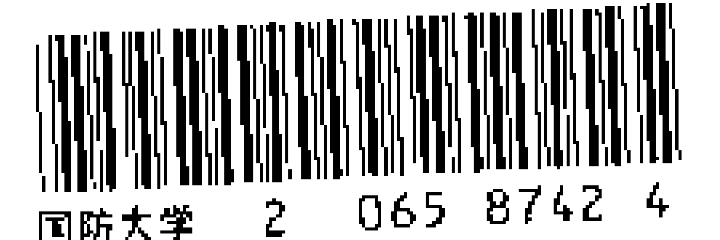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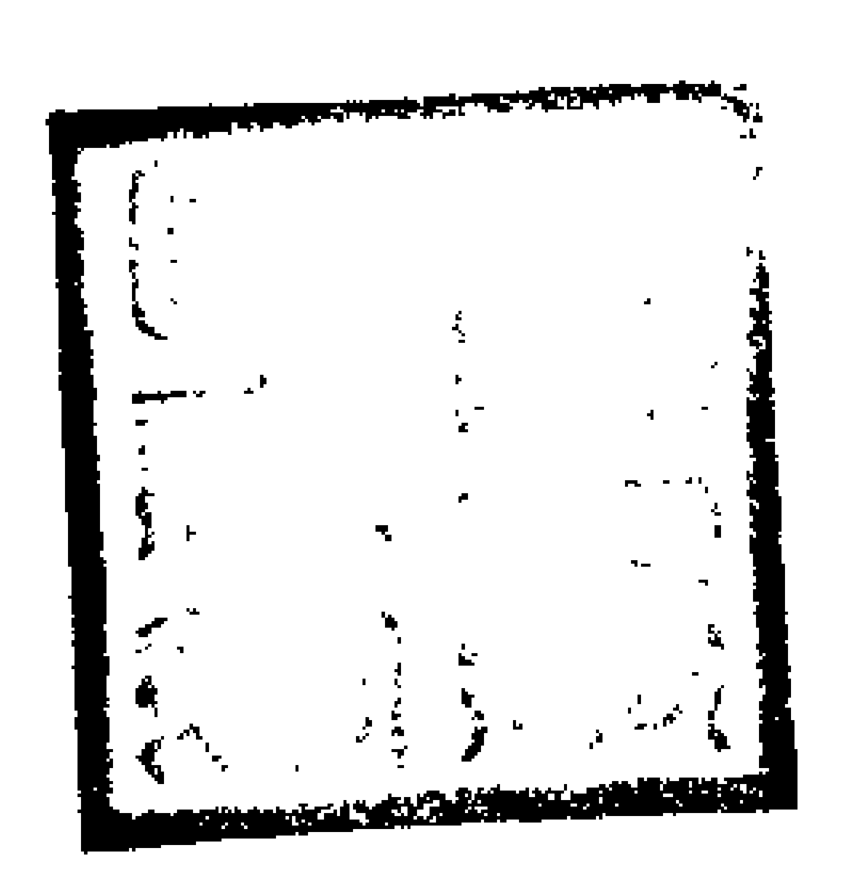


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吴冷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论战/吴冷西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
ISBN 7-5073-0473-6

Ⅰ. 十… Ⅱ. 吴… Ⅲ. 中苏关系-1956～1966 Ⅳ. 822. 35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44 号

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

作　　者/吴冷西
责任编辑/谭德山　徐永军
特邀编辑/李　捷
封面设计/李法明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外文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29.75 印张　50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0473-6/K·179　定价：5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苏共"20大"的震动

第一节　"破题"

1956年3月17日晚，我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到中南海的颐年堂参加毛主席召开的中央会议。

整个颐年堂由一个大厅和东西两个小厅构成，均以紫藤木雕刻装饰。大厅有100平方米左右，中间摆着一张大长桌，铺上深绿色的呢绒。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常在这里召开。

西边是一个小厅，由12张沙发围成一圈，通常是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地方（党的八大以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党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人数较少。党的七大选出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五人组成,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5年8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时又补选陈云为书记)。书记处开会时,也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列席,如邓小平、陈毅等,一般都在12人以内。七大选出的政治局成员有13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除任弼时1950年10月去世外,1954年高岗也去世。1955年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开会时人数较多,加上列席的有关部门负责人,通常有20余人,因此就在中间的大厅开会。

东边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便饭的地方,摆着餐桌。如毛主席便宴斯诺、斯特朗等美国客人时,我作陪,都在那里。通过一个过道往东走,便是毛主席住所四合院(原称菊香书屋)。

这次开的书记处会议,除毛、刘、周、朱、陈、彭真外,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都列席了。还有杨尚昆、胡乔木和我。邓小平在两年前(1954年)从西南局上调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所有中央局,这是高岗、饶漱石事件后中央采取的重大组织措施。毛主席早在撤销各中央局之前,就先后把各中央局的原第一书记上调中央工作,除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外,东北局的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的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长,西北局的习仲勋调任中央宣传部

长、中南局的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华北局的李雪峰调任中央工业部长。这样的措施，当时海外舆论类比如汉代的削诸侯和唐代的罢藩镇，其实质是加强中央集权。

我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在3月15日，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我的。他说，毛主席要求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1956年2月14日至25日举行)的秘密报告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便中央开会讨论。当时我以为要开政治局会议。我第二天接到毛主席秘书通知我到颐年堂参加书记处会议时，又以为会议缩小了。这都同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有关。我当时还不了解毛主席处理重大事件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处理重大事件时通常都是先开小会，再开大会。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先开书记处会议，酝酿一下意见，再拿到政治局会议去充分讨论。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在苏共“20大”不久，就断断续续地在西方报刊上透露出来。我党曾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朱老总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党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

把稿子拿走了。但是,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3月10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人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先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同志,全篇译校完毕再重印成本,再送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是在新华社把译文全部印出后才决定召集中央会议的。

当我来到颐年堂时,杨尚昆和胡乔木先我到达,接着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陈云同志以及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来了。此外还来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张闻天同志当时是协助周总理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曾是新中国第二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当教授,俄文、英文都很好。王稼祥同志当时是中央联络部长,主管同兄弟党的关系,他是新中国第一任驻苏大使,青年时代也留学莫斯科,俄文很好。

大约8点钟,毛主席到了。他坐下来就问我: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否都印发给大家了?我说:都发了。所有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都发了。毛主席接着问,报告是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吗?我说是根据这家报纸发表的英文稿译出的。(后来才知道,《纽约时报》的英文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从华沙获得的俄文译出的。)毛主席说,苏共搞得那么神秘,“20大”时只派人给我们口译一遍就走,而西方却得到了文本。这时小平同志补充说,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大会在25日闭幕。我们在会议期间没

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当时代表团商量，朱总司令年纪大，由我听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电报中央了。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搞突然袭击，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使各国党很被动。毛主席说，关于苏共"20大"，我们发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大会开始时根据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批判斯大林。虽然对他们的报告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支持。所以我们第一篇社论只谈了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苏共"20大"闭幕后，第二天接到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知道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但不了解详细情况，不好表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们当时的方针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在第二篇社论中，只讲了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最后笼统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毛主席接着说，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小平同志谈到，此次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苏方没有同我们单独会见，而是在同各国代表团礼节性会见时，对朱老总祝词中支持他们，对我们发表的社论，说了一些好话。但是，看来苏共的大国主义基本上没有改。作秘密报告，事前不打招呼，事后念一遍就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也强调指出，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恐怕

不易改。从彼得大帝开始，大国主义传统在俄罗斯人头脑中影响很深。他们两人因在苏联多年，谈了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事例。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大家刚拿到材料，可能没有来得及看完。我也刚开始看。希望大家仔细地看一看。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样，17日晚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可以说，这次会议只作了"破题"，即毛主席的两点意见，讨论还没有展开。

第二节 评论赫鲁晓夫报告

过了两天，3月19日下午，我再到颐年堂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上次书记处扩大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13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胡绳、邓拓等人参加。大家都在正厅围着那张大长桌坐下。我到颐年堂后不久，毛主席进来了。看来毛主席刚起床不久，因为不一会儿勤务员给他送来用茶杯盛的稀粥。他一边喝粥，一边主持会议。通常，毛主席晚上睡得都很晚，有时天亮时才睡。很多会议都是在下午

开，毛主席边开会边吃早饭。

毛主席边喝粥边说，请大家议论议论。有什么意见，可以讲一讲。他说：我从头到尾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过很吃力。总的感觉是很乱，不知你们觉得怎样？

接着，大家议论纷纷。王稼祥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张闻天、少奇、周总理都讲了话，好多人也在中间插话。

王稼祥认为，报告给他印象较乱，格调不高，近乎谩骂，没有讲多少道理。究竟斯大林错在哪里，说是个人崇拜、破坏法制。个人崇拜是结果还是原因，搞不清楚。讲到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肃反的错误，对战争准备不够以及战争初期瞎指挥，农业问题的错误，南斯拉夫问题的错误等，就是这么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没有讲出系统的、有分析的道理来。看起来这个报告写得很仓促。

小平同志说："20大"闭幕大会是2月25日下午。很可能是正式会议闭幕后在晚上举行秘密会议，开得很仓促。在"20大"会议上，只有米高扬几个人一般地谈到个人崇拜，其他人没有涉及。但秘密报告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如报告开头也讲到列宁是怎样讲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稼祥同志说，苏联不仅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是在国际共运一系列问题上，在对中国党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党历史上的错误，如立三路线，与斯大

林有关。特别是王明路线的错误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抑制各国党的积极性，对各国党瞎指挥，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危害很大。（王稼祥同志过去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曾表示支持，后来怀疑、反对，在中央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时同毛主席议论过。在遵义会议上他首先起来支持毛主席。毛主席曾多次肯定稼祥同志的功劳，说没有他首先起来造反，遵义会议不会那样快否定王明路线。）

张闻天同志在会上也讲到，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当然，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做了贡献，为苏联国防力量奠定了基础。苏联最后战胜德国法西斯是靠30年代建立的工业基础，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再一个问题是大国沙文主义，这次外交部召开大使会议，我们好些大使觉得与驻在国的苏联大使共同语言很少，话不投机。我国驻外大使觉得他们与英、法、美等国一样，都非常强调欧洲问题。他们是欧洲第一主义，以大国自居，在亚洲、非洲的工作开展得不好。这次驻外使节回来开会，大家觉得苏联看不起亚洲、非洲。

周总理也谈到苏联大国主义的问题。他说：这个问

题由来已久，我们搞外交工作时间不长，他们比我们长得多，理应比较有经验。但是，看来他们思想比较僵化，许多事情不讲策略。周总理说，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我们与杜勒斯(美国国务卿)、艾登(英国外交大臣)、蒙代斯·佛朗斯(法国外长)的斗争很复杂，怎样利用英法与美国的矛盾以孤立美国，怎样争取印度，当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时，莫洛托夫很古板，只讲斗、斗、斗，对怎样争取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考虑不多。他们的脑子里，要么就是破裂，要么按自己拟定的原方案办事，如果原来方案不成，第二个、第三个方案都没有准备。他们把英、法、美这些国家都看作铁板一块，没什么矛盾可以利用。他们不讲利用中间势力，这也与斯大林过去的公式有关。斯大林一直认为中间派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说它是最危险的。这个公式当然是错误的，应该是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日内瓦会议在朝鲜问题上很快就闹僵了。我们准备几个方案，事先与苏联同志商量时，他们认为没什么好谈的。我们明知问题比较困难，还是准备了几个方案。在会议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几个方案提出，美方都拒绝了，这就充分揭露美国顽固不化，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美国真面目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而苏联代表团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可能反映苏联满足于朝鲜南北对立，要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面。

周总理又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争取和平解决，但苏方不积极，认为还要打下去。当时法国政府自己也觉得打不下去，困难很多。法外长当时希望按他们的条件停战，我们提出要利用这一点做法国外长的工作。莫洛托夫认为没什么可谈的。葛罗米柯当时是莫洛托夫的助手，他认为法国与美国一样不愿意和平解决。我们提出要改变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做英、法、印度、加拿大、泰国等国的工作。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矛盾，因为美国希望把战争继续下去，把法国拖垮，由它接手。我们要利用美法这种分歧。当然苏联最后还是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内瓦会议说明苏联同志比较僵硬、不讲策略，他们处理许多问题都是这样。

总理还谈到在中苏两党关系中，历史上有过多次事件。在党的七大之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我党的许多错误时，我们没有讲苏联，只讲自己犯错误。但实际上许多问题并不是我们决定的，而是苏共决定的，或由苏共主持的共产国际决定的。当时中国党只是照办。现在谈斯大林的错误，应该说中国革命受的损失，苏共要负一定责任。看来共产国际解散是对的。一个外国党，尽管是一个大党，历史很长的党，像苏联党这样由列宁创立的党，对别国的革命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未必正确，甚至可以说肯定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不了解别国国情，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别国革命运

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要犯错误。我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我们结合得好。我们没有按斯大林的意见办，按毛泽东思想办。

毛主席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这时已是6点多钟。大家都没有吃饭，毛主席宣布会议暂停，以后再来讨论。

第三节　怎样看待斯大林

过了五天，3月24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在颐年堂。会议开始时，毛主席就讲了比较系统的意见。看来休会这几天他是做了认真考虑的。

毛主席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

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毛主席说，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毛主席这时停了一会儿，大家知道他还没有说完，谁也没有插话。他接着就说了他六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

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2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人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

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主席说,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他的看法。他讲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逻辑性，对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什么分析。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一股脑儿都算作个人崇拜。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像刚才毛主席讲的，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题是怎样不使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一系列的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而在于怎样才能使小错不致发展成大错。

少奇同志说，我看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肃反扩大化，这与王明"左"倾路线时肃反扩大化相似。第二条是在苏德战争前夕缺乏必要的警惕，没有对希特勒搞闪击战保持高度警觉。但话说回来，希特勒既然要搞闪击战，他必然要用各种欺骗手段。苏联完全觉察也难。问题在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德苏协定，没有估计到希特勒会这样快发动进攻。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现在我们根据也不充分。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那么苏联卫国战争是如何打赢的呢？说不清楚了。第三条是农业问题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包括赫鲁晓夫搞开垦荒地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四，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指导各国党有许多错误，不仅是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在指导中国党及其他兄弟党的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

少奇同志强调指出：对这些错误要作历史的分析，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

的结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不能说都是斯大林个性粗暴造成的。把种种复杂的现象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样就不仅不能解释错误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从错误中吸取历史教训。我看，斯大林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斯大林有些理论是错误的。比如总理讲的斯大林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是打击的重点。但斯大林许多理论还是对的，不过他实际上没有完全照那样做。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他都讲了，有时还强调民主。但是看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又不那么言行一致。再比如自我批评问题，他也讲了自我批评只会提高威信，不会丧失威信。可是从秘密报告看来，斯大林骄横专断，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实在的。但我们也不能说斯大林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

少奇同志接着讲了他 1949 年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的情况。少奇同志说，1949 年夏天我们去莫斯科，那时苏联方面接待我们很好。有一次斯大林宴请我们，他在祝酒时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不赞成你们同国民党打仗，认为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你们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你们打赢了。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为胜利者——中国党干杯！少奇同志说，这时我站起来说，我不能干杯。中国人民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的，这个胜利是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应该为我

们共同的胜利干杯,也为苏联党干杯!我这样说了以后,斯大林不同意,坚持为中国党干杯。这样争论了很久,局面很僵。最后,斯大林才说,好吧,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干杯,为中国党也为苏联党干杯。从这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知道他要中国党不要打自卫战争是错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我批评精神。对斯大林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作具体分析。

毛主席接着说,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小平同志在会上讲到,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当然不能把斯大林的所有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个人崇拜是个坏东西,我们党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我记得延安整风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讲领导方法时,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就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党是有群众路线传统的。我党七大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搞群众路线,集体领导,自我批评。毛主席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8年写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是贯彻群众路线防止个人崇拜的重要文献。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明

确提出不突出个人，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方、街道、工厂等，都是有远见的、正确的。赫鲁晓夫报告中讲那时不能对斯大林提不同的意见，谁提不同意见就保不住脑袋。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共产党人应当坚持真理，不坚持真理，阿谀逢迎，算什么共产党人。而且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里不能提不同的意见，这怎么行！怕死怎么行！赫鲁晓夫说怕丢脑袋，不能以此来原谅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能说错误都是斯大林的，没大家的份儿。功劳是大家的，没斯大林的份儿。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

会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都讲了话，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去影响很坏。当时已有迹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受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们过去同苏共说一样的话。苏共习惯于把各国党当作自己的传声筒，对国际群众组织更不在话下。所以，一些兄弟党有人退党，英国党、美国党都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悲观失望。有几位同志提出，在这样的风浪面前我们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主席问大家是不是要表态。他说，是不是用支持苏共“20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40

周年。是不是40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这样，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一篇文章，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加以协助。毛主席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后，陈伯达要我帮助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供他起草时参考。由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比较充分，许多观点都讲了，所以他如期把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形成初稿。

第四节 探索正确道路

十天以后，4月3日下午，刘少奇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人与上次差不多。会上大家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初稿。

在这之前，这篇初稿出来后，小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指定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同陈伯达一起讨论修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后由陈伯达再行修改，于4月1日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这次少奇同志主持讨论的已经是第六稿。

在少奇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大家对文章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少奇同志说，“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

译名，用哪个更合适？现在用的是"个人崇拜"，先这样用也可以，不过，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好一些。（按：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是"个人崇拜"，后来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才改用"个人迷信"。）文章中要突出斯大林错误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要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间还不长，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经验。

小平同志也讲，我党历来提倡群众路线、集体领导，与个人崇拜相对立。这是我党的传统，文章已经提到，但要更突出地写。

周总理说，稿子中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我党历史，不要使人误以为我们现在号召国际共运反教条主义。周总理指出，现在已有些兄弟党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泄露后，借反教条主义之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伟大功勋还要再加强调，写得更充分些。这篇文章主要不是对苏共，而是回击西方反共反苏。其他同志还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征求大家意见后说，政治局原则通过。要陈伯达先根据会上的意见修改。他还说毛主席还要召开会议讨论。

4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人数较少）。他先把他昨天夜里在稿子上修改的意见作了解释。他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毛主席着重讲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是：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他说，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套硬搬，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

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还讲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影响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主席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根据会上其他同志提出的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方面的意见，我们当场把稿子改好了。毛主席决定，文章当天晚上广播，4 月 5 日见报。因为 4 月 6 日米高扬将率苏联代表团到北京。

由于时间匆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 月 5 日发表前来不及在文字上精雕细刻，还存在一些缺陷，论点有些重复，文字有些累赘等。

第五节　文章的要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主要论点是：

1. 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 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

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主观主义,产生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自己原来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

3. 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

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 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文章肯定,苏共"20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物的斗争。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 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党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

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 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 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





人民日報

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版面。

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第六节 必要的说明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它充分肯定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的方面，也批评了他们次要的错误的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又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提出新的发人深思的观点和令人信服的论据。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4月5日发表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开始同外国党的同志说明我们对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的态度。虽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从正面阐述了我党中央立场的，明眼人也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但是，中央以为，还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

告作必要而又适当的表态。

毛主席首先同兄弟党谈及批判斯大林的是苏联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的第二天，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连同斯大林时期援助的141项，合共156项）的协定。毛主席在会见米高扬时，感谢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并表示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毛主席又谈到，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嚷，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主席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几天后毛主席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又重申了我们党中央对斯大林的看法。

4月29日，毛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包括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的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议论纷纷，一致给予好评。毛主席对他们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主席在

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9月和10月，在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我国国庆节期间，毛主席会见了好些兄弟党的代表团，对其中有的兄弟代表团，也谈了我党对斯大林的看法。

毛主席曾单独同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到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指出存在着好像老子党对儿子党的关系。毛主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共代表团在中共八大大会上致词时大讲苏共如何伟大，对中国革命如何帮助等等，俨然以老子党自居。

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毛主席谈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毛主席还说，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主席同英共主席波立特等会谈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主席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因，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

放在如何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集中表现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第二章

苏波关系与匈牙利事件

第一节　苏联兵临华沙

1956年10月中旬，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突趋紧张。波兰境内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苏军也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港口前进，华沙气氛非常紧张。10月20日下午，我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政治局会议。八大新选出的政治局成员，包括常委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还有委员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等都出席这次会议。林彪、林伯渠、刘伯承都因病未到会。另外还有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等也参加。

这次政治局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穿着一身睡衣，一开始就说明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他说，收到苏共中央一个通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力在波兰驻军，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对此有什么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事情很紧急，很严重，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联。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的消息？我汇报说，今天上午收到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连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华沙工人也武装起来。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传出的消息说，苏联的军舰已集中在波兰的港口格旦斯克（即过去的但泽）港外；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苏联军队也在调动。这些都是西方通讯社的消息。

毛主席听了之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

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还谈到我们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的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接着会议上议论开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动用军队，这不仅给帝国主义一个机会，而且无法向苏波两国人民，特别是波兰人民交待。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独立平等的原则的。即使按照一般国际法也是不允许的。大家一致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警告苏联，表明我们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传出消息：苏联一个代表团已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包括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等，差不多苏联的主要人物都去了。

苏波关系这样紧张，要从苏共“20大”以后波兰的局势说起。

1956年2月苏共“20大”以后，6月间波兰各地不满情绪在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

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按：哥穆尔卡是1945年—1948年任波党总书记，1948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1年被监禁，1954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个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都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11月初开中央全会，到10月15日又确定提前在19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开完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

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 10 月 19 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很久（有人说一个小时，有人说两个小时），最后才被允许降落。

这是 19 日上午的事情。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20 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同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的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在赫鲁晓夫 10 月 19 日率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之前，苏联已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则向波兰港口格旦斯克方向集中。这是 10 月 17 日下命令的。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就通知我们，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我们的意见。

所以，在 10 月 20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准备动用武力的，但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政治局决定尽快向苏联提出警告，要尽力制止赫鲁晓夫动用军队干涉波兰内政。鉴于形势紧迫，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主席亲自出面，立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明确向苏方宣布我党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第二节　毛主席警告赫鲁晓夫

在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马上通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我党中央的决定告诉他。毛主席把胡乔木和我留下来，让我们俩人参加会见。

毛主席整个下午开政治局会议时就一直穿着睡衣，接见尤金时也没有换衣服，就在他的卧室中接见。尤金带着一个参赞来，到达时已是晚上 7 点多钟。尤金来后，毛主席对他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当时毛主席讲得很严厉，并且一再重复。毛主席说，现在时间不多，你们赶紧回去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这样，会见很快就结束了。

尤金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都非常紧张，他带来的苏联

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也非常紧张，他负责记录。尤金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帕擦脸，不断地说“да”“да”(意即“是”，“是”)。

最后，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你们也没事了，不过你们新华社要24小时值班，有什么重要消息立刻通知我。这样，我们就离开了。

20日夜，我很晚才睡，一直守候在办公室等待着有什么新的消息，同时告诉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要注意所有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有关于华沙方面、苏波关系等消息立刻通知我，一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同时关照办公室值班秘书，如有重要消息马上叫醒我。

10月21日上午，我睡不到四个小时就来到办公室，很快就看到《参考消息》编辑部写的要闻提要，并马上把参编部选报的同志找来，请他告诉我刚刚收到的消息。据西方通讯社消息，苏联代表团已离开华沙返回莫斯科。后来才知道，苏共代表团19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据说，两党代表团在19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蛮横。会谈很快变成了激烈的互相指责。

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

意苏方的意见(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因为这本来就是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引起的。据波兰同志后来告诉我们,赫鲁晓夫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原来苏籍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因为所有道路都控制在波兰公安部队手中。公安部队的司令就是原来与哥穆尔卡一起坐牢的科哈马将军。他与哥穆尔卡一起在七中全会上恢复名誉,从监狱中出来后被任命为公安部队司令。苏联军队的行动被发现以后,科哈马立即报告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快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要你们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

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抵抗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支，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这样，苏共代表团在20日早晨返回莫斯科。我们在21日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形势已经缓和，苏联军队没有入城，但华沙仍很紧张，工人自卫队和公安部队仍然在街上巡逻，波兰国防军在驻地备战。同时，外国通讯社还说，在格旦斯克港外的苏联船队已向列宁格勒方向返航。所有这些消息，我们都随时收到随时排印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办公厅、外交部和中联部。

第三节　苏波中三角会谈

22日晚上，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来电话，要我

马上到主席家中开会。我晚上7时半到达毛主席的卧室,知道是政治局常委开会。这是在中共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按:政治局常委包括党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林彪因为不是中共八大选出的副主席和常委,没有参加。但即使是在1958年八大第二次会议补选他为副主席和常委以后,我每次列席常委会议也很少看见他参加。)这晚参加会议的除六位常委外,还有彭真、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他们几位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彭真通常在小平同志不在时主持书记处会议,实际上等于副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议他都参加。张闻天同志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由周总理兼任)。王稼祥同志是书记处书记兼联络部部长,专管与兄弟党关系的。胡乔木是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也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之一。一般有关国际问题的会议,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参加讨论。此外,我和田家英列席。

毛主席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大家都坐在床前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随便闲谈。人到齐了以后,毛主席宣布"言归正传"。毛主席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苏共中央打来电报,邀请我们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他们建议苏、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主席又问到今天又有什么新的情况,我将当天收

到的外国通讯社报道的情况扼要汇报。主席说，赫鲁晓夫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动用军队干涉波兰。这主要是他在波兰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估计如果他用武力应付会爆发战争，而且不容易一下解决问题。当然我们党的表态对他也有一定影响。通知尤金是在20日晚上，北京与华沙时差有6个小时，等于在华沙的20日中午，而赫鲁晓夫软下来在19日晚上。他在20日回到莫斯科才得知我们的态度。所以决定的因素是波兰的抵抗，波兰党坚定拒绝苏共的无理要求。

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也讲，赫鲁晓夫在19日晚上软下来，主要是波兰的因素，但是我们坚决的表态，苏联代表团回到莫斯科就知道了，所以请我们参加他们的谈判。

毛主席提出，我们是参加还是不参加？少奇同志主张参加，周总理也主张参加。

后来大家又谈到，我们派代表团去，怎么跟他们谈呢？毛主席说，可以三方一起会谈，也可以不跟他们一起会谈。三方会谈是因为我们提出和平解决，但是我们不是直接有关方面，是间接有关方面。毛主席设想：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毛主席的这个设想大家都赞同。

常委会最后确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波苏友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两方的会谈。会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苏方要求我党代表团要在23日上午乘苏联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

这天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时间比较短,以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准备第二天早晨启程。

从这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分别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代表团有些请示需要马上答复的,常委议论之后当场起草电报发出。

据少奇、小平同志发回的电报,莫斯科会谈进行得还好。我们首先严厉地批评苏联调动军队,指出战争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冒险的行动。少奇同志讲得非常尖锐。据代表团报告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差不多全体都参加了,他们都硬着头皮听我们讲。同时他们也诉苦,说波兰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强烈,不好办。苏联在波兰驻军完全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安全。但他们也说,他们到华沙后也有同我们提出的意见相同的想法,即通过

谈判，和平解决苏波分歧。所以苏共中央已下令驻波兰和民主德国的苏军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

我党代表团表示，我们努力做波兰同志的工作，希望波苏友谊不断地得到加强，我们愿意为此尽最大的努力。苏方对此也感到高兴。

我党代表团也跟哥穆尔卡为首的、包括奥哈布等人组成的波党代表团进行会谈。我党代表团在会谈中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少奇同志介绍了我党政治局曾严厉警告苏联不要武装干涉波兰的经过。同时，少奇和小平同志也劝波兰同志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合作，度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我们希望波兰与苏联的关系搞好，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我们对波兰寄予希望，也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苏波关系。

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情现在发展到何种程度。他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他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这时哥穆尔卡是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身份谈话的。苏共代表团在20日晨离开华沙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继续开会。政治局一致推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代替奥哈布。哥穆尔卡

在当选后发表著名演说——《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10月23日起，苏、波、中三国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像走马灯似地轮流双边会谈。苏联代表团同波兰代表团谈过后和中国代表团谈，波兰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谈过后也同中国代表团谈。中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谈后又与波兰代表团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两点：第一，苏波两党尽快再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协商解决分歧并达成协议(因为这次会谈是不公开的)；第二，苏联单独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这个宣言10月30日发表了，内容很特别，其中苏联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声明要改正这些错误，表示要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波兰党商妥的。我代表团还答应，在苏联发表宣言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加以支持。这就是让苏方自己先采取主动，我们然后表示支持。这是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在莫斯科设想的方案。

中共代表团29日将这一计划报国内。毛主席在10月3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方案，并在11月1日专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说明情况，征求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取得他们的赞成，然后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声明。

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但是，在波苏关系紧张的过程

中，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第四节　匈牙利反革命叛乱

1956年10月间，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发动暴乱，匈牙利政府要求驻匈牙利的苏军支持他们平息反革命叛乱。可是反革命叛乱越来越凶，匈牙利人民政府岌岌可危。这时苏联当局动摇起来，准备把苏军撤出匈牙利。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方面讨论了苏波中三党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同意由中国政府出面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同时，又讨论了匈牙利的局势，认为苏军不能坐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不管，撤出军队。

匈牙利事件也是苏共"20大"以后开始的。在苏共"20大"开过不久，1956年3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要求所谓"民主"、"自由"。匈牙利当时许多人思想混乱，大学生也开始闹事。在这种形势下，7月间，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党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

从这时起，匈牙利开始平反冤狱、错案。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拉伊克平反。他曾经是匈党领导人之一，后来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在10月间，匈当局不仅为他平反，而且举行国葬。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形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差不多同时，纳吉也恢复了党籍，他也是匈牙利的著名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苏联红军，战后回国，当农业部长，1953年7月当了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4月下台。当时，匈牙利党中央指责纳吉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并把他开除出党，10月间又恢复他的党籍。这时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很混乱。

10月20日哥穆尔卡在波兰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并且发表了“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演讲。此事也冲击了匈牙利。当时裴多菲俱乐部发动游行，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上街，示威群众要求纳吉上台。匈牙利政府开始下令禁止示威游行，后来又撤销这个禁令。但公安部队已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一些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10月23日，示威游行的规模更大，冲突更加严重。这时匈牙利党宣布撤换原来的总理格罗（他当时任党的第一书记，但有名无实），由纳吉当总理。政府宣布戒严，同时邀请苏联军队帮助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根据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华沙条约，苏联在匈牙利境内驻有军队，但在首都布达佩斯并无驻军。10月24日，苏联军队进驻布达佩斯。这时匈牙

利的军队一批又一批参加示威群众行列。

10月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飞到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工人党中央的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来代替格罗当第一书记。但是群众的示威和骚动仍继续不断，反革命叛乱分子混在示威群众中，挑起同公安部队冲突，情况越来越严重，整个布达佩斯一片混乱。

10月25日，新任总理的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并宣布实行戒严。即使这样，罢工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布"解放"。布达佩斯到处听到枪声。

许多匈牙利流亡分子通过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边境涌入匈牙利，西方的记者也大批地涌进匈牙利。西方的电台鼓动匈牙利人举行反苏起义，匈军一些部队与叛乱分子站到一起。

10月27日，苏联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群众与苏联军队的关系比较融洽，互相开玩笑，小孩爬到苏军坦克上玩。看来当时群众还是拥护苏联军队平息叛乱的。

这一天纳吉宣布成立新政府，免去了好几位共产党员部长的职务，而吸收一些非党员参加政府。

28日，匈牙利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这次会议要求所有各方停火，并要求成立新的军队，要改

变国徽、国庆日，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这时匈牙利各省都宣布“解放”，广播电台掌握在叛乱分子手中，要求苏军立即撤退。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显然，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于10月29日再次飞到布达佩斯。他们在同匈牙利当局会谈时说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这是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时，从苏联方面得到的通知。我们代表团认为此事很重要，立即报告中央，请求中央指示对此事应采取的方针。

第五节　抛弃还是支援匈牙利人民

10月30日，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支持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的声明的同时，也讨论如何对待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主席指出，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人民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苏联在这时对匈牙利撤手

不管,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就完了。苏军应当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当时大家觉得,苏联曾想在波兰动用军队,结果碰了钉子,只好放弃武力干涉内政;现在对匈牙利也想采取放弃武力支持的方针。其实,匈牙利的情况同波兰完全不同。苏联如出兵波兰,就会爆发波苏战争。在匈牙利的苏军既是根据华沙条约又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帮助维持秩序的。显然,现在匈牙利党和政府无法控制局势,这时如果苏联不帮一把,撒手不管,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这与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波兰采取武力干涉内政的方针,是完全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在匈牙利动用苏联驻军帮助政府和人民平息反革命叛乱,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相反,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针,撒手不管,听任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垮台,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会议很快得出一致的结论后,毛主席提出,要赶紧起草电报,告诉少奇和小平同志,要他们代表我党中央郑重向苏共中央提出,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给代表团的电报当晚就起草好,经宣读通过,立即发出。这时已是10月30日深夜。

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于10月31日下午紧急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向他们转述我党中

央的意见。少奇同志讲得很严厉。据少奇同志回北京后说,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都认为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是不得已的事。目前的状况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好撤军。少奇同志最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真是现在撤兵,对匈牙利撒手不管,那么你们将要成为历史的罪人。苏共主席团听了这些话大为震动,但当时并没有表示苏军要留在匈牙利。

11 月 1 日,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党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时,赫鲁晓夫特意到宾馆送行,并和少奇同志同车赴机场。在赴机场途中,赫鲁晓夫在汽车上对少奇同志说,昨天下午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们一夜之间来了 180 度的大转弯,变得很快,但很正确,我们支持你们。赫鲁晓夫接着讲了一大通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的理由,差不多跟昨天我党代表团批评他们时讲的一样。少奇同志当然表示完全赞同。在飞机场贵宾室,苏共主席团全体成员到场热烈欢送我党代表团,逐个与代表团成员紧紧拥抱,并一再表示衷心感谢我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帮助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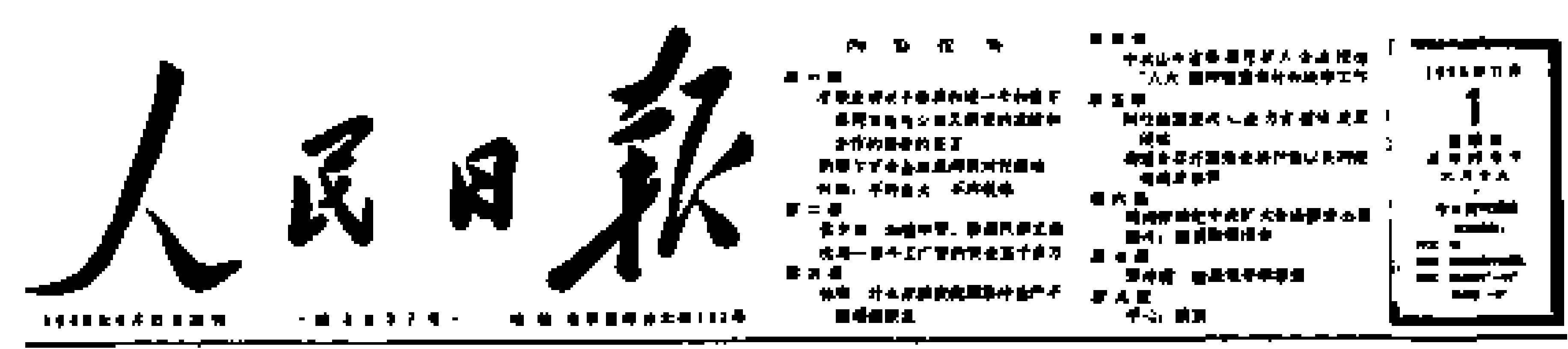
本来,赫鲁晓夫准备从匈牙利撤出苏军的决定,于 10 月 29 日飞到布达佩斯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已正式通知纳吉政府,苏联军队也从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开始撤出。纳吉 30 日在电台上宣布苏军开始从匈牙利撤退,并宣布

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卡达尔不同意纳吉的决定，他离开布达佩斯，在匈牙利东部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这样，在匈牙利出现了两个政权：一方面是卡达尔宣布成立的工农革命政府，它宣布匈牙利还留在华沙条约组织，而且要求苏联军队停止撤出，帮助工农革命政府平息叛乱；另一方面是纳吉改组的政府，吸收小农党、社会民主党等参加，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同时实行大赦，释放全部政治犯。这样，纳吉政府显然抛弃社会主义旗帜了。

11月3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又在布达佩斯同纳吉谈判，劝说纳吉放弃原来的决定，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并表示苏联仍支持他。但是，纳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且宣布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要求苏军立即撤退。谈判于是中断。

11月4日，苏军根据卡达尔工农革命政府的要求，重新进入匈牙利布达佩斯。卡达尔政府宣布解除纳吉的一切职务。纳吉跑到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布达佩斯的叛乱很快平息下来，匈牙利全国各地的叛乱也很快平定。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下来了。

也正是在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震动世界的事情，英国和法国对埃及宣战，出兵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此事激起全世界的反对。在联合国大会议论纷纷，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对英、法实行制裁。



不许放火 不许侵略

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

1956年11月1日、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

英军是 10 月 30 日出兵埃及的，这一天也是苏军开始从匈牙利撤退。10 月 31 日苏军停止撤退，重新支持匈牙利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11 月 4 日，苏联增派军队到匈牙利并开始进入布达佩斯。这时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东西方两面锣鼓一起响起来：苏军进兵布达佩斯，英法军队侵略埃及的苏伊士区，两套锣鼓，性质完全不同。苏伊士的锣鼓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这对苏军支持匈牙利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很有利。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能够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干涉匈牙利。这是匈牙利事件平息下来的有利的国际条件。

10 月 31 日，毛主席又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匈牙利的局势，表示坚决支持苏军留在匈牙利。

11 月 1 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会上把当前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波兰、匈牙利以及埃及的情况和我们的方针对民主人士讲了。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我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对外关系宣言的声明。这个声明 11 月 2 日发表了。

第六节　两次事件的观感

11 月 2 日下午，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下飞机后即到颐年堂，向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汇报。整个会议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

少奇同志除了谈到上面所讲的情况以外,还谈到我们代表团与苏共主席团会谈时,苏方一个接一个地讲波兰如何反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如何反苏;苏方曾给波兰很大的援助,但现在波兰不买账。苏联同志激动地说波兰对苏联不公平,忘恩负义等等。我党代表团只好劝他们平心静气,理智地而不是感情地对待当前的严峻形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严肃地指出:苏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帮助,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功劳。希望他们能胸怀宽大些,搞好与波兰的关系。使用武力干涉波兰是极其错误的。

据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说,与波兰代表团会谈时波兰同志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对苏联是一肚子气。他们说,苏联过去是欺负他们,把他们当作殖民地,剥削他们的资源、劳动力;苏联从德国拿到的战争赔偿,一分钱也不给波兰,等等。他们谈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有关苏联欺负波兰的具体事实。他们一直追溯到历史上苏联党在30年代如何清洗波兰党。许多波兰共产党人无声无息地在苏联"失踪",现在才知道是在苏联肃反中被处死了。波兰同志讲起来慷慨激昂。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激动得有点像我国搞土地改革时贫雇农吐苦水。少奇同志说,看来哥穆尔卡还比较冷静,他没有讲这些话。他自己在1953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来又坐牢。他在会谈中没有抱怨,没有发牢骚,反而强

调改善苏波关系，加强苏波友谊。少奇同志说，我们在莫斯科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是取得成功的。后来双方谈得比较好。但这些问题不是一天能完全解决的，具体问题还要他们协商。从大的方面看起来，经过莫斯科会谈，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

关于匈牙利问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讲到，开始苏联很坚决地要从匈牙利撤兵，表示毫无商量的余地。他们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已经完了，除撤退苏军没有别的办法，否则就要打仗。他们情绪非常低沉、悲观。据说，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呆得不耐烦，觉得没事情做，要求赶紧撤兵回来。10 月 31 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与苏联主席团谈判时，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只有撤兵一条路可走。少奇同志说，11 月 1 日，我们要离开苏联时，赫鲁晓夫在汽车上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们主席团昨天一整夜讨论是否从匈牙利撤军的问题，最后决定不撤。他所讲不撤军的理由与我们前一天跟他们谈的理由一样。少奇同志讲，看来苏联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符合辩证法，片面性很严重，忽左忽右。一个时候主张非撤兵不可，隔了一天又讲无论如何不能撤兵。但这也有好处，就是思想不是那么僵化。我们向他们提出意见后，他们是能够考虑的，最终改变了原来撤兵的决定。

这次会议开得不长，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刚从莫斯科返回，非常疲劳。毛主席说，这次会先开到这里，先回

去休息。晚上不到九点会议就结束了。

11月4日，在苏军重新返回匈牙利，重新返回布达佩斯之后，毛主席又召集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估计苏军重新返回后，匈牙利的叛乱将会平息，但匈牙利政权的巩固要做耐心的、艰苦的工作。毛主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20大"有个好处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我们4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苏共"20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这个时期各国党对这个问题新发表了许多意见，我们已经编了两本小册子。我们可以认真加以研究，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再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把

当前的国际形势告诉高级干部,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并让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也列席,听取周总理的国际形势报告。会议同时还决定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除了讨论1957年的计划草案外,主要也是讨论国际形势,让全党知道中央政治局这时期的重大国际活动。毛主席还提出,再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39周年,要热烈庆祝一下。苏联大使馆将举行庆祝会,我们可多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以表示对苏联的支持(后来毛主席本人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关于写文章,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先酝酿一下,待开过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再来讨论。

11月10日到15日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当前时局的报告,主要是讲我党对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所采取的方针以及苏波中三党分别会谈的经过,说明我党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也谈到英法侵略埃及,说明我们在全国举行支援埃及的群众示威集会是完全必要的。

毛主席11月15日在会上讲话时讲到波苏纠纷和匈牙利事件,也讲到苏共"20大"。毛主席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关于苏共“20大”，毛主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欧好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掉。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毛主席还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七节　在反苏反共浪潮面前

就在二中全会前后，全世界都议论苏军帮助匈牙利政府平息反革命叛乱。西方资产阶级大肆攻击。许多共产党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发表谴责苏联的言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 11 月 11 日在普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第一次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从 11 月 25 日开始，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加上别的有关负责同志约有 10 人参加。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的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头的小会议厅举行。

在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床的左边放着新旧书籍、报纸、杂志。惯常中央常委在床前，座椅围成半圆形。靠床头右边坐的通常是小平同志，因他的耳朵有点背。从毛主席卧床的右边到左边挨次是彭真、少奇、周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按习惯我是坐在最左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办公桌。这些常委会议，陈云同志 1958 年以后参加较少，因为他身体有病，经常休养；朱总司令由于年纪大，开会又多在晚上，一般也不参加。

11 月 25、27、28、29 日，这四天会议，除周总理因出访东南亚没有参加外，大家广泛议论，着重讨论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对铁托的讲话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声明的看法（这些讲话、声明和文章，新华社收到译出后即分送中央各同志，然后登在《参考资料》上，后来又汇编成册），然后议论如何再写一篇评论，表达我们的观点。

在这几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到，英法侵略埃及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苏联很快地平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都是好事情。但这两台锣鼓一起敲，国际上许多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军平息匈牙利叛乱混在一起，不分黑白地一起谴责。甚至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分不清敌我，分不清是非。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些不坚定分子动摇起来，有些人甚至公开宣布脱党。这种情况从赫鲁晓夫在苏共“20 大”的反斯大林报告泄露后就开始，越来越严重，到波苏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反苏反共达到高潮。

毛主席在会上针对这种情况说，共产党中有些人脱党，当然使党员数目上有损失，但是去掉脓包，包括一些叛变分子和动摇分子，党更加健康，更加坚强、巩固，也是好事。

大家着重议论到铁托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问题。大家认为，铁托的提法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这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的做法。毛主席在会上说，所谓斯

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政治局会议议论到：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同对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区别，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

这四次会议议论很多，慢慢就形成一些比较重要而又同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潮有关的观点。毛主席在 29 日讲到要写一篇文章。他初步设想，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要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毛主席说，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古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然后再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因为

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比较容易接受。

毛主席还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 年斯大林 60 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 年他 70 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 60 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 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

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第八节　毛主席的基本论点

经过四天的会议，毛主席11月30日归纳大家的意见形成文章的初步轮廓。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

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的民主

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到了12月2日晚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阐述他的设想。他说，前几天试想这篇文章可以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做题目，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20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要看文章写起来如何再定。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意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

毛主席接着就提出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

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马列主义的书还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在文章的要点这样确定之后，毛主席就叫胡乔木和我起草这篇文章，田家英也参加。我们三人先商议一下分工，然后分头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一人把全部稿子通改一遍。在12月12日拿出了初稿。当时用的题目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的主要意见是：辩解比较多，而正面阐

述意见还不够。正面阐述中对什么是共同道路没有说清楚,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哪儿条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规律要明确地概括出来。对铁托讲得多了一点,初稿有几处引用他的话再来反驳,给人印象似乎我们主要是同铁托辩论。其实,铁托的普拉讲话只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由头。当然,对他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是要彻底批判的,但是不适宜引用他的许多论点逐条批驳。对斯大林的评价应比4月间的文章讲得深一点,要讲出他犯错误的原因。过去我们只讲他的思想原因,现在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初稿中对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讲得还不够。现在教条主义还不少,这一部分应当多费些笔墨。对修正主义要集中分析它的主要论点,主要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少奇同志着重指出,修正主义者说的民主问题可能是要害。他们打的口号是要“社会主义民主”,实际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要把这个问题说透。大家还认为,在加强团结方面,应充分利用苏共10月30日对外关系宣言中讲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应遵守的原则。比如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要展开讲一讲。因为大国的大国主义是严重的,同样也有小国的大国主义,比如南斯拉夫对匈牙利就指手画脚,甚至对波兰也指手画脚。这些问题都要讲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这天会议上大家提的意见比较原则,也比较重要。会议决定:文章要作较

大的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第九节　从分析世界基本矛盾入手

经过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连续四五天的修改之后,毛主席在12月19日、12月20日下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讨论文章的修改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以及有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中说,假如党不犯错误,10月23日的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这样说太简单化了。因为有些因素,如国内外反动势力,不是共产党能决定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论述中要把闹事的工人、学生和一般市民同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可以说群众是无罪的。但匈牙利确实存在反革命势力策划叛乱。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性质。至于苏联第一次把军队开入布达佩斯,我们不说他不对,也不必为此事辩护。如果匈牙利党是坚强的,始终不动摇,牢牢掌握军权,那苏联军队也可以不开到布达佩斯去。虽然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但也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派兵,要看具体情况。后来,叛乱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岌岌可危了,这时苏联军队应邀支援匈牙利工农政府则应

明确肯定是正确的，因为情况变了，苏军不支援就等于抛弃匈牙利人民政权。总之，对匈牙利事件要对它的总的性质作估价，不要细说每一件事情，更不要斤斤计较地为每一件事情辩护，不必逐一回答各种议论。

第二，关于苏共"20大"，应说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一切是不对的。没有肯定斯大林正确的东西，造成右倾的危险，结果修正主义思潮果然泛滥起来了。对苏共"20大"要有分析，既要肯定其正确方面，又要指出其错误。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很凶猛。毛主席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要从当前世界两大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讲起。毛主席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

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第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要理直气壮地讲苏联的基本经验，然后指出苏联在历史发展中也有曲折，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我们在指出缺点和曲折时，决不能忽视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能忽视它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是正确的。教条主义不承认错误，不接受教训，不改正错误。修正主义是强调错误的，否定正确的成功的，否定一切，从右的观点看待苏联基本经验。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是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集中点。因为当时国际上议论纷纷。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议论，铁托的普拉演讲，焦点都是对斯大林的评价。对苏联的评价也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引申出来的。大家认为，我们的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指出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造成的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最集中的，一是肃反问题上的扩大化，一是对外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是肃反还是对外关系，都有他正确的一面。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错误是有大国沙文主义。这一

点无须掩饰，因苏联政府10月30日对外关系宣言自己也承认了。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还不完善，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缺点。即使没有缺点，也有一个怎样运用制度的问题。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斯大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个人专断，在认识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讲错误的原因首先要从思想上讲清楚，再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讲清楚。这样才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教训。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

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的讲话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别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过分了。

这两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讨论完之后要我们再去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常委。

我们按原来分工的办法,两天把稿子修改好,然后送政治局常委。

毛主席12月22日晚上召集常委讨论我们的修改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第十节　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过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文字的意见,原则性的意见,都在逐段讨论中提出来了。意见比较多的,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形式

各有不同，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也是与它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别的国家不能照搬。大家主张在文章中可以讲一讲我党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别人怎样我们不去讲，只讲我们自己。但是反对教条主义不等于允许修正主义泛滥。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文章中一定要进一步讲透。大家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错了。匈牙利事件也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势力起来叛乱时没把他们镇压下去。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运用好。文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

第二，关于国际主义。大家一致认为，国际团结要加以强调。现在苏联犯了错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是，过去一直提出的“以苏联为首”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我们的文章应针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明确地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事实，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以苏联为中心应明确提出。但应同时指出，以苏联为中心不等于苏共与其他党的关系是父子党的关系。兄弟党之间应当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

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还可以点一下，苏联虽然犯错误，但大家对苏联要公平。对苏联援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功绩，应作充分的肯定，不能加以抹煞。要说明苏联 10 月 30 日声明的积极意义，同时要强调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还要团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把三种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推进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

第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比较短，前途是光明的。在这次文章中应再次引申这个观点。要指出国际共运只有 92 年，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有 39 年。而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历尽艰辛，几起几落，经过多次反复才取得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因它更伟大，也就更艰巨，有曲折、反复也是正常的。要有经受更严酷考验的思想准备，也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我们的条件比十月革命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的力量不知强大了多少倍。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取得建设的胜利。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更加有信心。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

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时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毛主席讲的第二个意见是：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

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苏联过去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他的错误。毛主席说，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非常生硬，盛气凌人，老是摆出教训人的样子，不是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同鲁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读，我不大喜欢读，但我还是读，也劝同志们还是要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苏共成长的经验。没有别的权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读。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

提交会议讨论的这个修改稿中，原来有一段专讲关

于和平过渡的。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是中苏两党当时主要分歧之一。前几次会议中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修改稿中作了回答,正面提出要准备两手。从战略上讲,要准备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为了争取群众,从策略上讲可以提出愿意和平过渡。毛主席反复考虑在这篇文章中讲不讲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讲。政治局会议也同意了,于是删去了这段文字。

经过政治局12月23、24日两天会议的讨论,这篇文章原则通过了。会议最后一天确定文章的题目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要我们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会议之后,我们就抓紧时间修改。因为毛主席吩咐:不迟于12月30日发表这篇文章,把1956年的事情在年底之前了结。

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开会,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又提了一些意见,并要我们马上修改。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着看。我们修改完一段,他看一段。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工作到第二天12月28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

大家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須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和錯誤。只要我們是全面地观察問題，那么，如果硬要說什么"斯大林主义"，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义，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錯誤。尽管在某些时候糾正这些錯誤是最迫切的任务，但是为了估量它的全面的評价，这些錯誤就是次要的一面。

只有採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我們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所謂"斯大林分子"，我們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的錯誤以及一切所謂"斯大林分子"的錯誤。他們的錯誤既然是共產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錯誤，既然是根源於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我們就必須承認这是共產主义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而不是階級斗爭中的敵我問題，我們就必須用同志的态度而不是用敵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們的錯誤，就必須善意地加以批評，而不是否定他們的一切。他們的錯誤有社会歷史的根源，也有思想認識的根源，因此，这种錯誤既可以在

—10—

1956年12月毛泽东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手迹。

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同上一篇文章一样,还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并写明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题目已改成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差不多全文加以转载,只删除了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几小段。其实,整篇文章对苏联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且文章中有些话还是有保留的,没有彻底讲。比如对抗性矛盾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考虑还是保留一下,只提出命题,没有展开讲。对铁托作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它是第一篇的续篇和深化。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和舆论的重视,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十一节　文章的要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文两万字，分四个部分，外加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

引言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指出：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文章的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六条：（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

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出,这些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从基本原理上说,都离不开并且都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规律。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在当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正是要否定这些基本经验、普遍规律和共同道路。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文章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同时又指出他的错误。文章强调:斯大林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过时。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在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总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产生一定的矛盾并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这些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主观认识到工作方法，总难于百分之百地符合实际，因而难免发生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但是，只要严格地遵循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认真地依靠群众，那就可以避免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斯大林晚年的严重错误，正在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文章着重指出，斯大林尽管在他一生的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全面地观察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文章在这里指出，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对斯大林所采取的态度，不能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文章在肯定铁托等人讲话中正确的一面之后，又批评他们对兄弟党采取敌对态度的立论，特别是把所谓“斯大林主

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文章说，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为了不给敌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制造分裂的条件，我们不能不向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提出兄弟般的劝告。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等错误口号，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文章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每个民族都经历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能根据这些特点具体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反而会带来重大损失和失败。

文章指出，教条主义不懂得学习苏联经验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的，成功的经验如此，失败的经验更不待说。文章列举中国党历史上因犯教条主义错误致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

失败的教训，并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克服教条主义路线的结果。

文章强调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目前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着重批判了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文章指出，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包含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广泛的民主和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如果因为看到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或“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文章指出，有些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不但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也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长入”社会主义。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只有

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推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当前面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特别需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文章指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代表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文章指出，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曾经有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的原则。这是历史上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留下的影响，而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难免使人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与甲国相比，显得小和落后，但比丙国大和先进，这就可能使乙国尽管对甲国的大国主义不满，却往往对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文章提醒中国人特别要记住，中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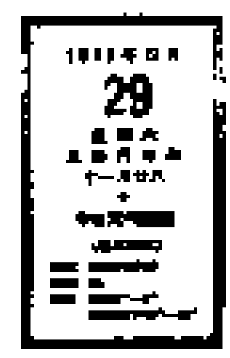
文章进一步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东欧某些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

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已认真制止那些造反苏谣言、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着手消除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所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绩减色。

文章指出，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首先要在较大的国家中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同时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倾向。无论大国或小国，共产党人绝不能把本国民族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文章呼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文章的结束语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的历史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无论是敌人的高兴、同志和朋友的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管理国家，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资产阶级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成为统治阶级，例如在英国和法国，也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与反革命的恐怖，内战与外战，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现在我们好得多了。我们前面无论还有多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第三章

1957年莫斯科会议

第一节 毛主席提前赴苏

1957年11月2日清晨，我坐车从新华社直奔南苑机场，欢送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代表团是去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我一到机场，看到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已陆续到来，都在贵宾室里休息。一架巨型的苏联飞机停在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南苑机场在当时是北京最大的机场。苏联大型客机图104当时在别的机场还降不下来，只能在像南苑机场这么长的跑道才能比较平稳地升降。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

志先后来到贵宾室，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孙夫人宋庆龄也到了。

毛主席到得比较晚，他是八点半左右到飞机场的，很快就与大家话别登上飞机。

这次毛主席率领的代表团称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毛主席是团长，副团长是孙夫人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和其他工作人员。后来彭德怀同志参加中国军事代表团，由他任团长，叶剑英元帅任副团长。叶剑英是 11 月 5 日到莫斯科的，比彭老总晚到三天。另外，同机去的还有郭沫若同志率领的中苏友好代表团。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也陪同毛主席去莫斯科。

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 1949 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是建国之初，斯大林还在世。现在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八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到 1957 年底将提前和超额完成。由于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经济欣欣向荣。同时，我们党 1956 年召开八大，1957 年整风反右，我国政治上是稳定的。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国参加了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接着又参加了 1955 年的万隆亚非会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威望正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 1956 年苏共“20 大”时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结果引起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着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访问苏联的。

那个时候的苏联，经过1956年西方掀起反苏反共高潮，经过苏波关系的调整和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平息之后，特别是在波、匈事件中，感到中国党虽然在内部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还是竭力维护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支持赫鲁晓夫的。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几个月，苏联党内发生了所谓"反党集团"事件。"反党集团"成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在苏联反对所谓"反党集团"中间，中国党虽然认为他们的处理办法并不得当，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我们党对苏方说这是苏联内部的事情，既然你们党中央这么决定，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毛主席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

在这些事件过程中间，赫鲁晓夫感觉到，中国党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建设的援助项目，同时也答应了帮助中国建立一个试验性的核反应堆，还答应给中国一个小型的原子弹样品。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处在困难的时

期，很需要中国帮助的情况下，我们给了他帮助。这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后来曾经多次说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毛主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的。

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祝贺十月革命40周年，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动。但是，更重要的是参加后来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有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苏共首先提出来，并邀请毛主席访苏。

毛主席访问苏联是本来早就答应过的。在1956年和1957年初，苏联方面催了好几次。毛主席一再对苏联大使说，我1949—1950年已经访问过苏联，我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访问你们国家的。虽然访问过一次，我还是要作第二次访问，但最好是在你们国家元首回访中国之后我再去。就是说，希望伏罗希洛夫能够先访问中国，作为毛主席1949年访苏的回报。毛主席说，这以后，我就可以去苏联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人民交待得过去，不是老是我们的国家元首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来，那样对中国老百姓就不好说。后来，伏罗希洛夫在1957年5月间访问了中国。这之后苏联再次邀请的时候，毛主席答应再去访问。

在答应再访苏联并参加兄弟党的国际会议时，毛主席对苏方表示，既然要开这样的会就要开好，首先要做充

分的准备，大家预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然后发表一个共同文件，他希望苏联在这方面多做准备工作。

在十月革命节快到的时候，10月28日，我们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

毛主席原来是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即11月5日或6日才动身去莫斯科的。

收到苏联起草的共同宣言的稿子以后，中央政治局10月30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觉得苏联的草稿问题很多，我们和他们的观点有不小距离。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提前去莫斯科，到那里起草一个稿子，提交苏联讨论，并争取中苏两党在提交其他兄弟党之前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一致的草稿。于是毛主席提前在11月2日动身去莫斯科。

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说，我们去这么早是不是要发新闻，是不是到了莫斯科以后再发新闻，免得人家会问为什么去这么早。后来考虑推迟发表新闻也不好，有人会说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决定新闻还是当天发，第二天见报。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大家一致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一定要把这次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向帝国主义示威的大会。代表团的方针是：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他们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采取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协商一致，求同存异。

这个方针是在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之前，在10月29日晚上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议定，然后提交30日召开的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批准的。

少奇同志在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说，方针就这么定了。这次去是去谈判，不仅跟苏共谈判，还要跟其他许多兄弟党谈判。因此我们政治局批准这个方针之后，在谈判过程中，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会上大家都同意授权以毛主席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相机行事。

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以后，把每天的情况综合用电报发回来，让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会议进行的情况。

我没有跟着代表团去参加莫斯科会议，我是从代表团发回来的电报中，在政治局、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时候了解到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的情况的。

据代表团从莫斯科电发回来的汇报，代表团到莫斯科几天后，赫鲁晓夫正式拜会毛主席的时候，就谈到召开兄弟党莫斯科会议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大家都准备好稿子了，在大会上念就是了。毛主席在庆祝大会上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得到很好的反应。但是毛主席到莫斯科去，主要是要准备一个好的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毛主席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苏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小平同志他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稿子跟第一次的稿子差不多。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政治报告的有片面性的观

点还保留着,照这些观点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所以毛主席对前来拜会的赫鲁晓夫说,我提早来就是为了宣言的草稿。我们要搞一个好的草稿。我们党也准备起草一个稿子,供你们考虑。

代表团从11月3日晚上起,开足马力起草,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小平同志主持讨论修改,毛主席最后审定。到11月5日搞出一个初稿。初稿搞出来后就交给苏共中央。

从11月6日起,中苏两党代表团各出几个人(我方由小平同志领头,苏方由苏斯洛夫领头)开始讨论苏联的第二稿和我们的初稿。我们为我们提出的稿子说明理由。双方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讨论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1日才完成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随后交给各兄弟党。

开始,苏共的意见是,这个草案只交给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我们建议同时也交给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兄弟党,让他们也先看到。因为毛主席在跟英共领导人谈话的时候,问他们对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有什么意见。他们说没有看到。当然,英国党是一个小党,但是英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我们在同苏共讨论宣言的过程中发现,好像苏共对西方国家兄弟党中看得起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党,一个是意大利党,其他党在他们看起来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建议把中苏两党起草

的宣言草案也交给所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苏共后来也同意了。

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还没有协商好，苏共提出要开会。我们建议：一边开大会，依次发言，各自念预先准备好的稿子；一边开小会即起草委员会，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

从14日开始，先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一直开到16日，才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还有不少分歧，文字上也还需要修改。这时全世界60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团都等着开会。我党代表团感到拖得太晚也不好。于是我们同苏共商量，从16日起开60多个党的大会，同时起草委员会继续工作。

60多个党的大会从16日开始，也是由各兄弟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在会上讲话，一直到11月19日才结束。大会宣言也是到11月19日大会结束的时候才最后定稿。也就是说，从11月6日开始讨论宣言的草案，一直讨论到19日晚上。参加这个大会的实际上有68个党，因为有些党处在秘密状态，或者由于国内条件比较特殊，不好在宣言上签字，也不好公开说参加了这个大会，比如美国党，所以在宣言公开发表时只列举了64个党的名称。

第二节　同兄弟党领导人会谈

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以后，首先同苏共中央、同赫鲁晓夫会谈，商量怎样开好莫斯科兄弟党会议。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商定，中国党出三个人，苏联党出三个人，负责起草一个共同宣言草案。

从最初起草中苏两党提出的共同宣言草案，一直到19日晚上宣言最后定稿，开始是由中苏两党各三人参加的六人小组负责的，后来其他兄弟党也参加讨论，实际上成了起草委员会。

在这过程中，毛主席多次跟赫鲁晓夫接触，在开庆祝会的时候，在十月革命节游行的时候，在招待会上，在12党大会和60多个党大会期间，毛主席都跟赫鲁晓夫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也就是中苏两党起草小组在讨论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

在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毛主席跟赫鲁晓夫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说，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当时赫鲁晓夫也承认，苏共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毛主席说，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

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够保持这种关系。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还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毛主席说,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毛主席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 20 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 12 年,还有 8 年就够 20 年,我们应该争取这 8 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 10 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 10 年和平,然后再争取 15 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毛主席问赫鲁晓夫,你看是不是这样?赫鲁晓夫说,是这样,赞成你的意见。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朱可夫元帅发表过一个声明,说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朱可夫元帅还谈到,如果美国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就援助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毛主席说，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要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当时赫鲁晓夫表示赞成，并且说，朱可夫的讲话没有说我们采取进攻战略，是说要准备对付敌人。你这么一提，这个问题更清楚了，不要采取进攻的战略，而要采取防御的战略。我们整个战略是防御的，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是保卫者。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可以说是达成了协议。后来毛主席谈到此事时说，他当时担心赫鲁晓夫毛毛躁躁闯出乱子，所以和赫鲁晓夫讲了这么一段话。

毛主席除了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以外，还和其他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最早交换意见的是同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毛主席第一次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是在列宁山体育馆召开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在开会前和开会后都同哥穆尔卡谈话。后来，毛主席又专程到波兰代表团驻地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

在交谈中，哥穆尔卡提出，宣言草案他已经看到了，

其中一些措词太尖锐。他所说的措词,实际上是指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 。哥穆尔卡说,一些措词中国可以接受,在中国可以谈。苏联也可以接受,在苏联人民中间也可以谈。可是在波兰,波兰人民不能接受。他提出波兰党希望宣言草案的整个措词温和一些,不要过于刺激。

哥穆尔卡这么提出问题,主要涉及两个观点。一个就是宣言草案中多处点名谴责美帝国主义。他说,这样的措词波兰人民接受不了。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有些是波兰侨民,更多的是有美国国籍的波兰人后裔。这样的措词会增加接受我们合理意见的障碍。再一个就是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毛主席跟哥穆尔卡说,以苏联为首是我们中国党先提的,苏联人没有提。毛主席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现在最强大的共产党是苏共,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苏联。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总得有个头。哥穆尔卡说,我本人同意,但是在波兰人民面前这么提,他们很难接受。哥穆尔卡的意思是波兰人对苏联有一种民族反感。他说,第三国际对波兰党的处理影响不好。他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不赞成搞国际机构,像第三国际那样。他对这些反感极了,连共同出一个刊物他也不赞成。哥穆尔卡说,波兰吃这样的苦头太多了。毛主席说,我们也吃了第三国际的苦头,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第三国际对我们的帮助。

毛主席说,第一,我们不赞成成立国际机构,像情报

局那样的机构也不赞成。历史证明搞国际机构是没有好处的。第二,我们赞成以苏联为首并不是苏联说了算,而是在兄弟党之间要协商一致,所有党意见一致了才能做决议,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哥穆尔卡说,这不是太民主了? 主席说,就是要民主。第三,虽然有共同宣言,但是怎样来实现宣言所确定的原则,各国党完全独立自主,可以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

哥穆尔卡谈得很坦率,从谈话里面反映出他对苏共的戒备,警惕性很高。毛主席没有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是也考虑到他的意见,对宣言草案做了一些适当的非原则性的修改。

后来,11 月 15 日晚上,毛主席到莫斯科郊区别墅区波兰代表团住地拜访哥穆尔卡。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哥穆尔卡觉得宣言草案修改以后,对美国还是太强烈,如说美国要独霸世界,这就放松了法国和英国,也放松了西德复仇主义,而且美国也独霸不了。他不赞成"美国独霸世界"的提法。他说,宣言草案里说美国"要在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也不好,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说"美国是世界反动中心",还说什么"掘墓人"这些词,都会引起人家反感,波兰人就不接受。他说,你们虽然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见,做了一些妥协,但是我还是觉得波兰人接受不了。

哥穆尔卡说,他有这样的感觉,这次会上,在起草委

员会中，是大家攻波兰一家。毛主席就开玩笑地跟他说，你说大家攻你一家，也可以说是波兰一家攻大家。接着，毛主席又说，现在我们跟苏共可以商量问题了，比起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是好多了。这次会上大家可以互相提意见了。我们跟苏联同志就争论了五天才拿出一个共同草案来，但这个共同草案里面还有分歧，一直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可见是可以商量的，空气比较好，比较民主。

哥穆尔卡说，他总有这样感觉，感到压抑。他甚至说到这个程度：如果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的话，波兰党就不能在宣言上签字。毛主席说，不同的意见还是可以商量，彼此做些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取得一致。我们还是协商一致解决问题，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兄弟党之间绝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哥穆尔卡又提出，草案里面讲到兄弟党双边会谈或者多边会谈必要性的时候，说兄弟党国际会议由苏共来召集。他说，这个不行。最多只能下一次会议由苏共召集，不能以后总是由它召集。他甚至说，如果下次由它召集，也不能在这个宣言上讲。应该另搞一个内部决议，说下次由苏共召集，但是也还要强调协商一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问题上他很不放心。毛主席请他放心，并且说，我们党历来提倡兄弟党之间应该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每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毛主席说，这次会议还是可以商量问题的。这就是

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妥协，互相让步，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

据参加会谈的同志说，对于毛主席说的话，哥穆尔卡好像还听得进去。最后他表示，跟毛主席谈话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

后来毛主席多次谈到，跟哥穆尔卡会谈给他深刻的印象：苏共在兄弟党的关系上，习惯采取老子对儿子的恶劣态度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哥穆尔卡这样警惕、戒备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分责备。但是哥穆尔卡有些观点不见得对，这倒是要注意的。兄弟党的关系怎么处理好很值得我们深思。过去苏联对同兄弟党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波兰党这样步步为营、高度警惕、反应强烈的情况，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生怕又重复过去那种以势压人，借所谓多数来压少数的做法。

11月8日，毛主席和英共波立特、高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间，毛主席主要是讲了国际形势现在发展到一个转折点，他列举了十件大事，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发言中讲的十件大事。

毛主席跟波立特、高兰谈话主要是征求他们对和平过渡的意见。当时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联合起草的宣言草案已经提出来了，但苏共没有发给英共，波立特和高兰都说没有看到文件。毛主席建议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找苏联谈。毛主席谈了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讲要准备两手。波立特和高兰都表示赞成，不

过他们强调，英国还是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下一届政府可能是英国工党上台，工党上台对和平过渡更有利。

当天，毛主席又和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谈话。多列士说他也没有看到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稿子，但是他们看到苏共的第二稿。多列士表示赞成苏共的第二稿。他认为，提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通过选举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很小，应该准备用暴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

在同英国党谈到宣言的时候，他们说虽然没看到宣言，但准备签字。而多列士则表示，他不赞成英国党的意见。他说，这个宣言（莫斯科宣言）最好还是执政党签字，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签字，其他国家共产党不签，连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也不签。苏联本来是想要法共和意共也签字的。

毛主席问多列士：如果要你们签字怎么样？多列士说，我们不准备签字，但是我们可以提意见。对宣言中间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战略路线这些问题我们要提意见，但是我们还是不签字为好。党的威信不是依靠在宣言上签字来提高的，而是依靠工作来提高的。

第二天，11月9日，毛主席又和英共波立特和高兰谈话，主要是请他们介绍英国的情况。他们介绍了英国保守党、工党的情况。当谈到他们自己党的时候，波立特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大反斯大林。他

说，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泄露出来以后，助长了英共党内修正主义抬头，英共党员减少了好几千。毛主席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当然不对，但你们党减少一点党员也不坏，这样你们党更结实、更坚强了。那些动摇分子本来就是修正主义，这一下暴露出来了，隐藏在党内反而不好。

因为毛主席已跟法共多列士交换过意见，所以这次再跟英共谈的时候，毛主席就对他们说，法国党不准备签字，意大利党也不准备签字。英国党不一定非在宣言上签字不可。中国党代表团准备建议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党都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12个党签字。他还说，现在波兰党还需要说服以后才能签，如果他实在不签，11个党签也可以。南斯拉夫党过去就讲过不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勉强。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毛主席确定的方针是，准备说服波兰党签字，万一说不服，也采取谅解的态度。对南斯拉夫党不签更应如此。

12日和16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是听他们介绍印度的情况、尼赫鲁的情况和中印关系。毛主席说，在亚洲，中国党和印度党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我们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两个国家经济上落后一些，但是两国人民要求革命的情绪比较强烈，有弱点也有优点。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毛主席说，不要认为一定是欧洲先革命成功，然后亚洲革命成功。历史已经表明，不是欧洲发达国家先革命成功，而是

欧洲不发达的国家先革命成功。苏联当时也不算是发达的国家，比起西欧来讲是落后很多，东欧也比较落后，但是这些国家先革命成功了。中国在亚洲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更不用说跟西欧、北美比了。但是中国革命也是先成功了。不要以为自己落后就自灭志气，我们中国人是不甘落后的。

毛主席8日同法共多列士谈过话以后，在17日又和杜克洛谈话。这次谈话跟同英共第二次谈话一样，主要是听杜克洛介绍法国和整个西欧的情况，问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法属非洲的情况，荷兰、比利时、共同市场、西德军国主义等情况。毛主席很愿意直接从这些党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他们介绍情况。

毛主席跟杜克洛说，你过去批评过美共。原则上讲，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不晓得效果怎么样。如果是美国共产党自己来批评自己的缺点可能会更好一点。一个党公开来批评另一个党，一般是不适宜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之间有些矛盾，希望你们内部谈，不要公开争论。

毛主席还向杜克洛介绍了我们跟苏共的关系，介绍了历史和现在的状况。他强调过去我们也吃过共产国际的亏，斯大林也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我们都肯定他们对中国党的帮助，缺点错误我们自己负责，由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说，现在赫鲁晓夫对兄弟党的关系比过去好一些，相互之间可以讨论问题。现在苏共处在不稳定的时期，我们希望他们稳定，对他们还

是要采取帮助和支持的态度。我们对苏共的缺点也还是批评的，并不是赫鲁晓夫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只在内部批评。

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没有直接跟意大利党谈过，只是小平同志和陶里亚蒂交换过意见，主要是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意大利党都在起草工作小组里面谈过，谈的也比较充分。

到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在18日晚上才同陶里亚蒂做了一次长谈，从晚上10点钟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两点钟，谈了四个钟头。

毛主席同陶里亚蒂谈话，主要是了解意大利党内的情况，意大利农村的情况，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以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民主党、保皇党、法西斯党等的情况，还了解了罗马教廷的情况。毛主席还同他交换了对西方国家政治家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看法，比如他们是不是非常自信，是不是觉得万事如意，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有什么看法。谈这些情况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毛主席不断地提问题，请陶里亚蒂逐一介绍，毛主席非常用心听。

在谈到意大利革命前景的时候，陶里亚蒂说，现在意大利封建势力还不小，现在意大利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时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附带完成。现在意大利的农业比重还不小，但比较落后，农村里的农民是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

的对象，两方面都要争取这个同盟军。意大利党正在努力加强农村的工作。在城市也是一样，也需要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至于将来的前景怎么样，陶里亚蒂估计，现在看起来，在没有世界震动，比方说战争的震动，要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是比较困难的。

他还说，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什么形式，现在也很难估计。现在我们利用议会，共产党在意大利议会里面占很多席位，但是，将来世界震动到来的时候，议会是不是存在还很难估计，到那时是利用议会形式还是用别的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革命一定要由共产党领导，社会党不行，社会民主党也不行，更不用说其他政党了。陶里亚蒂对意大利革命的前景的这些看法，毛主席十分重视。

毛主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人民阵线，意大利将来可不可以有一个过渡，先成立人民阵线的政府，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就是社会党的左派，然后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陶里亚蒂说，这也有可能。他说，意大利资产阶级比较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意大利如果没有美国驻军，那时意大利可能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因为战时意大利的游击队、地下斗争组织大多数都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因为有美国驻军、英国驻军，救了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命。现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也还是很弱。但是他们也不满意受美国的统治。所以将来意大利有可能先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第一阶段不是无产阶级专

政，到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不可能跟每一个党都接触，他只能为了在共同宣言上取得一致意见，对意见比较多的党的领导人多接触、多协商。同时主要想了解意大利党、法国党和欧洲的情况，乘这个机会亲自听他们的介绍。其他一些兄弟党就由代表团的小平同志、尚昆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跟他们接触，但是代表团的同志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在起草工作小组里。

第三节 纵论兄弟党关系与世界大势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主席除了跟兄弟党会谈，还在12党全体大会和60多个党的全体大会上作了三次发言。

第一次是毛主席和哥穆尔卡、英共、法共、印度共产党接触之后，在11月14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时做了一次即席发言。在这个发言里，主席主要是根据他同兄弟党领导人接触的情况，着重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

毛主席着重讲了为什么中国党要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道理。他说，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

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毛主席申述这样做的三点理由。

毛主席说，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

毛主席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 40 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

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共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些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毛主席说,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是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

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毛主席这个讲话是针对当时许多兄弟党（有些党已讲出来，有些党没有讲出来）对苏联党有戒备，怕它再以势压人，怕再出现像过去共产国际或情报局那种不好的情况。

毛主席的第二次讲话，是11月16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当时各兄弟党对宣言经过反复讨论，虽然没有最后定稿，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这个宣言怎么样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

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毛主席说，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间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来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那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16 日以后，就召开 68 党大会。68 党大会是从 16 日开到 19 日。毛主席在会议结束之前，18 日发表了一次

讲话。

毛主席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形势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形势问题主要是讲了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形容形势。毛主席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当时赫鲁晓夫是赞成毛主席这个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的，后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他又反对了。他说，什么东风，东风从哪里来？东风是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我苏联的风。他把这句成语说成这样子，令人啼笑皆非。毛主席在解释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是讲社会主义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毛主席讲到，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他说，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

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接着毛主席就列举十件事来论证国际形势到了一个转折点。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1945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事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21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

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毛主席说,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15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15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3000万吨。那么中国再过15年也可能达到3000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毛主席说,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

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 4 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 24 万人。

在讲到形势的时候，毛主席也谈到了纸老虎的问题、原子弹的问题。毛主席说，纸老虎是我 1946 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他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讲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

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的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毛主席形象地说，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主席又说，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毛主席说，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27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13.5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27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

毛主席说，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都怕战争，

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讲话，也是根据同兄弟党的谈话有所感而发的。哥穆尔卡就很直率地说过，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所以毛主席在这里详细解释为什么说帝国主义和原子弹是纸老虎。

毛主席在18日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问题。他认为，我们这次会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60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股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

毛主席说，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哥穆尔卡17日在大会上讲话时说，应该以苏联为首，这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过像波兰这样的

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

毛主席说,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12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不在12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向西方世界贷款,要美援。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美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按:第一个宣言是指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字、征求了60多个党的意见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第二个宣言是指有64个党签字的和平呼吁书,也叫《和平宣言》)。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13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13个变成12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宣言上签字的。

毛主席讲话后,在大会休息时间,卡德尔文走到毛主席跟前说,他对中国同志谅解他们很满意,他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话。后来在苏共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卡德尔文又

对毛主席说，铁托同志很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希望中南两党加强联系。

毛主席在18日讲话里讲到团结问题的时候还说，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他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一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毛主席说，我们这次12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

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主席说,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在17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毛主席说,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50%的、40%的,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的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12党会议不就是谈判吗?60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毛主席说，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毛主席还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间讲到哲学问题，辩证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毛主席曾建议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讲辩证唯物主义，要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所以毛主席在 18 日的讲话里，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毛主席这三次讲话都是即席发言。第三次发言长一点，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前两次都是即席讲话。三次讲话都是讲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是当时大家关心的、有不同意见的一些问题，对会议的成功，圆满达成协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反映很好。

第四节 争论和协商一致

前面谈到了兄弟党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在起草宣言过程中间就反映在由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里面。

起草委员会开始是由中苏两党的代表组成。从11月6日以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加上南斯拉夫党的代表都参加了。根据苏联同志的意见,也吸收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代表参加。这样,一共有15个党的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后来,又再扩大为60多个党都有代表参加。虽然说是有60多个党的代表参加,但是实际上有些党的代表经常不参加,他们觉得没有很大必要,也提不出很多意见,所以经常参加的也就是10多个、20多个党的代表。

南斯拉夫党的代表声明,他们参加会议是听听大家的意见,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他们还说他们党早就收到苏共的宣言草案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苏共在把他们的宣言草案(第一稿)送给我们之前,已经预先同南共联盟交换过意见。南共是反对这个宣言草案的,后来南共主席团决定:不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但也不声明反对这个宣言。这之后,苏共才向我们发出宣言草稿,就是我们在10月

28日收到的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第一稿。

在起草宣言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为了在这些问题上使不同的意见求得一致,并具体落实到文字上,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过充分协商,才取得一致意见。

意见分歧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主要是我党代表团起草的,后来苏共中央经讨论修改后接受的)中,不少地方讲到美帝国主义,比如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是不能得逞的"这样一些提法。

这些提法首先遭到波兰党的反对。波兰党的代表认为,这样说太过分,整个宣言调子太高,不仅波兰人民接受不了,而且波兰党内也会有许多人接受不了,他希望修改,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提"掘墓人",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尽量避免这种太刺眼、太刺耳的提法。

南斯拉夫的代表虽然声明不参加签字,他也附和波兰党的意见,认为这种讲法太强烈。

意大利党也觉得太尖锐了不好。

至于美国党,他开始就声明不准备在宣言上签字,也不能公开宣布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根据美国麦卡锡法案,这种行为在法庭上就可能被控告犯叛国罪,如果他参

加了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很容易被反动派抓住作为一个借口，宣判他们党为非法。他们虽然不赞成这种提法，但也不是太坚持，因为他们不签字，连参加会议都不愿意宣布。

根据这种情况，经过再三斟酌、反复磋商，双方作了妥协。最后把"美帝国主义"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或者"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把"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改为"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把"美帝国主义要称霸世界"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对"掘墓人"，把主语改换了一下，改成"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

这样，虽然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做了一些妥协，但是这方面的原则我们还是坚持了。结果连波兰同志也觉得可以接受。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文章上，比如关于莫斯科会议的社论，我们还是讲美帝国主义。

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中苏共同草案原来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同时也讲到现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势力，存在着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使它不能得逞的机会。

这种提法，意大利党、法国党，甚至波兰党都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是突出可以消灭战争。在讨论、协商过程中间，他们一方面批评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

不足。按照他们说我们对帝国主义估计不足这个逻辑，那就应该说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帝国主义很强大了，可以指使一切了。但是，他们的结论又不是这样，他们说他们讲帝国主义很强大，对它要有足够的估计，是为着动员和平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应该强调战争可以避免，否则争取和平就没有信心了，动员不了人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前后矛盾。

我党代表再三说明，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战争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今年、明年，或者后年，大后年就可能爆发，我们没有这个观点。但是我们认为，战争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可能爆发，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可能制止，可能推迟。

争论的结果，双方都做了妥协。首先是强调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把“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改成“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这个意见他们接受了。经过反复协商，大家才同意：一方面讲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实行的破坏和平的侵略政策造成新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讲和平力量已经大大增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就是说，两种可能性都讲到了，而且还强调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

这样的修改对我们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原则坚持了，没有把战争可以避免问题讲死，没有只讲可以避免这一种可能性。当然，在60多个党通过的另一个文件

即《和平宣言》中，就只强调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个宣言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的和巩固起来的。这个提法当然和12党的宣言不一样。因为它要照顾到大多数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需要，它们要抓和平旗帜，要加强和平运动，要动员更多的人来为和平而斗争，为防止战争而斗争，作为一个策略口号提出来也是可以的。我们也就没有坚持一定要修改这个提法。

第三，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以苏联为首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个提交中苏两党讨论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来的。苏共开始不同意。苏共在兄弟党的关系上，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坏作风，一切都得听他的，现在虽然稍有改进，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实际上他们仍然想充当头头，由他来一锤定音。说来也很怪，这次我们提出以苏联为首以后，他觉得大刺眼，不愿意提。个中心理是怕其他兄弟党反对，下不了台。

后来，毛主席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向他解释说，我们所以坚持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够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当不了头的。赫鲁晓夫接着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苏为首，毛主席说，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

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后来赫鲁晓夫也就同意了。但是有些兄弟党就反对，波兰反对，南斯拉夫反对，意大利也反对，还有其他党虽然没有提出反对，但心里也是不赞成，对我们的提法不表示态度。

后来我们根据毛主席在14日12党会议上发言的观点，在起草委员会中反复解释。苏共代表也再三表示：要尊重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这以后，兄弟党才觉得以苏联为首也还可以。但是波兰党代表仍很担心，他特别声明说，要说清楚苏联召集会议是以协商为前提，而且只是召集会议。召集会议本身也要协商，什么时候开会要协商，讨论什么问题也要协商，会议做出的决议更要协商。波兰党明确表示这一点以后，还特别提出不能成立国际组织。苏共代表公开表示，不再成立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像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也不成立。这样大家才接受了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时在宣言里加上了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并且规定在经济和文化合作上互助互利的内容。这样，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第四，关于共同规律、共同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就提出来了。我党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加上这个内容，并要代表团考虑怎么样写比较科学。所以我党代表团在向苏共提出的宣言草案里，

就写了几条共同规律。后来经过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补充修改，才在宣言的第三部分确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规律。当然这只是文字上的规定，但大家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同规律上求得统一认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性，也有民族特点，不要因为强调民族特点而忽视共同性，也不要因为强调共同性而忽视民族特点。共同性是一般规律，怎么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千万不能忽视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虽然两方面都讲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强调共同规律，没有更多地强调民族特点。

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这就没有什么共同规律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会上强调共同规律，但是也提到民族特点。怎么样实现这些共同规律，就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方针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两方面都讲到。

在讨论过程中间，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的党的代表更多的是强调民族特点。特别是意共代表，他认为欧

洲各国不一定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而应强调可以采取和平过渡的形式，通过议会取得政权。因为这件事情，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两个人还吵了起来。多列士认为还是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陶里亚蒂的意见。这两个党长时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争论不休。

在起草委员会中，我们对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关于民族特点方面，我们强调，如果认为要根据共同规律就是抄袭其他共产党的政策、策略，这是错误的。忽视自己民族的特点就一定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同时我们也说到，不能借口民族特点来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背离共同规律。我们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强调各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第五，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对两者都反对，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在会议过程中间，波兰党代表提出，在波兰党来讲，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就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意见。首先意共代表反对，南斯拉夫党代表也不赞成。意大利党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不是修正主义。结果他的意见又引起法国党的反对。法国党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这两个党在过去长时期争论里面，意大利党一些同志认为法国党是教条

主义,法国党一些同志认为意大利党是修正主义。

在1956年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主席认为,现在要注意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这是当前主要危险。但是我党代表团觉得波兰党所讲的主要反对修正主义,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虽然没有详细阐述,但从他们的发言中感到,他们好像认为苏联那一套就是修正主义。起草委员会经过多次折衷,在宣言草案里两方面都讲到了,讲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必须坚决克服",又讲要"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对两者都作了介绍。但意大利党还不那么满意。我们再和苏共商量,补充了"对于每一个共产党说来,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各个党自己判断"这么一句。这样意大利党也认可了。这个问题就达成协议。

第六,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和平地取得政权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这个观点在欧洲各国党内比较流行。特别是意大利党,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和平过渡。这个观点后来也为苏共所接受。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里一个很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

我们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的，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他争论。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着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怎么样来维护共产主义、维护苏联的威望是当时更重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公开评论和平过渡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是有意见的。

所以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就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保持它的政权，一直到使用武力。这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武装自卫并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在宣言草案里强调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苏共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关系到苏共"20大"路线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在中苏两党讨论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后来各兄弟党参加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论。英共、法共、意共和波兰党都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讲的和平过渡的观点。

当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我党代表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认为，既然起草委员会发生这么大争论，苏联又这么紧张，可以更多地听听西方国家兄弟党的意见。于是他亲自同英国党、意大利党、法国党交换意见。毛主席分别问他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怎么样？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大的震动，比方说世

界大战，要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以要充分利用议会。毛主席说，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大震动到来的时候，可以通过议会夺取政权？英国党说，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法国党也说没有把握。意大利党说，到大震动来的时候，议会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

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毛主席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当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

后来我们代表团跟这些国家的党商量的时候，问他们这个观点怎么样，他们说这样可以，但是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表达得不那么明确，比较含糊，把两种可能性平列了。我党代表团主张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明确一些，但是苏联党竭力反对，要求我们照顾苏共“20 大”通过的决议，说那是他们党的路线，不能变动。

最后，毛主席认为再讨论下去只能拖延时间，可以作适当的妥协。他在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时明白告诉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意见都说了，你们坚持不能接受。现在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给你们，把我们的意见说清楚，这样在会上就可以通过宣言。赫鲁晓夫很高兴表示同意。后来我们把意见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交给苏共，没有在会上宣布。一直到后来公开论战的时候，我们才公布了这个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

第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感到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形而上学的毛病，辩证法比较少，认为辩证唯物论问题值得各兄弟党重视。所以毛主席在一次跟赫鲁晓夫谈话时，就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重要，而且建议各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辩证唯物论问题，要使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然后到一般干部，一直到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毛主席这么讲了以后，就要代表团起草一段文字，加到宣言草案里去。

在起草委员会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苏共的苏斯洛夫，他以理论家自居，说这是课堂里讲课的问题，放在政治宣言中恐怕不合适。后来我们再三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普遍注意，因为现在讲唯

心论、形而上学多了，讲辩证法、唯物论的少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强调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苏共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增加这一段。这就是后来在宣言第三章讲到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之后，专门加了一段，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后来毛主席在18日全体会议上又专门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强调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讲到希望各兄弟党中央能经常讨论讨论辩证法。

第八，关于宣言里是否肯定苏共“20大”，肯定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党代表团最初起草的宣言草案里是没有的，后来苏共一定要加进肯定苏共“20大”，而且还要把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也加进去。我们表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不需要在宣言上讲，可以不加。我们认为各个党的代表大会是各个党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际会议来批准。要不然以后开国际会议都要来审查各个党代表大会的路线，那怎么得了，不又是搞共产国际了吗？所以我们不赞成。

这个问题苏共一直坚持，说要提苏共“20大”，也要提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代表大会。苏共这么提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国际会议肯定苏共“20大”的路线，确认苏共“20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

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后来,他们在起草委员会上又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一直不同意,理由是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及其他兄弟党的决议大家都没有研究,也无需在国际会议上加以肯定。

这个问题一直扯到最后。毛主席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说,既然你们一直坚持要写,感到确实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照顾你们。现在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照顾照顾你们。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既然写了我们苏共,也要写中共,也要写法共、意共。毛主席只同意写苏共。后来在起草委员会上我们代表团表示,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做必要的妥协,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的方针,在起草委员会里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做了一些让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法。

由于代表团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最后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

这次会议还签订了另外一个文件,就是《和平宣言》,是由 64 个党签字的。对这个宣言,我党代表团没有花很大气力,因为这个宣言主要是由法共、意共领头起草的。由于它要尽可能地包含各方面的意见,尽可能使资本主

义世界各国党不感到困难，所以好些地方是无头公案。比如，只讲帝国主义，哪个帝国主义也不言明。宣言中有些话是和平运动的语言，是说给那些主张维护和平但并不赞成革命的各种不同阶层人士听的，主要是为了团结他们。全篇没有一个地方提美帝国主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强调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等等。对这个宣言，我们没有提多少意见。

总的来说，整个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是成功的。大家就整个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保卫和平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及对兄弟党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原则，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会议能在这么大范围内，就这么多重大问题达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意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而且这些一致意见，是根据兄弟党完全平等、民主协商的原则，采取在兄弟党之间充分协商、不强加于人、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求同存异的方法取得的，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有的好现象。这就使得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时候，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

第五节　同志式的话别

对这次莫斯科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各兄弟党普遍感到满意。不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感到满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也感到满意，特别是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协议这一点感到非常满意。在协商中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凡是好的意见都吸收了，不能吸收的也说明了理由。这一点大家反映很好。

苏联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一些观点，虽然被删改不少，但大部分都包括在宣言里面了。特别是在宣言的最后，肯定了苏共"20大"的意义。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喜形于色，认为是对他们的帮助。这是赫鲁晓夫在11月19日晚上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跟中国代表团讲的。他在告别宴会上也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宴会过程中，赫鲁晓夫跟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在这种时候很需要听到中国党的声音，很需要中国党的支持。

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哥穆尔卡。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离开莫斯科之前，率领波兰代表团全体成员，专门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克里姆林宫（所有兄弟党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住在克里姆林宫，其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向毛主席辞行（别的代表团都

没有专门来辞行),毛主席又一次同他长谈。开始的时候,哥穆尔卡对几个问题还不大放心,一个是召集会议的问题。哥穆尔卡问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毛主席说,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哥穆尔卡说,会议不能开得太长,而且开会要有准备。毛主席说,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事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国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10月28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10月18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来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哥穆尔卡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共同刊物问题。哥穆尔卡认为,看来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办一个国际刊物,不过他说谁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参加就不参加。毛主席说,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要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感到这次会议苏联共产党是不是有一些进步?哥穆尔卡回答说,是有些进步,我跟波

兰的留苏学生也这样讲了,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改进。毛主席表示很赞成哥穆尔卡这个态度。

最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跟哥穆尔卡讲了一大段话。毛主席说,我还想提点意见供波兰同志们参考。毛主席先从中国党怎样经历种种曲折的斗争才慢慢地比较正确讲起。他说,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说,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哥穆尔卡说,完全赞成。我们党本身也有这个感觉。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同

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哥穆尔卡说,他也赞成这个意见。

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 1935 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1957 年),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毛主席诚恳地对哥穆尔卡说,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 10 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以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毛主席说,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想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

毛主席跟哥穆尔卡说,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地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

哥穆尔卡说,首先我感到你的经验很丰富。我们现在采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毛主席说,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廷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廷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哥穆尔

卡表示，我们对你这一切好意都完全接受。他说，要真正判断我们政策是否正确，还得有一个长的时间。毛主席说，是的，是这样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自己要观察自己，人家也要观察你，党内有人要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接着，毛主席就讲到他1949年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时的情况。他说，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给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一个条约。现在我没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

毛主席说，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事情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兴趣。我这次不是专门来替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有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

毛主席接着说，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

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么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毛主席说，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是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53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

毛主席说，1950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的。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词

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

毛主席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哥穆尔卡说，毛泽东同志呀，你总说你主观，但从你说的话来看，并没有什么主观主义。哥穆尔卡很欣赏主席这番话。

毛主席说，今天谈得很好。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相之间都需要支持。赫鲁晓夫也需要我们支持。哥穆尔卡说，我们波兰特别需要你们支持。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是为辅，但还是要支持的。我们是互相依靠，不是互相依赖。

可以说，毛主席和哥穆尔卡的这次谈话很有代表性。哥穆尔卡原先对会议的宣言草案意见很多，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也感到满意。他虽然对苏联有意见，但是觉得苏联还是有进步。当然他的疑虑也不是完全去掉了，他还是有点怕，怕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总的来看，他是比较满意的。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他都听进去了，感

到中国党对他们的确是真心诚意的。像这样一个党，特别是哥穆尔卡本人态度的转变，的确反映了这次莫斯科会议开得很成功。毛主席跟他谈话开诚布公，是真正同志式的谈话。最后告别的时候，双方都非常激动。两个代表团同志们都逐个热烈拥抱，场面非常感人。这件事情十分典型地说明这次莫斯科会议的成功。

11月20日晚，毛主席启程回国。苏联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到飞机场送行。在去机场途中，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说，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一点我们很高兴。我们两家达成一致的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赫鲁晓夫表示非常高兴。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发现有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办法。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在昨天跟哥穆尔卡谈话时讲到，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效果都不好。他说，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

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赫鲁晓夫当时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以后,不要成为互相争论的刊物。赫鲁晓夫说,完全赞成,完全赞成。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 11 月 21 日早上回到北京,也是在南苑机场降落的。前去迎接的中央同志都非常高兴。

休息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晚上,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了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开会的总的感受。毛主席说,总的来讲,这次会议是成功的,12 党宣言是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我们在莫斯科实际上工作了 18 天,连头带尾一共 20 天,工作相当紧张。这次会议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采取的方法是协商一致的方法。这个方法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苏联同志、赫鲁晓夫是比较满意的,这次态度也比较好,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波兰党最后也满意。南斯拉夫党虽然没有参加 12 党的宣言,他参加了 68 党的《和平宣言》,公开发表时是 64 个党。卡德尔文说他将来也一定会参加 12 党宣言。我说可以等 15 年。他说用不着

等15年。总之,莫斯科宣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一不是机会主义,二不是冒险主义。我们是对得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他们不会开除我们党籍的,会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毛主席还说,宣言中间有关哲学一段是我们有意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谈话,包括苏联党在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感到他们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辩证法。宣言上加了一段,我在会上也讲了。但是,别人是不是听进去了还得看,是不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还得看。我们大部分意见都讲了,但是有些意见也没有完全讲,我们还留一手,不要一次把所有问题统统讲完。

毛主席说,本来关于苏共"20大"我们跟苏共的意见分歧,除了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在1956年两篇文章里全面讲了;后来苏共中央做了一个决议,也基本上纠正赫鲁晓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鲁晓夫自己也讲,如果讲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义分子。他在个别场合、个别谈话中间也讲过这个话。和平过渡问题过去没有讲,这次讲了,而且把我们的意见系统地讲了,写了个备忘录。宣言也根据我们的意见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虽然文字上的表达跟我们还有差距,但是可以接受。对苏共目前也只能要求他们达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次也基本上是两面都讲，战争一手、和平一手，战争的可能性、和平的可能性也讲了。这次讲的基本上他们也接受了。

毛主席说，但是还有两个问题这次会上我们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里面，认为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然是对的。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当然是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是不错的。这是中国和印度首先提倡的，后来万隆会议也肯定了，并发展为十项原则。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个问题在莫斯科会议上没有和苏联展开来争论，只是在宣言的文字修改上我们提了一些意见，经过一些修改，觉得还可以，

就没有再展开来争论。

毛主席说，再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来不及跟其他兄弟党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没有展开来讨论。不过这也好，问题不可以一次讲完，还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讲。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再讲。

小平同志比较详细地讲了会议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论和主要斗争情况。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对苏共“20大”还是采取照顾的办法，还是写到12党宣言里。我们照顾他们这一点，就取得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比如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的意见，但现在也只能争取到这个程度。我们争取到赫鲁晓夫支持我们党原来起草的宣言草案的意见，说服其他兄弟党。虽然我们做了让步，对苏共“20大”做了肯定的提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加以改正，尽量争取措词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最后争取到这样好的结果。总的来讲，这样做法是对的。我们所以采取这样态度，是因为原来在北京的政治局会议上，原则同意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支持，所以在宣言上才对苏共“20大”做了那样的表述。

小平同志说，在宣言上写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苏共"20大"以后,一方面带来一个反共高潮,另一方面又使各国共产党不得不独立思考问题,增强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20大"最好是能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20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还是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小平同志说,鉴于许多党害怕苏共强加于人,搞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这种情绪,我们在肯定了"以苏联为首"之后,对苏联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为首的职权范围是加以限制的。小平同志解释说,对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措词,说"在必要的时候,除了举行双边会谈交换意见以外,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共同的斗争"。这里讲到可以开这

样的会,“交流经验,彼此了解观点和立场”,也就是可以互相交换意见,不是一家说了算。“协议”就是由协商达成决议,而不是一家做决定。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使苏共没有理由来操纵会议,它不能不跟大家商量就召集会议。在12党开会的时候,达成一个不公开的协议,明白指定由苏共来召集会议。怎样召集,讨论什么,怎样协商,公开的宣言中都规定了。毛主席还明确跟赫鲁晓夫讲,什么时候召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都要预先通知,预先做准备,如果要形成什么文件,事先要有草案,并且提交给参加会议的所有的党,经过协商做出决定。这些都给赫鲁晓夫讲清楚了。小平同志说,这样没有坏处,如果他不照这样做,那我们就可以加以反对。这样也可以解除波兰党、南斯拉夫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顾虑。看起来,结果还是好的。

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扼要介绍情况后,政治局常委会就批准了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1958年5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时才正式通过决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赞成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个宣言。

第四章

戴维营会谈前后

第一节 面对面的抗衡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中共中央决定用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回国以后，毛主席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步伐。为此，我党中央希望也需要中苏关系像莫斯科会议所表现的那样的友好合作保持和发展下去。

但是，形势的发展同我党中央的愿望相反。莫斯科会议后不久，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当时的部长是马林诺夫斯基）向我国国防部提出要求，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苏联核潜艇舰队在太平洋活动时，可以通过这个长波电台同莫斯科联系，因为苏联在远东地区还没有这样

一个合适的建长波电台的地方。苏方提出，这个长波电台由中国出一部分钱，苏联出一部分钱，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其实，所谓“共同使用”当时并无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核潜艇，所以使用这个长波电台当然就只能是苏联，实际上等于是要两家出钱，一家使用。

当时我们答复说，钱不需要苏联出，由中国出，在中国建，归中国所有。苏联需要时可以使用，但是所有权归中国。

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又来电报，还是坚持苏联也出钱。他说，费用大概需要一亿美元，苏联承担一半。但是他避开归谁所有的问题。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党中央的重视，很想知道苏联究竟有什么打算。正在这个时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在1958年7月21日要求紧急会见毛主席，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觉得事情既然这么紧急，同意马上见他。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当时北京天气很热)接见了尤金。少奇同志、周总理和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和陈毅同志参加了会见。尤金对毛主席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向毛主席汇报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东事件。尤金说苏联决定不参与中东战争。毛主席说，我们也不赞成参与。我们搞反帝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作政治斗争，不跟它直接打仗。当时

美国军队已有一万多人在黎巴嫩登陆，后来英国也有二三千人登陆。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但是苏共中央决定不作军事卷入。毛主席说，我们赞成这个方针，不作军事卷入。但是要准备美国打大仗，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南斯拉夫问题。尤金说，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继续批判，不能停止。他还说，苏共中央感谢中国党对苏共的支持。现在南斯拉夫集中攻击中国党，而这个攻击本来是应该针对苏共的。毛主席说，我们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苏联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海岸线长，可以四通八达。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同苏联建立一个共同舰队。

讲到这里的时候，毛主席诧异地问：啊！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又要搞"合作社"，是针对过去苏联跟中国合办的四个合营公司说的。这是毛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斯大林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是苏联在中国开矿，开采出来的矿物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苏联。当时我们为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只好答应了。毛主席把这些合营公司叫做搞"合作社"。

毛主席对尤金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

这时尤金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要中国考虑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他没有回答毛主席提出的问题。

接着他就谈第四个问题，即苏联国内情况。尤金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苏联的情况空前的好，工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完成，今年的农业收成也空前的好，会得到丰收。

尤金谈完以后，毛主席抓住第三个问题不放。他问尤金，照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我们原来设想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毛主席说，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再考

虑去人的问题。你们不同意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搞。这个问题暂时不定,因为你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办合作社?是不是你们要强迫我们搞共同舰队?是不是苏联指挥这个舰队?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现在暂时不定,明天再谈。

第二天,7月22日,毛主席又约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上次参加的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等同志外,又增加了林彪。

毛主席对尤金说,中苏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局势,我们九个指头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不一致。过去多次讲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毛主席说,昨天你提出的问题,我可能有误会,也可能是正确的。看来,要你们帮助我们搞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今天早上我们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撤销这个请求,不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我们中央过去写信请求你们帮助,是要加强海军建设,加强海岸防卫,也提出过建设核潜艇,但是没有提出过要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提出过要建设中苏两国共同的核潜艇舰队。你们苏联人大概觉得中国人没有经验,不可信,毛手毛脚,所以要搞合营,要搞共同舰队。如果要合营,索性一切都合营,索性我们把全部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搞游击队好了。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

毛主席说,斯大林过去看不起中国人,去年莫斯科会

议，我们感觉到赫鲁晓夫能够跟我们平等相待。我当时说过，这种方针是好的。但是现在你们又来了，又要搞共同舰队了，又要恢复“合作社”了，又要搞斯大林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决定现在不搞，撤回请求。要么我们就把全部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不仅占领旅大，还要加以扩大。不过，老实对你们说，你们这样搞，我们只好自己搞舰队了。如果你们说这是民族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你们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来了。

毛主席对尤金说，你这次谈过来谈过去都说不清楚，或者是我到莫斯科去跟赫鲁晓夫谈，或者是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跟我们谈。这时，尤金再三辩解说，赫鲁晓夫跟他说的时候，没有谈到舰队归谁指挥，也没有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中国同志研究具体的措施，没有别的意思。

毛主席说，我们是要搞潜水艇的，如果苏联要提条件，一个条件也不行，半个条件也不行。请你把我这个意见如实告诉赫鲁晓夫，不要怕我的意见太尖锐。如果赫鲁晓夫不同意，他就不必来。尤金说，这是误会。毛主席说，那不一定。你把我们的意见如实报告赫鲁晓夫，请他考虑，是我去还是他来。

这次谈话从上午 11 点一直谈到下午 4 点，尤金再三解释，但他也说不清楚究竟赫鲁晓夫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反复问他，他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前后矛盾。毛主席最后对尤金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

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不久前我才去过莫斯科,那么,按常理,这次应该是他来。如果他不愿意来,我也可以到莫斯科去。

这两次谈话我都没有参加。后来听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讲,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尤金满头大汗,说话颠三倒四。

由于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尤金回去后迅速向赫鲁晓夫报告。据后来赫鲁晓夫解释,他接到尤金的电报以后,本来想马上就到中国来,因为要等美国对苏联关于召开五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的答复,所以推迟来华。

五国首脑会议是指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下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制止中东军事冲突。召开这个五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是赫鲁晓夫在美国和英国派军队在黎巴嫩和约旦登陆之后,在 7 月 19 日提出来的。艾森豪威尔在 7 月 22 日答复赫鲁晓夫,说可以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召开五国首脑会议。但是到了 25 日,艾森豪威尔又给赫鲁晓夫写信,提出不必开五国首脑会议,把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就行了。这样就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赫鲁晓夫知道五国首脑会议开不成,便决定 7 月 31 日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是 7 月 31 日下午到达北京的。他的专机到达南苑机场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到飞机场去接他。毛主席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铺红地毯,一路上大家也没有讲什么话,整个场

面非常严峻。

到怀仁堂后，中央其他同志都离开了。毛主席只和小平同志一起跟赫鲁晓夫在怀仁堂后厅会谈，苏联方面只有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参加，费德林当翻译。

据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们，这次会议非常紧张。赫鲁晓夫一上来就否认他们有过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想法，但是他谈了好久也没有进一步谈及这个问题，只是大讲过去斯大林怎样跟中国搞合营公司，讲他们内部对建设海军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究竟是建大型的还是小型的，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滔滔不绝地谈了很久。

毛主席很不耐烦，直率地对他说，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

赫鲁晓夫又对海军建设究竟是主要搞潜水艇、鱼雷快艇，还是主要搞大型巡洋舰，或者搞发射导弹的飞机等问题说了一大套。

毛主席又打断他的话，郑重地对他说，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这就把赫鲁晓夫逼到墙角。毛主席说，你们大使尤金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他还说到你们的黑海不行，波罗的海没有出路，北海太窄了，海参崴也有危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很难搞大的远洋舰队。赫鲁晓夫解释说，这些话我说过，黑海和波罗的海不需要搞大的潜艇舰队，因为在海岸上就可以用炮火控制海面。摩尔曼斯克离美国又太远，中间要经

过格陵兰和英国，我们的潜艇舰队进入大西洋会被他们发现。海参崴好一些，有千岛群岛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利用千岛群岛来监视我们、打击我们。中国海岸线长，面对太平洋，一旦战争爆发，用潜艇舰队打击美国比较方便。他说，我们的具体想法，可以在中国的一条大河岸边，比方说在黄河岸边（按：他是这样说的，看来他根本不知道黄河河口的深浅），可以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他说，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毛主席抓住他的话说，你们大使尤金就是说要在中国搞共同的核潜艇舰队。这时候赫鲁晓夫又辩解说，尤金说的不对，我们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意思，是中国政府给苏联的信里提出要搞核潜艇舰队问题的。

毛主席说，不对，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并没有说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说要搞中苏两国的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赶忙否认说，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毛主席说，有记录为证。尤金上次谈话是有记录的，记录就在这里。当时毛主席就拿记录给赫鲁晓夫看。毛主席说，你看是不是这样写的？尤金还说你建议搞共同舰队，还说可以吸收越南参加，这个对不对？赫鲁晓夫说，关于吸收越南参加，倒是有过这样的想法，那是讲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毛主席说，战争时期那是另外一回事，尤金说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说要搞共同舰队，就是你们要搞斯大林过去搞的那种“合作社”。你赫鲁晓夫1954

年取消了这些“合作社”,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要搞“合作社”呢?赫鲁晓夫再三辩解说,尤金是个好同志,但是他听错了我的话,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也有责任,因为我谈的时候,可能没有交待清楚,所以经过他的转达,事情就搞得不对头了。

赫鲁晓夫接着又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搞共同舰队,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了解不对,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这时,毛主席非常生气地说,什么,触犯了你们的自尊心?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这个时候也有点火,他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主席更生气了,说,谁粗暴?是你派的代表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要搞共同舰队。当时我们理解,你们就是要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我们说,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不干。我们可以分工,你们去搞核潜艇舰队,我们去打游击战。

毛主席说到这里时,赫鲁晓夫说,现代战争条件下打游击战不行。

毛主席说,不行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

这时小平同志插话说，当时毛主席问尤金是不是要搞共同舰队，尤金没否认。他提的就是共同舰队。毛主席问是不是要搞“合作社”，尤金也没有否认。当时在座的其他政治局同志听了以后都“啊”了一声，都很吃惊，很奇怪为什么苏联提出要搞共同舰队。毛主席提出是不是搞“合作社”，这说中了要害。你还说很伤心，伤什么心呀！

毛主席说，我当时听尤金说了三次，都说的是共同建设共同舰队。我有过怀疑，但尤金三次都这么说。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我们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请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个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都交给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的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这样搞过，你们想扩大，那就扩大吧。毛主席问赫鲁晓夫，你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再来搞斯大林那一套？

赫鲁晓夫赶忙推脱，一再说，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永远也不会再提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你说的是永远不提，那好，把你的话记录下来。

赫鲁晓夫辩解说，这是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

错误地转达"我们的立场。

这里,赫鲁晓夫说的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可见尤金并不是完全错误地转达他的立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转达他的立场。

毛主席说,那好吧,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我们不搞共同舰队。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中国建设海军,你们不帮助也可以。

这时赫鲁晓夫又提出长波电台的问题。毛主席说,长波电台的问题好办,就是我们建,我们有,你们可以用。马林诺夫斯基两次来电报,都说共同建、共同用。其实就是你们使用,我们现在还没条件使用这个东西。赫鲁晓夫推脱说,他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来电,但是苏联可以出钱。毛主席说,不,不需要苏联出钱。中国自己搞,不要苏联出钱。如果你们要出钱,我们就不搞。赫鲁晓夫说,那我们同意中国的这个决定,你们建,你们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

接着,赫鲁晓夫又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顾问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苏联准备把在中国的顾问全部撤回去。毛主席说,苏联顾问大部分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个别的人有些毛病。你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对个别人有意见,过去没敢说,也不适合说,去年才讲了这个问题,因为去年大家都更加互相了解了。但是,我们的意思还是把这些顾问作为专家留下来,帮助我们工作。有些不需要的,可以不再聘请,但是大部分还是要

留下来，个别表现不好的，我们提出名单，请你们调换。

看来赫鲁晓夫提出顾问问题是一种试探，想看看中国究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也包括有对中国施加一点压力的意思。

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谈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如果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那个时候一定要互相配合，要搞"合作社"，这是将来发生战争时的事情。现在我们不搞共同舰队，不再搞"合作社"。

后来，毛主席在1960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谈到这次事件时说，那次谈话说明，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

这次会谈(7月31日)以后的三天里(8月1日到3日)，还举行了三次会议，8月1日、8月2日会谈的时间比较长。毛主席利用这个机会，同赫鲁晓夫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听听他的观点，也说明我们的观点。

毛主席跟赫鲁晓夫8月1日的会谈，是从上午的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举行的。我们方面参加的有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陈云、林彪、小平同志、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当时是总参谋长)、胡乔木、杨尚昆同志。苏联方面除了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以外，还有马林诺夫斯基、杜库列佐夫、库兹涅佐夫和安东诺夫。

这次会谈主要是谈国际形势，而且集中谈美国出兵黎巴嫩的问题。因为7月15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到这时已经半个多月，在黎巴嫩登陆的美军有15000人。毛主席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美军登陆黎巴嫩引起全世界反对。这场斗争美国肯定要输。从这个分析出发，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毛主席提出谁怕谁、谁怕谁更多一点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们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曾经谈过。美国弱点甚多，恐怕还是他们怕我们更多一点。毛主席还谈到，看来美国对五大国首脑会议是要拖，这个会议很可能是开不成。开不成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暴露了美国不愿协商解决国际问题。

毛主席谈到戴高乐的时候说，戴高乐上台有好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当然对国内来讲，法国共产党会受到压力，但是也可以让群众看一看戴高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以暴露戴高乐的真面目，破除群众对他的幻想。但是我们对戴高乐还是要讲究策略，因为他对美国闹独立性，这对反美斗争有利。这点赫鲁晓夫也同意了。

毛主席还提到，这次中东事件证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他估计美国很可能要撤退，落得一个挨骂的下场。赫鲁晓夫说，他们主席团决定不用参加战争的办法来支援伊拉克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反美斗争，但是采取举行军事演习的办法来警告美国。他说，他们准备在伊朗边境上演习，在土耳其边境上演习，还和保加利亚一起搞联

合演习。毛主席表示赞成不采取军事干预的办法来支援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他对赫鲁晓夫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给你谈过，支援外国斗争不一定要苏军直接出面，可以用参加志愿军的办法。我主张最好不出兵，但是要出兵的时候，不要派军队，只派志愿军。毛主席还再三讲到，我们要注意讲究斗争方法。对美帝国主义，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究策略。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对昨天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还耿耿于怀。他谈到苏联专家问题时说，我们的一些顾问在你们这里做了一些蠢事，你们就能够批评我们，向我们菜园子里面丢一把荆棘。毛主席当时就把他顶回去。毛主席说，不对，你看错了。我们不是给你菜园子里丢石头，而是丢金子。少奇同志也说，我们只是当面给你提意见，我们背后不向任何人讲我们之间的分歧。毛主席说，你是不是又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是不是说我们又要专家，又要批评你们。赫鲁晓夫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地位上。你们这里有我们的顾问，而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顾问，我们的顾问做了一些蠢事，你们就可以批评我们。

8 月 2 日的会谈从下午 5 点钟到 9 点钟，会谈地点改在颐年堂，参加的人基本上一样。

这次会谈主要也是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跟上一次会谈差不多。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组织究竟是什么性

质的？毛主席说，说它们是侵略性的，这没有疑问。问题是，究竟是防御性大一点，还是进攻性大一点。毛主席说，依我看还是防御性大一些，是一个钙化组织，像一个人得了肺结核病一样，钙化起来就防止结核菌扩散。

毛主席还谈到，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相距20年的时间来计算，我们应该争取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现在起，至少推迟七八年，有可能的话，要争取推迟10年、15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争取推迟，努力推迟它。但同时要准备万一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他们怎样打算，我们说了不算。他们有没有战争狂人呢？肯定是有的，万一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怎么办？我们得有准备。

毛主席又谈到，紧张究竟对谁有利？我们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似乎紧张局势只是对我们不利。这不见得。辩证地看问题，紧张局势对美国也不利，可以引起全世界人民来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以动员更多的人来反对美帝国主义。黎巴嫩事件造成了紧张，但结果引起了全世界反对美国。美国军队最好是半年内不撤，那样可以使得有更多的人来反对它。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但估计美军很快会撤退。因为美军留在那里受不了，退还能保留一点面子。估计美国最后可能连面子也不要就滚回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寸土地，但是也不要人家一寸土地。毛主席问赫鲁晓夫同意不同意这个意见。赫鲁晓夫表示，他完全同意这个意见。

接着，大家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谈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谈两国国内的工作。少奇同志谈了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彭德怀同志谈了军队要搞生产，并且要帮助农民。毛主席谈了干部要下放劳动，还说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赫鲁晓夫也谈了他们国内的工作，但是对我们谈的政策、方针，他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不赞成。

8月3日的会谈从下午1点到2点在勤政殿举行。这次会谈比较简单，是关于这次赫鲁晓夫访华的中苏联合公报签字之前的一个简短的会谈。因为赫鲁晓夫是秘密来的，原先没有准备搞什么公报，也不准备公开回去，而是秘密回去。在会谈两天以后，毛主席向赫鲁晓夫提出是不是公开回苏联去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要么是秘密来公开回去，要么是秘密来秘密回去。双方商量结果，决定公开回去，同时发表一个公报。所以在会谈过程中，由我外交部和苏方代表团准备一个联合公报，签字以后赫鲁晓夫就公开地离开北京。

这个公报说，中苏双方对国际问题和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充分地、全面地交换了意见，谴责美国和英国出兵侵略黎巴嫩和约旦，要求他们把军队撤走，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同时两党对国际形势下所面临的亚洲、欧洲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照毛主席的说法，公报在这个地方是吓唬美国一下。

公报还讲到，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一步加强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并且对所讨论的问题达成了完全的协议。

公报所说的中苏两国领导人对当前国际形势充分地交换意见是事实，还说就中苏两国关系充分交换意见也是事实，双方对各个国际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至少从表面上看)也是事实。但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这四天里面，暴露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显示在中苏关系上空出现一片乌云、一阵雷声，虽然没有暴雨，但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从中国方面来讲，毛主席在这次会谈中无比坚强地表明，中国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国压力，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抵抗，也是可以抵挡得住的。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中苏两国会议中完全没有谈到三个星期后中国炮打金门的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根本

不是像有些外国评论评说的那样，中苏事先商量好炮打金门。

第二节　四方的盘算

赫鲁晓夫7月底8月初到北京来跟毛主席会谈的时候，曾经对中东形势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当时伊拉克已经发生了革命，7月13日伊拉克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退出由美国和英国蓄意组织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退出由英国人一手炮制的伊拉克—约旦联邦。伊拉克革命政府同时宣布承认由纳赛尔总统组织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7月15日，美国匆匆忙忙调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运送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开始是两千人，后来逐步增加到一万多人。7月17日，英国又出兵约旦。美英军队出兵中东，为的是反对伊拉克人民的革命，反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要控制中东这块战略地区。

在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不到一个星期，在中东局势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台湾海峡又出现紧张局势：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那里调兵遣将，增加驻金门的部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就台湾海峡局势大肆叫嚷，加剧本来已经紧张的局面。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说，美国军队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台湾海峡

登陆作战。本来美国在台湾就有几千驻军和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在关岛、台湾和日本三角地带游弋，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还有一个大的海军基地。所以说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这样叫嚣不是无缘无故的。

毛主席在赫鲁晓夫离京后即去外地视察，先后到河北、河南、山东，然后回到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讨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人民公社问题。

这次北戴河会议，初期我没有参加，因为会议在开始阶段是分头准备 1959 年计划草案和人民公社决议草案，然后提交全体会议讨论。我在北京还有一些事宜需要处理。8 月 20 日中央办公厅催我赶快去北戴河，8 月 21 日我才去参加会议。

我到达北戴河后才知道，毛主席在前几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确定：要在金门、马祖地区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惩罚性的打击，炮轰金门和马祖。金门离海岸很近，在厦门就可以望得见；马祖在福州出海口外。这两地离大陆也比较近，蒋介石部队经常从那里出发骚扰大陆。炮轰金门、马祖的主要目的是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使它不敢再放肆地在沿海骚扰。同时还有一个附带的目的，炮轰金马，使美国人紧张一下，说不定可以分散美国人的注意力，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起一些牵制作用，对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可能有所帮助。基于这两方面

的设想，中央常委决定炮轰金门。

我到达北戴河的第三天，8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轰金门，一天打了上万发炮弹。台湾国民党马上向美国人求援。美国赶忙调兵遣将，把原驻太平洋的第七舰队的大部分兵舰，包括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集中在台湾海峡；同时还把在黎巴嫩附近支援美军登陆的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舰只，从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红海调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的舰队中调出一个航空母舰编队开到新加坡。

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谈话是含含糊糊的。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他，如果发生进攻台湾的事情，美国军队怎么办？艾森豪威尔拒绝回答是否同国民党一起对解放军作战，也不肯说明台湾局势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声明不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在这里所说的“责任”，是指美国政府在 1954 年跟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协定里规定的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一起防守台湾的义务。

当时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主张，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战争。艾森豪威尔反对这种主张，不同意首先发动核战争，认为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在宣传上我们要采取进攻的姿态，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在政治上压倒美国人的气焰，同时要防止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我国领海，给

台湾当局舰船护航。我国政府在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我们的领海为12海里,宣布金门、马祖是我国的内海岛屿。这是警告美国人不能进入我国领海,如果进入我国领海,我们就有权开炮。

关于领海的范围,国际上各说不一,有些国家宣布为7海里,有些国家宣布为12海里,也有些国家甚至宣布为200海里。我国政府宣布为12海里,金门、马祖就在领海的范围以内。

当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声明,虽然没有明白表示一定要帮助国民党保卫金门、马祖,但是他威胁说,如果那边发生情况,美国总统要做出判断,可能把金门、马祖的形势和台湾联系在一起考虑。言外之意,如果我们进攻金门、马祖,美国人要帮台湾当局打仗的。美国摆出了这么一个架势。

两天后,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说美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舰队如果进入我国领海,那就是侵略。

在周总理发表声明之前,毛主席从北戴河回京后,在9月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把周总理的声明印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说明我们这次炮轰金马的意图和方针。毛主席说,我们并不是现在就要解放台湾,也不是现在就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给国民党一个惩罚性的打击,同时要美国紧张一下,这样来支援中东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在会上民主人士都赞成我们的方针,认为应

该在政治上采取攻势，给美国迎头一棒。

最高国务会议是从5月开到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同时，7日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声讨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从北京开始，上海、天津、广州等全国十多个城市、两亿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同时也支持伊拉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黎巴嫩和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

这时莫斯科紧张起来。赫鲁晓夫9月5日通知我们，说要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中国来了解情况。这说明在我们发表领海声明和杜勒斯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紧张起来，匆匆忙忙要派葛罗米柯来打听究竟。

当天(9月5日)晚上，周总理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时向他说明：第一，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在我们沿海骚扰；第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因为美国企图独霸台湾，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台湾单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搞两个中国；第三，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绝不连累苏联，不会拖苏联下水。总理还要求苏达利科夫把这三点马上报告莫斯科，同时表示，如果葛罗米柯还要来的话，我们准备接待他。

9月6日葛罗米柯秘密地飞到北京。下午两点钟，周总理接见他，并把昨天同苏达利科夫讲的意思告诉了他。总理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既不是要解放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我们就是要打击国

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的气焰，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总理这么讲了以后，葛罗米柯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政府的方针，回去后将报告赫鲁晓夫，并希望还要见见毛主席。

毛主席在当天晚上接见了葛罗米柯。毛主席把他 9 月 5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讲话要点告诉葛罗米柯，而且讲得更明确，把我们在台湾海峡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全部告诉了他，要他回去向赫鲁晓夫报告。

毛主席说，我们炮打金门，不是要打台湾，也不是要登陆金门、马祖，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希望你们放心，我们的目的是要调动美国人，这是一。

第二，美国人同国民党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不久前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的时候，并没有说现在就承担共同防御金门、马祖的义务，而是说，美国是不是要像共同防御台湾本土一样来共同防御金门、马祖，还要看情况。毛主席说，艾森豪威尔这个讲话表明，他还是怕跟中国打仗。即使是杜勒斯 9 月 4 日的声明，也没有肯定说要保金门、马祖，也是比较含糊的，只是摆出一副恫吓的姿态。

第三，毛主席说，我们宣布 12 海里领海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警告美国海军和空军不得入内。它如果进入我们 12 海里的领海界线，就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另一个目的也是告诉美国人，它只要不越过这个界线，我们就不打它。当然我们也没有说，如果他越过了，我们就一定马上打它，我们可以警告。

第四,毛主席说,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美国人可能要逼迫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退。他要国民党撤退,主要不是对我们有什么好感,而是金门、马祖离中国海岸太近,美国怕我们打金门、马祖。如果国民党要防守金门、马祖,跟中国大陆开战的话,美国就有被拖下水的危险。因为在国民党不撤退的情况下,金门、马祖前线不断炮战,这个地区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这就使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害怕被拖下水,因为美国还没有决心要打世界大战。

第五,毛主席说,尽管这样,我们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准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它可能要打,不是放在它不会打,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准备美国打仗。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跟它硬碰硬。如果它要登陆,我们就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放它进来,放它进来后就关起门来打狗。

毛主席跟葛罗米柯说,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跟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同于国民党,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

毛主席说,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当前的问题。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点请葛罗米柯告诉赫鲁晓夫。毛主席说,将来有机会,我可以同赫鲁晓夫就美国人发动战争时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不发生这个问题。

经过毛主席、周总理这么讲以后，葛罗米柯完全放心了。他说，我个人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个人是赞成的。我回去后一定把毛主席所谈的中国的想法、中国的打算，原原本本地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赫鲁晓夫同志。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一定如实报告。从我个人来讲，是赞成你们想法的。

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后，葛罗米柯第二天(7日)飞回莫斯科。

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报告，摸到了我们的底牌以后，发信给艾森豪威尔，放了一炮。他在信中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略，苏联也一定要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这句话暗示：如果美国侵犯中国，苏联就要援助中国打仗。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当然，赫鲁晓夫是有意也乐意放这个空炮，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我们根本不会和美国打仗。

以上就是1958年9月初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的真实情况，都是有案可查的。但是，葛罗米柯在他写的回忆录里，却避开这些不谈。他把当时的情况描写成好像我们一定要跟美国打仗，甚至说我们要把苏联拖下水，要美国跟苏联打核战争。这完全是捏造。

在葛罗米柯的回忆录里，他也隐瞒了一件并非不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他返苏向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苏联向我们提出，他们要派导弹部队，后来又提出改派空军部

队,"支援"中国,这些部队要驻扎在福建前线地区,归苏联指挥。这建议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政府拒绝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对中国还是不放心,还是想派部队驻扎在前线地区,监视中国的行动。

葛罗米柯在他回忆录里没有讲到这件事,倒是在西方出版的所谓《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遗言》那本书的第二部分里讲到了。书中述及金门事件时说,苏联要求在沿海驻扎苏联的空军,被中国拒绝了。不过,这个赫鲁晓夫的《最后遗言》是真是假现在还不清楚。据说这个稿子是赫鲁晓夫在生前最后几年里的录音。录音带不知经过什么途径到了西方,由西方整理出版的。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这是可靠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可靠。而苏联方面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

从美国登陆黎巴嫩,中东形势紧张,一直到台湾海峡紧张,金门打炮的过程中,毛主席逐步形成了叫做绞索政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毛主席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的讲话里说得比较充分。他说,美国在世界各地搞军事基地,台湾是它的大军事基地。所有这些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都是美国自己制造的绞索,是它自己把这些绞索套在脖子上,把绞索绳子的另一端交给各国人民。总有一天,世界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这种侵略和战争政策要处以绞刑。现在台湾也好,金门、马祖也好,都是美国的绞索。我们不要让它从金门撤退,要拖住它,我们想打就打。今天(9月8日)我们要打三万发炮弹,但

是我们也不是马上要登陆金门。我们要争取10年的和平，在10年内不想打大仗，在这10年内主要把我们国内建设好。10年以后再争取15年，再争取20年，或者再争取更长的时间。就是要不断的努力，跟世界人民一起，跟社会主义阵营一起，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

毛主席说，现在看起来，美国也不想打，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就是曾在1949年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那个艾奇逊)最近发表的一个谈话就是证明。艾奇逊说，现在美国既不能撤，也不能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局势。毛主席说，这说明美国内部也有人看到这种情况很不妙，要么打，要么撤退，二者必居其一，否则就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我们既不要它撤，也不去登陆，就吊在那里，这是一个绞索。炮打金门的结果，就是要把美国套在那儿，使它经常处于被动。而我们则掌握主动权，要使美国人紧张一下就打炮，要松弛一下就不打炮。

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斗争策略，是我们跟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开始时国内外许多人都不知道个中奥妙。所以这次金门炮战，国民党虚惊了一场，美国人也虚惊了一场，连赫鲁晓夫也虚惊了一场。由于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以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0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形势，包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一致认为：美国当前的政策是脱身金马、霸占台湾。

因此，我们与此针锋相对，需要采取"联蒋抗美"的策略。毛主席指出，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第一是蒋不愿撤出金马，我让金马留在蒋手中有利于就近保持接触，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对美一紧一松，主动权在我。第二是蒋介石要死守台湾，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第三是我在蒋介石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让蒋介石跟美国人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跟美国人斗。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介石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因为美国要扶持孙立人，搞倒蒋介石。美国要派大批陆军到台湾驻扎，蒋介石不同意，只允许美国派团一级的部队驻在台湾。由于美蒋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人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介石是有共同点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联合反美，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

最能说明当时我们采取这个正确方针的，就是毛主席起草的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署名的两次《告台湾同胞书》（10月6日和10月25日）和根据毛主席意见起草的、在10月1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且看它们怎样动作》。这三个文稿充分反映了我党中央当时对金门炮战的策略思想。

10月6日发表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第一次《告台湾同胞书》，明白宣布我军暂停炮击金门和马祖七天，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向岛上自由运送供给品，但是条件是没有美

国护航。如果美国护航，侵入我领海领空，我们就要炮击。开始时，美国军舰还护航，我们打炮，美舰掉头就逃，国民党船队遭殃。后来美国也不护航了。本来，在我政府宣布关于我国领海的声明发表以后，美海空军曾多次侵犯我们的领海领空，但是从10月7日以后，美军在金门前线就没有再侵入我们领海了。当然，后来也还在别的地方发生过美国船、兵舰、飞机侵入我领海领空，甚至飞机一直飞到大陆来的情况，我们都发出警告。后来美国U－2飞机侵入我们领空，被我们击落了。

金门炮战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后来就完全停了。偶尔打一打，也是小打，而不是一天几万发炮弹那样打。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把问题吊在那儿，让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岛上，也给美国套上一个绞索。

一个月后，在1958年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曾经回顾炮打金门马祖，谈了他的看法。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的方针是小心谨慎。美国军舰护航，我们不打美国军舰，专打蒋介石的军舰。我们是打我们自己国内的人。美国人也很小心谨慎，也是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触犯我们。我们在9月4日提出12海里领海权，美国人公开表示不承认，硬是要突破我国12海里的领海线，但是，它不在金门，也不在马祖，而只在福建平潭那个地方超过我们的12海里领海线。就是它要在你12海里领海线上突破一

下，表示它不承认。我们没有打它，但发出警告。以后，它又来突破一下，我们又发出警告。这样一次又一次，我们警告了40次以后，美国人觉得老是这样下去会有危险，现在它就遵守我们的12海里领海线了，不仅金门、马祖不来了，连平潭以及其他地方也不敢突破了。

毛主席还说，今年夏天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那次赫鲁晓夫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当时我向他提了五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你不帮助我们搞海军，硬要搞共同舰队，那么我们就不搞，索性把我们的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我们一点也不要了。当时我说我去打游击，搞点游击队。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要搞游击队呀！现在世界上游击队不行了。我对他说，我的鼻子都让你堵死了，海口统统交给你了，我不搞游击队还做什么事？没有事情做，我只有搞游击队。我是搞游击队出了名的。赫鲁晓夫说，这个不好。后来他就缩回去了。最后才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吓唬帝国主义一下。其实，那次赫鲁晓夫来根本没谈金门的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谈。倒是谈了国际形势，谈了中东事件。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大概经过他们中央考

虑，在10月间来信说，照我们意见办，帮助我们搞海军，帮助我们搞核潜艇，不再搞共同舰队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来信提出，台湾海峡地区比较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一次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我们给他复信，表示我们不赞成他们派空军，也不赞成他们派导弹部队。因为他们说他的导弹部队不能交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指挥。我们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那个地方，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一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要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我们统统给他顶回去了。

后来在第二年(1959年4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炮打金门这件事情。毛主席说，去年炮打金门是我们先打的，不要赖在美国人身上。我们就是要欺负一下美国人，因为他们在中东混不下去了。伊拉克发生革命，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神魂不安，决定派兵去黎巴嫩。但是，全世界人民群起反对。联合国在8月21日召开大会，通过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大多数国家要求美国和英国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兵的决议。

毛主席说，联合国这个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8月23日)，我们就在金门打炮。第一天我们一共打了1.9万发炮弹。美国人、蒋介石都说我们打了四五万发，其实那是夸大其词，没有那么多，只打了十几分钟。因为打1.9万

发炮弹不要好多时间，只要十几分钟就全都打出去了。国民党部队的参谋长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打死的，还有一个副司令也是在那个时候受伤的。台湾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身上也染了一点血。那个时候，蒋介石慌得一塌糊涂，准备搬家。行政院长陈诚开了会，要政府部门统统搬到乡下去。经济部就带头搬到乡下去了，但是其他部的人老于世故，硬着头皮呆在台北，后来经济部觉得上当，又搬回来了。

美国人也着了慌，从美国西海岸、日本的横须贺、菲律宾的马尼拉调来海军和空军，主要调兵舰到台湾海峡来。它还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抽调一部分舰只到东方来。开始的时候，他们摸不着我们的底，调集了许多兵舰。据杜勒斯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军集中。当时美国一共有12艘大的航空母舰，这回集中到台湾海峡周围的就有6艘，就是说有一半航空母舰都集中在这里了。他们拼命调动海军和空军来，就是怕我们把金门、马祖连同台湾都夺回来。

毛主席说，从8月下旬我们开始打炮起，经过9月一个月，到10月，美国人就开始把情况弄清楚，看到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些地方都拿回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军舰调回去了。毛主席说，你刚把军舰调来，呆上个把月也好嘛。不，它只呆一两个星期就回去了。结果，11月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赢得了多数。我们无代价地做了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的忙。这件事情

闹得全世界都心神不安，特别是闹得美国心神不安。美国人历来是欺负我们的，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欺负他们一下，所以说金门打炮是我们欺负美国人的。

毛主席说，美国人本来非常神气。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他们顽固地拒绝我方提出的要美国撤退在台湾地区的全部美军的要求，并在1958年初无理中断会谈。我们毫不示弱，在6月30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天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后果由美国负责。这等于最后通牒。我们不怕它。在要求恢复谈判的同时，我们在福建前线采取行动，封锁金门和马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结果，美国人也很怪，我们给它那么一个最后通牒，它不在15天内答复我们，也不说拒绝我们的要求，而是在15天过后，在第17天由杜勒斯出面，说可以恢复会谈，仍为大使级，但地点改在华沙举行。从这时可以看出美国有它软弱的一面。

毛主席说，在金门事件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都在搞边缘政策。美国人在搞边缘政策，调动那么多军舰，而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这么打。但是，美国军舰上面铺了一块很大的美国国旗，边上也有美国国旗，意思是说这是美国的军舰，要我们不要打。它也不到金门、马祖侵入我们的领海，就在台湾海峡公海上那么晃来晃去。我们也确实不打它，因为我们打的是内战，我们只打蒋介石，不是打美国人，我们跟美国人还在华沙谈判。

毛主席说，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

争边缘,两方面都处在战争的边缘,我们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毛主席谈到这里就有声有色地讲了《聊斋志异》里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狂生夜读”。毛主席说,有一位书生夜里坐着读书,有一个鬼来吓唬他,在窗口伸出很长很长的舌头,以为这样可以把书生吓倒。可是,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来把自己的脸画成《三国演义》里那个张飞的样子,就像我们现在袁世海的花脸那个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得老长老长。一人一鬼就这样对着、看着、顶着,你望我,我望你。结果那个鬼觉得没办法,吓不倒书生,跑了。毛主席说,《聊斋志异》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就要吃掉你。

毛主席说,去年9月间,我们在这里开最高国务会议的时候(是指1958年9月间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谈金门打炮事件和周总理关于领海的声明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台湾目前是不能解放的,对金门、马祖要相机行事,有机会就把金门、马祖拿回来。当时这样想也不是冒冒失失,而是很谨慎的。但是后来感到这样想也不对头。因为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毛主席谈到这里时对着张治中说,文伯先生,那个时候你还是想不通,你还是想要金门、马祖。当时我对你说不想要了,统统都归蒋委员长暂时看管着。我们少了金马两个小岛也可以活下去。

毛主席以上讲话,把炮打金门的前前后后的策略思想都讲清楚了。但是,当时,不仅蒋介石集团不了解,美国人也不了解,赫鲁晓夫也不了解,都出了--身冷汗。在他们仓促应付中又暴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就中苏关系来说,赫鲁晓夫在搞共同舰队失败之后又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大国沙文主义是一贯的。

第三节　影射攻击的开始

在赫鲁晓夫 1958 年 7 月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从 1958 年年底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地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 年 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同美国参议员汉费莱谈话时,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内政。1959 年 1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 21 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

这就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的先例,也是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的先例。这种状况只能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后的愤懑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

我们党中央注意到赫鲁晓夫这种影射攻击,也明白他的用意。但是,毛主席还是强调以团结为重。1959 年

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26日到2月2日)上，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在“21大”的报告比“20大”有进步。他在报告中讲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是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的。他对“20大”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补。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社会党问题，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口径。毛主席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21大”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

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主要精力用于国内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到武昌会议(12月)，到北京会议(1959年1月至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一直到上海会议(3月至4月初)，主要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左”的倾向的某些问题。

上海会议之前，在西藏发生了叛乱事件。在这一事件(包括其后我军平叛)过程中，苏联官方没有发表公开声明，报刊也没有发表评论，但是苏联报刊既报道了我国的新闻公报，也报道印度官方及报界的评论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应，而且在报道数量上，后者大大超过了前者，充满了大量污蔑和攻击中国的言论，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偏袒西藏叛乱集团及其幕后支持者印度当局。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西藏上层叛乱、我军平叛以

及我党中央的决策，然后再谈苏联的态度。

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早就酝酿叛乱，到3月10日公开闹事，打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位藏族官员，还打伤了西藏军区一位藏族副司令员。到这个时候，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少奇同志在3月17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会前少奇同志跟毛主席通了电话。这次会议确定了对西藏叛乱采取坚决平叛、全面改革的方针。

在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八年。过去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会议认为，现在首先要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西藏军队，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对达赖本人，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要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走，这也没有什么。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平叛、改革。

周总理在会上还谈到，这件事情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很积极，把印度推到前头。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现在对少数上层人物发动全面叛乱要有充分准备，包括军事部署，但是我们不打第一枪。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到两天，西藏叛乱集团指挥藏军在3月19日晚上对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20日天亮以后开始反击，全力平息叛乱。在这之前，达赖还在拉萨，还和我们有联系，他给

我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写了三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这件事和他无关,希望同谭冠三商谈。这似乎表示他这时还在犹豫,但也可能是缓兵之计。过了几天,他跟叛乱集团一起逃走了。我们沿路追截,没有截到,因为他们人熟地熟,很快就逃到印度噶伦堡去了。当时我们还不能控制整个边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派那么多军队来驻守所有边境通道。有些地方我们根本没有军队。我们只是在拉萨、日喀则周围有驻军。

3月25日上海会议开始的时候,中央同志首先谈了西藏问题。小平同志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方针。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有四点:

第一,要理直气壮地坚决平息叛乱。因为西藏上层叛乱集团撕毁了他们在1951年5月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武装反抗中央,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所以我们要坚决平叛,要理直气壮地声讨叛乱集团。

第二,现在还是说"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给达赖留有余地,但是要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原为达赖)由班禅代理。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应该是要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因为他们已撕毁17条协议,我们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我们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也要理直气壮地讲。

第四，对于印度，我们暂时不公开点它的名。毛主席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就让印度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同它算账。尼赫鲁一些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讲话我们暂不报道，因为一报道就要评论，目前暂不同他辩论，看一些时候再说。这是留有余地。对达赖逃到印度噶伦堡也暂时不提。

当时周总理要我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一个新闻公报。我起草出来以后，经过中央同志讨论修改就发表了。

上海会议以后，我们在 4 月 8 日下午到毛主席住地（杭州西湖刘庄），讨论几个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稿。毛主席对这些稿子的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的公开评论。毛主席说，估计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大家会议论西藏叛乱问题。这个问题国内关心，国外也关心。我们要准备发表评论，《人民日报》要准备写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说的社论。他说，回北京以后就要着手准备。现在英国、美国、印度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当时周总理要我回北京后马上着手准备。

从 4 月 14 日开始，《人民日报》就准备写反击国外反华叫嚣的评论。也从这时候起，周总理指示我主持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参加的有乔冠华、张彦、姚溱和

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同志,每周开会一次,地点在人民日报社,由我主持,商量近期和中期的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重要的报道和评论都送周总理审定。

19日是星期天,一清早,我带着一家大小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饭、休息。香山饭店是过去慈幼院的旧址。1949年春北京刚解放不久时,新华社编辑部就在那里,少奇同志、总理也都住在那里,毛主席住在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1959年香山饭店还没有改建,还保持解放初期的原样。我正在香山饭店午休的时候,中南海总机转来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要我马上去毛主席住处去参加会议。中南海总机的话务员,本事也真大,他们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在香山,就把电话打到香山饭店来找我,果然找到了。我接到电话后,午睡不成了,马上坐车回城。中途把家里人放到新华社,我直奔中南海。

我从新华门进去,到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正在开会。毛主席一看到我就说,找你半天找不到。我说,因为预先没有料到要开会,我到香山去了。毛主席说,你马上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写一篇评论。我就问毛主席评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毛主席说,平息西藏叛乱是属于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过去我们一直对外国主要是印度方面的攻击采取克制的态度,现在可以利用评论所谓达赖喇嘛声明为由头,点名批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但暂不点尼赫鲁的名。然后毛主席进一步分析达赖声

明，对其中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是印度和英国方面的观点）逐一加以批驳。他要求我据此写出评论，当天夜里交稿。

我吃过晚饭后就动笔，第二天清晨送到毛主席那里。下午，主席把我和胡乔木都找去。他半躺在木板床上，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样修改。当时我们就在毛主席卧室的外间修改，修改以后拿给毛主席看，当场定稿。毛主席要把这篇评论用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的形式发表。他说，这样比较特别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篇评论在当天晚上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4 月 21 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题目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4 月 22 日，毛主席在家里召开常委会，要我也去。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开始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他说，《人民日报》原来准备的社论要扩大成一篇评论尼赫鲁几次讲话的长文章。因为从 3 月 11 日以后，关于西藏叛乱的问题尼赫鲁在印度议会上已经接连讲了五六次话，我们可以公开回答他了。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一下，要集中反映西藏叛乱的问题，集中宣传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正确措施，我们平息叛乱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毛主席这里说的这篇社论是指《人民日报》根据 4 月 8 日政治局常委杭州会议的意见从 4 月下旬开始准备的那篇系统反驳外国借口西藏叛乱事件反华的评论。

毛主席在 4 月 25 日给乔木、我和彭真同志写了一封

信,信里提到我们过去关于西藏叛乱的提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主席在信里写道:"'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法。"主席这里说的"全国一律照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法"就是他修改上面说的那篇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时亲自确定的提法。毛主席要乔木和我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的干部开一次会,讲清楚道理,统一宣传口径。他还要彭真向在人大、政协会上发言的人打个招呼,照这个统一说法,理直气壮地讲。

毛主席4月25日在他家里又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知我也参加。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告诉他正在修改。接着他明确提出,对尼赫鲁的评论应该尖锐些,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以斗争求团结,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印度过去的干涉以及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等讲清楚。有利,就是要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问题的国际斗争,也有利于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还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有节制,在文章中要留有余地,讲必要

的礼貌，不要把话说绝，要给尼赫鲁台阶下。对印方的谬论应该充分暴露，新华社、《人民日报》要充分报道印度的谬论；对西藏人民拥护平叛、要求民主改革的愿望要充分地反映，要从多方面来反映，要发表读者来信和资料，说明我们平叛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现在道理在我们这方面，而且叛乱基本平息，印度方面要闹也无能为力，只能打笔墨官司，只能舌战。现在尼赫鲁他们很被动，他们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斗争对我们是有利的，要坚决斗，斗到底，以斗争求团结，这对国内国际都很有好处。

毛主席说，你们秀才可以多找几个人，一起议论一下，修改一下，然后再拿到政治局常委来。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关于西藏问题的评论就由以人民日报起草班子为主改为由胡乔木领头，再增加一些人。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总理的秘书浦寿昌和中宣部的姚溱，还有外交部亚洲司熟悉印度情况的张彤同志都参加了。稿子先由我主持讨论修改，经过几天修改，到4月30日修改完毕，交给乔木。乔木在5月1日作了一整天的修改，改好后就印成大样，送给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参加会的除了常委以外，还有陈毅、彭真、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和我。大家对稿子提了不少意见，并且把题目

改成《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大家指出，因为主要是和尼赫鲁辩论，应该着重驳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是他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第七次讲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观点虽然过去也讲过，但是这次讲的比较系统，所以应该着重评论他的这次讲话，也联系到他在其他讲话中的观点，这样就比较集中了。

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后，乔木、浦寿昌和我三个人5月3日在乔木家里修改了一整天，修改以后送给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又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因为比较重要的意见上次会议都已谈过，文章也照大家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次会上没有很多原则性的意见，只对个别文字、提法提了一些意见，当场基本定稿。由于常委同志在稿子上还作了一些修改，毛主席指示胡乔木和我在第二天再仔细通读一遍，然后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在5月6日发表。

在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完文章以后，毛主席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初)结束以后，在从郑州到武汉的火车上就考虑西藏问题，因为当时已经有迹象表明拉萨要闹事。毛主席说，我当时想到可能要发生叛乱，因此对如果发生叛乱怎么办，也想了一下。当时只要求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在拉萨的驻军密切注意拉萨的西藏上层集团和藏军(按：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当时西藏仍是政教合一，上层集团没有变动，藏军也没有改编，仍保留

原来的建制)的动向,要做好准备。后来到武汉不久,3月10日他们在拉萨闹事,他们果然向解放军开枪,19日全面向解放军进攻,发动全面叛乱。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5月6日见报后,晚上毛主席要秘书林克打电话通知我:从5月7日开始,暂时停止对印度的评论,看看印度对我们这次评论反应怎么样。我们按这个指示,《人民日报》版面变了样,新华社也暂停发表批评印度当局的报道和文章。

5月8日,周总理召集专门会议,研究这篇文章发表后国际上的反应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会上大家议论到,我们的文章在印度反应强烈,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我们这样尖锐批评尼赫鲁,有些人接受不了,但是有些人清醒过来,觉得尼赫鲁插手西藏问题的确做了一件蠢事。也有些人认为,尼赫鲁本来在亚非拉国家里面很有影响,现在插手西藏问题,跟中国吵起来,对尼赫鲁很不利。

周总理说,现在研究一下,外交部要采取什么行动,是不是要给印度发出照会。当时有些同志赞成发照会;也有些同志不赞成现在就发,主张再静观印方反应然后决定。周总理认为,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汇报,在毛主席那里讨论后决定。

5月11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在颐年堂开会,毛主席在这次会上谈了四点意见:

第一,毛主席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

他说，尼赫鲁这个人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批评他坏的一面，但是对他好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着重批评了他坏的一面，对他好的一面虽然也有肯定，但重点是批评他坏的一面，因为这个时期他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尼赫鲁还是有另外一面，他的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应该能够给他下台阶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第二，毛主席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暂不理睬，看一看再说，就是说也是要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宗教领袖，毕竟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来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如果他想回来，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也是惟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在回来之前要发表声明，说他过去在噶伦堡讲的一些话都作废，是不对的，撤销那些声明，这就可以回来。毛主席说，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他也声明过去的作废，这就可以了。

第三，毛主席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上可以减少一点，正面的和反面的都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分量要减少。

第四，毛主席讲到《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

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写得还是不错。写文章要讲究提笔。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不一定看文章各段落之间的文字上的联系如何，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在联系如何。如果内在联系得紧，那么倒不一定追求形式上联系。我们不搞形而上学，不搞形式上的联系，要注意内在的思想联系。毛主席还谈到，他写文章的时候经常是注意提笔，看起来后一段和前一段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内在的思想是一贯的。每一段都给读者一个新鲜的感觉，不在乎形式上的一气呵成，做到内容上一气呵成就好。

后来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具体落实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会议要求：在规模上要收缩，总的精神是要多做少说。对西藏农奴获得解放以后高涨的生产热情，对废除债务、废除"乌拉"的热烈拥护，都应充分报道；对农奴制度的黑暗残酷可以做一般的揭发，但是也不要揭发太多，主要是报道一些叛乱头子对农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一般贵族不宜报道，因为我们还要团结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总之是要适当地控制，压缩宣传规模，多做少说。

从这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主要精力又转移到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倾向上来，不让西藏问题干扰我们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同苏联纠缠，尽管当时苏联报刊已发表了许多西方攻击我们平定西藏叛乱的报道。

但是形势的发展不以我们主观愿望为转移。7月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发表演说，借人民公社问题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当时中央正在庐山举行会议，前期反“左”，后期却转了180度，变成反右，错误地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这未始不是因由之一。

9月4日毛主席给我和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说要准备发表赫鲁晓夫的这个讲话，可以考虑在国庆节以后半个月发表，届时是不是发表，中央再考虑决定。后来，中央决定不发表。

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现在应该跟苏联讲团结，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9月1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说，一定要跟苏联同志团结起来，也一定可以跟他们团结起来。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应该采取跟他们搞好关系的方针。他还说，中苏关系是团结的，有时候有一点别扭，这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1957年在莫斯科开兄弟党会议的时候，他跟赫鲁晓夫说，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等问题，我们有分歧，这些都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纲领，这就是《莫斯科宣言》。现在我们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

这是一直到9月11日的情况，尽管赫鲁晓夫以及苏联的报刊在这个时期不断地对中国进行不指名的影射攻击，或者转载西方报刊攻击中国的报道，但是，我们党中央还是采取克制的方针，还是尽量避免分歧公开化。

第四节 赫鲁晓夫的贡礼

赫鲁晓夫是在9月15日到美国访问的。在这之前，在中苏关系史上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表明赫鲁晓夫的动向。

第一件事情是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1957年10月签订的协定。

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一事，是1957年夏天苏联主动提出来的。当时苏共领导层发生了所谓“反党集团”事件，即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后者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等人的支持下反败为胜，苏共中央决定把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苏共中央把此事通知中共中央，询问中国党的意见。当时，我们党中央认为，这是苏联党内的事情，既然他们中央已经做了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来反对他们党内的事。因此我党中央向苏方表示支持他们党中央的决议。

在这之后，赫鲁晓夫向我们提出，中国如果需要发展原子武器，苏联可以提供帮助。本来苏联早就同意帮助我们发展原子能利用的研究，我们也派了一些专家到莫斯科去参加他们原子能中心的工作，这是早就有协议的。

现在，赫鲁晓夫进一步提出愿意向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而且还愿意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让我们利用他们的技术来自己制造。我党中央认为，中国是大国，原子弹不可没有，也不可以多搞，因为我们还是个穷大国。既然苏联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帮助，制造少量的原子弹。中苏双方于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为此签订了协定。

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即开始进行为研制原子弹所必需的巨大工程建设。我们集中了大批专家进行研制工作，花了很大的力量、很大的投资。可是，不到两年时间，到 1959 年 6 月间苏联竟然提出废除这个协议，中断向我们供应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里讲到他们这样做的借口时说，现在苏联正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可能会受到西方的指责。这显然是遁词。

我们党中央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正是毛主席在颐年堂主持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 1959 年生产指标，正在忙着调整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准备上庐山开会。当时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信里讲的理由是表面理由。当然，这个表面理由也说明赫鲁晓夫这个时候倾向于向西方国家让步，以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依照赫鲁晓夫的逻辑，既然要停止核试验，那当然不能让中国制造原子弹。这就表明赫鲁晓夫这时倾向于同西方搞妥协，认

为这样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说，他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面，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包括中国拥有原子弹），依靠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世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还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同正在酝酿中的美苏首脑会谈有关。因为那些时候西方通讯社已经不断传出赫鲁晓夫可能要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当时，苏联有一个高级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代表团成员有一个是当时赫鲁晓夫十分信任、被认为是赫鲁晓夫左右手的科兹洛夫。他原来是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中央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他是6月到美国去访问的。那时传出科兹洛夫是专门接洽安排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就是由科兹洛夫把艾森豪威尔的亲笔邀请信带给赫鲁晓夫的。在赫鲁晓夫同意接受邀请后，艾森豪威尔8月3日才正式宣布。事后看来，中央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

中央认为，苏方毁约是中苏关系中一个重大事件。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一直是履行斯大林答应给我们援助的协议的，他1954年访问中国时答应增加援助的项目也是一直在履行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少建议他差不多都接受了。苏方这次毁约，说明赫鲁晓夫可能要在中苏关系上采取

新的方针。赫鲁晓夫在1958年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搞共同舰队,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当这些遭到我们抵抗以后,他可能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

由于当时中央正忙于调整计划,毛主席提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暂时不做答复,还要观察观察再说。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苏联塔斯社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

这件事情距离赫鲁晓夫9月15日访问美国更近了。塔斯社的声明完全避开印度挑起这次中印边境冲突的事实。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中印边境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而且声明还进一步说这件事情"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这些话显然是表示赫鲁晓夫对在他访美之前发生这一事件非常不满,责怪中国,偏袒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无理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偏袒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中印边境的冲突事件是8月26日发生的。这是印度统治集团内一部分人长期密谋策划的结果。自从1959年3月西藏叛乱集团发动叛乱以后,印度一部分人就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支持叛乱集

团，支持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力图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复杂化。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在3月22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借机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要中国接受印度自认为是已经划定了的中印边界线，特别是要中国接受在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

本来在这之前，中国政府就曾经向印度政府建议，要按友好的、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协商，像中国和缅甸之间、中国和尼泊尔之间那样，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为此，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两度访问印度，但是没有结果。尼赫鲁3月22日的来信，要求中国全盘接受印度单方面的主张。从这以后，印度的反华分子、国际上的反华分子和西方的资产阶级主要报刊，便吵吵嚷嚷，攻击中国。他们不仅支持西藏叛乱，鼓吹西藏“独立”，而且，要中国完全接受印度方面的无理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毒化中印关系的活动。印度政府纵容这些反华活动，纵容西藏叛乱集团的活动，并且下令印度军队进驻有争议的中印边界地区，甚至越过边界，进入到在过去印度政府官方文件中也承认是属于中国的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他们还在边界属于中国一侧的一些地区建立印度军队的哨所。这样就埋伏下印度方面挑起冲突的危险。

8月23日，印度巡逻队越过中印边界，在中国一侧建立哨所。8月25日，这个哨所的印军向中国军队开枪

射击，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还击。在这次冲突中，印度士兵有一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

此事发生后，印度方面马上大肆诬陷和攻击中国，国际上也掀起一个反华浪潮，诬蔑中国侵略印度，甚至造谣说中国要占领印度东部某某城市。倾盆大雨的造谣诬蔑都落到中国头上。西方各通讯社大量加以传播。

开始的时候，由于地区辽阔，交通和通讯不便，中央不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急电向西藏军区查问，边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印边界很长。人民解放军并不是在所有边界上都驻防。只是在平息西藏叛乱过程中，主要是平定拉萨以南叛乱集团巢穴的时候，我军才在一部分地区接近边界。所以西藏军区查询情况也很困难，费了好些时日才电报中央。中央得到的情况表明，这次边境冲突是印度方面有意挑起的。

9月6日，我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向他介绍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明白地告诉他：这次冲突是印度挑起的，是印度越过中印边界设立哨所，进行巡逻，向中国军队开枪而引起双方交火的。并且告诉他：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文件和材料，说明中印边境这次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这样做了以后，我们认为苏联是应该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

到了9月8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复信。

会上，周总理先作扼要的说明，然后由外交部主管同

志详细地介绍中印边界的情况，并展示有关文件和中印边界地图。中印边界东西长达1700多公里，纠纷由来已久，双方对边界的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有争执。特别是东段争执较多。从1954年以来，中印双方为边界问题交换照会就有40次之多。

东段的问题，主要是印度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英国殖民时期强迫西藏当局接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是当时英帝国驻印度的总督。英国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定的中印边界东段的界线，便以他的姓命名。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是这位英国总督拿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画在传统的边界线以北100多公里，割走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对于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当时的清政府不承认，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不承认。现在尼赫鲁政府却要求新中国的政府承认，这当然是办不到的。现在印度军队不仅已经完全占领了这条线的印度一侧的地方，而且还越过这条线，又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一侧的一些地方。本来中国就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现在印度政府不但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要中国承认印军越过这条线占领的地方。

中印边界西段地方很大，广袤荒凉，人烟稀少，大部分地区无人居住。从新疆到西藏的交通是经过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没有到达那里去，只是在平息

西藏叛乱以后才派军队从新疆到那里去，去了以后就是修路，修路期间不时看到印度军队的巡逻队。这说明当时印度已经越过过去的习惯边界，占领了中国不少地方，这是过去不知道的，是平叛以后才发现的。在整个中印边界沿线，过去没有驻扎人民解放军。因为根据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中央只在拉萨有驻军，在日喀则也有一点驻军，其他地方还是维持原来的藏军，没有整编，也没有解散。那些边界地区属于藏军驻扎的地方，其实藏军也没有去，只有在拉萨地区和拉萨以南的山南地区驻有藏军。

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得出三点结论：第一，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边界线，包括越过麦克马洪线，也越过了西部的传统边界线，侵占中国领土而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印度领土而引起的。第三，中国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谈判之前，建议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个别有争执的地方可以采取临时协议来解决。

政治局确定的这三点，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充分协商的余地。

会议还通过了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并决定在当天(9月8日)晚上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并由新华社在9月9日广播。

第二天(9月9日)上午,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给我外交部送来一份塔斯社声明,并说这个声明将在9月10日发表。我外交部收到这个声明时即告诉苏联临时代办: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意见已经在几天前告诉了苏方,因此我们希望苏联方面对中印边界问题最好不要发表任何评论,塔斯社这个声明也不要发表。我们希望苏联方面看了中国政府今天将发表的有关中印边界的文件和材料之后,再和我们交换意见。

当天下午,新华社广播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后,我外交部又约见苏临时代办,通知他周总理的信已经发表,并正式代表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考虑中国的立场,停止发表塔斯社的声明。

根据我当时的日记记载,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新华社是在9月9日北京时间下午6时20分广播的。这个时间等于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0时20分,印度新德里的时间是下午3时5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和北京时间差5个钟头)。我们估计,我们广播以后,无论是印度还是苏联,他们都可以在9月9日白天看到周总理给尼赫鲁的这封信。但是苏联政府不听中国的劝告,把原来准备在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提前在9月9日晚上发表了。就是说,他们上午知道中国将要发表周总理给尼赫鲁的信,下午又知道这封信已经发表,但仍然不顾中国的劝告和要求,迫不及待地赶紧把塔斯社声明发表。

苏联方面这一行动，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中苏分歧的公开化，首先采取行动的是苏联。苏方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呢？关于这一点，声明本身说得很清楚。声明声称，中印边境冲突是"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使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晤的局势"复杂化"。看来苏联把中印边境冲突是由印度挑起的事实，看作是中国有意制造事件，来破坏赫鲁晓夫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所以迫不及待地发表这个声明，向艾森豪威尔表明他赫鲁晓夫同中国人不同。艾森豪威尔当然明白，他在评论塔斯社声明时说："它不是站在中国方面的。"

本来，根据中央的方针，我们并不想利用中印边境冲突这一事件来谴责印度，不想把此事扩大化。但是，印度首先公布这个消息，接着大肆攻击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侵略者"，在全世界煽起一股反华浪潮。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回答，逼得我们不能不同曾经和我们一道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辩论。这是不得已的，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在我们的报纸上，10日登出了周总理9月8日给尼赫鲁的复信，同时也发表了尼赫鲁3月22日的来信。11月，报纸上又发表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资料，同时刊出中印边界从东面到西面整个边界的地图，并且标明了中印争执的地方，包括印度人侵和占领的地方。

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对中印边境冲突议论纷纷。对印度侵入我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而且恶人先告状，诬蔑中国，常委们非常愤慨。为此，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就中印边界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并申明我国政府的立场。

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通过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决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对印度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和印度国内右派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并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9月15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座谈会。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休息室去，要我写一篇关于座谈会的新闻。我当场写好新闻稿，并附上统战部拟定的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一起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完后批示"照发"。当时政治局的几位常委也在休息室里，毛主席对各位常委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同印度的公开辩论，可以考虑暂时告一段落。国庆十周年快到，我们要搞庆祝活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需要收一下，但是，在收之前要发一篇社论，阐明我们对这场大辩论的态度。社论发表之后就可以停止发表我们和印度双方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论、行动、消息和文章。

毛主席让常委们考虑是否可以这样做。接着毛主席谈了社论的要点。他说，社论要阐明我们的立场，说明这次争论我们是被迫的。争论一下也有好处，可以把双方的观点公开，也使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我们不愿意继续争论下去，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谈判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社论要重申我们的三点主张，同时要拉尼赫鲁一把，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维护中印人民的友谊。

周总理赞成这样做，并且指出，社论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印边界没有划定；第二，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总理说，这两点是我们这次争论的要点。总理还说，可以引用尼赫鲁的讲话，说他也曾表示愿意协商解决，对此我们欢迎。我们希望中印长久友好下去。

其他常委少奇、朱老总、陈云和邓小平同志也赞成这样做。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说，根据大家的意思，你今天晚上把社论稿子写出来，给总理看了以后明天就发表，不用给我看了。

当天晚上，我先回新华社发出座谈会的新闻，吃过晚饭，就到人民日报社写社论。当天晚上赶出来后打清样送给周总理，送到那里已经到凌晨两点钟了。周总理习惯深夜工作，他一直等着这篇稿子，收到后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就退回给我。这就是《人民日报》在第二天（9月16日）发表的题为《我们的期待》的社论。

中国和印度之间这次关于边界问题的争论，以及在这之前3月间开始的关于西藏叛乱问题的争论，历时整整6个月，中印之间一片乌云。但是，由于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为尼赫鲁下台阶留有余地，中印

的争吵总算平息下来。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了结。后来,到 1962 年又重新爆发了边境冲突。但是从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竭力维护中印之间,也就是亚洲和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努力争取尼赫鲁,力争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我们根本没有意思要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搞坏,更没有意思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来干扰美苏之间的会谈。

苏联迫不及待地发表塔斯社声明这件事情,的确说明赫鲁晓夫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一心追求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

塔斯社 9 月 9 日的声明和苏共中央 6 月 20 日给中共中央关于中断供应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技术资料的信,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做的,是赫鲁晓夫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可以说,赫鲁晓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不是赫鲁晓夫在白宫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苏联火箭到达月球时在那里留下一个苏联国徽标志的仿制品,而是 6 月的苏联撕毁中苏原子弹协议的一封信和 9 月 9 日塔斯社的声明,这才是真正的贡礼。

这两件事,一件是撕毁中苏协议的开始,一件是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开始。赫鲁晓夫可能认为,这是他访美前的得意之作,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的倾向。只是当时还没有料到他以后会走得那么远。

第五节 在中南海的激烈辩论

赫鲁晓夫是9月15日到达美国访问的，到9月28日离开美国返回苏联。在这期间，他除了访问美国各地以外，主要是9月25日到27日在美国总统休假地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根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主要是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另外也讨论了德国问题、对德和约问题、柏林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从发表的公报看，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只是宣布艾森豪威尔明年（1960年）春天到苏联回访，具体日期没有确定。除此之外，有没有谈了别的什么问题呢？苏联方面表示，没谈什么问题，没有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可是，艾森豪威尔则说，没有达成不讨论第三国问题的协议，没有这回事。美国国务卿赫特10月6日对记者说，苏联对它阵营里的成员的问题应该负责。苏联对中国的问题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赫特的谈话，表明他们讨论过中国问题。此事在后来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时更清楚了。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多年间，美苏两国长期对立，在赫鲁晓夫访问过程中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场面。

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发表几次正式讲话和谈话，都带有比较浓厚的论辩色彩。他在讲话中对捍卫苏联和共产

主义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许多西方舆论认为，这次访问很有特色，反映苏联领导人还是顽强地捍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赫鲁晓夫本人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们党中央认为，因为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在对华关系上的一些表现，主要是撕毁原子弹协议和发表塔斯社声明，表明他这次到美国去，对中国不怀好意，他采取这两个步骤（毁约和塔斯社声明）是适应美国当局的需要的。但是，对他在美国的表现，我们也不能一概置之不理，不能完全采取冷淡的态度。所以中央决定：我们的报刊可以按照他公开的表现来报道他的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观察一些时候再说。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

根据中央的精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多次正式讲话，差不多都全文发表，到9月29日访问结束的时候，《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他这次访美表示支持，认为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益的；同时也阐明：我国政府也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赞成他这种活动，赞成他为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而做的努力。当然，全面彻底裁军能否实现，是不是应当采取赫鲁晓夫采取的那样的办法去实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赫鲁晓夫访美之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就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都来了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有好些

是他们党的第一把手，苏联共产党是由苏斯洛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先来，赫鲁晓夫来了以后就担任代表团团长。

赫鲁晓夫到北京以后，当天(9 月 30 日)晚上，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周总理在招待会上的祝酒词才讲了 1000 字，而赫鲁晓夫讲了 6000 字。他滔滔不绝，内容和口吻就是教训中国。他在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这段话很明显是有所指的。人们不难看到，赫鲁晓夫的心里对我们在 1958 年夏天炮打金门事件和 1959 年 8 月中印边境冲突事件，还耿耿于怀，仍然认为我们是要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好像我们要挑起战争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就是 10 月 1 日上午，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我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游行、阅兵活动。作为正式礼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会见了他。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会见了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有些代表团分别由少奇同志、朱老总、周总理会见。

赫鲁晓夫在同毛主席会见时，讲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说美国人生活怎样富裕，艾森豪威尔怎样希望和平。因为会见时间比较短，他还没有畅所欲言，但是他还是有机会对先后陪同他活动的彭真和陈毅同志尽情地讲他的

访美见闻。他讲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特别是讲到他到戴维营去的情景，讲艾森豪威尔如何热情接待他，并带他去看自己的农场，讲得津津有味。

赫鲁晓夫这次到北京来，从一开始给我们中央同志的印象是，他是来吵架的。这在10月2日中苏领导人正式会谈的时候就进一步充分表现出来了。

中苏两党10月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差不多都参加了。小平同志因为腿跌伤后活动不方便，没有参加。彭真同志、陈毅同志、王稼祥同志也参加。苏方参加的有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加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

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谈他访美的情况。他认为这次访美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他说艾森豪威尔的确需要缓和。他所到之处受到很热烈的欢迎，一位农场主还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还送给他一盘古银币。他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结论是，我们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

这时毛主席回答他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开始说的还是比较客气的。

接下来，赫鲁晓夫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主动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提出这个问题，很显然他是答应了美国，要到中国来做说客。艾森豪威尔否认说过他同赫鲁晓夫不讨论第三国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赫特说苏联对中国的行动负有责任。

中国要主动做些什么呢？赫鲁晓夫说着说着就说出来了。他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1920 年到 1922 年)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赫鲁晓夫说，列宁当时曾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缓和日本人支持白军对苏联的进攻。他说，当时列宁在苏联欧洲部分遭到外国干涉很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采取了这个办法。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在这里虽然没有说要台湾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什么“共和国”。而台湾是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在台湾驻有陆、海、空军。

周总理首先回答赫鲁晓夫说，要解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惟一办法是美国撤出台湾，从台湾撤兵。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办法解放台湾，用和平的办法还是用武力的办法来解放台湾，别人不能干涉。这是我们跟台湾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同美国无关。美国不能干涉，任何外国都不能干涉。

毛主席这时也直率地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听了很尴尬，耸耸肩膀，摊摊手。

但是，赫鲁晓夫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为着缓和跟美国人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

当时在我们的监狱里关押着几个美国人，他们都是触犯了中国刑律的罪犯。其中有两个是驾驶美国间谍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以后被俘的。另外有些是以神甫的身份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被逮捕的。他们都被判刑入狱。

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事。

赫鲁晓夫又碰了钉子。

上面两个问题很可能是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答应了艾

森豪威尔向中国提出的。赫鲁晓夫充当说客，但都没有成功。

接着，会谈转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首先提出来的，他不厌其烦地说了很多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话。双方激烈争辩的时间也比较长。

赫鲁晓夫说，你们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

当时，陈毅同志首先站起来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我们边境内设立哨所，向我们开枪。周总理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六个钟头以后，我们才还击。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印度是有准备的，消息很灵通，事情发生不久，它就发消息了。而我们中央不知道这个情况，就给西藏军区发电报，查问这件事情。西藏军区也不晓得，他们赶紧问边境部队，边境部队离那个地方也很远，再三催他们查，好几天才查清情况。周总理说，你怎么能说是我们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同志非常生气，指着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的。

赫鲁晓夫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他们的人。

陈毅同志说，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准备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应当慎重一些，等弄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打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了你们塔斯社的声明，这是为什么？

当时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就这个问题来回辩论。赫鲁晓夫蛮不讲理地说，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同志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赫鲁晓夫也非常生气地说，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不管怎么样，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达赖放跑了。

这个时候彭真同志插进来同赫鲁晓夫辩论。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达赖是叛国外逃，他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拦得住他？我们人生地不熟，追也没有追上。

赫鲁晓夫可能看到在达赖问题上他辩不赢，又转移话题说，反正你们把跟印度的关系搞坏就不对。你们何

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

这时候周总理回答他：不能这么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总理再三强调，我们对印度一直是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我们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同志说，你那个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地说，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同志的强烈驳斥。

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没有多说话。每当争论激烈的时候，他还笑着对中国同志说，“不要打架呵。”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主席讲得很严肃，但语气比较委婉。

最后，赫鲁晓夫说，既然这样，我就没什么可以再谈的了。我在美国跟艾森豪威尔说过，我访美之后，接着要

到中国去。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你到中国去一定是白跑一趟。果然是白跑一趟了。

会谈终于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10月4日即离京回国。

从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的确是答应了艾森豪威尔到中国来做说客，而且他在艾森豪威尔面前还表示很有信心的样子，所以艾森豪威尔才说可能是白跑一趟。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我们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攻击我们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10月4日，毛主席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会议开始，先由周总理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大家听后议论很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表示的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且真的相信，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赫鲁晓夫这么讲，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只能由美国来教训他。现在我们无论怎么讲，他也是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

交政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相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让客观事实和历史进程来教育他。毛主席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

会议赞同中央常委几个月来的活动，并作出结论，认为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会议还决定：近期内要就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中苏关系的情况，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

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西海如今出圣人，
涂脂抹粉上豪门。
一辆汽车几间屋，
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
万年宇宙绝纷争。
列宁火焰成灰烬，
人类从此入大同。

这首打油诗是主席的警卫员 1959 年 12 月杭州会议时给田家英看，田家英转告我的，没有广为流传，当然也没有公开发表，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毛主席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

第六节　杭州的议论

从上面中苏关系发展的过程来看，1957 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对他是一个威胁。开始时他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以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他沿着这样一条路线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党中央还是坚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方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同赫鲁晓夫会谈后一致认为应当坚持这个方针。

毛主席在 10 月 14 日特别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几次公开讲话还是比较好的。毛主席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之间不要因为一个小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一致。他说，中国党还是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

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

周总理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也强调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还是要加强团结，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还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周总理说，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斯大林曾经说过，对帝国主义的压力一定要顶住。据米高扬说，斯大林生前有一次曾对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说，“我担心的是你们顶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周总理说，我们现在不但对帝国主义要顶住，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不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做法也要顶住。正确的我们当然要听、要吸收；不正确的我们就要顶住，不能听从他们。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中苏两国之间、中苏两党之间，意见分歧只有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我们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

10月下旬，毛主席离京，到达杭州后，11月间接连开了两次小会（常委只到少数）议论国际问题（包括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讲话，赫鲁晓夫的讲话和印度政府的照会等等），作了充分酝酿。

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即要求各国同苏共保持一致。

12月4日至6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包括赫鲁晓夫12月1日提出的“对表”。常委除朱、邓(因腿伤未愈)外都出席，还有陈毅、贺龙、谭政、王稼祥、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会前，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毛主席讲话的要点是：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的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体系，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会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是要团结的。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许打

1959年12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迹。

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的分歧很多。接着主席就讲了从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苏共警告我们不要进行自卫战争(即解放战争),一直讲到 1959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讲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还讲到 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我们"抢先",提出要"对表"。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已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

(以上是我当时的记录,但后来看到毛主席亲自写的

讲话提纲，其中讲到赫鲁晓夫的可能性，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第三、第四两种。毛主席写道：第三个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个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第三，我们的方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

快建设我们自己的尖端国防科学技术，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总结了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的变化，并确定了我党应当采取的方针。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在赫鲁晓夫访美前撕毁协议和公开分歧，访美后又跟我们吵了一架，回去后还不断不指名地攻击我们的情况下，我党中央还是采取以团结为重、硬着头皮顶着、暂不公开争论、从容观察的方针。

这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即带领一个读书小组（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组成）继续边读边议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1960 年 2 月才读完。

第五章

突然袭击

第一节　毛主席强调团结为重

1960年新年伊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是毛主席紧接着在杭州召开常委会议之后于1月7日—17日主持举行的。

这次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部长。全体会议的地点是在锦江饭店南楼和北楼之间的小礼堂。参加会议的人分别住在北楼和南楼，也就是老楼和新楼。我住在公寓式的新楼的12层，这在当时是上海最高级的饭店了。毛主席住在锦江饭店旁边的原法国俱乐部。

这次会议原来主要是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

一个是国防战略问题。在会议过程中间,会议议论的中心很快从国防战略问题转到国际形势。因为讨论国防战略问题就必然要联系到国际形势,这就很自然地引起对过去半年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的议论。

国防战略牵涉到对美国及其战略的看法。议论集中在美国现在会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会不会在近期内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大家认为,大量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到处张牙舞爪,积极推行扩张政策,扩军备战,到处侵略。艾森豪威尔 1960 年初发表的新年国情咨文,表明美国的确是在准备战争,大搞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现在美国是不是就要打大仗打核大战呢?多数同志认为不一定。因为根据前年(1958 年)台湾海峡金门打炮事件中美国的表现来看,它是很怕国民党把它拉下水的。美国是否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当然有这个可能,但不是很大。美国要长期霸占台湾这是定了的,它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这也是定了的。这除了为维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军事战略地位以外,也还是想要把台湾作为指向中国大陆的前进基地。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要说它一定就会很快跟我们打仗,那也不一定。

当时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的本质没有变,还在进行备战,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战略准备,还是要放在它要打仗这一基点上,不能放在它不打仗这一基点,

这样才有备无患。但是也不是说要做大规模的准备,像马上可能爆发战争那样,而是减少常备力量,加强尖端武器,主要是核武器和导弹。

会上从议论美国联系到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看法。大家对赫鲁晓夫这半年来的表现很气愤。有些同志谈到,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大反斯大林,第二大错误是大捧艾森豪威尔。这两大错误,一个是把自己人一棍子打死,一个是把敌人美帝国主义捧上天。接着,大家着重分析了对赫鲁晓夫应该怎样估计,他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会上印发了毛主席在12月杭州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各省第一书记根据这个提纲,用自己的语言,向全党17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大家的议论集中到对苏联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上面。大家都同意主席在提纲里对赫鲁晓夫的估计,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同于铁托。赫鲁晓夫的前途怎么样?他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议论到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是沿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目前看来还不能论定。

第二个可能是有所改变,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他不得不作些改变。因为过去有过先例,比如,赫鲁晓夫对戴高乐,原来是尽说他好话,去年12月戴高乐大肆攻击苏联之后,赫鲁晓夫的腔调就变了。对美国,赫鲁晓夫现在的

腔调也同他刚从美国访问回来时不大一样。因为戴维营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艾森豪威尔的新年咨文又非常强硬,他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要扩军备战,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所以说,赫鲁晓夫在碰了钉子后,也可能在形势压迫下,不能不有所改变。

第三个可能是根本的改变。这个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小。他稍作改变是可能的,而要他根本改变,把他的思想体系完全改变,成为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是比较困难的。

第四个可能是赫鲁晓夫完全变成修正主义,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面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毛主席着重分析了这种可能性。毛主席说,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也存在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帝国主义一方面拿着核武器,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搞糖衣炮弹。他们采取一硬一软的两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把苏联搞垮。赫鲁晓夫手里也有核武器,是惟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他是有所依恃的,不会轻易向美国俯首称臣。同时,修正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美国糖衣炮弹面前,又很容易为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变来变去。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毛主席列举了以下的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不会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做。虽然它们

都讲不要妨碍赫鲁晓夫，不要损害他的地位，但是要帝国主义完全按照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让步，那是做不到的。

其次，在苏联内部，因为长期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到如今已经40多年，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因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党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会完全听任赫鲁晓夫为所欲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有所顾忌，即使他想同帝国主义搞某种妥协、让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也是不敢贸然从事或者做得过分的。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独立运动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赫鲁晓夫要削弱这个运动，要被压迫民族不革命，服从他的指挥棒，也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妥协，这是很困难的。这也不能不影响赫鲁晓夫的政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影响，不能不有所制约。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就不同于一般的小党。这不是大国主义，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力量。

毛主席说，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对他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反面教员是不会按照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和他的想法去做的，是不会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的。赫鲁晓夫在革命力量面

前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在反革命面前也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大搞修正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

会议上大家同意这些分析，比较倾向于肯定赫鲁晓夫存在两种可能性。变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们的方针是力争他变好，采取以团结为重的方针，这是我们根本利益所在。当然，讲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适当的内部批评是必要的，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正面地发表我们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斗争的目的还是团结，还是作为共产主义队伍内部问题来处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还是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也就是采取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即使赫鲁晓夫要分裂，我们也不要分裂，硬是拖着他。你要分裂，我不分裂，我们不采取分裂的步骤。有些同志甚至说，我们就是赖着，赖着跟他搞团结，赖着不分裂。

为着达到坚持团结和反对分裂的目的，就要采取一些办法。会议中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要充分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还是战争的根源，还是和平的敌人，还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还是死对头。它无时无刻不采用两手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力量，它对革命力量是能够消灭的就消灭，不

能够消灭的就暂时采取逐步蚕食、腐蚀、渗透、颠覆的办法，用糖衣炮弹的办法，直到搞垮革命力量。对这些都要充分地揭露。这也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要求的。

第二，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攻击我们最凶狠恶毒，而且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姿态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批判它的修正主义观点，这样也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第三，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

第四，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是目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尽可能争取他们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而斗争。

最后，大家还强调说，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水平，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反对修正主义浪潮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也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国内工作特别是内部团结搞好。

在会议的最后，毛主席做了一个发言，他讲得比较系统，主要讲了五点意见。

第一点，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决定，就是决定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他问题，关于国防战略问题，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等等，都是交换意见，都不做决定。

第二点，毛主席说，大家还是要读书，要组织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学习苏联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哲学原理》。学习这两本书要第一书记挂帅。读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观点搞清楚，特别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两本书里面不能说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还不少，但是也不能说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点，毛主席说，国内的形势是好的。国际的事情我们不能全管，因为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尼赫鲁、苏加诺、赫鲁晓夫的参谋长。我们只能管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情。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现在人家不大相信我们，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才在摸索。我们对人家的意见不能大骂一顿了事，更不能打仗，要靠我们把国内的工作做好。

第四点，毛主席说，国际形势是好的，世界人民一天天觉悟起来。还有一点应该估计到，就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世界

大战现在是打不起来的。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做了好事的，这是应该肯定的。赫鲁晓夫访美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帝国主义现在不敢打大战，这一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给美国捺粉，给艾森豪威尔捺粉，这一点是不好的。赫鲁晓夫不是利用好的形势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是给人家捺粉。当然，帝国主义也给赫鲁晓夫捺粉，也说他的好话。双方都捺粉，但是比较起来，讲原则的还是西方国家，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捺粉是有分寸的，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他整了我们几下。我们党历史上受过多次整，也习惯了。挨整挨得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顶了他，结果还是顶住了。我们对苏联，包括对赫鲁晓夫本人，我们的政策还是团结的政策，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赫鲁晓夫虽然有缺点，但还是应该团结，而且是可以团结的。斯大林不是也整过我们吗？但是还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对赫鲁晓夫做工作。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讲明对南斯拉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还是听了。毛主席说，有些事情可以事后给他讲，有些事情也可以事先给他讲。赫鲁晓夫很快就要访问印度，他很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不利，对苏联也不利。所以应该通过外交部告诉他们，叫他对尼赫鲁讲，要同中国协商解

决问题。中印之间的问题我们不要别人来调停，我们跟印度直接打交道，直接协商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不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做结论为好，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善变。我们要看几年，他也要看我们。他有两怕：一个怕我们搞得他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照顾照顾；再一个怕我们给他戴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机会主义，更不能公开说。其实，我们和他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指头的事情，其他九个指头还是相同的。苏共还是好党，这个大前提现在还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同的一个指头也要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公开说清楚，可以用阐述《莫斯科宣言》的方法，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明确地讲清楚。原则上我们要鲜明，但具体问题要策略一些，不要把话讲绝，要留有余地，要谨慎。对有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我们要讲就公开讲，不要放暗箭。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断地放暗箭，他越放暗箭越对他不利。应该公开讲清楚帝国主义本性难移，它的策略可以改变，但是它要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它要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对这一本质问题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但是我们不赞成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话，用批评南方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

第五点，毛主席说，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我们要准备顶它十三年。因为从我们离开延安到现在整整十三年，我们再顶它十三年，分三步：第一步顶三年，第二步顶五年，第三步再顶五年。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就再回到延安。这一点我跟民主人士也讲了，大不了再从头来。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不成，一定会成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赫鲁晓夫也是能顶的，顶了他就缩回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总的方针还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进步力量要团结。当然，同尼赫鲁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后才能够说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根源没有消灭之前，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要怕形式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符合他们的利益。

上海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开过好几次会。在会上一方面是根据上海会议精神，确定对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执行团结的方针，只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我们对南斯拉夫还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方针，现在"打"也就是批评，但是批评要注意有间

歇性，不是那么老批下去，要有阶段性、间歇性，同时还要做南斯拉夫的工作。这是上海会议已经决定了的。这几次常委会上还是强调这一点，并指定中央宣传部组织起草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党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与当前国际形势密切有关的若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发表。

这些常委会议还讨论和确定对美国还是继续同它在华沙举行中美会谈，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就是我们不主动破裂，要拉住它谈。“谈而不速”就是建交问题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求速成，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条件，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当时中央同志认为，现在跟美国建交，条件不成熟，它不可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即不可能同意从台湾撤兵；它的条件我们也不能接受，即不能同意搞两个中国，拖几年建交对我们有利。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让美国人进来”。这个方针概括地说就是“谈而不速”的方针。

对美国提出要我们放它几个间谍的问题，中央常委认为，将来再放，对现在已经逮捕的这些间谍还是要判刑。其中有一个在上海解放时留下来没有撤退的美国人，全名叫做杰姆斯·爱德华·沃尔斯，他操纵以上海主教梅龚品为首的叛国集团替美国人搞情报。当时梅龚品已经被判了刑。按照中国的法律，也要给美国人沃尔斯判刑。（后来，沃尔斯在 3 月中旬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中央常委还讨论了解决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中央同志认为，要迅速跟他们解决边界问题，包括印度在内。对印度，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原则上要互谅互让，我们做点让步，印度也做点让步，这样互相妥协，达成协议。为此，在适当时机，周总理将访问印度。对缅甸、尼泊尔、老挝，都要争取快点解决同它们的边界问题。至于中朝、中蒙的边界问题更要快点解决，问题也不大。中越边界问题，现在还不着急，因为越南还在跟美国人打仗，但是也要解决。中苏边界是最长的，从东段到西段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这些边界过去又都没有完全划定，双方地图有许多出入，也要争取解决。把我们四周的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就稳定了我们跟邻国的关系。

以上这些是这几次常委会议中谈到的一些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

中央这些设想，后来部分地实现了。

缅甸总统奈温在1月底访问中国时，签订了双方边界协定，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同时还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3月初访问中国，在3月下旬签订了中尼边界和经济援助两个协定，解决了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

周总理在1月间写信给尼赫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在2月间表示同意。接着周总理

再次写信给尼赫鲁表示愿意在4月间到印度去访问，商谈边界问题。

4月间周总理连续出访亚洲各国:4月15日到19日访问缅甸，19日到26日访问印度，26日到29日访问尼泊尔。接着在5月5日到5月9日访问柬埔寨，9日到14日访问越南，5月27日到6月1日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陈毅同志在8月间又访问了阿富汗，签订了中国阿富汗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朝鲜的边界问题，也在这一年的5月签订了边界协定，主要解决天池归中朝两国共用的问题，以白头山为标志来划分中朝两国边界。

在解决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里，难的就是中印边界问题。周总理在4月19日到26日访问印度时，跟尼赫鲁谈了多次，但是尼赫鲁表现得很固执，不愿意根据互谅互让的原则来解决边界问题。按照我们原来的意图，我们在边界东段让一让，印度在西段让一让，这样来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但是尼赫鲁提出，东段他要多占，西段他也要多占，他们军队已经驻扎的地方都算他的，还没有进驻的地方也算他的。这完全继承了英帝国主义过去的扩张主义衣钵。周总理虽然耐心、细致地说明我国的立场，但是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这种情况同苏联的态度有关，也同美国的态度有关。

在亚洲展开活动的同时，我们对非洲、拉丁美洲也展开了活动，主要是加强民间的友好活动。所以在3月到

4月间，先后成立了中国和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中国和非洲友好协会。

由于贯彻了中央的意图，积极主动地开展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工作，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从而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第二节　赫鲁晓夫开始行动

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不欢而散以后，回到苏联就开始实行他的所谓“和平计划”。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打出他同西方互相让步的和平纲领。12月1日在匈牙利党代会上，他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就是说要大家向莫斯科看齐。

更严重的是，2月4日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主席。这次首脑会议是苏联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它将在巴黎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和艾森豪威尔夏天访苏时的方针。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主要是既吹捧赫鲁晓夫访美，又一致支持苏联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

从一般原则来讲，我们也支持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首脑会谈总比不会谈好，只要他不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是可以支持的。但是，问题是在这次华沙条约国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先后两次对中国进行猛烈的攻击。

次是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是把矛头直指毛主席。

根据代表团的报告,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完全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他指责中国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赫鲁晓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和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他还明白宣布,他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但是他又表示,他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细节。他蛮不讲理地说,反正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就是中国不对。9月9日塔斯社声明是"帮助"中国的。

特别是在招待会上他喝一点酒后,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他这个话当然是指中国了,因为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以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这样讲,就是说中国党虽然提了以苏联为首,但是没有给他面包、黄油,在政治上、道义上也不支持他。他还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并说我们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他还指责中国的批评尽是玩弄词句。

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越骂越起劲,竟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他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按:指苏联人在下雪天穿的那种长筒套鞋),实际上

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赫鲁晓夫这次大放厥词,他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过去(指1956年和1957年)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在赫鲁晓夫看来,现在他的地位已经巩固,他说了算,不在乎中国对他支持还是不支持了。

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接着在2月间到印度、印度尼西亚访问。在这之前,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12月的亚洲之行也曾访问印度,支持尼赫鲁采取固执的反华立场。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国家反对中国的浪潮高涨的时候。当时在印度的议会里、报纸上吵吵嚷嚷,就达赖喇嘛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在印尼,印尼的反华分子发动一个驱逐华侨、迫害华侨,特别是迫害华侨商人的运动,中国和印尼的关系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到那里去访问,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推行他的"和平计划",双管齐下,一方面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在一起,来促成他跟西方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打击、孤立中国。这在当时已经明显露出这样一个趋向了。

2月22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在颐年堂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对我们的攻击。

当时中央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所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

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他的这个姿态，像他过去访美之前发表塔斯社声明和废除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协议一样，都是为着讨好西方。同时也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中央认为，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会议确定，要加快实施原来在上海会议之后考虑过的一系列打开外交局面的外交行动的设想，以对付世界范围的反华浪潮。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确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

3月初，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家。会议还决定要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在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发表。在编辑小册子的同时，要按上海会议的布置，根据列宁的观点，加紧撰写文章，阐述关于时代、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要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同时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的观点，回答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的观点的歪曲、篡改和阉割。

当我们正在准备起草纪念列宁的文章的时候，3月23日早上，我在北京接到通知，要我到天津去，说政治局

常委要在那里开会。

我跟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分乘两辆汽车到天津。我们没有进入天津市区，而是在天津郊外飞机场的铁路支线旁停下来。在这个支线上正停着毛主席的专列。我们上了专列，刚在房间歇下来，就通知我们下午两点钟开会。

这个专列有12个车厢。主席专用两个车厢，一个是办公室和卧室合在一起的，另一个是餐车，开会用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都是每人一个公务车，办公室带卧室。我们四个人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每人一间包厢。这种包厢也比较特别，只有一个床，一个沙发，两人共用一个洗漱间。

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特别是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但在会议过程中，主要是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苏关系，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的问题；再一个是少奇同志提出、毛主席赞成的，就是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起来。

会议一开始，少奇同志就提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应该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旗帜应该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以后我们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在国内一般可以提“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样提就把两个联系起来，不是两个东西，中间一个顿点，就是表明互相有联系的。

对这个提法，毛主席赞成。他说，好呀，我们要做得比较妥当一些。这个提法比较确切，免得别人误解我们要把我们的“香肠”出口到外国去。他还说，我们不搞革命输出，我们在国内宣传可以谈毛泽东思想，但对外宣传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接着，毛主席说，所以把你们几个秀才都找来，主要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掌握这个精神。少奇同志说，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就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贯的提法是这样的。毛泽东思想是属于整个马列主义体系里面的，但它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发展。我们不要求人家接受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我们对外宣传还是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这个问题要发个通知，全国宣传上口径要一致，特别是在宣传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

会议接着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议论从毛主席的一个批语谈起。这个批语是毛主席在我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发回的一份电报上写的。这个电报是讲我国在巴基斯坦办展览会的情况。电报里边讲到我们办的展览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

非常踊跃。毛主席 3 月 22 日(即天津会议前两天)在这个材料上批了很长一段批语,题目叫做《关于反华问题》。主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 5%吧,最多不过占 10%。""而有 24 倍 3000 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种情况,就"如同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 350 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 90%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主

席还说："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毛主席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 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毛主席又说："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是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了吗？"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的，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90%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毛主席说："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毛主席最后说："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

着世界上有10%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10年,甚至会有整个20世纪的后40年。如果给我们40年的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主席关于反华问题的这个批语,也印发给在专列上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到会的除了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以外,还有彭真同志、李富春同志、薄一波同志、谭震林同志,还有天津的黄火青同志。此外,还有廖鲁言和我们一起到天津去的四个人。会议从毛主席的关于反华问题的批语谈起,着重讨论了中苏关系,特别是乘纪念列宁90诞辰之机发表反修文章问题,要求加快准备和增加文章。然后会议又讨论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和人民公社问题。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常委扩大会,只开了两天,就是3月24日和25日,到25日晚上就结束了。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到天津市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北京。

第三节　纪念列宁的文章

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加快纪念列宁的文章的起草工作。我们分头准备三篇文章:一篇是由乔木同志领头、我协助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

另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由陈伯达领头，《红旗》杂志几位副总编辑帮助他准备；还有一篇是准备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由陆定一同志讲。他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这篇讲话就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协助他准备。

4 月初，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些文章的初稿，同时也讨论了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的问题。关于纪念列宁的文章，首先要考虑的是要集中讲哪几个问题。当时会上就确定要讲清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讲世界形势，要对世界形势作分析；讲新技术——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形势有什么变化，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现在是什么时代，新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因为修正主义观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认为时代变了。

第二，要讲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因为修正主义讲列宁主义过时了，我们要明确回答：在当今这个时代，列宁主义没有过时。

第三，要讲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

第四，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第五，讲帝国主义的本性变了没有，要讲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系。

第六，讲革命斗争和议会斗争的问题。这里面牵涉到和平过渡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要根据 1957 年莫斯科会

议时，我党的备忘录的观点来讲。

第七，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

大家认为，在纪念列宁的文章中一共要讲这么几个问题，但是在这里面还要注意，要坚持团结的方针。因为我们不是反对苏联提出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口号。所以对苏联正确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表示支持。我们批判还是着重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要注意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这些问题讨论完以后，又讨论了三篇文章的适当分工。因为当时三篇文章的初稿中间重复比较多。书记处会议确定：《人民日报》的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不多谈理论问题，着重讲现代维护和平的斗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揭露美帝国主义。因为这是现实世界和平的一个要害问题。陆定一同志的文章着重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针对性地批判一些反对革命的观点，批判和平过渡的观点，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把列宁有关这些问题的观点，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说清楚，从时代问题讲起，说明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对三篇文章作了分工以后，就分头进行修改。

后来在毛主席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小平同志把书记处开会时谈的这些意见向常委们汇报。少奇同志、周总理赞成纪念文章讲这些问题，也赞成三家做这样

的分工。毛主席也表示赞成。毛主席说，主要的是我们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也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我们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

因为一个时期来，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苏联在整个宣传上大讲"三无"世界。"三无"世界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30日回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他说："要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也就是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三无"世界。根据这个总的目标，苏联报刊长篇大论，一篇又一篇地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实，这些观点南斯拉夫的报刊早都讲过了，现在苏联又大讲特讲，把这些观点散布得这么广、影响这么大，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所以必须回答。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在文章论辩中，可以泛泛提出要批判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要留有余地。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分头对三篇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在纪念列宁90诞辰时一同发表。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主要是讲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是团结国际友人。在这篇文章里讲这三个任务时，重点放在争取世界和平。而争取世界和平就需要反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所以文章把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这上面，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在戴维营会谈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事实，一共列举了35件事例，充分揭露美国还是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社论着重阐述为了维护世界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社论针对当时不仅南斯拉夫，连苏联都在大讲美国爱好和平、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着重揭露美帝国主义，最后落到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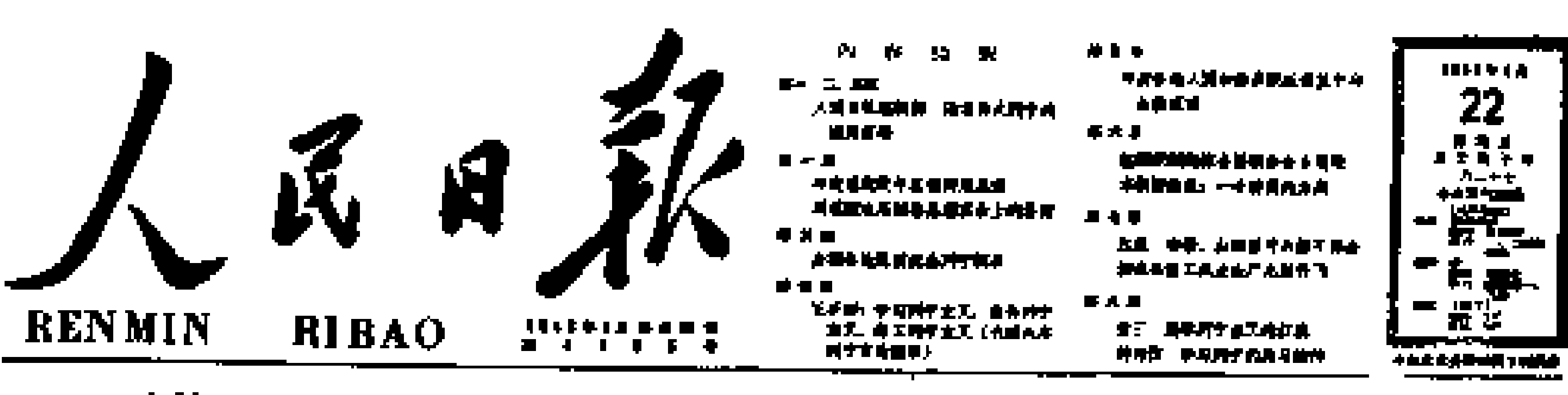
陆定一同志的讲话，是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着重讲了列宁的革命精神，指出列宁的精华就是他的革命精神，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是如此，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也是如此。讲话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篇讲话的警句就是："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讲话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们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自己害怕战争，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

命引起战争。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题目为《列宁主义万岁》。它从时代讲起，指出：虽然新技术的发明，核武器的出现，有重大意义，但是，时代并没有变，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它论述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和平共处的政策与和平过渡的区别等问题，回答了列宁主义是否过时。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要坚持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

这三篇文章都集中对美帝国主义，对南斯拉夫的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没有引用赫鲁晓夫和苏联报刊的话，连赫鲁晓夫最得意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话也没有引用，而且好几处肯定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肯定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三篇文章高举团结的旗帜，每篇的末尾都强调要加强团结，团结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强调各种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斗争，抵制美帝国主义的挑拨。

后来这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的题目——《列宁主义万岁》做标题，印成中文、英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人民日报编辑部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1960年4月22日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陆定一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目录

列宁主义万岁——红旗杂志编辑部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列宁主义万岁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

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公开发行，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共同编辑了好多本列宁言论的小册子，其中有关于帝国主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等等。每一个题目编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编出来以后，在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时候也出版发行了。

《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重申了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我们原先以为，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三篇文章发表后，4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家里开会时决定，从现在起，除了一般的国际问题照常发表我们的意见以外，有关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暂停发表文章。毛主席提出，帝国主义反华有它的间歇性。一个战役和一个战役之间应该有间歇，这是军事学上的一般原理。那么，在政治斗争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地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停一个时期，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无论是美国的或是苏联的，都要看看它们有什么反应。毛主席说，人家反华有间歇性，我们反美反修也要有间歇性。但是，我们要充分准

备，准备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打打停停。

因此，我们的报刊都按照中央的这个指示，暂停发表有关反修的文章。

第四节　首脑会议流产

在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5月1日，发生了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美、英、法、苏四国准备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的前夕，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苏联公布了美国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和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之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马上转发了苏联政府的抗议。《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支持苏联政府谴责美国的挑衅。这件事情我虽然事前没有请示中央，但是我认为这与4月下旬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相符合。所以在书记处开会的时候，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U-2飞机事件成了5月4日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议论的主题。（当时毛主席在南方，少奇同志在视察西北和西南，周总理访问东南亚，因而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家议论纷纷，差不多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向美国提出强硬抗议，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从内部来讲，苏联是

忍受不了这样的欺负，美国人一边说要开首脑会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边又派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使苏联人感到受了侮辱。当时苏联报刊都有这样的反映。外部的影响就是当时世界舆论大哗，包括西方国家、美国舆论在内，大多数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实在太愚蠢。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对这件事不能忍气吞声。尤其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之后，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在美国面前表示软弱。

会上大家也谈到，《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实在好。我们这些文章对列宁观点的论证，证明他的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证明列宁讲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世界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两手等观点没有过时。我们阐述的这些观点，恰恰在 U-2 飞机事件中得到现实政治的证实。当然，我们在 4 月间并没有想到美国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派飞机入侵苏联，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难改，这一点是我们论定的。U-2 飞机事件是个偶然事件，但是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对事件发展的前途会怎样，大家在会上也进行了议论，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敷衍一番，还是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另一种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根本不买账，对苏联的抗议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或者忍气吞声，依然到巴黎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或者是"愤怒的杯葛"，拒不参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当时估计赫鲁晓夫采取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美国既然不

理睬，他还去参加四国首脑会议，这在全世界面前实在是太难堪了。

我在会上提出，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U-2飞机事件，《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讲话时版面怎么安排？小平同志说，这没什么需要多考虑的，应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但也不必当头条。同时把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发表，针锋相对，看以后会怎样发展。

5月16日，赫鲁晓夫仍然按原计划从莫斯科到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但他在到达巴黎时发表声明，要美国对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政府将重新考虑对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态度。声明态度强硬，差不多是给美国政府的最后通牒。

5月15日，毛主席电话请刚刚访问越南回到南宁的周总理飞武汉，商量当前国际局势。毛主席在16日同周总理谈了一个上午。周总理5月17日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在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如下的意见。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硬起来了，虽然不必到巴黎发表这个声明，可以在莫斯科发表，看看反应，然后决定是否去巴黎。现在事情似乎很僵，要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办不到，这是明摆着的。因为他已经说过派出那架U-2飞机是经过他批准的。堂堂一个美国总统，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四国首脑会议看来开不成了，流

产了。在这个事件上,赫鲁晓夫做对了。我们要给予支持,要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不过,他说要重新考虑对四国首脑会议的态度,不知是什么意思?是拒绝参加?还是延期召开?毛主席嘱周总理回京向政治局报告后,看赫鲁晓夫如何行动再决定。但宣传上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要继续做。

周总理传达后,会议讨论毛主席意见,决定宣传多发评论,支持苏联,揭露美国,还决定一俟巴黎情况明朗,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即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0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要北京市紧急布置。

第二天,各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艾森豪威尔于5月17日发表声明,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赫鲁晓夫愤然离开巴黎返莫斯科。这样,熙熙攘攘了一阵子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了。

5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1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群众情绪激昂,空前热烈。

5月21日至22日,毛主席在杭州趁同金日成会谈之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是21日会见金日成的,他也是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来华同我党中央交换意见的。这是中朝两党高层领导在苏共“20大”后,第一次交换两党同苏共关系的意见。金日成同志很称赞我们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认为比《列宁主义

万岁》三篇文章写得好。22日，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刘少奇同志这时也从武汉赶到杭州，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则从北京陪同金日成同志飞抵杭州。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同志参加了会议。

我没有去杭州参加常委会议，我知道的情况是小平同志回京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据小平同志说：

会议讨论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这次做得对，在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的情况下，只有拒绝参加。但赫到巴黎才提出条件，说明他对开会还抱有一定幻想，对艾森豪威尔的“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们党的方针是不反对缓和紧张局势，也不反对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如果能达成某些协议，这当然好，如果达不成协议，也可以揭露帝国主义反对缓和。问题在于对帝国主义绝不可以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赫鲁晓夫有时在这方面做得过分了。帝国主义有时也称赞赫鲁晓夫，但总是比较有分寸的，而赫鲁晓夫则把人家吹捧得天花乱坠，太没分寸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不等于马上打大战，美国本身没有准备好，英法不愿意，苏联的国力是不可轻视的。看来，首脑会议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西方还没有到非作点妥协不可的程度；而世界大战，目前条件也不具备，打不起来。

小平同志在传达毛主席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时说，社

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一种是战争，即帝国主义发动大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缓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若和平共处，不是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只是表现为比较缓和的形式。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冷战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冷战共处，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东战争等，但没有打起世界大战。冷战共处的形势也不是一直很紧张，有时高一阵，有时低一阵。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 10 年、15 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第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已有 14 年，这是两次大战中的间歇期，也就是冷战共处时期，这个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

小平同志说，毛主席还对赫鲁晓夫作了分析。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森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 U-2 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

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据小平同志说，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很适时也很有力量，使得赫鲁晓夫不能不有所顾忌。毛主席说，我们的文章有影响，但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他至今仍说 1957 年 1 月间总理给他们"上大课"，仍耿耿于怀。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森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 年还比较好，1956 年就不行了，1957 年好一点，1958 年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

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为天下先。

小平同志传达完以后，嘱咐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要按照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的指示行事，密切注视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形势的变化。

第五节　建议和反建议

在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不久，苏共中央6月2日给我党来信，建议利用6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小平同志在6月4日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来信。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四国首脑会议之所以流产，苏联之所以采取强硬的态度，首先是因为苏联国内对U-2事件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苏联受到了欺负，这口气咽不下去。其次是美国起了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美国用它的行动证明，它搞的并不是什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制造紧张局势。再有就是我们《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有影响，使得赫鲁晓夫不能轻易对美国做出让步。在美国拒绝他的声明之后，赫鲁晓夫无法转圜，

他只能采取拒绝开会的办法，愤然回国。

对于苏联6月2日来信中提出要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是：

第一，我们跟赫鲁晓夫之间有共同点，有共同点就可以开会。在苏共中央的信里有这么一句，说1957年《莫斯科宣言》还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对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方针也还是对的。在这一方面有共同点，就可以求同，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

第二，估计苏共要开会，意在保驾。在赫鲁晓夫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保驾。如果赫鲁晓夫现在垮台，苏联社会乱起来，这对大局不利。我们希望苏联比较稳定。我们认为他是个半修正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修正主义，也不是没有变好的可能。因此可以保驾。问题是如何保驾，在什么基础上保驾。

第三，苏共要开这次会议，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共同对敌，根据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以后的形势，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共同对付美国。但是，还要估计到另一种可能，这就是赫鲁晓夫认为我们捣乱，干扰他同西方妥协，认为中国不跟他"对表"。他可能打着团结的旗帜来整我们。要估计到有可能他们是要用整我们的办法来保赫鲁晓夫。

第四，考虑到上面这种分析，我们不能同意马上开会，不能照他们原来的建议开，要开就要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建议不要匆匆忙忙开，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再开。

我们可以建议把会议的时间推迟在十月革命节前后，最早也只能在8月开，不能在6月开，因为需要时间做准备。

第五，我们可以建议，首先是这个会的范围再扩大一些，不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开，而是扩大为世界各国党派代表参加，像1957年那样的范围。因为如果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我们的意见很难充分表达在文件上。在12个党中，除了朝鲜、越南以外，基本上都是跟赫鲁晓夫走的，他们会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所以要把范围扩大，要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其次，要成立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文件，可以还是由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26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也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但是不要太多。在这个起草委员会开会之前，要成立中苏两党联合起草小组，为起草委员会准备一个共同的文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反建议。

第六，苏共中央在6月2日来信提出，要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大会的时候开12国会议。我们可以建议，在罗党大会期间，可以就上述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商量怎样为将来在十月革命节前后正式召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这次会议除了谈这些意见外，快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提出，考虑到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有必要更广泛地宣传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里面所阐述的观点，要正面宣传，不是批判苏共或南共的观点。现在来宣传更加有利，时机也很合适。美国这样横蛮的

态度正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时机，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它抱有幻想。小平同志说，这些意见要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但我国工会代表团要在6月5日至6月9日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人理事会上，按照这个方针阐述我们三篇文章所说的观点，来动员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会上还确定，给苏共中央6月2日来信的答复，可以到上海开会时再进一步讨论。在北京先准备一个复信的初稿，到上海后再定稿发出。

会议之后，据尚昆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交换了意见。他们三人在6月5日一起出席我党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负责人座谈会。座谈会首先由我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致词，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但苏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听取小平同志的解释，也拒绝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挽留，断然退出座谈会。此事后来成为苏共借口指责我党的一个题目。

乔木和我在书记处会议即开始起草给苏共的复信。复信里主要是讲两个建议：一个是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扩大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的时间推迟到十月革命前后。另一个建议是为了充分准备，成立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联合起草小组。

我们刚动手不久，毛主席从杭州来电话，提出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除讨论1960—1963年的经济计划（原先确定的议程）外，还要讨论苏共来信。于是，小平同志要我们随他先行飞上海，就近请示毛主席。

上海会议在6月10日到18日举行。这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之前，中央常委讨论并修改好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在6月10日发出。在这封复信发出之前，苏共中央在6月7日又给我党中央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原先苏方提议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因为我们的复信本来就建议推迟，不需作什么改动，原样发出了。

毛主席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

上海会议实际上从8日开始，但是先开座谈会，对当

前形势交换意见，由少奇同志主持。周总理谈了国际形势（主要是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和他同陈毅同志访问东南亚的情况。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主要精力在抓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分析。从6月10日（给苏共中央复信发出后）开始，少奇同志才主持讨论三年补充计划问题，这是会议的正式开始。6月12日少奇同志通报了中央常委对苏共来信的看法和我们的复信。毛主席在6月17日出席会议讲话，主要谈工业、商业、农业和人民公社等问题。6月18日毛主席以《十年总结》为题，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谈到了同苏共的关系。他说，我们既然同意开会，就要为开会创造好一点的气氛。在6、7、8、9月我们的反修宣传要暂停一下。当然，在开会之前，不排除赫鲁晓夫攻击我们，那么我们就让他放，让他放一阵再说。像《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那样的论战文章，在4个月内不发表。但是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在将来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上斗争。

在上海会议结束之前，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同志率领代表团去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兄弟党的"会晤"。

彭真同志后来告诉我，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去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毛主席把他叫到上海（他原留守北京，没有参加上海会议），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经过讨论，毛主席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

留有余地。这六句话的意思，首先是以团结为重，但我们讲团结是有原则的，对赫鲁晓夫的错误不能迁就，要坚决反对。但现在情况不明，他召集“会晤”究竟要干什么还不清楚，所以要把情况摸清楚。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别的兄弟党广泛接触，弄清楚苏共的意图。如果他们是要在这个会上整我们，我们就采取后发制人，让他先放，然后我们先防守后反击，在反击的时候据理力争，跟他辩论，但是也不可以把所有子弹都打完，要留有余地。

第六节　突然袭击

彭真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6月16日离开北京，当天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会面。科兹洛夫原来是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到苏共中央来工作的。当时有种种传说，说他是准备当赫鲁晓夫的接班人。科兹洛夫一开始就指责我们发表三篇文章，指责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人理事会上宣传我们的观点。他说，我们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好像没有经过苏共同意就是犯了组织上的错误。当时我们代表团跟他辩论，一共吵了8个钟头。据代表团发回来的电报说，科兹洛夫在跟我代表团争吵的时候，他手里有一个文件，是打字的，大概有20多

页，说明他是准备好的。但是，当我代表团问到布加勒斯特会晤究竟怎么开，他们有什么打算时，科兹洛夫支支吾吾说，这个事情到了布加勒斯特以后再商量。我代表团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个情况不是好兆头，很可能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后发制人的准备。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6月20日到6月25日举行的。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会场上多次起立鼓掌、呼喊，为他捧场。彭真同志的致词，还是讲我们三篇文章的观点，参加会议的坐在大厅里的人鼓掌都比较热烈，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就有意冷落。代表团把这种情况向国内报告说，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可能要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中央回电要代表团提高警惕，摸清情况，后发制人。

代表团来电还说，我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后遭到全面封锁，各代表团都没有同我们接触。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罗党联络员也不告诉我们。我们想去拜会兄弟党，罗方也不给安排。在会场上偶尔碰到一些兄弟党代表，他们也不知道“会晤”怎么开，说这次“会晤”非常神秘。于是代表团决定单刀直入，提出要见赫鲁晓夫。但他们一直拖延，推到22日赫鲁晓夫才跟我们代表团谈。

我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的会见一共继续了6个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指责我们党。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方针商量好采取先让他放的方针，多听少说，以便摸

清他究竟要干什么。赫鲁晓夫看到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就更加放肆地攻击。他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他还讲到成吉思汗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他还强词夺理地说，中印冲突完全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发表一个声明保持中立，是帮助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现在你们跟印尼关系也搞坏了，责任也在你们。总之，他信口雌黄，大肆漫骂，根本不讲道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代表团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经过这次谈话，赫鲁晓夫的意图摸清楚了，他要我们到布加勒斯特来"会晤"，就是要整我们。

第二天，6月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我代表团一封信，这封信是苏共中央给我们党中央的，署的日期是6月21日。信里通篇大讲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驳斥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他们在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同时，还把这封信改成《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其他兄弟党，而且比交给我们的时间还早，在6月21日就发出了。这是越南党、朝鲜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团告诉我们的。赫鲁晓夫在骂了我们一顿以后，才把这封信交给我们。

我代表团收到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以后，立即向国内报告这封信的要点，也就是所谓《通知书》的要点。苏共中央的信，一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时代的性

质。它不赞成说当今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给时代下了许多定义。其中心思想是说现在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世界已占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力量已大大削弱，因而时代的性质已经变化，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已成为可能。

第二部分是讲战争与和平问题。它强调战争可以避免，指责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指责我们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依然有发生战争危险的观点是宿命论。

第三部分是讲和平共处问题，这是来信中讲得最长的一部分，也是赫鲁晓夫思想体系里面的核心问题。它认为和平共处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它指责我们反对和平共处，攻击我们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提出要足够估计帝国主义的强大，应该跟它和平共处，否则爆发战争，全人类都要毁灭。它的这个观点，同第一部分讲时代问题时强调帝国主义已大大削弱的观点自相矛盾。当它强调可以和平过渡时，它认为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它强调要和平共处时，它又说帝国主义很强大。来信又为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辩解，说苏共对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幻想，同时又说仍然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指责我们反对这个口号。

第四部分是讲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着重讲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信里说，毛主席也讲过要准备两手，和平的一手，暴力的一手。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

变了立场。实际上我们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跟他争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且写了一个备忘录，不赞成他们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观点。

第五部分是讲关于国际群众组织的问题。来信指责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独特的立场"。其实在近半年来，我们在这些组织里面无非是根据1957年《莫斯科宣言》，阐述我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立场。对于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言行，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的立场就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立场。

来信第六部分说中国党违反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即：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信中所罗列的一大堆罪名，大都是歪曲的甚至完全是捏造的。

来信第七部分是讲团结的必要性，说中共严重损坏了国际团结，使个别的队伍偏离了正确的道路。

整个来信（我们后来为了便于兄弟党了解，通常用苏共中央给兄弟党的《通知书》的名称）除了歪曲、漫骂、诬蔑以外，还包含一些修补苏共中央过去发表的被我们批评的错误观点。它做的这些弥补，有的是逻辑上弥补，有的是词句上修改。苏共中央在信中极力攻击我们党，但实际上这么长篇大论完全是为它原来的错误立场辩护。

6月23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中央

还没有收到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也没有收到代表团22日同赫鲁晓夫谈话的情况报告。因为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的时差有五六个小时。北京只收到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央同志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看来，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我们6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的建议，苏共中央一直没有表示态度。我代表团路经莫斯科同科兹洛夫大吵一顿，到了布加勒斯特，又遭到全面封锁。从这些情况来看，苏方提出的所谓"会晤"很可能是对我们围攻。中央决定打电报告诉代表团，说明中央估计苏共可能对我们搞突然袭击，要代表团有被围攻的思想准备。

少奇同志说，如果苏方发动攻击，代表团应准备把中苏关系分歧的实质在兄弟党代表"会晤"中端出来，让各兄弟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也不是希望这一次就能解决问题，斗争还是长期的。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他说，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

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代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一个电报，发给在布加勒斯特的我党代表团。

常委会议上还决定，这两个月内不发表批评修正主义的文章，让他们放，而且让他们放够。但是要认真准备写文章反驳。

在布加勒斯特，23日上午苏共代表团把信交给我代表团之后不久，又送来了一份关于会议公报的稿子，并说准备在24日开会讨论。

24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所谓"会晤"，由罗马尼亚党的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会晤"一开始就对我们围攻。因为他们都看过苏共中央的《通知书》，内容无非是根据这个《通知书》瞎说一顿。

在会上发言态度比较恶劣的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党，波兰和蒙古党的代表发言比较一般，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党则不赞成会议这样开。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表示，这个会议这样开他们很难表示意见，他们要请示国内。

（后来，巴卢库率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在跟毛主席谈话时讲到，卡博率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时候，在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党中央领导三天三夜没睡好觉。卡博每天都请示中央，究竟怎

么表态，他个人不能决定，也很难做出决定。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指示他，要他一定要请示中央以后才能够表态。所以每天从地拉那派飞机到布加勒斯特，带着他的请示回地拉那，然后又带着中央的指示回布加勒斯特。当时毛主席就问，为什么不用电报、电话？巴卢库说，电话根本不能保密，而电报呢，阿尔巴尼亚的密码是苏联编的，他们可以译出我们的密码，也不能用。所以只能写信，派专人、专机往返送。卡博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就表示不赞成开那样的会，结果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也受到一阵围攻。）

最后赫鲁晓夫讲话时，又一次对我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涉及到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差不多把他22日跟我们代表团谈话的内容又搬到这个会上来。

在这次会上，无论是赫鲁晓夫的发言，还是其他党的发言，都避开了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抓住一些具体事情特别是组织问题来攻我们，说我们在国际民主组织里持独特立场，说我党代表在蒙古党大会上致词中没有和平共处这句话，说我们跟阿尔巴尼亚的谈话是找反苏同盟军，还讲到世界工联北京理事会会议、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等等。

赫鲁晓夫发言以后，彭真同志站起来讲话。彭真同志在讲话中，对其他党的意见都不提，只提赫鲁晓夫的讲话，只批评赫鲁晓夫，批评他骂我们假革命，批评他吹捧艾森豪威尔。彭真同志着重批评赫鲁晓夫说帝国主义跟

过去不一样,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已经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批评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彭真同志只笼统地给予答复,说我们是根据《莫斯科宣言》讲的,我们是维护《莫斯科宣言》、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不是什么独特活动、独特立场。

彭真同志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要发表公报的事情。现在居然有一个公报稿子。我们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且要我们签字。彭真同志又提出,公报应加一段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着重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这是《莫斯科宣言》上写的。赫鲁晓夫又带头反对。后来彭真同志又提出,公报前面不必一一列举每个党的名字,只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会晤。赫鲁晓夫也不赞成。最后,我们提出公报里边改两个字,把"一致"两个字删掉。赫鲁晓夫仍然不赞成。反正一个字都不能改。

赫鲁晓夫横蛮霸道,说会议不能延长,马上就签字。他要求我们当场签字。彭真说,不行。我们提出的几个修改意见你都不接受,怎么就要我们签字呢?苏共中央通知举行会晤时没有说要发表公报,我党中央没有授权我们签字。我们要请示中央。

就是这样,彭真同志和赫鲁晓夫两人一来一往地吵。后来吵得不可开交,罗马尼亚党的乔治乌·德治提议休息半小时以后再开。实际上,他们是利用这个时间商量怎

么办，怎么处理这个僵局。

复会以后，他们还是提出要通过公报。乔治乌·德治宣布，大家都呼吁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席毛泽东同志能够为着团结，能够同意代表团签字。乔治乌·德治做了这么一个说明后就宣布散会。

第七节　防守反击

散会后，我们代表团连夜向中央报告会议的情况，请中央指示，签字还是不签字？电报中还说：代表团倾向于签字，同时发表一个声明，把我们的意见讲清楚。

25日上午，中央收到代表团24日夜里从布加勒斯特发来的电报。在这之前已收到了代表团22日同赫鲁晓夫谈话和23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即《通知书》）的要点。

25日上午小平同志同少奇同志、周总理（毛主席睡觉还没起床）通电话商量，决定起草声明。小平同志把乔木同志和我找到居仁堂（书记处办公楼），向我们口授他设想的声明内容。我们写成文字后稍加整理，即印送给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时我们还起草了给代表团的电报，也同时印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这个电报指示代表团：我们后发制人，现在是反击的时候，要严厉地批评苏共，要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对其他兄弟党一概不要提

及。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代表团争取在会议上宣读北京发去的声明。但也要估计到可能不让我们在大会上宣读，所以，要准备在会上散发这个声明。声明发表后，可以在公报上签字。他们不让修改也就算了。

当天下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常委开会，讨论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和给代表团起草的声明。

在会上，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了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他6月2日的信是他下决心要对我们施加压力。6月7日的信是一个骗局，骗我们说不开正式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会晤"，只对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撒谎。看来他们的《通知书》早就准备好了，临时写是不会这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五六十页，说明他是准备好对我们实行围攻。这个《通知书》就是对我们发起围攻，拿这个《通知书》来武装跟随他们走的喽罗。

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我们三篇文章咽不下去，他是迫不得已拒绝参加四国首脑会议的。他不是把气出在艾森豪威尔身上，而是把气出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三篇文章向全世界广播了，大家都听到、知道。形势发展证明我们说对了。这使他下不了台，逼得他没有办法，不得不宣布拒绝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把一切怒气都发泄到我们身上。他在22日同我代表团谈话时，那么放肆、那么恶毒、

那么不讲道理、那么破口大骂，反映了他内心的恼怒，真是恼羞成怒了。

少奇同志说，赫鲁晓夫很像高俅，就是恶霸兼流氓。毛主席说，他比不上高俅，他只能当个蒋门神，就是《水浒》里面的蒋门神，高俅的食客。

少奇同志说，从《通知书》看来，赫鲁晓夫毫无原则，一下可以这样说，一下可以那样说，自相矛盾也顾不得。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常委会对代表团的声明草稿只作了一点修改，立即发到布加勒斯特，这个声明有五点内容：

第一，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破坏协商的原则，抛弃预先不做决定、只是交换意见的诺言，搞突然袭击，滥用苏共的威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第二，中国党历来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年多来是忠于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我们在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这些分歧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以取得一致。但是赫鲁晓夫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我们两党的关系不是看成

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用压力使我们向他们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屈服。我们是绝不屈服的。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是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第三，重申我们历来是为团结而斗争的。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赫鲁晓夫如何做法，我们坚信，中苏两党的团结，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终究是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下去的。

第四，讲清楚我们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在整个两党关系来看，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中苏两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和团结是主要的。我们相信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能够找到机会，通过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得到解决。

第五，对公报的草案提出意见。我们认为，公报的草案明确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是对的，但是这个草案中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说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而且这个草案对当前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示态度，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现代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提到，这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公报草案，建议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加以讨论，以便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文件。

正当我党中央在北京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的时候，25

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擅自把会议扩大了。我们代表团到会场的时候才发现,参加的不是12个党,而是51个党,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好些兄弟党的代表都来参加了。会议扩大到这么个范围,事先既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们,完全是他们一手包办的。

会议一开始,又是和24日的会一样,对我们围攻一通。不过这次发言的大多数都是那些常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当时我们代表团还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不好多讲话。彭真同志只在大会上说,现在这个会议不符合苏共6月7日的信,那个信只通知会议讨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而且说不作决定,现在则要求发一个公报。大家发言又不是讨论公报的问题,而是指责中国党。中国党在会前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兄弟党会议推迟到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召开;二是扩大会议范围,参加会议的包括全世界的兄弟党,而且要在会前成立起草委员会,为兄弟党会议准备文件。对于我们的建议,苏共没有答复我们。现在大家这样指责我们,又要求我们在公报上签字,我们代表团处境很困难。许多指责都是没有道理的,是不顾事实的。我们代表团还没有得到中央授权在公报上签字。我们正等待中央的指示。

我代表团这时采取哀兵的姿态,既争取时间,又取得同情。

25日上午和下午的会议,都是在一片谴责中国党的

叫骂声中进行。

当天休会以后，到了晚上，代表团才收到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发来的声明。代表团连夜充分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怎样贯彻执行中央指示。

据代表团的同志后来说，他们原先考虑也是在会上先发表声明，然后签字。但是后来考虑，如果在会上发表声明，很可能会被他们打断。同时也考虑，根据前几天的情况，在别的代表发言骂我们的时候，他们有意对同声传译设备在技术上做手脚，使我们听不清楚究竟人家说了什么，也使别人听不清楚我们说了什么。如果我们在会上发表声明，他们很可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虑到这些情况，代表团决定采取这样的步骤：第一，先提出公报修正案，就是把中央拟定的声明中的几点意见，改写成一个修正案，在会议一开始时就提出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如果赫鲁晓夫还是反对我们修改，就采取第二步，即扼要地讲明我们的立场，然后表示：为了团结，同意签字。随后就把我们的声明当场散发给所有代表，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的干扰。

第二天一清早，我代表团约见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我们代表团到达罗党中央总部时，罗党政治局的所有成员差不多都到了。我们向他们提出，这次会议不正常，同苏共 6 月 7 日的信不相符，并说我们接到中央的指示，要求修改公报草案。我们准备在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提出修改意见。乔治乌·德治听后表示，会议

开成现在的这样子,也不是罗马尼亚党所愿意的。他劝我们要忍耐,不要着急,事情慢慢会解决的。他说,这个会我们预先也不知道怎样开,也不知道苏共在会前要发出《通知书》。会议怎么开都是苏共在会议开始前通知我们的。乔治乌·德治做了这么一番解释,可能也是实情。乔治乌·德治还对我们说,捷克斯洛伐克对开会没兴趣,他们已经在昨天晚上回国了。波兰代表团也认为不应搞得这样严重。他还劝我们不要把这次会议看得太重了。

由于我们跟罗马尼亚党会见,会议推迟到快11点才开始。我们首先提出我们对公报的修正案。彭真同志说,我代表团认为这个公报草案没有讲该讲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修正草稿,请大家讨论。当场就把修正案分发给各代表团。赫鲁晓夫看后马上站起来反对。他说,前天(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已经通过了,不能再修改了。彭真同志问,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赫鲁晓夫蛮不讲理,说,一个字都不能修改。这时,有一些党的代表也附和赫鲁晓夫的意见,说不能修改了,已经通过了。

这么嚷嚷了一阵以后,我们代表团看快到12点了,就站起来说,既然大家不赞成我们的修改,我们也不要求修改了。但是我们必须声明,我们的修改案还是对的,还是比较适合时宜的,很遗憾没有被大家接受,很遗憾受到赫鲁晓夫的坚决反对。对这种强加于人、不讲道理、横蛮的、粗暴的做法我们表示极大的遗憾。彭真同志接着又

说，为了团结，我们同意在公报上签字，但是我们要声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就由我们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声明分发给大家。我们同意签字。

因为我们说同意签字，到会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所以我们代表团工作人员顺利地把我们的声明发给了大家。

我们的声明发给大家以后，大家都低着头看。据代表团同志回来说，当时会场上静寂得像死人一样，空气极其凝重。原先我们估计，赫鲁晓夫看了我们的声明以后，会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暴跳如雷，当场就大骂我们一顿；另一个可能是他看到我们答应签字，他脑子一时转不过来，把我们的声明吞下去了。

看来我们这个声明是一记闷棍，赫鲁晓夫没有回答我们的声明，只建议十月革命节开会，提出起革委员会由12个党再增加10个党。我们提出增加日本和澳大利亚。大家也同意了。上午的会就这样结束了。

代表团回住地后非常高兴，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吞下去了。有的同志说他上午吞下去了，他下午可能要发作。

下午开会的时候，其他党的代表发言时都没提到我们的声明。到赫鲁晓夫发言，大概他事后觉得实在咽不下去，果然摆出老资格、老子党的架势，好像是做总结的样子，大骂了我们一顿。他大骂我们违反1957年的宣言，破坏团结，攻击我们的内政外交。内容没有什么新东

西，都是老一套。但是，他不敢接触我们在声明里面讲到的父子党和指挥棒这两个问题，只是空泛地讲中国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挑拨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团结。因为父子党、指挥棒这两个问题对他来讲是最痛的了，讲到了他的本质了。这正是我们要在这次会议上捅出来的要害。

接着，彭真同志也发了言，批评赫鲁晓夫搞父子党，强迫我们签字，也批评他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会议结束时举行的招待会上对我们谩骂、诬蔑。彭真同志还着重讲了我们是维护团结的，是维护《莫斯科宣言》的，是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违反这些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彭真同志完全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反击赫鲁晓夫，对其他党一概不问。

在彭真同志发言时，赫鲁晓夫非常激动，他跟彭真同志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地吵起来了。彭真同志说，你讲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今天还没有把全部意见都讲出来。我们对你们的《通知书》还没有答复，我们将来要详细答复你们提出的问题。但是你今天讲到什么问题，我就跟你讲什么问题。接着赫鲁晓夫又讲了长波电台的问题，但是他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彭真同志就回答长波电台的问题说，你就是要控制中国，要苏联所有，归苏联使用，这是损害我们的主权。这样的事还有，你讲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彭真同志在这里又点了一下，其实赫鲁晓夫知道，这里暗指的是共同舰队问题。

赫鲁晓夫又讲了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纸老虎、双百方针等问题，还讲到我党八大会议上米高扬致词时毛主席故意离席等。彭真同志逐个地批驳他，他讲什么就驳他什么。彭真同志这样你来我往地批驳赫鲁晓夫这个庞然大物，别的兄弟党代表只是瞪着眼睛听。吵了一阵以后，赫鲁晓夫无可奈何，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彭真同志是我党书记处书记，赫鲁晓夫是苏共第一书记，从身份来讲是不对称的。但是，彭真同志就那么理直气壮地顶他、驳他，而且再三说，我还有好多话要讲，今天不讲。但你讲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从气势上压倒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也看到他单枪匹马地跟彭真你来我往地那么对吵，觉得不是办法，于是就示意其他党的代表来助攻，问还有什么人要讲。但是，没谁来响应。于是他又点保加利亚党的日夫科夫名字。日夫科夫才勉强给中国党加了什么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十几顶帽子，没说出什么道理。当赫鲁晓夫点到阿尔巴尼亚党的卡博时，卡博说，我们没有什么意见，我们中央不赞成兄弟党会议这样开法，中央意见就是这样，我们提不出别的意见。赫鲁晓夫自讨没趣。

最后，乔治乌·德治出来收场。他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也不准备会议延期。公报草案已经通过了，中国也同意签字了，到此会议就圆满结束了。

散会的时候，赫鲁晓夫气没有出够，仍然耿耿于怀、

退出会场时对我们代表团讲，看来你们教条主义很顽强。我们代表团成员中懂俄文的也顶他一句说，看来你这个机会主义也很顽强。

由于代表团每天都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用电报发回国内，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

第八节　留有余地

我党代表团回国以后，6 月 30 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彭真同志汇报。在会上彭真同志详细汇报了代表团根据中央的方针进行工作的情况。

会上大家议论到，这次斗争是一场突然袭击，是一场遭遇战。我们虽然预先估计到这个可能性，但是还没有充分估计到赫鲁晓夫会采取这么恶劣的手法，预先准备好围攻我们。毛主席说，看来苏共中央 6 月 2 日给我们中央来信建议开会，那个时候他就下决心要整我们了。他 6 月 7 日来信说这个会推迟开，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只商量一下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开会的内容，交换一下意见，不做决议，这完全是欺骗的手段，是企图麻痹我们。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就准备好《通知书》来全面攻击我们。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打算围攻我们，而我们是反围

攻，像过去中央苏区那样反“围剿”。但是我们这个反“围剿”要适可而止，要留有余地，不要把子弹一次打完，能够收时就收，有理有利有节。

大家还议论到，中央采取高举团结的旗帜，后发制人，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的方针是对的。实际上我们代表团这次的工作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中苏之间分歧的严重性摆在所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面前，让他们知道中苏之间的争论，不是简单地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牵涉到两党、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通知书》所起的作用，就是把这个问题摊开了，把分歧公开化了。而我们的反击也起了这么一个作用，让大家知道，不能让赫鲁晓夫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事情的真实情况也不像通知书说的那样。赫鲁晓夫企图通过这次会议，采取高压的办法把我们整服。但是实际上适得其反，我们跟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但没有达到他原来的意图，相反把他的弱点，他的横蛮无理，他的错误观点，都给揭露出来而且批驳了。当然，我们只讲了一部分，没有全部讲，赫鲁晓夫讲到哪里我们才跟到哪里，形式似乎被动，实际上非常主动。这次反“围剿”斗争是成功的。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都讲到，这次斗争是第一个回合，斗争是长期的。来日方长，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开各兄弟党会议的时候

会有一场恶战。现在首先要对他的《通知书》做出回答，然后准备在起草委员会中协商提交兄弟党会议的共同文件草案。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7月间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除了讨论国内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同时还决定给党内发一个通报，把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告诉党内高级干部，讲清楚我们跟苏共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问题的分歧，同时指出这还是十个指头里边一个指头的分歧。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还要坚持团结。因为彼此有需要，也有团结的基础。赫鲁晓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可能变化。所以我们要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要采取这样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问题的方法，对他进行斗争目的还是为着团结。

会议还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开兄弟党会议之前，不发表跟苏联进行论战的文章，即使不指名的也不发表。当然，对于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对于时事性的问题当然还照样发表评论。对苏联要静观一个时期，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估计他们在开会之前还会有动作的，我们要再看一看。

第六章
回顾与决策

第一节 避暑胜地

北戴河是华北久负盛名的避暑胜地，解放前主要是外国人夏天避暑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半月形的、平坦的、长达十公里的海滩，是游泳、戏水、日光浴的好处所。北洋军阀时期，首先是外国人在那里建了高矮不一、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别墅。特别是英国人在唐山办开滦煤矿以后，英国的一些资本家、工程师每年都到这里避暑。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节也在这里盖了很多别墅。北洋军阀比较守旧，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但连夏天也不常到那里去。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那里又盖了一些小别墅。但总的说来，那里气候潮湿，一年可度假季节也短，许多别墅都

很破旧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建的不多。(近十多年来大兴土木，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在50年代，中央同志夏天也偶尔到北戴河来度假，但很不经常。因为那个时候进行抗美援朝、三大改造，工作繁忙，中央同志难得有空闲休假。从1958年夏起，中央经常在那里召集各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样北戴河才又逐渐热闹起来。

北戴河的十里长滩，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东面属于东山区，北京军区、河北省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基本上是河北省的。中区是北戴河的市区，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小镇，50年代和60年代也还是小镇。国务院政府机关的各部和外国人在那里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夏天休假的地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在那里也搞了比较简易的疗养所。西区是属于中直机关的，由中央办公厅管。再往西就是部队的，总参、总后、总政在那里有些别墅，但是不太多，当时还比较荒凉。最热闹的是中区。

中央所在的西区比较安静，从中区到西区之间的路是隔离的，有警卫守着。在西区的山坡上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盖了一个礼堂。文艺演出、看电影、娱乐活动都在那里。礼堂的东面是毛主席住地，那是一排比较宽大的平房，东头是主席住的地方，西头是他会客的地方，中间是书房和饭厅。少奇同志住在半山腰的别墅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都在围绕小礼堂周围的别墅里，多数都是平房，个别的是楼房。只有周总理和董老住在靠近海

边的马路旁，都是两层楼的别墅。1958年我第一次到北戴河去的时候，是跟胡乔木住在小礼堂附近的一个平房别墅里。

1960年夏天，我到这里是第二次了。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

因为要起草文件，这次来的秀才比较多。我们住在中直的高干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西区的西头，离总后不远的地方，是两层旅馆式的楼房。我、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等都住在这里。每两人住一套。每套房子都是东西各一间住房，中间还有一个小客厅，合起来是三间一套。另外也还有秘书、工作人员住的单间房间。

在北京的时候，小平同志交待，所有参加起草反修文章的秀才都到北戴河去，在那里起草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当时我们简称为《答复书》。

参加起草《答复书》工作的人比较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还有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调查部的孔原、冯铉。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楼房比较小，房子不多，所以他们都不跟我们住在一起，除乔冠华住在中区外交部的招待所以外，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别的地方。

其实，起草反修文章的人，从1960年初起草《列宁主

义万岁》三篇文章的时候起，队伍就慢慢形成了。那个时期做的主要工作是收集、编辑马恩列斯关于时代、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等等问题的论著，搞清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问题、跟什么人讲的，后来把每个问题的论述分别编成了小册子。同时，我们也收集世界各国党特别是苏联党，尤其是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的言论，分别打印成一份份材料。同时也收集我们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在各种公开场合、会见外国客人时，在这些问题上讲过一些什么观点。当时主要是做这三部分工作。

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我们就更加注重收集各国党和我们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这样，在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对对方的言论（主要是根据苏联和各国兄弟党他们自己报刊登载的领导人讲话或者是他们中央做的决议等）比较熟悉，辩论起来有根有据。这个工作从长远来看是很有用处的，因为写文章要有针对性，要搞清楚对方的论点。

除了注意收集上面三部分的材料以外，我们还有意识地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主要人物关于这些问题讲过一些什么话，英国从丘吉尔起历任首相讲过什么话，法国的戴高乐讲过什么话。当时主要是收集美、英、法这三家，特别是美国的材料。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和西德在国际问题上还没有发表什么特别的议论。除了收

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外，还收集这些国家一些主要报刊的评论。

这样一来敌、友、我三方面的论点弄清楚了，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据，针对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参加这个材料收集工作的有外交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另外还有全总、青年团、妇联也参加工作，因为他们同世界工联、国际妇联、国际学联、世界青联等国际民主组织经常来往，掌握不少材料。所以收集的材料相当齐全，数量相当大，近千万字，后来把这些言论分类编成摘录。

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是40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先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班子。这个班子就是后来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成立的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前身，也是它的基础。

因为是夏天，太阳出来比较早，北戴河早晨的空气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早上起得很早，起来后就分头起草，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就下海游泳。这是一

天中间最好的时间，海滩阳光很好，海面也比较风平浪静。午饭后就休息一下，任务紧的时候，下午就再写，比较松的时候，下午又去游泳，或者在沙滩上商量问题。晚饭后散步，一直散步到俱乐部小礼堂看戏或者看电影。有时不愿意看就一直散步到中区的镇上吃点冷饮。一般情况都是龚澎请客。她自己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也请我们吃冰淇淋。有时则到海边浴场休息室里喝茶，这是中央负责同志游泳时休息的处所，我们比较熟悉，去了就边喝茶边闲聊，我们戏称这是"废话俱乐部"。

礼堂里有好戏的时候，我们也去看。因为看戏要凭票，而我们这些人并不都是参加会的，只有我是属于会议的成员，其他秀才都不属于会议成员，虽然也可以拿到票，但不是首长票，没有首长票就不能坐到前排。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当然这也是一个恶作剧了。因为乔冠华个头高大，王力比较胖，头发又斑白，少年白头，像个"首长"，虽然他在我们中间比较年轻，比我还年轻。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票给他俩中间的一个，其他人前呼后拥，好像是首长的秘书，跟在后面进去坐到前排看戏。我因为经常到中南海开会，警卫对我很熟，不要票也会让我进去。但是许立群经常给拦在门外，虽然当时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但他比较谨慎，进场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怕这怕那，经常被警卫拦住。我们用了这个办法后，他也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大摇大摆地进去了。他长相少年英俊，像个首长秘书。后来到 1962 年以后就比较好

一点，因为警卫对我们这些秀才比较熟了，他们是认人的。但是1960年那个时候，警卫对他们还比较生疏，他们到毛主席、少奇同志那里开会较少，不像我从1956年起就经常接近中央领导核心。

我们一到北戴河就开始动手起草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改了几稿。这个《答复书》的起草工作由小平同志直接抓，具体主持这个工作的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乔木，一个是陆定一，一个是康生。

陈伯达不大参与我们的活动，他惯于自己搞。在小平同志主持开会的时候，他偶尔也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秀才在起草过程中间，乔木、陆定一、康生同我们一起商量的时候，他是不参加的。当时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慢慢搞清楚，他跟定一同志合不来。定一同志在七大的时候当了宣传部长，而他只当个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陆公当了部长以后架子大了，跟我们不大来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来往不来往的问题，因为他俩经常在一起开会。只是因为定一同志当了部长以后，没有单独找他谈过话，所以他就记恨在心。这是后来1963年夏天在杭州的时候，他跟我说了此事后我才知道的。

在北戴河的时候，《答复书》基本上定稿了，小平同志也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过了，但是最后定稿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整个来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虽然我们有搞《答复

书》的任务，但是多数时间是休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小平同志交代说，在北戴河你们要好好休息，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他指的是后面还有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这之后还有26党起草委员会，最后才是81党大会。在这一系列会谈和会议中，肯定发生激烈争论。我们要为此做充分准备，所以小平同志说，紧张的事情还在后头，在北戴河先休息休息，松弛松弛，准备迎接连续战斗。

第二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说明什么

北戴河会议是从7月5日到8月10日举行的。会议的议题原定有两个。一个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调整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即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当时中央已经感觉到，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工作中间一些“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面更加严重了。整个1960年上半年情况很不好，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得很差，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不好，而且农业又发生自然灾害，已经发生春荒，所以对1960年下半年的经济计划以及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调整。

原来会议是准备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充分讨论的。但是，从会议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国际问题上，集中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开始直到最后，中苏关系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本来中央也是准备在这次

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预先没有估计到大家对这个问题这么关心，所以在会议正式开始的第二天（7 月 6 日）就由彭真同志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过。

彭真同志在会上除了讲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外，还讲到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的几个问题。大家就对这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过，前面已经讲到了，所以这里只讲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可以说大家的讨论是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

第一，这场斗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彭真同志在汇报中提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归结为毛主席讲的两句话，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人民即资本主义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陆定一同志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讲话里面讲到，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革命而反对人家革命。这两句名言就是主席过去讲过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问题，所以，说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问题，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第二，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战争马上就要发生，更不是不应提出为和平而斗争。我们认为，只要战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还存

在，那么总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说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去掉两个"不"字，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了。我们在讲到战争的社会根源时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战争的社会根源，战争的危险就始终是存在的，不是可以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修正主义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以牺牲三分之二世界人口的革命来换取帝国主义恩赐的和平。我们是反对以牺牲革命换取和平的。我们认为，革命力量越壮大、越发展，和平的保证就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赫鲁晓夫却认为，革命越发展，战争的危险性越大，和平的可能性越小。我们和赫鲁晓夫在现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这样的分歧。

第三，由于我们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对我们又怕又恨。他之所以对我们又怕又恨，是因为我们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打中了他的要害，我们批判的是南斯拉夫的观点，但赫鲁晓夫正是抄袭这些观点，而且还有所"发明"（如"三无"世界之类）。所以他总想办法来整我们。

赫鲁晓夫这么想整我们，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原则，另一方面是美国人也坚持了原则，但它坚持的是帝国主义的原则。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它对赫鲁晓夫很不客气的。虽然要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但它仍派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而且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飞机是他派的，以后还要派。他的这个态度使赫鲁晓夫下不了台。

如果没有我们的批评，可能他还觉得好混一点。我们一批评，他就非常难堪了，只好宣布拒绝参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虽然他已经到达巴黎。

赫鲁晓夫在我们发表三篇文章之后，特别是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恼羞成怒，把气出在中国党身上，对我们恨透了，于是准备发动一个反华运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6月21日开会之前就把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改成《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各兄弟党。这封信是做了充分准备的。那个时候，苏共中央想采用高压的办法把我们党压服。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看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下了决心要压服中国党的。

第四，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搞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很恶劣的先例。他们事先不说要开什么会，甚至预先也说不讨论什么问题，只讨论开兄弟党会议的地点、日期和会议议题。但是会议一开始，就搞突然袭击，组织对中国党进行倾盆大雨的围攻。他们搞阴谋诡计，在会议之前纹丝不露。虽然他们给我们中央的信署的日期是21日，但6月22日我们代表团会见赫鲁晓夫时，他也讳莫如深。他对我代表团采取严密封锁，然后搞突然袭击。

这种办法不是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所应采取的方式，而是反常的，是搞阴谋的。由此可以这样说，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可信赖的。他是搞阴谋诡计的，不能用

通常的党内斗争的办法来对待他,也不能用兄弟党之间商量问题、讨论问题以至争论问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来对待他。

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从他搞掉贝利亚,搞掉莫洛托夫,后来又搞掉朱可夫的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善于搞阴谋的。他在党内既然这样做,那么在兄弟党之间也会这样做的。布加勒斯特就是一个证明。

第五,大家认为,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好些同志指出,看来赫鲁晓夫是越走越远了,要他改变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他们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对他的修正主义进行有力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坚持不跟他走,不听从他的指挥棒,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用批评的武器,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还有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反面教员的作用,在一定情况下,比我们的斗争作用还要大。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这个会议,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帝国主义立场非常坚定,他横蛮霸道,不但不道歉,而且说以后还要派飞机入侵苏联,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这对赫鲁晓夫来讲是迎头一棒,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教训,反过来恼羞成怒,说我们拆他的台。这真是岂有此理。

第六,在会议讨论过程中间,大家都赞成中央采取的

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的方针，就是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公开破裂的时间，力争拖下去，但是也不怕分裂，也要准备分裂。如果他硬是要破裂，那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不怕。无非是自力更生。他不给援助，我们自己搞。如果他连贸易也不做，我们就跟日本、西欧做生意。美国封锁我们，做不成生意，但日本、西欧还是可以做生意的。这样就逼得我们搞单干。其实单干也是列宁和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下搞工业化时采取过的办法。这是列宁的办法，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这样的国格，不怕封锁，不怕分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第七，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各兄弟党的《通知书》，也是他们6月21日给我们的信，要答复，要坚决进行反击。

在讨论彭真同志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要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

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毛主席又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

会议进入国内问题的讨论后我没有参加。我和其他秀才一起起草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也就是起草我们的《答复书》。

第三节 历史的回顾

北戴河会议从7月14日到16日连续三天，由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和苏共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谈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以后，大家一面讨论国内问题，一面很想知道我们跟苏共的关系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所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总理做一个系统的报告。

周总理经过一番准备以后，在7月14日开始做长篇

发言，连续三天，每天一个上午，详细地介绍了从共产国际成立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们和苏共的关系。

周总理的报告是分五个时期来讲的。

他首先说明，共产国际（1919—1943）的成立是必要的，解散也是适时的。尽管这中间有些缺点，但是大体上还是正确的，特别是列宁在世的那四年是正确的。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的工作长达18年，总的来讲，支持革命是主要的，不许革命是次要的，他犯过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有的也改了。后来由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毛主席说："两头好，中间差。"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是正确的。它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各国共产党已成长壮大。由一个中心来指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无利的。从赫鲁晓夫上台到现在是七年半，开始一段还做了一些好事，从1958年起就向坏的方面发展，一直到现在。

周总理说，共产国际和我们的关系在第一个时期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时期是从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一直到1927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去考察、物色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中国找到陈独秀、李大钊，也找到戴季陶、王介民，通过他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们也找了孙中山，甚至找过吴佩孚，觉得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放弃了。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起来了。在1925—1927年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发动北

伐，一直到占领武汉。这一段还是对的，但是后来就问题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多了。

第二个时期是从 1927 年 7 月（蒋介石叛变以后）到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是共产国际中期，对中国革命影响最大。共产国际给中国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1927 年"八七"会议，是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国民党叛变以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做认真的分析，没有总结大革命时期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今后革命采取什么路线、方针、政策。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创立了红军，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具体军事路线上是错误的，南下广东以后只在汕头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支援，而不是采取就地上山开展游击战争，造成起义的失败。后来退到湘南组织浏阳暴动，把队伍带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组织的农民起义的部队会合。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原来派到国民革命军里帮助孙中山、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伦已经回国，另外派了一个叫罗明纳兹的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这个人的整个思想是托派思想，结果在革命低潮的时候，采取盲动主义的路线，到处发动暴动，下令广州起义，但是没有讲起义以后队伍应该怎么办，根本

没谈到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是1927年10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时，苏联人罗明纳兹提出的一套办法，根本反对部队转入农村，还是要攻打城市，所以牺牲了许多干部。而且他还对我们党中央采取组织处理，进行干涉，把谭平山开除出政治局，警告毛主席和周恩来。

1928年，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代表有70多人。因为罗明纳兹在中国的时候，主张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所以参加六大的代表，从国内去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代表，70多个代表中有40多个是工人。后来革命困难时期叛变的代表有40多人，其中有10多个是工人。向忠发就是当时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当了中央书记。六大的代表到现在只剩下周恩来、邓小平、蔡畅和刘伯承四个人了。当然还有王明，他现在住在莫斯科，不回国了，说是“治病”。

在六大期间，因为在苏联有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所以在六大代表中派别斗争也很厉害。大体上瞿秋白同志是一派，张国焘是一派。立三同志是站在瞿秋白同志一边的。会议是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布哈林领导，但是实际工作是由一个叫米夫的人负责，他也提出增加工人成分的中央委员。王明就是这时被提拔为中央委员的。这个时候王明非常活跃，搞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实际上是反对中共中央。

六大的主要功绩在提出土地革命的任务，但具体的

阶级分析和其他政策还有许多“左”的成分。因为当时苏共在反对右倾,反对托洛茨基,后来又反对布哈林,所以也要在中国反右,在中国发展“左”倾路线。

李立三同志回国以后,在1930年6月间领导中央做出决议,要发动全国革命,要争取一省或少数省胜利,来推动世界革命,并要在各大城市中搞暴动,要打长沙,打南昌。他错误地认为,现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但当时斯大林还比较冷静,他曾说过,不要让红军去打大城市,现在还不能打城市,打下来也守不住。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听斯大林的,李立三当然也不听。所以在半年时间内仍然搞全国暴动,企图夺取大城市。

1930年9月,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立三同志。但是国际代表是用共产国际六月决议来批评立三同志的,而六月决议恰恰是反右,认为立三同志“左”得还不够,认为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这个时候,王明、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大反中央,认为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要搞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王明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结果召开了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是1931年初开的。会议的决议完全是由米夫起草的。决议指责中央,并且改组了中央。王明和博古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

王明、博古路线从 1931 年到 1935 年为期四年多。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开始时上海还保留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中央指责毛泽东和刘少奇右倾。后来博古到中央苏区夺权，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权。在这四年多中，王明、博古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主要是城市地区，也包括农村）损失几乎达百分之百，只有少数地方组织保存下来。一直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第三个时期是共产国际后期，从 1935 年到 1943 年它解散的时候为止。这个时期，因为中央和共产国际联系比较少，所以影响也比较小。这时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后来红军到了陕北，中央跟共产国际联系也比较少。当时完全靠电台联系，电台设备又差，联系不好。同时，共产国际七大以后，路线还比较对头，一般不干涉各国党内部的事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使得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事情影响比较小。

但是，也不是一点影响没有。比如西安事变，共产国际在开始时的分析是错误的，它认为张学良代表亲日派，西安事变是汉奸发动的事变。后来它才改变这个观点，认为“西安事变”应该和平解决。抗战初期，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政

权、统一的军队,这就是要求"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就成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据。王明这次右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但是这个路线没有能够在中央取得优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还批判了这种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当时还没有提出路线问题,直到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才严肃地批判了这种丧失党的独立性的、投降主义的倾向。

第四个时期是从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为止,就是斯大林晚年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在过去长时期养成的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考虑,要同英、美成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为着表示他是真正要跟它们搞同盟,不在它们国家内搞共产主义,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我们历史地看问题,从共产国际的本身来说,应该说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各国党已经建立起来,可以而且也应该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问题,无需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共产国际来越俎代庖了。因此解散共产国际是对的。但是,当时斯大林那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服从他的外交政策的想法是不对的。当时跟随英、美搞同盟是正确的,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当时最凶恶的敌人德、

意、日法西斯轴心，总的来讲也是对的。

这种情况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第一件事情是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3 年 10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承认，除东北三省外，中国是美、英的势力范围。1945 年雅尔塔会议上，美、英承认：蒙古独立，中国东北归苏联，北朝鲜也归苏联，以换取苏联在打败希特勒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苏联答应给国民党一切道义的、物质的援助。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们达成了这么一种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协议。后来苏联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友好条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签订的。

第二件事情是，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不让我们革命，不许我们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这也是苏联在上述的背景下向我党提出的意见。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对我们进军敌占区采取消极的态度。特别是我们进军东北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曾经通过我们驻南京的代表团，要我们在东北不要前进。后来更进一步，8 月 22 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中央在讨论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因为那个时候，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在抗战八年中间一直搞摩擦，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在大敌

当前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共产党。与这样一个蒋介石谈判和平,那等于与虎谋皮。但是苏联当时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路线,生怕跟美国发生冲突,生怕中国内战打起来会引起又一次大战,所以斯大林用很严厉的口气要我们去重庆谈判,不要打内战,否则中国要毁灭。其实,内战并不是我们要打,而是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我们不能不自卫,不能不反击。

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

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毛主席说,不怕,可以到重庆去,可以谈判。我们利用谈判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谈得成谈不成,责任在国民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揭露国民党不要和平,要打内战。同时要通过我们驻重庆的办事处跟美国方面交涉,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就要保证他安全去安全回。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一口答应，而且说，他将亲自同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起到延安来，接毛主席到重庆去。这样去的安全有了保证，但能不能安全回来还是一个问题。赫尔利答应他能保证这一点。所以后来赫尔利要蒋介石亲自写一个保证书，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这是后来赫尔利离开重庆回国之前，拿到蒋介石亲笔写的保证书对周恩来讲的。

毛主席、党中央灵活运用策略，把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后来签订了《双十协议》、《停战协定》，为我们准备自卫战争争取了时间，也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第三件事情是，日本投降以后，苏军本来可以晚一点撤出东北，可以把收缴日本的武器交给我们。但是当时苏联对我们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没有信心，生怕卷入中国内战，所以很快就撤退了，把机器都搬走了，连哈尔滨的大炮、炮弹都炸掉，只给我们步枪和子弹。其实，美国人是怕苏联的，怕在东北触犯了苏联。美国空运国民党军队到沈阳以后，国民党军队就向北进，打四平街。我们狠狠给它一个阻击战，国民党才知道我们的厉害。后来因为我们整个战线过长，兵力不够，决定收缩防线。国民党到了长春以后，苏联很怕国民党再往北进，美国也怕国民党再往北进惹了苏联，所以代替赫尔利到中国当大使的马歇尔就要求蒋介石保证不再往北进。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给马歇尔，保证占领长春以后再不往北进兵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苏联对美

国估计错误了，对我们也估计错误，对我们赢得胜利根本没有信心。苏联驻南京的大使跟随快要垮台的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到广州，离开南京的时候对我们代表团说，很担心你们要吃败仗，打不过国民党。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没有去广州。

第四件事情是，蒋介石大规模发动内战后，一边进攻陕甘宁边区，一边进攻山东，东西夹击。我们为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我们的力量，主动从延安撤退。当时苏联来电报要毛主席到苏联去。毛主席硬是坚持在陕北，连黄河也不过，只叫书记处五位书记中的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两位过黄河，到平山一带；而他跟另外两位书记周恩来和任弼时一直留在陕北，直到把战局扭转后才于1948年初离开陕北过黄河，同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在我们打到长江边的时候，苏联驻中国大使又想为宋子文求和，向我们进行试探，被我们拒绝了。

第五件事情是，三大战役之后，我们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对我们解放全国信心仍然不大。斯大林在1949年1月底派米高扬坐飞机来西柏坡。那个时候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孙科带领一班人马搬到了广州，随行的只有苏联大使罗申一人，其他国家的大使都留在南京，因为当时李宗仁作为代总统还在南京。米高扬来的时候很怕我们提出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打算要提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在全国解放后，苏联援助我们四亿美元搞建设，米高扬答复只给三亿美元，

答应给专家，派苏联内务部负责人科瓦廖夫以中长路苏方代表的资格到东北。米高扬还要毛主席到苏联去，毛主席说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北平还没有解放，离不开。

第六件事情是，北平解放以后，1949 年 6 月少奇同志和高岗一起到苏联去，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解放了北平，长江以北也都解放了。斯大林比较含蓄地承认他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他暗示说，不许中国革命，说中国不能赢得自卫战争胜利，都是不对的。当然他讲的是比较含蓄的。他在祝酒的时候说，你们胜利了，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为中国党的胜利干杯！当时少奇同志不肯干杯，说，不行，要干杯就要为中苏两国的胜利，为中苏两国人民、两党的胜利干杯。相持了好一会儿斯大林才同意为中苏两党喝这杯酒。后来少奇同志说，看来这次斯大林还有点自我批评精神，承认他过去做错了。

第七件事情是，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斯大林对毛主席的接待是冷落的，还不如接待少奇同志那样热情，那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宴会。本来毛主席这次访问苏联，一是为斯大林祝寿的，二是要跟苏联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苏联对订立条约不理会。后来毛主席发了脾气，说我现在没有事情干，一天只有三大任务，吃饭、拉屎、睡觉，大骂了苏联联络员一顿，这时苏联也看到英国带头，印度、缅甸都先后承认中国，与中国建交。而我们对英国说要谈判，谈判以后才能

建交。这个时候苏联才着慌,才同意签订条约,于是就把周恩来找到莫斯科去商谈订约。

但是,在商谈订条约过程中,苏方提出中苏共管中长路,要我们同意在新疆设立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所谓中苏合营,实际上是苏联出机器,把我们的矿产挖出来,运到苏联去抵债。苏方还要我们同意不让第三国的人到东北和新疆去,这样他们才答应把东北的财产交还给我们,才落实给我们三亿美元贷款。我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交换条件。最后经过多次商谈,互相让步,才达成妥协。

第八件事情是,关于抗美援朝问题。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一方面增加中朝边境军队,一方面公开警告美国,要它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中国不会置之不理。这个时候美国人认为中国不会抗美援朝。杜鲁门又发表一个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要我们不要支援朝鲜。我们没有理会。美国越过三八线以后,我们就断然出兵抗美援朝了。

我们决定出兵朝鲜后,周恩来到苏联去,要求苏联援助我们军火。苏联答应援助,但是要我们出一半价钱。原先还答应用空军援助我们,第二天就不干了。

我们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才发生变化。他看见我们真的抗美援朝了,才承认中国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半个铁托,而是真正共产主义。苏联援助我国的 156 项建设项目也是在我抗美援朝之后才落实下来的。

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斯大林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在十年间有错误的，有正确的，但最后还是正确的是主要的。当然，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出的主意，不仅仅是1943年到1953年这十年，在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立三路线、王明博古路线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指导的错误的根子，应该说也是出自于斯大林。但是中国党历来采取的态度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归共产国际的错误，我们党的错误由我们自己负责，不能因为有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而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向来是批评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党内领导，并没有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但这些错误本身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这是历史事实。所以毛主席多次说过，一提起斯大林就有气，从感情上讲很不平静，但从理智上讲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主要的还是做了好事的。

第五个时期是赫鲁晓夫时期。

在这个时期有几个阶段。从1953年到1955年是第一阶段，赫鲁晓夫对中国党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刚任苏共第一书记，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扫除从贝利亚一直到莫洛托夫，和后来的朱可夫的障碍。所以他当第一把手初期，对我们还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我们纪念国庆五周年的时候，他到中国来签订了增加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协议。

但是，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思想方

向是不大对头的。他一上台就急急忙忙要结束朝鲜战争。斯大林去世以后，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吊唁。在葬礼结束以后，赫鲁晓夫就提出，要马上停止朝鲜战争，不管怎么样都得马上结束，不再提出原来的要求。原来我们计划在夏天再打一个战役，突破沿三八线的几十公里防线，威胁汉城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样做对停战谈判有利。赫鲁晓夫急于停战，我们只好同意，很快就同美国人签订了停战协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赫鲁晓夫很怕美国人，要讨好美国人。

当时他也很想和铁托修好，这样做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好像认为过去一切都错了，连铁托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也认为是对的，简直是称兄道弟了。

在东方，他说一些新独立国家都是搞社会主义，到处封号许愿，无原则地追求人家跟他友好。同时在朝鲜问题上，搞得更不像话，除了要赶快停战以外，他又否认美国搞细菌战，说朝鲜控告美国搞细菌战是假的，还要我们也否认。我们请了国际专家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实地调查，证实美国的确是搞了细菌战。我们不但没有否认，还正式发表声明证实这一点，各国专家都在这个声明上签字。

赫鲁晓夫在国内大权独揽，在国外也突出个人。他是党的书记，不是政府人员，但是他陪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英国的时候，突出他个人，把布尔加宁撇在一边。当时西方舆论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认为共产党

不懂礼节。

第一阶段是 1956 年到 1957 年，这一阶段从苏共“20 大”开头，到莫斯科兄弟党会议结束。开头赫鲁晓夫就闯了祸，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世界性的反共高潮，给兄弟党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

波兰事件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他要对波兰动武，因为我们坚决反对，才没有敢干。对匈牙利，他原来是要出兵援助的，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反对下他害怕了，反过来要撤兵。我们劝告他不要撤兵，要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第一天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到晚上他们主席团开了一个通宵的会。第二天，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带领的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北京的时候，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才告诉少奇同志，他们主席团整夜讨论，同意中国同志的建议，还是继续增兵到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保卫住社会主义江山。

因为我们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整个世界性反共高潮中间，是支持苏共的，维护苏联的，所以赫鲁晓夫感到对他有帮助。毛主席到莫斯科参加 1957 年莫斯科会议时真心诚意帮助他们跟波兰党和其他兄弟党搞好关系。我们不仅在国际问题上支持了赫鲁晓夫，而且在他在党内清除所谓“反党集团”时也支持了他。因为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中央已作了决定，我们除了支持以外没有办法干涉。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内部究竟怎么样。

所以赫鲁晓夫从这一系列情况中，觉得我们对他还是不错的，对他是有帮助的。

第三阶段是从 1958 年到现在（1960 年）。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成长发展的时期、大肆放毒的时期。首先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苏联党史等五本书，公开修正列宁主义。这样才使我们不能不写三篇文章。他们除了出版这几本书以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害怕美国到羡慕美国，从惧美到媚美，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比如对中国，在西藏叛乱问题上是这样，在中印边界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系上也是这样。更加严重的是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亲自出马反华。

这是因为在 1956 年、1957 年这两年中间，中国明确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但是对他的错误也是有批评的。比方说，在波兰问题上，开始苏联准备要出兵波兰，镇压波兰共产党，要把哥穆尔卡搞掉，这件事情受到我们强烈的反对，而且我们还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就要发表公开声明来谴责你。这样他才不敢动手。在匈牙利问题上，我们也批评了他。在他准备放弃匈牙利，不再援助匈牙利人民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说将来历史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对这些他是很不高兴的，再加上中国的威望日益增大，赫鲁晓夫忌妒怨恨我们的那种仇视的心理、恼羞成怒的心理，明显

地增加了。

从 1958 年开始，赫鲁晓夫就企图控制我们，首先要我们跟他们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共同拥有。我们反建议中国自建自有，苏方可以利用，他们不干。我们曾经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而他却提出要搞共同舰队。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舰队。所谓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驻扎在我们沿海港口，实际上就是要把我国沿海口岸完全控制起来。另外，他还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这些要求都被我们顶回去了。

由于这一切，他对我们的批评总是耿耿于怀，特别是周恩来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1 月访问匈牙利、东德路过苏联的时候，也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并跟他们中央会谈，给他们讲道理，指出他们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大国主义的。当时毛主席在北京给总理打电话说，你要狠狠地捅他一下，统统给他讲，让他们感觉到疼，这些人你不把他刺疼，他是不会觉悟的。其实，刺疼了他还是不觉悟，反而怀恨在心，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说"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感到害怕。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材料，就是在 1954 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跟阿登纳说，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接着他讲了成吉思汗是怎样打到欧洲去的。从这里可以看

到。赫鲁晓夫把中国当成是"黄祸",他的那种欧洲第一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赫鲁晓夫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没有搞成以后,到1959年6月他就宣布不供应我们原子弹样品,不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签订的协议。他采取撕毁协议的这个步骤,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1959年赫鲁晓夫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他是把它作为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之一。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偏袒印度,责备中国。他是把这两个东西作为他拜会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马上到中国来,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我们放弃台湾,要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想牺牲中国,讨好美国。在1959年我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他在访美后急忙到中国来,跟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大吵一顿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屁股已经坐在美国一边了,不是把美国看作是他的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而对我们,他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大骂我们"公鸡好斗",大骂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一直到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对中国进行围剿,采取高压手段,企图把我们压服。这是赫鲁晓夫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发展。

以上是周总理用三个半天的时间，对我们跟共产国际、跟苏联、跟斯大林、跟赫鲁晓夫的关系所作的系统的历史回顾。它使全党高级干部都增加了对这些历史的了解。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强，有好多事情讲得很细，许多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讲到了。以上所述，只介绍了一个概要。(按：1984 年出版《周恩来选集》，只摘要发表了这次讲话的若干部分。)

总理在最后结束他这个回顾的时候说，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个斗争会高一阵低一阵。我们现在在内部把整个过程说清楚，但在公开讲的时候，特别是发表文章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仅在很快就要在十月革命节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绝不先发制人，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我们始终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斗争是为着团结，不是为着破裂而斗争，但是也要准备赫鲁晓夫要搞破裂。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团结，争取能够拖延、推迟分裂的时间，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革命也有利，对苏联人民也有利。总理说，1959 年中苏两党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谈的时候，赫鲁晓夫说你老是给我花园里边丢荆棘。毛主席就跟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给你丢石头，而是给你撒金子。主席说的意思是我们给你说道理，给你讲马克思主义，指出你的错误，希望你改正错误，这是丢金子，而不是打石头。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14日到16日总理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以后，17日开小组会讨论了整整一天。其实在那三个半天里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三五成群地议论。大家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今天跟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从此也看到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第四节　顶住压力

毛主席在18日的北戴河会议上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全世界反华的最多只有10%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谁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问题要紧。从今天起转到讨论国内问题。

主席这么宣布以后，接下来李富春同志讲话的时候，

先讲的还是国际问题，其他同志发言的时候，也还是讲国际问题，这样下来，会议就成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一起讨论的状况。

富春同志在讲到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整我们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要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时，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他说，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所以在18日这一天这么强调自力更生的问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苏共中央16日交给我们的信，他们在信里提出要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就是说，苏联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全部撤退专家，实际上是等于全面撕毁中苏过去签订的所有合同。

按照过去的合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有156项,在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项,一共304项,到1959年底已经完成了109项,1960年将要完成48项,合在一起一共有157项,剩下来还有147项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苏联给我们的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的,而是要钱的。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下79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味着这近80亿卢布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147个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根据这些项目,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专家一共1299人,另外有家属1700多人。在这些专家中有些不完全属于援助项目的,比如文教方面、军事方面的顾问。但大部分是经济援助项目的,包括国防工业。他们把将近1300名专家全部撤走,设备就安装不了,究竟以后他们还来不来设备也说不定,也可能一风吹了。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了这件事情。中央认为,我们应该把决心下在他们把专家统统撤走、所有援助的设备统统都不给、条约统统撕毁上。当然,估计他们还是想做生意的,因为中国有些东西他们还是需要的,特别是矿产和轻工业产品。我们要认真算一算账,我们欠他的债怎么办?他们赖账怎么办?

周总理把账算出来了。他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

我们每年还他5亿左右的样子，如果按5亿左右算，我们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够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要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要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其实我们欠苏联的152亿卢布里边，真正属于经济上援助的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的债务都是抗美援朝中苏方以半价卖给我们军火的钱。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毛主席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7月31日，周总理在会上把苏联专家的情况、苏联援助我们项目的情况和我们外贸的情况、欠债的情况都向大家讲了，而且强调要对苏联专家多做工作，要相信专

家大多数还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人。凡是有苏联专家的单位，要由单位负责人亲自找专家谈话，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的帮助。如果他们有意见，可以听他们的意见，做适当的解释，不和他们争论。同时地方上的各单位、厂矿企业单位，要组织小规模的欢送会，要热情欢送他们，因为他们做了有益于中苏友谊的工作，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大的帮助。不管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都要以诚相待、热情欢送。将来在北京再集中欢送一次。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对在中国的苏联专家采取这样的方针完全正确。许多苏联专家在撤走的时候非常激动，在我们欢送和告别的时候，他们许多人都流了泪，跟中国人热烈拥抱，对我们这样的热情欢送非常感动。

苏联7月16日发出的照会，是在7月13日至16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批准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活动时决定的。苏共中央的这次全会不仅批准了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采取高压政策，也批准了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措施。

这件事情等于苏联全面地撕毁跟中国签订的所有关于经济援助、国防工业援助的协议和合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步骤。但是，对这件事情，我们党中央有充分思想准备，决心顶住这个压力，把重点放在搞好国内工作上，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北戴河会议后期集中讨论了国内问题，特别提出要把农业搞好，要大办粮食，

要千方百计地挤出东西来还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清外债。

8月10日，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讲话。他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们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90%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毛主席说，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急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及待，着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

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10年，如果太长了，缩短5年也可以。如果5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5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12万个乡的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12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就是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哪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够长久。

主席讲完以后，小平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小平同志说，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因为孤立的不是我们。历史的发展不是跟他走的，他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不灵了。阿尔巴尼亚就不跟他走，英勇得很，这么一个小国硬是顶住了庞然大国的赫鲁晓夫。我们党坚持原则是正确的，也只有我们党有力量坚持，我们不坚持就不得了。我们党在国内实行的一系

列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一件是赫鲁晓夫同意的。如果我们听他的，承认错误，那我们现在就要下台。

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信心的。尽管现在面临着很紧张的局面，但是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暂时的问题。我们国内的事情搞好了，我们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腰杆子就粗了。其他兄弟党也不会给赫鲁晓夫帮什么忙的，对我们影响也不会大。我们要做最困难的准备，这样有好处，要加紧工作。要从现在起用一年的时间缓过气来，要下决心明年出口20亿卢布来还债。要硬着头皮顶着，从各方面挤，努力尽快把债还清。这是政治问题。事实上是可以挤出来的，留点尾巴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大家情绪很高，都要勒紧腰带还债。大家对苏共这种做法义愤填膺，这就产生干劲，就可以想各种办法来渡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扎实，从今以后要坚决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在今后一年内要把困难估够，把干劲鼓足，共赴国难。小平同志还宣布：为着加重地方的责任，让中央腾出更多的时间考虑全局性的问题、世界性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局，把全国划分为六大区，成立六个中央局，来代行中央职权，作为中央的代理机构。

接着少奇同志也讲了话。少奇同志说，现在修正主义成为一种国际潮流。这次大暴露，究竟是好是坏？列宁讲过，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暴露出来是好事。发生不发生修正主义不由我们主观来决定，因为修正主

义有客观的基础,是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与其迟发生,不如早发生好,脓包以早些放出来为好。修正主义出现是列宁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修正主义,列宁主义就不会这样的大发展。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我们可以大大发展马列主义,可以组织马列主义的队伍。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担当起这么一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马克思、恩格斯搞第一国际的时候,反动派猖狂进攻,发生了机会主义。恩格斯再组织第二国际,又有很大发展。可是恩格斯一死,修正主义又抬头,因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列宁当时是很孤立的。后来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把国际工人运动推向前进。列宁死后又发生修正主义,因为整个欧洲、美洲产生了工人贵族,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高薪阶层。苏联的高薪阶层是斯大林30年代肃反以后产生的。1930年我在苏联的时候,苏联的工资最高的是300卢布,1932年肃反以后,提高了工资,叫做物质刺激,这样就产生了高薪阶层。有了高薪阶层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至于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那是一种偶然性,而产生修正主义是一种必然性。

少奇同志说,如果我们中国搞不好,也会产生修正主义。所以我们提倡干部要参加劳动,每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对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定会胜利的,要有这个信心,因为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世界上90%以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好人,即使他一时受了蒙蔽,最后还是

会觉悟过来的。我们要准备硬着头皮顶十年,像主席所讲的那样,用十年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就比较主动了,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很可能成为新的社会民主党,这恐怕不是十年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发生分化,可能出现列宁主义的派别。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好几种类型。南斯拉夫是一种类型,苏联又是一种类型,而我们又是一种类型。这不是十年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硬着头皮顶上十年,我们经济发展了,粮食过关了,钢多起来了,那就比较主动了。

北戴河会议就是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气氛中结束的。

第七章
斗争与妥协

第一节 胡志明劝和

在北戴河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越南党胡志明主席直接来到北戴河。随行的只有黄文欢和阮春水。他一来到就声明说他是来做说客的，是来劝和的。

中央决定先由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和他谈，谈了两次。胡志明提出一个想法，说他们越南党准备开党的代表大会。在开会之前，他要到苏联去，征求苏共的意见。他可以趁这个机会对赫鲁晓夫做一点工作，希望中苏的分歧能够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胡志明说，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化以后，兄弟党都知道了。接着苏联又宣布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撕毁全部合同。这是一件大事。据他得到的消

息,兄弟党都很焦急。他这次到中国来,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商量,然后再到苏联去。他说,他劝和,希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团结,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他还建议开三个会:先由中苏两党会谈,谈好了以后再开起草委员会。像 1957 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各个洲都派出一些代表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具体商量起草一个宣言。起草以后再开第三个会,就是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通过宣言,团结起来对付美帝国主义。他希望听听中国同志对他这个建议的意见。

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跟胡志明谈的时候,首先讲了从斯大林去世后,从苏共"20 大"开始,中苏两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分歧。然后又讲到中苏历史上的问题,讲到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错误,斯大林不许我们革命,斯大林不相信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说我们可能是半个铁托,以及 1949 年毛主席到莫斯科时在商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过程中苏联所表现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

胡志明听了以后,觉得中苏分歧不简单。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希望中苏两党团结,以大局为重,共同对敌。

在北戴河会议结束的那天(8 月 10 日),毛主席通宵没有睡觉,他一清早就想跟胡志明谈话。在知道胡志明已经到北戴河海边去以后,毛主席也来到海边,跟胡志明一起游泳。两个人在游泳前谈了一阵,游泳之后又谈了

一阵。毛主席到海边不久就叫人请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到海边来一起谈。

毛主席对胡志明说，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我看基本上是好的。我不说它是完全好的，只说它基本上是好的。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们提出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这也很好。但是，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赫鲁晓夫早就有分歧。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毛主席说到这里，胡志明显得非常紧张。

但是，毛主席又说，我们还是赞成采取共产党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内部讨论，不公开去争论，不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其实，赫鲁晓夫早就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赫鲁晓夫叫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分歧公开化。毛主席说，中苏不和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赞成你们劝和，赞成你们当和平使者。

这时胡志明就问毛主席：我们到苏联以后，赫鲁晓夫会问我们中国同志讲了些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把谈过的问题都给他讲呢？

毛主席说，这些问题我们过去都同赫鲁晓夫谈过，我

们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完全可以对他讲。

胡志明说，我打算跟赫鲁晓夫讲中国在四个问题上不同意苏联的意见。第一是关于我们的时代和帝国主义问题，第二是关于和平和战争问题，第三是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第四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他说，我还准备讲，中国同志主张用解决兄弟党之间分歧的正常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毛主席说，完全赞成你的打算。我们的这些意见他们都是知道的。你现在做和事佬，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说一说也好。

这时胡志明又提出一个想法。他说，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步中苏两党派代表会谈；做好准备后，第二步毛泽东同志和赫鲁晓夫亲自会谈。我们这个想法行不行？

毛主席说，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而且，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他们都可以去谈。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话，甚至讲到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中国来。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那样喜欢斯大林，老讲我丢掉一把刀子，那么，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你们那里去好了。毛主席问胡志明：你赞不赞成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

中国来？胡志明说，还是在苏联好，怎么能搬到中国来呢。

最后，胡志明表示，他同意中国同志上面所讲的几个重大问题（就是他讲的四个问题）的意见，对中国提出的批评原则也完全赞成。但是，胡志明说，中国同志是不是对西方同志的性格不太了解，有时候采取的方法效果不大好。毛主席说，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批评的方式。接着，胡志明打个比方说，请人抽烟是把烟递过去，而不是把烟丢过去，递过去人家就接受了，丢过去人家就说你太不礼貌，接受不了。毛主席说，主要是原则，我们要用科学的语言表达意见，发表评论，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这是主要的。当然，方式也要注意。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胡志明说，是不是还可以加上同志式。毛主席说，也要看对什么人，对一时糊涂受骗的人，对一般中下层干部可以作同志式的谈话。列宁对伯恩斯坦就不把他当作同志了。胡志明说，那当然，应该是义正词严。

谈过一阵之后，毛主席建议去游泳。他说，我一夜没睡觉，很疲劳，游泳一会儿可能好一点。于是他们两个人就下海去游泳了。

在毛主席和胡志明下海游泳的时候，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和尚昆同志都来到了浴场。毛主席和胡志明同志上岸后，大家在海滨浴场一起吃午饭，饭后又继续会谈。除了对前面谈过的问题又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

以外，胡志明还希望少奇同志最好在明年春天气候好的时候去越南访问，那时气候适合一点，欢迎规模也可以搞得大一些、热闹些，像过春节那样。

胡志明去了苏联以后，8 月 19 日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听他谈他见了赫鲁晓夫以后苏方有什么反应。

据胡志明说，他在那里把意见都跟赫鲁晓夫讲了。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在主要点上意见是一致的。比方说，消灭帝国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无产阶级革命、搞共产主义，等等。胡志明说，可是当深入一点谈时，意见就不同了。比方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的看法，对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对中国同志有一大堆意见，这是中国同志都知道的。特别是在谈话中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 1958 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他们说，这些都表示中国另搞一套，要跟苏联过不去。他们特别抓住成吉思汗这个问题做文章。

毛主席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把日俄战争时两位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毛主席讲，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毛主席说，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惟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1954年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他还表示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够开好，

能够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好准备。

毛主席对胡志明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 12 日到苏联的，14 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毛主席说，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 8 月 19 日，8 月份还有 12 天，9 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 9 月 29 日或是 30 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 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问题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胡志明表示希望两党会谈越早越好。

不仅胡志明有这个意见，而且波兰党和匈牙利党也向我们表示了这个意见，所以我们党中央常委经过讨论，在 9 月初答复苏共中央同意先举行两党会谈。

第二节　对苏共的《答复书》

北戴河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了几次会讨论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会议同意举行两党会谈，为起

草委员会做准备，同时还确定，在会谈之前我们要对苏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作全面的、系统的批驳，发出我们的《答复书》。

本来，在这之前，按照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这些秀才的主要工作是准备《答复书》，批驳苏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所发的《通知书》。在这个《答复书》中，我们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特别是我们和苏共有分歧的重大原则问题，也包括苏共《通知书》里所谈到的七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同时联系苏共的错误观点，全面地、系统地对苏共歪曲事实、歪曲我们的观点、对我们进行无理的攻击，逐一加以批判。

《答复书》有 12 部分，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党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的所有协议，撤回派到中国的所有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由于我们在前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撰写《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时，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所以苏共在《通知书》里面东补一点，西补一点，但是

依然贯彻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通知书》中矛盾百出。一会儿说时代的性质、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帝国主义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会儿又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能按老眼光对待帝国主义,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一会儿说如果不肯定裁军的可能性就不能够动员群众,一会儿又说裁军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一会儿说苏共对帝国主义从来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但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赫鲁晓夫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爱好和平"。总之,这样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在《通知书》中俯拾皆是。

《通知书》对我们的观点,却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例如,我们认为战争打不打不是由我们一方面决定的,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他们就说,我们低估了和平的力量。又如,我们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们就说我们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其实我们早就讲清楚,我们是在战略上把原子弹、帝国主义看作纸老虎,不怕它,但在战术上要认真对待它,讲究同它进行斗争的方法。毛主席早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就是这样讲的,后来又多次进一步讲清楚这个问题,但他们头脑里辩证法太少,形而上学太多,就是蛮不讲理地指责我们。

在《答复书》里,我们责问苏共,既然你们承认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不能放松警惕,不能麻痹,为什么赫鲁晓夫又大肆鼓吹"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这如何解释呢? 关于和平过

渡的问题,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我们对你们的观点是有不同意见的,所以特别写了一个备忘录给你们。可是你们在《通知书》中却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苏共以为这个备忘录只交给他们,别的兄弟党不知道,可以蒙混过关。所以我们在《答复书》里特别指出,我们同意《莫斯科宣言》的提法是一个妥协,是有保留的,所以才写了那个备忘录。我们的观点就表现在备忘录里。这次我们就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我们交给苏共中央的这个备忘录,作为附件放在《答复书》后面,让兄弟党都知道。

苏共《通知书》里还讲到,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革命可以取得胜利,并举例说日本、南朝鲜、土耳其等国家群众运动兴起,15年来有27个国家取得独立。他们把这些算做是和平共处的结果,说和平共处能够促进革命的胜利。我们批驳他们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的诡辩,指出,这些胜利从根本上说是这些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结果,是人民革命运动,特别是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怎么能算在苏共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账上呢!

他们攻击我们反对谈判,我们在《答复书》里指出,我们跟美国谈判,从朝鲜战争时就谈,一直谈到日内瓦会议,现在还在华沙谈,谈的时间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美国谈判的时间都长。我们是主张谈判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谈判作为我们主要的斗争手段,更不能在谈判中

间放弃原则立场,作无原则的让步。

在《答复书》里,我们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那种像泼妇骂街的谩骂没有理睬,比如他说什么"民兵是一堆肉"、"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北京去";说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说"中国快要出匈牙利事件",等等。但是,对他指责我们老是批评赫鲁晓夫是"挑拨"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我们就回答说,这是因为这几年来攻击中国最多的就是赫鲁晓夫本人,他一共发表了一百多次讲话。我们不驳他驳谁呢?谁叫他讲那么多攻击中国的话呢?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搞什么中苏共同舰队,是他搞大国主义的暴露。苏共在《通知书》里对此讳莫如深,我们在《答复书》里把此事拆穿,指出赫鲁晓夫就是因为中国抵抗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所以才攻击中国。《答复书》中对赫鲁晓夫攻击我们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也做了回答。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期间的宴会上,大骂我们提出"以苏联为首",说"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我们在《答复书》里明确指出,"为首"不等于当老子党,不等于不能批评,不等于一定要跟着你的指挥棒转。

由于我党中央确定中苏两党会谈以便为1960年十月革命节后召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因此我们的《答复书》就不能只限于回答苏共中央的《通知书》。我们在批驳之后,还提出了以团结为重、通过协商解决分歧等五项

建议。这五项建议是：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和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原则，是中苏两党和所有兄弟党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判断是非的准则。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所规定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国际主义原则。

第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兄弟党之间关系中的所有争论，必须根据莫斯科宣言规定，通过同志式的、从容的讨论来求得解决。中苏两国、两党在一切重大的、共同有关的问题上，都应当充分协商，从容讨论，以便取得一致。如果争论一时不能在两党商谈中求得解决，应该继续从容讨论。

第四，中苏两党应该珍惜友谊、共同对敌，而不应当有任何足以破坏两党、两国团结的言论和行动，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第五，中苏两党应当在上述基础上，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协商，开好今年 11 月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

这五条原则针对性是很强的，主要就是在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不能由苏联一个党说了算，要经过协商，有分歧要从容地协商；一次协商不成，再次协商，以达到协商一致；不能采取表决的办法，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一定经过充分协商，大家同意了才能做决定。这

就是说，各兄弟党是独立、平等的，相互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这是当时跟苏共关系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挥动指挥棒指挥一切，我们提出需要时间请示中央也不允许，我们提出要修改一个字也不能。这种横蛮的、霸道的作风不是兄弟党之间应该有的。所以我们抓住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五条原则。

这些意见都是9月7日在毛主席那里开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一致强调的，而且根据这些意见在会上就把《答复书》修改定稿了。定稿以后，由专家翻译组把《答复书》全部校译好。在10日由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这个《答复书》交给他；同时通知他，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准备在15日动身去莫斯科，跟苏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三节　中苏两党会谈

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我党代表团，由小平同志任团长，彭真同志任副团长，一行有几十人，代表团成员中包括联络部和外交部的负责人，还有一批秀才，因为要准备可能有激烈争论，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需要准备材料。这次我没有去，因为毛主席交代要留些秀才在北京做后方支援。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有这种愿望，希望不要再吵下去，还是要团结。他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代表团是9月15日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的。因为从安全考虑，如果同坐一架飞机，万一发生事故，那损失就太大了。小平同志和定一同志等坐一架飞机，彭真同志和其他同志坐另一架飞机。小平同志乘坐的飞机当天就到了莫斯科，而彭真同志乘坐的飞机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后，因为天气不好不能直飞莫斯科，只好改坐火车，第二天（16日）才到达莫斯科。

中苏两党正式会谈从9月17日开始。苏方代表团是以苏斯洛夫为首，包括新到苏共中央工作的科兹洛夫，还有安德罗波夫、波斯别洛夫。我们参加的是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定一同志和康生。

第一天会谈开始，苏斯洛夫抢先讲话，一方面说表示

愿意消除分歧；另一方面又说，初步研究了我们的《答复书》以后，认为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他指责我们在《答复书》里面讲了很多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考虑苏共的意见，是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对苏共最严重的攻击。

接着他就对我们的《答复书》作长篇大论指责，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是我们原来估计到的。我们代表团在出发之前就估计他们看了我们的《答复书》后是咽不下去的，可能在会谈中直接就我们的《答复书》进行争论。我们做好了应战的准备。鉴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向所有兄弟党散发了他们的《通知书》，我们的这个《答复书》也准备要发给所有兄弟党。

苏斯洛夫这么抢先讲了一大套以后，气势汹汹地说，这还是对中共《答复书》的初步评价，他还有话要讲。当然，最后他也说了一些希望能够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套话。

苏斯洛夫抢先作长篇讲话，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屈服于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施加的压力，没有屈服于他们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的压力。他还振振有词地对我们在《答复书》里批判苏共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一系列错误观点，一一加以狡辩。

针对苏斯洛夫的长篇讲话，小平同志作了答复的答复。小平同志说，你们那个《通知书》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的这个《答复书》是由你们那个《通知书》引起的。你们不仅有那个《通知书》，而且还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扩大到

国家关系上，采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一系列严重的行动，所以我们的《答复书》不能不提这些问题，不能不就这些问题做出回答。现在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但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们的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质问他们：你们究竟要把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引到什么地方去？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做出认真的答复。

第二次的会谈在19日举行。这次又是苏共方面先讲，但不是苏斯洛夫讲，而是由科兹洛夫讲。科兹洛夫原来是列宁格勒的书记，在苏共“21大”时才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

科兹洛夫同样是指责我们的《答复书》，认为我们的《答复书》是严重的，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分歧并不是苏共引起的，而是中共引起的。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不指名地指责兄弟党，攻击苏共。他举例指出《人民日报》的一些文章，《贵州日报》一篇《边干边学》的文章和《红旗》杂志刊登的《思想解放》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并没有指名兄弟党，只是正面讲一些道理，当然其中有些观点是与苏共不同的，并非有意同苏共论战。

科兹洛夫还讲到，中国党为什么把过去的分歧又提出来，为什么要挑拨苏联跟波兰、匈牙利的关系。因为在我们的《答复书》里面讲到，我们过去在苏共困难的时候，本着团结的愿望，为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曾帮助苏共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科兹洛夫却把我们讲要跟波

兰搞好关系和不能抛弃匈牙利的意见，看成是挑拨他们跟波兰、跟匈牙利的关系。这完全把事实颠倒了。

科兹洛夫还讲到苏共“20大”的问题。苏共“20大”之后，我们《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评论文章。我们在《答复书》里批评他们对待斯大林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没有分析，一棍子打倒斯大林，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使亲痛仇快。科兹洛夫在讲话时就为这个事情辩解、抵赖。他说这跟批判斯大林没有关系。其实，苏共中央自己后来也发现继续那样大反斯大林不妥，所以1956年7月间苏共中央全会做了一个决议，纠正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一些错误。科兹洛夫要赖账，认为是我们对他们的攻击，还说是我们制造思想混乱，诋毁他们党的领袖赫鲁晓夫。

最后他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谈问题的实质，如时代、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等等。其实我们的《答复书》正是就这些问题批评他们的，其中列举很多具体事情证明他们是违反1957年《莫斯科宣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兹洛夫这么长篇发言后，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做了针锋相对的发言，反驳科兹洛夫。他们一致指出，不要诡辩，不能逃避事实，必须面对事实。苏共中央犯了错误，错了就是错了，应该承认。他们分别就科兹洛夫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逐个地给以回答。这时，苏共方面沉不

住气了。安德罗波夫、波斯别洛夫都起来插话，苏斯洛夫也面红耳赤，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轮番辩驳。最后，小平同志提出，今天会谈休会，对苏方两个发言，我们将做系统的答复。19日的会谈就此结束。

9月20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小平同志做系统的发言，主要是批驳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在前两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敌我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兄弟党的关系问题。

小平同志从历史上讲到苏共中央在朝鲜战争以后，在刚果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误，特别强调了在塔斯社声明之后美化反动派，攻击兄弟党。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更是这样，赫鲁晓夫大捧艾森豪威尔，骂中国"要试探资本主义稳定性"，说中国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在一系列问题上颠倒了敌我关系。

小平同志指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上，他们搞的是父子党，要各兄弟党都得听苏共的。中国不听，他就要控制中国。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共同舰队的问题、长波电台的问题、撤专家和撕毁全部协议的问题、封闭《友好》杂志苏联发行的问题、要挑起边境纠纷的问题，还讲到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大骂中国党、大骂毛主席，等等，统统讲出来了。

小平同志声明说，苏联撤专家、撕毁协议，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屈服。我们要自力

更生，用自己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小平同志在发言中一直没有提出要苏联赔偿毁约的损失问题，只强调我们要自力更生弥补这些损失，而且要还清欠苏联的债务。

小平同志还义正词严地责问苏方：你们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什么方向去？小平同志列举出一系列事实责问苏方的时候，苏方无人回答，苏斯洛夫脸都红了。最后，小平同志表示，希望苏联能够改变态度，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我们之间的分歧。

苏方原来准备一个共同声明草案，但会谈了三次，整个气氛非常紧张，他们不敢也没心思拿出这个声明草案来讨论。

第三次会谈以后，我党代表团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会谈实在很难继续下去。代表团认为，既然现在苏联没有准备冷静地坐下来讨论问题，不妨把问题推迟到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经过请示中央后，在21日的会谈中，我代表团提出：在目前情况下，中苏两党的分歧很大，一时也难得谈妥。现在离起草委员会开会日期不远，可以考虑两党会议就此告一段落。没有解决的问题到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再谈。苏方代表团在交头接耳商量一阵之后，也表示同意。看来他们也并没有准备在这次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仍想在更大范围的会议上以多数逼迫我们屈服。9月22日我党代表团启程回国。这样，9月间的中苏会谈，在大吵一顿之后，无结果而散。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每天都把会谈的情况用电

报发回来。毛主席曾多次主持常委会议,讨论代表团的报告和请示,并电复。代表团回国后,9 月 24 日向中央常委作了扼要的汇报。

在汇报会上,毛主席讲了一番话。他说,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需要团结,苏共也需要,因为分裂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也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因为苏方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训斥兄弟党,像老子训斥儿子那样,不习惯在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布加勒斯特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只有他们讲的机会,没有我们讲的机会。这次你讲我也讲。争是争了,但问题没有解决。在布加勒斯特,他是要把中国孤立起来,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中国党不屈服,别的一些党也不赞成。

毛主席说,全世界共产党像十个手指一样不是一般齐,估计有相当多的党希望能够调和、妥协,能够达成一个大体上过得去的协议。即使如此,苏共还是要继续孤立中国党。对此我们不怕,要做最坏的准备,准备他们采取 1948 年对待南斯拉夫党那种办法,把中国逐出教门。当然,估计他现在还不敢,因为中国不同于南斯拉夫。但现在这种斗争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修正主义的这种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泛滥一个时期。当然,它也不会永远这么下去,会发生变化。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

前途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的方针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要放手斗,但以不破裂为原则。将来在26党的起草委员会上,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在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时也采取这个方针,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的方针是坚持斗争,以不分裂为限度。如果他硬是要分裂,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方针还是争取达成一个过得去的协议。放手斗争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斗是为的达成协议,而不是为的要分裂。如果赫鲁晓夫要分裂,那就充分暴露了他,责任在他们方面,不在我们方面。因此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也觉得代表团在莫斯科斗得好,抓住要害,猛攻一顿,最后双方还是同意以后继续谈,没有破裂。但是,要准备在26党的会上斗争会更加复杂、更加激烈。

第四节 起草委员会争论不休

有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从10月2日开始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讨论为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

会议讨论的声明草案是由苏共准备的。由于我党给

苏方《答复书》中和中苏两党会谈中,批评了苏共的不少错误观点,所以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修修补补,加了一些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观点,也删去了一些有明显错误的观点。但是,这个草案仍然包含了许多错误的观点。

起草委员会上争论很激烈。争论的问题大致同中苏两党会谈时争论的问题差不多,还是围绕那些问题如何修改苏方草案的问题。凡是我们坚持删改的,苏共就力争保留,而且动员他们的党羽帮腔。当会上有几家支持我们的观点时,苏共才不得不修改,但又经常在修改中玩文字游戏,似改非改。经常是一次修改不满意,我们再攻,苏方再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修改。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很慢,声明草稿改动非常多。对于有重大错误的观点,我们据理力争修改。但是苏共仍然坚持。

特别是赫鲁晓夫从参加联合国大会回来以后,苏方更加坚持他们的错误观点,而且把他们过去已经同意修改的也推翻了。苏方在草案里安了不少针对我们的"钉子",主要有四个:第一,肯定苏共"20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不指名地攻击"派别活动",这是苏共指责所有不听从它的指挥棒的兄弟党的借口;第三,谴责个人迷信,这是苏共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借口,引起了许多兄弟党的反对;第四,鼓吹世界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苏共认为时代已变、帝国主义本性已变的逻辑结论。

赫鲁晓夫是10月中旬到联合国去的,他不仅自己

去，而且还纠合了东欧六个国家的首脑去。他在纽约两次要求会见艾森豪威尔都遭到拒绝，所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大闹一场。

起草委员会开了三个星期，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同意的声明草案。许多兄弟党的代表提出要向他们的党中央报告，才能决定最后的态度。会议于是决定告一段落，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争论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起提交11月间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苏两党会谈，特别是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们代表团去的人比较多，因为估计文字工作任务很重，所以大部分秀才都去了。这两次我都没有去，我跟陈伯达留在北京，主要任务是根据代表团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商量哪些需要修改，并提出修改意见，经中央常委讨论后再发电报给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当时我看出陈伯达有点不高兴。他说陆定一、胡乔木、康生他们都去了，他留下来没有什么搞头。他对代表团报来的意见特别挑剔，提了很多很琐碎的意见，但在毛主席召开的会议上被删改了许多。中央给代表团发去的电报只提一些比较重要的、带原则性的意见，对那些比较琐碎的意见就不提了，有些还授权代表团酌情处理，不一定按电报写的那样做。

起草委员会由于苏方代表出尔反尔，争论不休，因而直到十月革命节前夕仍然不能就80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共同声明草案达成一致的协议，只好在举行大会的同时继续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第五节 大会首轮较量

我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少奇同志为团长，小平同志为副团长，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大批顾问，包括冯铉、我、乔冠华、熊复、姚溱、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刘宁一和廖承志两位经常参加国际群众组织的活动，跟亚、非、拉和西欧、北美许多党的同志比较熟悉。冯铉同志过去是驻日内瓦大使，经常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兄弟党有来往。原先决定我留在北京的，在后方支援前方，出发前由于确定少奇同志在会议后以国家元首身份在苏联作正式国事访问，要发表几次重要讲话，人手不够，最后还是要我也去了。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对当前局势作了分析。大家认为从中苏两党会谈和26党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仍然顽固地要

贯彻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仍然坚持要把我们压服。在81党会议上，他更可能凭借更众多的所谓多数，对我们进行轮番围攻，力求把我们压服。但是，他是否准备破裂还很难说。因为中国党不是小党，不是可有可无的党，而是在国际共运中处于重要地位，有广泛影响。同中国党决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会大大削弱，国际共运对亚非拉的影响也大大削弱，因为这些地方的兄弟党中许多比较重要的党的立场都是同中国党接近或者基本一致的。而西欧、北美的兄弟党虽然有许多观点同苏共一致，但在是否同中国党决裂这一点上是不会随便附和赫鲁晓夫的。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他也不能不考虑苏共党内和苏联人民中对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因此，赫鲁晓夫不敢至少很难下决心在81党会议上决裂。毛主席强调指出，81党会议会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可能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会议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要求代表团本此方针，相机行事，重大问题电报北京请示中央，并授权代表团在情况紧急时先行处置，事后报告。

少奇同志是11月5日早上乘坐苏联图-104飞机动身的，跟他一起的有小平同志、尚昆同志、乔木同志、定一同志，我和乔冠华也跟他们同机。因怕气候不好，在少奇同志动身之前，由彭真同志带领代表团其他人员在4日

先行飞莫斯科。

少奇同志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去迎接了。这是例外的,也是赫鲁晓夫仅有的一次出面迎接外国党的代表团。勃列日涅夫去迎接是因为少奇同志是国家元首,当时勃列日涅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代表团到了以后,分住在列宁山上的三栋别墅里。苏联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兄弟党的第一把手,一般都是安排在列宁山的别墅区,惟一例外的是1957年毛主席访苏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里面。

从开头的情况看,苏联方面还是很客气的样子,让我们住三座别墅,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三人分别各住一座。

苏联的这些别墅很特别,也反映了苏联的首长制问题很突出。团长是第一位的,住的房子有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弹子房、电影厅,还有餐厅,这样一幢两层楼的别墅被这些房子占去了大部分,其余的房子都是很简单的,只有一个卧室、一个洗澡间,是给代表团的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住的。其他随员只能在楼下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而且楼下也只有两个洗澡间和厕所,很不方便。

开始分配我跟陆定一同志住在少奇同志那里,甚至要陆定一同志和我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陆定一同志的秘书住在楼下。我觉得很不妥,向代表团的秘书长尚昆同志建议,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尽可能住到大使馆去。因

为当时我们的大使馆除了主楼以外，还有两个配楼，是刚建起来，准备接待过往客人，当招待所用的。另外，苏联的宾馆都有窃听装置，住在那里非常拘束，讲话很不方便，代表团商量问题都不能在别墅里。我们住到大使馆去，就可以在使馆里另辟一个房间，安装保密装置，在那里议事也比较保险，而且活动也比较自由，还可以吃中国饭菜。尚昆同志觉得这个主意好，他同小平同志商定，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必要的翻译住在别墅，其他顾问、秀才和翻译都住到大使馆去。

我们住在大使馆里，对大使馆大师傅烧的猪蹄子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东西苏联人不吃，市场上价格特别便宜。我们大使馆大师傅买来做成红烧猪蹄子，非常可口。晚间秀才们聚到一起，喝两杯，吃猪蹄子，作为夜宵，也怡然自得。当然，有时候我们想吃点西餐、喝点洋酒，或者想多吃点水果、糖果，或者想吃苏联特别招待贵宾的东西时，就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那里去。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平常也觉得冷清，吃晚饭老是那么几个人，多一些人也热闹一些，所以我们有时候到那里吃晚饭或者吃中饭，热闹非常。

在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以后的开头几天，苏联方面还制造了一些假象，外表上好像对我们代表团非常客气、要讲团结的样子。

少奇同志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致欢迎词并不怎么热烈，但是在少奇同志致答词时热烈鼓掌达四

次之多。特别是少奇同志讲到中国和苏联共有八亿六千万人口,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时候,欢迎群众鼓掌非常热烈。这反映了当时他们的心理,就是说他们既要整我们,又不想破裂,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表现是这样的。

我们代表团一到莫斯科,少奇同志对苏方迎接人员表示,我们来是为着开好莫斯科会议,是为着要加强中苏团结。如果会议开得好,少奇同志还准备作国事访问。少奇同志到莫斯科第二天去拜会赫鲁晓夫的时候,赫鲁晓夫也大讲中苏团结。他说我们两方谁也离不开谁,争吵是免不了的,有时候也会抓掉几根头发,但总还是要团结的。可是,他一转话题就大骂阿尔巴尼亚。他说苏联丢掉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损失,中国得到阿尔巴尼亚也收获不大。他还讲了一些很恶劣的挑拨离间的话,而且大骂斯大林。少奇同志回答他说,你们这样一个大国,对阿尔巴尼亚那样一个小国,一点肚量都没有,怎么能以你为首呢?你是老大哥,应该宽宏大量一些,何况阿尔巴尼亚并不是错了呢!赫鲁晓夫不仅讲了阿尔巴尼亚,还公开表示不赞成我们的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并说希望"你们不要强加于我"。少奇同志说,这些事情我们在国内正在试验,说完全成功还早,说完全不成功也太早。我们没有一点意思要强加于人,这完全是我们中国的事情。但是,你们实际上是公开批评了我们,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很不慎重的。这样,少奇同志把赫鲁晓夫驳回去了。从这次谈话里面看,赫鲁晓夫的表现是要挑起争论的。

在晚上宴请中国代表团的时候，赫鲁晓夫又大谈斯大林，谈得眉飞色舞。他说，列宁是圣人，斯大林是强盗，列宁是我们苏联人的，斯大林不是。他还说，有人说我赫鲁晓夫很孤立，说苏斯洛夫和米高扬都是我的敌人，这完全是造谣。赫鲁晓夫在宴会中讲这些话，说明他们在开始欢迎我们代表团比较热烈是一种假象，在他的心里还是要整中国，还是要挑起争论的。他甚至可以把假象做到公开给外国人看的程度。在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阅兵和游行的时候，他让少奇同志首先登上列宁墓，他自己走在第二，并且把少奇同志放在勃列日涅夫和他之间。在庆祝大会上，科兹洛夫做报告时，既没什么新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带刺的东西。这些假象意在给人造成一种好像苏方还是要团结的。但是，从赫鲁晓夫在会见和宴请我们代表团的那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心怀鬼胎的。果然，到庆祝活动完了以后，苏斯洛夫对小平同志说，他们将要答复我们的《答复信》。他还说其中有些辣椒，因为中共的《答复书》中间有许多辣椒。

红场阅兵式以后的当天下午，安德罗波夫（他当时是苏共中央的联络部长）把苏方的《答复信》送来了。他还解释说，《答复信》是一回事，开各国共产党会议又是一回事。其实，两回事是一回事，他们《答复信》中对我们的攻击，也就是后来他们在兄弟党大会上对我们的围攻。7日晚上我们跟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接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苏联组织人向他们轮番围攻，首先是12个社会主

义国家党中几个同苏联站在一边的东欧兄弟党，先后拜访他们，轮番围攻。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表示，他们决不屈服。从这里可以看到，开头的这些征兆说明，一场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整个会前情况，特别是他们交出的《答复信》来看，我党代表团估计暴风雨即将来临。

收到苏共送来的《答复信》以后，我党代表团立即组织翻译，翻译一页大家传看一页，工作非常紧张。苏共对我们《答复书》的《答复信》，一方面是采取防御的姿态，为自己辩护，并对他们自己说过的话进行抵赖，说他们没说过这样的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我们大肆攻击，特别是攻击毛主席，也攻击少奇同志。它还挑拨我们跟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说我们对阿尔巴尼亚怎么样，对波兰、对匈牙利怎么样，对其他党的内部纠纷（比方对澳大利亚党、美国党内部的纠纷）怎么样，等等。总之，说我们在兄弟党间制造分裂，挑拨我们跟兄弟党的关系。在他们的《答复信》里还特别着重攻击阿尔巴尼亚，其实矛头也是对着我们的。整个《答复信》态度非常恶劣。他们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前夕散发这样一封《答复信》，就是要制造紧张气氛，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在会议中向他们屈服。

代表团看了苏共的《答复信》以后，就确定要加强我们原来准备好的在大会上发言稿的内容，把调子提高，同时要回答他对少奇同志的攻击。少奇同志过去在讲到毛

泽东思想时曾经说过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苏共《答复信》不指名地攻击少奇同志,说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这显然是他们知道少奇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会议后有意的挑衅。

代表团确定,我们在会议上的讲话,针对他们的《答复信》,应着重讲四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我们原来的稿子上都有了,但要加强。第一,讲中苏之间的争论从何而来;第二,讲争论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争论;第三,讲中苏关系时,既要表示我们的团结愿望,又要说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发展到今天如此恶化地步,首先是由苏共挑起和造成的;第四,要强调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是平等的、独立的、协商一致的,不是父子党,不是指挥棒一统天下。发言的整个调子要采取哀兵的方针,着重说明我们是受攻击的,我们是受欺负的。我们本来是为团结而来开会的,但是就在开会前夕,苏共制造了这么一种空气,使我们心情很沉重,处境很为难。我们认为,苏共在会前散发这样的《答复信》,是破坏这次会议的恶劣手段。

代表团确定对发言稿要作修改后,秀才们就连夜分头修改,每人改一段,最后由乔木同志统改一遍,然后在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再根据他发言的情况加以修改。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代表团成员和顾问分头同各兄弟党广泛接触。看来不少兄弟党是不赞成苏共那一套的。他们也收到苏共给我们的《答复信》,有些兄弟党明

确表示支持中国党，并希望我们在会议上有针对性地批评苏共的错误，更多的兄弟党表示不赞成双方互相指责，既不赞成苏共这样指责中国党，也劝中国党不要以牙还牙。我们问他们，苏共已经先对我们发动攻击了，怎么办？他们说，你们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就算了，还是团结合作把这个会开好。一些党表示，会议通过宣言时，一定要一致同意才能签字，不一致同意就不签字。

从这几天和各兄弟党接触中得出一个印象，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是相当多的党都希望团结，希望开好这次会议，不要再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大吵一场。当然也有不少党在苏共指挥棒指挥下，准备跟中国党大吵。

在开会的前一天(11 月 9 日)，苏联方面还要了一个花招，想麻痹我们。那天下午，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米高扬三个人一起到我们代表团住处来。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他们谈话时，他们说，赫鲁晓夫明天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强调团结的，口气是友好的，不涉及中苏争论的问题，只谈声明草案中间的有关问题和苏联的国内问题。他们三人反复讲这个意思，并且表示，苏共不希望在会议上挑起争论，从现在起就转向团结，向前看，不向后看。他们的复信是了结过去的事，现在会议是另外一回事，不要把开会和他们的《答复信》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应该共同对敌，通过会议文件。苏共也愿意跟阿尔巴尼亚党改善关系。希望中共了解苏共这样的愿望。更为恶劣的是，米高扬在最后还说，我们开完这次会议以后就专门来

谈中苏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援助问题、专家问题，要好好把这些问题解决。苏联还是要继续援助中国建设的。停止石油供应的事情苏共主席团并不知道，很快就可以恢复供应。只要中国不再向苏联专家散发反对苏共中央的文件，苏联可以继续派专家。

他们这么说是想把我们骗住。但是，小平同志很明确地跟他们说，我们原来就是要团结的，我们是带着团结的愿望来的，希望能够消除过去的分歧，能够开好这次会议，能够达成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协议。但是，你们11月5日的复信毒化了会议空气，是苏共首先发难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在会上作答复。你们不援助我们，你们不派专家，我们还是跟你们讲友好。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

同苏斯洛夫等谈话以后，代表团齐集我们的大使馆开会。估计苏共可能感到他们散发给我们的《答复信》反应不太妙，引起了兄弟党的不满。他们有点恐慌，想来哄骗我们吞下他们的复信。代表团研究了这种形势以后，认为我们不要上当、不要受骗，既然他们挑起争论，我们就乘势反攻，把争论端到大会上去，这样有利于团结左派，争取中派，孤立右派。代表团确定采取攻势，把整个发言的调子提高，要在大会上跟他们论战，要使赫鲁晓夫下不了台。

这就是会议之前的状况。

有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1960年

11 月 10 日下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开始。

会议首先由苏斯洛夫讲话。他说他是代表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起草声明的经过。但是，他在报告里面只谈苏方的观点，不谈或者少谈不同意苏方的观点，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的观点。他在讲话中只说苏共方面认为，或者笼统地说"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同意什么什么的观点，"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什么。而且他在报告中甚至把已经达成协议、后来又被他们推翻了的东西又提出来，并只讲他们一方的理由。他讲到起草过程中有分歧，但他又不说那些有分歧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意见是什么，双方的理由是什么。他的这种做法，是企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少数、几个、个别的不赞成声明草案。对于苏共有意安在声明草案里面而争论最激烈的几个大"钉子"（就是上面说到的四个大钉子），他却用完全肯定的口气来讲，似乎可以照草案的写法通过。

苏斯洛夫汇报后宣布休息 15 分钟，然后复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赫鲁晓夫。他一共讲了两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基调根本不是要缩小分歧、寻求团结，而是借题发挥，不指名地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攻击。赫鲁晓夫的发言一共讲了 11 点。

第一，他说，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都不符合当代的实际。

第二，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协作，单独建

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

第三,他说,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有个别错误,有粗糙的现象。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作的自我批评只说到这个程度。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能不说的,因为他对波兰也好,对其他国家也好,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他这么说是为着消那些党的气,拉他们一把,同他一道攻击中国党。

第四,他说,帝国主义的局部战争、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他一方面说不能说不要害怕战争,一方面又大谈核战争的恐怖。

第五,他坚持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这样,他就把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支持各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都排除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外。

第六,他坚持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是反映人类的最高理想。

第七,他强调新独立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第八,他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说现代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变成为人民的议会。

第九,他强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民族主义越来越重要,说南斯拉夫的主要特征是民族共产主义。

第十,他不顾 1957 年莫斯科宣言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硬说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会成为主要危

险，特别是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行动等等。他还特别强调要反对派别活动，不仅在各个党内部，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反对派别活动。

第十一，他还提出不要再写以什么“为首”，并说苏共当不了头。但是他又提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之间应该“对表”，就是说要同苏共“对表”，跟它保持一致。

赫鲁晓夫讲了这么一大堆意见，很明显是要挑起争论，要组织听他指挥棒的党在这些问题上围攻中国党。

我党代表团当天晚上在大使馆商量，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在报告里面讲的差不多大部分都是攻击我们党的，虽然他没有指名，但是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苏共11月5日散发的《答复信》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散发的《通知书》中指名攻击中国党的，就是赫鲁晓夫发言中不指名攻击的那些问题，谁都明白赫鲁晓夫指责的是中国党。因此代表团决定，我们在会上的发言调子要再提高，要公开指名跟赫鲁晓夫展开争论，要让到会的兄弟党都知道我们的观点立场是怎么样的。代表团还根据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少奇同志在第二线，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第一线的方针，决定我代表团第一次发言由小平同志来讲。由我们的副团长对付他们的团长也很有意思。发言的稿子还是在我们修改过的稿子的基础上，增加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提到而我们原来的稿子没有触及的那些问题，针锋相对地回答赫鲁晓夫。

11 日大会继续进行，有 11 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言。12 日上午大会也继续进行，有 7 个党的代表发言。其中荷兰党的总书记鲁克曼旗帜鲜明，尖锐地批评修正主义，主张维护团结。

从 12 日下午大会休会，13 日又休会一天。14 日复会的时候，上午，金一同志代表朝鲜党发言。他的发言和别的代表不同。他在发言中两次提到中苏为首，两次提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的经验对落后国家有重大的意义，确信中国党是忠于革命和忠于国际主义的。然后，他详细讲到他们国内建设中反对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他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反对提出宗派主义，强调各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要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金一的长篇发言占了整整一个上午。

按原来议程安排，我党代表团在 14 日下午发言。这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整个乔治大厅坐得满满的。苏联方面除了他们的代表团成员以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到会了。在小平同志的整个发言过程中，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鸦雀无声。

小平同志发言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在 9 月 10 日给苏共《答复书》里的内容，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的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

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也是苏共。小平同志接着指出：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的他就打击你，压迫你。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谈到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小平同志说，1956 年苏联准备出动军队压服波兰，干涉波兰共产党内部事务，要波兰党听从莫斯科的决定组织政治局。当时我们坚决反对，后来跟苏联党和波兰党在莫斯科分别会谈，才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们是帮助苏联做好这件事情，推动他们搞好跟波兰的关系的。但是他们却反过来恨我们，一直恨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小平同志还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他说，苏共原来是要从匈牙利撤兵的。当时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知道此事后劝苏联不要抛弃匈牙利人民不管，不能置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于不顾。当时他们不听，说什么也要从匈牙利撤兵。只是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接受我们的意见，重新派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

小平同志说，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是帮了苏联同志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一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他多次说我们给他上大课，特别是咬牙切齿地讲周恩来同志 1957 年 1 月间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时在莫斯科给他们上大课。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兄弟党之间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

义、老子党的态度，挥动指挥棒要大家都服从他，就是他说的所谓"对表"。试问，这能"对表"吗？能够跟赫鲁晓夫一起走吗？小平同志说，我们曾经想过，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他走吧。但后来考虑，不能跟他走，跟他走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就要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违反国际主义，同时我们也对不起苏联人民呀！小平同志讲得很恳切，会场上静悄悄的。

小平同志还讲到，赫鲁晓夫对我们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帝国主义却那么爱，对我们的敌人极尽美化之能事。小平同志列举了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见面前后大肆吹捧艾森豪威尔，说他（艾森豪威尔）"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小平同志还提到，赫鲁晓夫对敌人的这种观点早在1955年9月跟阿登纳会谈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当时对阿登纳说，中国人口太多，发展起来不得了，那样就会发生"黄祸"。他要阿登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付中国。小平同志说，他这种认敌为友，以友为敌，跟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付自己的朋友，对付自己的同志、兄弟，我们能够跟赫鲁晓夫同志"对表"吗？

小平同志把这些问题都公开摆出来之后，还说，还有别的问题，要讲还可以讲，但今天不想讲，以后有机会再讲。事情多着呢。赫鲁晓夫的错误多得很，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可多啦，不止这些。

小平同志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出国之前，毛主席交待这次莫斯科会议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完，要留一手。

有一些事情先不要讲，比方抗美援朝的问题、共同舰队的问题、长波电台的问题、要在中国驻扎苏联空军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小平同志发言时都没有讲。

小平同志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这是因为我们的调子比赫鲁晓夫高八度，他没有指名，我们公开指名，把问题揭开了。所以各代表团反应很强烈，中立倾向的非常担心，左派认为讲得好，就是要这样攻他。其实赫鲁晓夫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指名攻击中国，我们这次在莫斯科只不过是照样回敬而已。

15日上午继续开会，有些党的代表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在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党。在15日发言中六个党的代表指名批评我们。

16日大会继续发言，有八个党的代表发言。其中阿尔巴尼亚党的霍查发言时，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充分揭露赫鲁晓夫搞大国主义，干涉阿党内政，搞颠覆活动。他指出：苏共中央违背国际主义的原则，以断绝对阿援助相威胁，对阿党施加压力，背弃列宁主义，背叛十月革命。他讲得非常激动，列举苏共的错误事实非常具体，也是放了一个大炸弹。苏方也非常紧张。

还有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在跟我们接触时，纷纷表示一定要搞一个一致协议的宣言，如果不是一致同意的他们就不签字。这样一来，会议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我们把问题全摆到大会上去，充分揭露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让大家来评

论，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尽管在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下，有不少人攻击我们，但是讲来讲去没讲出多少道理，等于谩骂，以致引起一些立场处于中间状态的代表团不满，要求不要再采取这种方式开会，要真正协商解决问题，要好好协商，搞一个一致同意的协议。总的看来，第一个回合我们打了胜仗。

第六节 压服与反压服的斗争

我党代表团在 14 日晚上和 15 日晚上接连开会分析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苏共仍然坚持采取压服的方针，想造成多数压少数的这么一种气势，逼使我们屈服。在赫鲁晓夫发言后，许多跟着他指挥棒转的兄弟党代表发言，都蛮不讲理，乱骂一阵。甚至有些过去对苏联意见很大、得到我们帮助的兄弟党的代表发言时，也跟着起哄。代表团认为，这一方面由于苏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有共同点。看来苏共的方针是要压服我们。这可能是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可以重演去年布加勒斯特的故伎，利用更大范围的多数，以达到在布加勒斯特没有达到的目的。

代表团还注意到，一些态度处于中间状态的兄弟党很担心，很忧虑，他们生怕会议破裂。他们对苏共指挥的一些党的代表在会上根本不讲道理，采取肆意谩骂、乱扣

帽子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有些党的代表向我们表示，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开会。苏共越是这么搞越引起他们不满。这是一个情况。

代表团还注意左派兄弟党的反应。有些党一方面感到我们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很痛快，替他们出了气，另一方面又感到事情发展下去不好办，如果会议破裂，后果是严重的。他们对这一点思想准备不足，希望中苏两党能够妥协。

根据这些情况，代表团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代表团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现在斗争已进入指名攻击我们党的关键时刻，许多党的代表已指名说我们党搞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搞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声明草案中间虽然没有指名，但都提到这些指责，很显然是针对我们党的。因此代表团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在起草委员会中，我党代表团要公开宣布，我们代表团绝不在指责我们党的声明上签字。声明草案上虽然没指名，但是会议上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中还是把声明草案中提出的罪名加在我们党头上。如果不删掉这些指责和罪名，不拔掉这些"钉子"，我们党绝不签字。我们要通过各个联络员分头把这一决定正式地公开地向各兄弟党代表团讲明，宣布我们的坚决态度。

第二，代表团要准备会议破裂，因为如果苏联坚持不拔掉这些钉子，我们不签字，会议也就破裂了。所以我们要有破裂的充分思想准备，面且要把一切活动放在不怕

破裂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用少奇同志的话来说，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不怕破裂。

代表团认为，我们只有采取这两条鲜明的、坚决的方针，我们才能够争得主动，才能够给苏方施加压力，也才能够争取中间派，坚定左派对苏方进行斗争。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动动摇摇、态度不鲜明、害怕破裂，那我们就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中间派就会倒到右派那边去。右派就会更加嚣张，左派也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这两项决定事关重大，要请示中央。所以代表团在15日晚上急电中央，请示是否可以采取这样的方针。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从北京直接打电话到我驻苏大使馆找杨尚昆同志（他一直呆在大使馆等候中央复电），先询问代表团的生活状况，然后只说一句话："已商量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在电话里只能这么简单地说，因为苏方肯定在窃听。

得到中央批准后，代表团决定代表团中所有人员，在16日、17日、18日分头同西欧的、拉丁美洲的、亚洲党以及东欧兄弟党的代表团接触，向他们宣布我们的坚决态度。我代表团中那些过去同一些党比较熟悉的廖承志、刘宁一等同志，还有联络部的过去在世界学联、青联、工联工作过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各种语文翻译同志都纷纷出动。经过三天的活动，左派态度更加坚决，他们说要坚决把声明草案中的钉子拔掉；中间派也考虑劝说苏共让步，跟中国党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那些跟随赫鲁晓夫走

的右派也没有那么神气，表现得很沉闷，可能是他们也考虑会议破裂的后果。至于苏共方面，他们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连续几天脸色阴沉，似乎心事重重，碰到我代表团人员都装着看不见，既不打招呼，更不谈话。

81党会议，从11月10日到11月22日，除13日和20日休会以外，每天上午、下午都开会，各个代表团的团长或者他的代表轮流上台做或长或短的发言，表明他们的立场。据统计，包括苏共和中国党在内，一共有77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在这77个发言中，完全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一共有51个党的代表；态度中间的有15个党的代表；基本上反对赫鲁晓夫观点的有11个党的代表，包括我党在内。跟随赫鲁晓夫的那50个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有些态度非常恶劣。

我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会议上作第二次发言时决定对这些发言中所有造谣诬蔑和极其错误的观点，统统都要驳回去，但除点赫鲁晓夫的名外，其他人一概不点名。其实，其他人的观点，也就是赫鲁晓夫的观点的翻版。批驳这些观点，也都批到赫鲁晓夫头上，虽然他在会上第一次发言中没有提出来。

代表团还决定，我们第二次发言也要排在赫鲁晓夫的第二次发言之后。代表团估计，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批驳了赫鲁晓夫，而且列举了很多属于他本人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动，赫鲁晓夫吞不下去，他还会像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那样作第二次发言。所以我们的第二次发言

要安排在赫鲁晓夫发言之后,看看他还有什么新东西,以便我们在第二次发言的时候再把他驳回去。

代表团还决定,我们的第二次发言仍然由小平同志来讲。苏方什么事情都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面,嬉皮笑脸的是他,泼妇骂街的也是他。现在我们的团长不出面讲话,留有回旋余地,比较主动,而用副团长来同他们团长对阵,也包括藐视他的意思。

在这个期间,苏共代表团也加紧活动。他们派出大批研究各国情况的科学院院士,分别向各国党代表团做工作。谁态度模糊一点的就找谁,搞车轮战。谁不赞成他们意见的就找谁,纠缠不放。美国党的狄克逊给他们纠缠得病倒了,进了医院。澳大利亚的夏基也给他们纠缠烦了,最后只好说:我要休息,你们别再来缠我了。这样才把他们赶走。他们就是这样厚着脸皮四处做工作。

代表团估计,苏方除了准备赫鲁晓夫的第二次发言外,还可能酝酿什么新的行动。

果然,20日休会一天,21日重新开会的时候,匈牙利党代表团提出一个所谓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决议草案,要求大会通过。匈牙利代表解释说,这是一个内部决议,不公开发表,但要在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草案一共有六条,主要的一条居然规定国际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根据多数意见来做决议。还有一条更荒唐的是,两个党有意见分歧不能解决的时候,请第三党来仲裁,再不行就提交国际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这个决议草

案实际上是一个类似国际组织的章程、法规性质的东西。苏共想把它作为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一个章程，这显然是违反兄弟党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的，是针对不同意苏方意见的那些兄弟党的。

我们代表团21日晚讨论匈牙利党代表团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代表团估计，匈党的这一行动，显然是苏共策划的，这可能表明苏共下决心向我们施加最后压力，把它作为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因此我们代表团决定，坚决反对讨论这个决议草案，如果要讨论，我们决不参加。代表团这个决定，等于向苏方发出警告，我们不怕破裂。由于此事突然发生，关系重大，当天晚上代表团就把这个情况和代表团的意见向中央报告。

第二天，我代表团收中央复电，同意代表团坚决打掉匈方提案。于是代表团把我们的态度通过各联络员通知各兄弟党。各代表团十分震动。许多人说，中国党不参加讨论那就等于破裂了。我们对匈牙利党代表团说，我们过去在你们十分困难的时候支持你们，想不到你们竟然提出这样的决议草案。匈牙利代表团的一个团员耸耸肩膀，什么话也没说。很显然，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很为难，是苏方指派下不得已而为的。

22日上午大会发言完了以后，第一轮发言告一段落。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宣布第二天赫鲁晓夫要讲话。

22日大会结束以后，我们代表团开会讨论，觉得我

们对匈牙利提出的决议草案表示了坚决反对态度以后，大家都已经知道，而且也很震动。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第二天（23日）的发言会怎么样呢？当时代表团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大骂我们一顿，再对我们施加压力，坚持要在会上讨论匈牙利提出的决议草案；再一种可能是他把调子降低，装作和解的样子，骗我们在声明上签字。因为他看到我们态度这么强硬，如果我们不参加讨论匈牙利决议草案，那就讨论不成了，等于破裂了。他是不是完全下了承担破裂后果的决心，还很难说。所以他有可能假装好人，客客气气讲一通友好，劝我们接受声明草案。

同时我们也估计，赫鲁晓夫对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发言里面批评他的那些问题是一定要回答的。他的回答可能很激烈，也可能含糊过去，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多数同志认为，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宣布要对匈牙利决议草案斗争到底，不怕破裂，估计赫鲁晓夫可能会把调子降低，对我们采取又哄又骗的办法。

所以代表团决定，把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的调子也降低一点，不要太尖锐，不必回答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观点，主要是按照声明草案中提出的争论较多的几大问题，结合赫鲁晓夫上次发言和他们的《答复信》中我们还没有详细回答的重要观点，阐述我们的立场。至于匈牙利的决议草案，态度要坚决，但语气要平和些，采取“哀兵”的姿态，申述我代表团处境困难，只能采取不参加讨论的办

法。

代表团决定以后，我们几个秀才又忙了几天。因为原来大家意见比较激烈，特别是匈牙利决议草案出来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起草发言稿过程中把调子提高八度。现在代表团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又分头修改降温。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稿子写好交到乔木同志手里以后，我们便去参加大会。稿子没有写好，我们就不参加大会。所以我们几个秀才参加大会比较少，都集中力量搞发言稿。熊复同志的主要任务是修改在北京草拟的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时的几次讲话稿。当时还很难确定少奇同志是否访问，因为如果会议破裂，那当然访问不成，但是如果会议达成协议，那么少奇同志的这次正式访问，对表达我们对苏联人民、对十月革命、对列宁党的传统友谊和深厚感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做群众工作的很好的机会。所以代表团认为也应该把这些稿子准备好。

11 月 23 日，赫鲁晓夫作第二次发言。他首先表示支持跟着他指挥棒走的、攻击中国党的那些人的发言。他说什么会议是在“很高的水平”上进行，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对共同事业做出了贡献”。接着他说，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其他党的意见，走不健全的路子。总的看来，他的这个说法调子比较低。

然后，他对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批判斯大林问题

做了一些辩解。在这些问题上,他也说同意我们的一些观点。但是一说到他的观点时还是重复老一套。比如对战争问题,他说,他同意要制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但是他又说,不同意我们说他害怕战争、害怕帝国主义。又比如和平过渡问题,他说他不同意我们说他是走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确越来越大,但是他又说,他同意有两种可能性,有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并说"20大"就是这么说的,1957年宣言也是这么说的。他就是采取这么一种含糊其词的辩解态度。

他还讲了斯大林问题。他说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十分必要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就肯定反对个人迷信。他又说不能责备苏共事先没有跟其他兄弟党商量,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很紧迫,来不及。后来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作出了详细的全面的决议。他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来弥补他过去的漏洞,装着他也接受一些正确观点的姿态。

在赫鲁晓夫的全篇发言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恶毒地攻击中国、阿尔巴尼亚搞派别活动走错误的道路,凭空臆造一些不符合实践活动的理论观点。另一点是不指名地攻击所谓个人迷信。他说,有人把自己看做圣人,不能跟他谈话。很显然,他是指中国党,是攻击毛主席的。

最后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对这些争论应该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能争论不休,可以让步,但苏共不能做

无原则的让步。我们不怕斗争，但是我们坚持要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他讲了这么一些要团结的话来收场。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让步，但我们也要让步。

赫鲁晓夫一共讲了1小时20分钟，好像是做总结的样子。他讲完以后没有人要发言。主持人宣布休会，明天再开。我们代表团已经预先报名准备第二天发言。

代表团从会场回来后研究赫鲁晓夫的发言，一致认为他发言的调子比较低，因此我们明天的发言也应该温和一些，但是原则要鲜明，要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实质，要点一点态度最恶劣的人的名，比如哥穆尔卡、多列士。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又是大党，都比较有影响，他们的发言都不好，特别攻击阿尔巴尼亚党。

代表团决定，把原先准备的稿子再降一降温，虽然不是降八度，也要降三四度。这样，秀才们当天晚上轮番作业，搞好一部分送出一部分，先经过乔木同志看，再送代表团几位成员看，最后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跟我们一起研究定稿。当天晚上定稿以后马上组织翻译。由于原来准备的稿子已经有了初步译文，所以定稿后翻译时只需略加修改就行。修改好的翻译稿当夜打印已来不及，于是决定第二天小平同志发言时先同声传译，讲完以后再印发。翻译同志很辛苦，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作同声传译。

第二天(11 月 24 日)上午,小平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作第二次发言,一共讲了 50 分钟。小平同志的发言除了重申我们对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的原则性意见,不同意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着重揭露了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回答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对毛主席的攻击,驳斥他攻击毛主席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我不是帝国主义参谋长”这几个论点,指出他根本不了解毛主席所讲的是什么,完全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采取不分是非曲直、漫骂一顿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因为阿尔巴尼亚霍查在 16 日讲话以后即回国,没有机会回答其后会上一些党的代表对阿党的攻击,所以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法国党和波兰党的代表对阿尔巴尼亚党不公正,他们的无理指责和恶毒攻击,不仅污辱阿尔巴尼亚党,也污辱了他们自己的党。

然后,小平同志郑重宣布:中国党根本反对匈牙利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国党绝不参加这个草案的讨论,我们要为反对这个草案斗争到底。这样会场上更加震动了。小平同志指出,苏共采取的还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方法,以老子党的态度,想用多数压服不同意它的意见的党。他指出,策动提出这个草案,就是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

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小平同志问道:难道各国党吃大国主义的苦还不够吗?小平同志进一步质问:共产国际17年前已经解散,情报局也早不存在,究竟什么时候兄弟党召开过什么会议同意设立一个国际组织?究竟什么时候兄弟党同意在国际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此时会场死一样静寂。

大概是按照苏共预先的布置,在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有10多个党的代表上台发言,肆意谩骂、乱扣帽子、拍桌子、跺脚,态度非常恶劣。但他们这样做反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印尼、印度、巴西等党代表上台发言,反对他们对中国党的攻击。荷兰党总书记鲁克曼最后走到讲台上非常激动地说,这不是兄弟党之间、同志之间讨论问题的方法。他呼吁多数党(是指赫鲁晓夫和他的一帮人)放弃那种不正确的方法,希望结束这种讨论,会下举行协商,并建议首先由中苏两党进行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再来开会。

鲁克曼讲完以后就没有人再要求发言,大概都不愿意参加这种起哄、谩骂。会议主持者宣布暂时休会,并说26党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从明天(25日)起继续开会。因为对声明草案还有一些分歧意见没有解决,还需要讨论修改。看来,这大概也是苏共预先布置的。

第二个回合的激烈斗争是在我党代表团公开宣布决不在不指名的攻击我党的声明草案上签字,并声明决不参加讨论匈牙利党代表团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草

案之后展开的。这场斗争使得会议的空气极度紧张。小平同志第二次发言以后，许多代表都到我们代表团来，有的表示支持，有的担心破裂，也有的劝我们让步，但都一致希望会议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表达了多数党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普遍心情。苏共在第二回合中对我们的攻击，并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把我们压服，反而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中派、右派都怕会议破裂，都要求达成妥协。我党代表团贯彻执行不怕破裂、坚决斗争的方针，把赫鲁晓夫组织的围攻瓦解了。

第七节　调解与妥协

从25日起，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第一天开会的时候争论依然非常激烈，僵持不下，苏共方面毫不让步，继续坚持原来的错误观点，不同意对声明草案做任何修改。

起草委员会第一天会议之后，我党代表团从11月25日下午到晚上开会研究形势和对策。大家提出，会议已经到最后阶段，我们要进一步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代表团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认为，由于我们在第二个回合中间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不管赫鲁晓夫恫吓也好，劝降也好，也不管他做出破裂的姿态相威胁也好，或者是由匈牙利党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也好，都没有能够把我们压服，我们都坚决顶住了。我们这样做在各个代

表团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左派长了志气,认为可以向苏共施加压力。占多数的中间派,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也包括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都相当恐慌,感到不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就等于中苏两大国、两大党分裂,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实在太大。而听命于赫鲁晓夫指挥棒的那些人也犹豫起来,他们也害怕承担破裂的责任。据此,代表团认为,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中央原定的方针,也就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协议的方针。

这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越南党主席胡志明向我们透露,他要组织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要中苏两个党无论如何也得达成妥协。这个情况表明第三阶段形势发生变化,这就是左派和中间派要联合出面调解,做和事佬,要求中苏两党达成协议。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代表团经过讨论,决定对策是:

第一,我们的决心还是要放在不怕破裂上面,如果不坚定这个决心,那么我们就会经常担心破裂,影响坚决斗争。

第二,要全部删除苏共安在声明草案里的"钉子"和不指名的对我们的攻击,只有全部删掉这些东西,我们才能签字。

第三,如果他们删掉了安在声明草案里的这些"钉子",但又想另外再搞一个决议,也就是匈牙利党提出的

少数服从多数的那个决议,我们也不能签字。

代表团所以议定这三条,是考虑到:签订一个文件只是一个形式。而到现在为止,这次会议本质上是由赫鲁晓夫指挥的,是反华的,是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这个声明草案如果不加修改,那就成为一个反华的决议。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这次会议,应该从长远利益考虑。如果他真的要破裂,那也只好破裂。

代表团还考虑到破裂的后果,一致认为,如果真的破裂,后果无非是:第一,苏共领头继续反华;第二,苏方断绝对我们的一切援助,东欧兄弟国家也照办;第三,苏共及其随从断绝同我党的关系;第四,外交上对我们实行封锁,国家关系破裂;第五,在国际组织里面把我们完全孤立起来;第六,对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各搞一套。这些后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压不垮我们。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样做,只是没有完全做绝而已。代表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绝不能马马虎虎地让会议通过一个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指责中国的“钉子”的决议。

代表团还考虑到万一赫鲁晓夫在各种压力下做一些让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他做些什么让步,我们才同意签字。

当时,在大会休会后的起草委员会中,争论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六个问题上,这比赫鲁晓夫原来安在声明草

案中的四个“钉子”增加了两个。这六个问题是:一、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党的关系还是独立、平等的关系;二、国际会议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协商一致的原则;三、国际共运中什么是派别活动,谁搞派别活动;四、什么是民族共产主义,谁是民族共产主义;五、声明中是否肯定评价苏共“20大”和“21大”;六、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哪些要坚决反对到底,哪些可以妥协,代表团把研究的意见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同时也请示中央授权代表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不签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签字。请示电报在当天(25日)深夜发出了。

26日,越南党主席胡志明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去见赫鲁晓夫。请愿团中包括北欧一个党的代表、拉丁美洲一个党的代表,还有亚洲几个党的代表,由胡志明领头。当天晚上,越南方面告诉我们:请愿团跟赫鲁晓夫当面谈,主要是劝苏共让步。但是赫鲁晓夫态度非常强硬,毫无商量余地。赫鲁晓夫表示,“20大”一定要写,他本来坚持“20大”和“21大”都要写,这次他只提“20大”一定要写,就是说“21大”可以不写。第二,反对宗派活动一定要写,否则要做内部决议。从这里看,反对宗派活动他是要写的,匈牙利的决议草案则有可能要放弃,但是他没有明确说。第三,反对个人崇拜一定要写,因为1957年的《宣言》里已经写了。会谈中赫鲁晓夫又蛮不讲理地对纸老虎、双百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肆攻击。请愿团表

示非常担心，他们仍然希望中国党和苏联党协商，一定要达成协议。看来赫鲁晓夫是企图利用这个请愿团向我们施加影响。

26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两人到我们代表团住地来。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跟他们谈。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20大”必须写，反对宗派活动可以考虑写法。（这表示稍有松动。）

第二，对匈牙利的提案要不要作内部决议，那要看我们的态度。（很显然他们想拿这个问题来对我们进行要挟，把剑悬在我们头上。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妥协，他们可以不提匈牙利决议草案；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要强行通过这个决议。）

第三，如果会议圆满结束，那么中苏两党的分歧也就结束，要向前看，搞好团结。（这就带有劝降的味道了。）

第四，他们还请中国代表团在会后访问苏联各地。原先议过少奇同志在81党会议后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苏联，现在他们扩大成请整个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意见就包含着他们希望能够达成妥协，以便好向苏联人民交代。因为如果破裂的话，我们当然不会访问苏联。）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谈完以后，小平同志回答他们说，这次会议实质上是由你们苏共策动的反华会议，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极大的遗憾、极大的愤慨。第二，到现在为

止，苏共仍然坚持错误路线，这样下去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你们知道。第三，我们劝苏共不要做绝，要看得远一点，还是以大局为重。第四，只有把不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所有“钉子”拔掉，而且不做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我们才能签字。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说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党的意见，并说，请中国党考虑他们的意见，他们回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中国党的意见。

他们走后，我们代表团马上到大使馆开会商议。大家认为，从米、科谈话看，他们主要是来劝降的。我们把他们顶回去了，但是他们也没有把口封死，还说回去后向他们中央报告我们的意见。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没有关闭妥协之门。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要坚决斗争，要他们把声明草案中所有“钉子”都拔掉，不做谴责我们的决议，不做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那样我们才签字。这时代表团还没有收到中央对我们请示的答复。

第二天(27 日)，胡志明主席率领请愿团到我们代表团来。从他们谈话的情况看，印尼党、朝鲜党、澳大利亚党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日本党的态度也还好，印度党的代表高斯表示希望达成协议，越南党更迫切要求中苏两党妥协。

我党代表团把昨天同米高扬、科兹洛夫谈的意见告诉了他们，并且强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反华会议，到现在为止苏共还没有放弃他们的错误路线，所以会议破

裂不破裂就看苏共改变不改变他们的错误主张，是不是一定要把几个“钉子”钉在声明上，是不是一定要做出不指名地谴责中国党的决议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决不在声明上签字。因此为了避免破裂，你们应该向苏共施加压力，要动员亚、非、拉、美一些党、西欧一些党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已被逼到墙角。我们处境实在困难。如果我们签字，就无法向我们中央交代，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无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我们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别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妥协、让步了，苏共的一些提法已经写到声明里边，有一些是两方面的意见都讲，既讲他们观点，又讲我们观点。现在在最后六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实在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了。

我党代表团这样耐心地向请愿团讲清楚我们的立场，并请请愿团向所有关心会议面临破裂危险的其他党的代表团，转达我们的意见。最后，胡志明还是表示：希望中共代表团再斟酌一下，考虑大家的意见，能够让步的还是让让步，他们对其他兄弟党也做做工作。

请愿团虽然没有达到他们要我们让步的愿望，但是他们听了我们解释以后，总的觉得我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地步，印象很深。

第二天（11月28日）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在讨论

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即苏共感到实在坚持不下去，做出了一点让步的姿态。他们的代表在起草委员会表示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这个提法是我们要拔掉的六个“钉子”之一，现在他们表示同意在声明里删掉，但其他仍要保留。他们特别坚持要保留反对派别活动，肯定苏共“20大”更不待说。

接着，我党代表提出反提议，建议一定要在声明里面明确地加上协商一致的原则，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虽然这是针对匈牙利的提案说的，但不是讨论匈牙利的提案，而是在讨论声明的时候我们正面提出来的。当然又争论一番，没有结果。

这时，会议已经开了三个多星期，时间所剩无几，已到最后关头了。我党代表团在28日下午开会商量时觉得，苏共方面已经熬不下去，他们也害怕承担破裂的责任，于是开始松动，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从这点退却迹象看来，我们争取拔掉全部“钉子”的可能性增加了。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党是不愿意破裂的，他们也对苏共施加了压力。当然，在起草委员会里，他们还是唯苏共代表团马首是瞻，还是围攻我们，逼我们让步。但是，从苏共同意删去民族共产主义这个提法，可以看到他们的阵脚开始动摇了。

代表团认为，在这场斗争中间，双方实际上采取的都是边缘政策。我们是摆出退无可退、不怕破裂的破釜沉舟的态势，在这种决心下硬是顶住苏共的强大压力和诱

降，但也不是要求破裂，仍然是以斗争求团结。而赫鲁晓夫他们也摆出一副很吓人的姿态，毫无妥协可言，似乎我们不退让就导致破裂。所以那些跟着他走的一些党也狐假虎威，吵吵嚷嚷，开始时都非常嚣张。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苏共的底牌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在起草委员会里，越到后来发言越是小心谨慎，不像开始时那样张牙舞爪，时时注意苏共代表的脸色，这对苏共来说也是压力。如果他搞得众叛亲离，不仅胡志明那个请愿团，而且其他党也会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妥协、让步。苏共同意删除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实际上是他退却的开始。我们现在不仅可以拔掉一个“钉子”，其他的“钉子”也有可能拔掉。所以代表团决定，我们还是跟赫鲁晓夫熬下去，看谁能熬得到最后。这个时候，代表团还没有收到中央对代表团 11 月 25 日请示的答复。但代表团已将这三天来的情况陆续电告中央。

28 日夜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就是胡志明在深夜 12 点钟，打电话到我们代表团，要同少奇同志通话，请少奇同志到他那儿去，商谈一下究竟怎么办。当时少奇同志已经睡觉，起来后把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叫到他那里去，商量此事。少奇同志说，三更半夜，这么突然要我到他那里去商量，他自己也不来，有什么事情这么急，究竟是什么意思？估计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小平和彭真也怀疑其中有文章。因为按照我们同胡志明的关系和他本人的性格，他向来对我们是比较随和的，有事情大都是他来找我

们的。为什么这次三更半夜要少奇同志到他那里去呢?实在有些反常。估计这同他策动劝和有关。最后少奇同志下决心不去,并在电话里面告诉胡志明,我们的态度昨天已跟你们讲清楚。我们就是那个态度。我们之间商量不解决问题,你还是跟赫鲁晓夫商量,把我们的意见转告他,要他下决心,是破裂还是不破裂。

这时胡志明才说明,他请少奇同志来他这里,同时也请赫鲁晓夫来,大家一起谈。

于是少奇同志又和邓、彭商量,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如果赫鲁晓夫真想解决问题,他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针尖对麦芒,吵也可以,和也可以,何必中间夹个第三者。于是少奇同志又打电话告诉胡志明说,现在没什么再商量的了,我们的态度就是那个态度,要谈赫鲁晓夫自己来谈。少奇同志这样的答复,不仅使胡志明感到和稀泥不行,也使赫鲁晓夫觉得局势严重。

(后来,莫斯科会议结束以后,胡志明到北京和毛主席见面的时候,他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他曾经约少奇同志到他那儿去跟赫鲁晓夫见面,这件事情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是他要采取这种方式见面的。毛主席跟胡志明说,当时不到时候,熬的火候还不够,还差一天24小时,所以当夜没有赞成你的意见,拒绝了你的邀请,很对不起。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

我代表团当时并不了解这是赫鲁晓夫而不是胡志明

的主意。我们以为是胡志明又要做说客，并且得到赫鲁晓夫同意。我代表团是根据这种估计拒绝了胡志明的电话邀请。但胡志明约少奇同志去同赫鲁晓夫会谈一事，就足以表明：赫鲁晓夫熬不住了，想做最后妥协了。当时代表团认为，如果赫鲁晓夫想要妥协，也只能由他同我们直接谈，不需要别人做中间人。

少奇同志和中国代表团所以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在午夜接到胡志明电话之前，28 日晚饭后不久，代表团收到了中央对代表团 11 月 25 日请示的答复电报。中央是两天中反复研究代表团的请示电之后才答复的。中央在这个电报里对形势做了分析，指示代表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妥协、可以签字，还讲到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当时代表团成员和顾问们都集中在大使馆，中央复电译出一页就传看一页，然后研究了明天采取什么步骤来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中央的复电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央认为，当前情况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队伍还不巩固，一些采取中立态度的党摇摆很大，看起来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要跟赫鲁晓夫决裂的思想准备。相反，在全世界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共产党、工会，也包括搞民族独立运动的人、得到我们支持的人和很多群众，他们都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成功。应该看到，所有进步力量都不愿意这个会议失败，不愿意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

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中央要求代表团在最后阶段要把力量放在力争达成协议。因为会议已经到最后时刻，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不怕破裂的策略，而是应该采取明白无误的、力争达成协议的方针。

第二，中央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并要求代表团准备对付这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所有“钉子”，主要是声明草案中三个“钉子”（按：三个主要“钉子”是指苏共“20大”、派别活动、民族共产主义）全部删掉，也不搞内部决议，不管是谴责中国党的决议或者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都不搞。这是最好的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签字。

第二种情况是，三个“钉子”都不删，又要搞内部决议，做谴责我们的或者是搞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坚决不签字。这样责任就很明显，破裂的责任不在我们，而是苏共不肯让步、不肯妥协，决心把反华的方针贯彻到底。历史责任由他们来承担。

第三种情况是，同意删掉三个“钉子”，但是却要搞一个谴责我们或者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可以在声明上签字，另一方面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决议。

第四种情况是，删去声明草案中反对派别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但保留苏共“20大”那一段，同时又搞内部决议。应该看到这种可能性很大，可以说这种可能是这

几种可能性中间最可能出现的。那么代表团应该对会议声明草案中关于"20大"部分的措词作适当修改后签字。因为在他们原来的声明草案里的措词比1957年《莫斯科宣言》还要肯定，不仅要肯定苏共"20大"，而且还要肯定苏共"21大"，两个都要肯定。如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在改变措词以后签字，这个由代表团掌握。但是，代表团在签字的同时应该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决议。

中央的复电在列举上述四种情况后又指示：不论签字或不签字，代表团都要单独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遇到第二、第三、第四种情况，代表团都要单独发表声明。

中央复电还指示：除了会议声明以外，还要搞一个类似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搞的那样的《呼吁书》，呼吁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呼吁书》可以搞得简单一点，只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其他一些根本问题、理论问题，因为声明里面都讲了，《呼吁书》里可以不讲。因为只谈形势和任务，我们的要求可以宽一点。

代表团讨论了中央的复电后，当天晚上就作出四项决定：

（一）要准备好修改声明草案中关于苏共"20大"一段的文字措词，而且要准备几个方案。（后来我们起草了四个方案：一个是紧一点的，第二个是松一点的，第三个是再松一点的，第四个是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

（二）要准备好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代表团要发表的声

明:第一个是不签字时(第二种情况下)的声明;第二个是在声明上签字、反对做内部决议时(第三种情况下)的声明;第三个是保留苏共“20大”、又搞内部决议时(第四种情况下)的声明。

(三)在第一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在声明上签字以后,做一个表明我们鲜明态度的发言,呼吁加强团结、呼吁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少奇同志的这个讲话也等于是一个声明,只是形式不同一点。代表团考虑到,少奇同志从会议开始一直没有讲话,大会上的两次发言都是由小平同志出面讲的。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党代表团团长,签字完了以后发表一个讲话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明天(29日)举行中苏两党直接会谈。在中苏会谈之前,代表团在起草委员会上采取以静观动的方针。因为29日起草委员会还要继续开会,所以我们以静观动,准备到中苏两党直接会谈时摊牌,互相妥协,达成最后协议。

第二天(11月29日)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讨论声明草案。起草委员会会议一开始,波兰党代表就提出声明草案中关于苏共“21大”可以删掉,但是苏共“20大”的措词要保留。波兰代表的这个提议说明苏共退却了。接着,那些跟着苏联指挥棒转的好些人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逼我们接受草案中关于苏共“20大”的措词,但是没有讲出什么道理,只是乱说一顿。

这时又有人提出起草委员会中成立一个起草《呼吁书》小组委员会，来最后修改《呼吁书》的草稿。这时苏共代表就提出一个参加《呼吁书》起草小组成员的名单。我们建议增加一两个党的代表。他们蛮不讲理地拒绝了。苏共代表显得很威风的样子。

这天起草委员会是由彭真同志带领我党代表团成员参加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一直没有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小平同志也只是偶尔参加，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彭真同志领头参加，加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和部分顾问。因为这些会大都是吵吵嚷嚷，最后由苏共代表拍板定案。这一天彭真同志看到苏共代表还是这样霸道，就抓住这个机会大发脾气，说你们这样霸道，小组委员会只能按你们的方案办，亚洲方面只要中国党参加，其他兄弟党一个也没有参加，这太没道理了。我们拒绝参加。

彭真同志来这一着，使得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突然紧张起来，他们好像感到中国党准备破裂了！其实，彭真同志当时考虑趁这机会，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逼我们接受肯定苏共"20大"，我们就采取这样一个姿态逼苏共摊牌。僵持了一会儿以后，彭真同志就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约科兹洛夫出去谈话。因为，从过去的开会情况看来，参加起草委员会的苏共代表中，苏斯洛夫虽然水平比科兹洛夫高一点，但是最后拍板的还是科兹洛夫。所以彭真同志就约科兹洛夫出来谈话，科兹洛夫非常紧张。

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到会场旁边另一个会议室以后，彭真同志责问科兹洛夫，说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使会议破裂？如果要破裂，你们就公开宣布，我们要发表声明谴责你们。这时候科兹洛夫一下子就软了下来，连声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想搞好这个会议。彭真同志于是提出，既然你们要搞好会议，那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达成君子协议。科兹洛夫问什么君子协议？彭真同志说，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决议，不但反华的不能做，少数服从多数的也不能做。科兹洛夫说你再提吧。彭真同志又提出，第二，不但不能写反对民族共产主义，也不能写反对派别活动；第三，要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可以同意写上苏共“20大”，但是措词要修改。

科兹洛夫听说我们同意写上苏共“20大”，马上松了一口气。大概他们内部也有一个底盘，苏共“20大”非肯定不可，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就像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通灵宝石是他的命根子一样。科兹洛夫一听到我们同意写苏共“20大”，只要求修改措词，马上就说，内部决议可以不做，反对派别活动可以不提，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也可以写入声明。他最后说关于苏共“20大”你们有什么措词希望提出来修改。同时他还表示同意我们对《呼吁书》中的部分意见。最后彭真同志说，我们两人达成一个君子协议：中苏两党刚才协商一致的几个问题，要拿到起草委员会上公开宣布并做决定。科兹洛夫表示同意。

就这样，会议中长期争论的几大问题，最后"一锤子交易"，我方摊牌，科兹洛夫都接受了。这可能是苏共中央内部事前曾讨论过这些问题，他们的底线就是苏共"20大"必保，其他可以让步。

彭真同志看到科兹洛夫同意，马上对他说，我们是在列宁像面前达成这个协议的，我们两个人要负责报告中央。彭真同志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来跟你谈的，你是不是也可以代表你们中央达成这样的协议。科兹洛夫也表示，他也可以代表苏共中央达成这样的协议。但是他又说，他还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得到主席团的批准就行了。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看来赫鲁晓夫也还是纸老虎，到最后他只好步步退却，只要能够保住苏共"20大"就可以了。因为苏共"20大"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上写过，所以我们可以同意写上，而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底盘是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这对我们的原则立场毫无损伤。

在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谈话期间，起草委员会停会一个钟头，大家休息、喝咖啡、吃点心。当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谈好后，双方都在会场上各自向代表团本部打电话报告。接着，声明起草委员会、《呼吁书》起草小组宣布休会。

第八节 胜利达成协议

29日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给彭真同志。他说，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开完了。赫鲁晓夫主持了主席团会议，基本上赞成我们今天中午达成的口头协议，但是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达成正式协议。他还说，苏方建议第二天（30日）上午10点钟，在列宁山会议厅会谈。他们出三个人，我们出三个人。彭真问他们三个人是谁，他说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彭真同志同代表团商量后答复他，我们是由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参加。我们代表团商量的时候，认为苏方提出三点建议，即三个人，10点钟，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会议厅，我们不能完全照办，要做一点改动。于是要彭真同志告诉科兹洛夫，10点钟不行，改成11点钟。苏方也同意了。

这样，我们在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观点相近的一些党的代表团。在这些党里，阿尔巴尼亚党和朝鲜党对拔掉几个"钉子"都表示赞成，认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还要求再拔掉几个"钉子"，特别是对草案里还写"反对个人迷信"有意见。朝鲜党的同志说，过去苏共在朝鲜党内策动人反对金日成，就是打的"反对个人迷信"

这个口号。阿尔巴尼亚党的同志说，他们党内一个女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策动反对霍查时，说的也是“反对个人迷信”。所以他们要求反对个人迷信的提法要打掉，至少要修改措词。

第二天（11月30日）上午11点，中苏两党各三人，如期在列宁山大会议厅会谈。那里一座大楼实际上是类似俱乐部，其中有会议厅、游泳池、娱乐宫、健身房。后来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这次会谈是从上午11点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在会谈过程中间，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达成的协议。只是对“20大”的措词还要商量。接着，彭真同志提出，有些兄弟党（他没有指明是谁）对反对个人迷信的措词也有不同的意见，希望也做一些修改。因为这两个问题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上都写了，现在只是改变一下声明草案上的措词。赫鲁晓夫表示，只要保留这两个提法就行。少奇同志说，苏共“20大”你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我们是赞成的，但是不赞成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赞成你们不跟兄弟党商量就采取这样的重大决定。我们历来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我们党的八大也是反对这个东西的。我们还没有进城，早在1948年的时候，我们就做过决议，不给个人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方、街道和广场，还做了其他反对个人迷信的决定。这些都比你们早得多。但是，既然兄弟党有意见，我们就应该考虑，应该对原来草案上的措词作一些修改。

赫鲁晓夫原则上也同意修改，但是他又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说阿尔巴尼亚忘恩负义怎么怎么的讲了一大套。少奇同志这时劝他说，你们是大党、大国，对阿尔巴尼亚只有100多万人口这么一个小国、小党，你们应该有大党、大国的肚量，不计较小兄弟这点那点缺点，而且你们也不是没有过错。今天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不要整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对此不置可否。

接着，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结束争论，中苏两党恢复到1957年那个时候的良好关系，同时要求我们两个代表团一起尽快商量声明草案中关于“20大”、关于“个人迷信”的措词，以便明天(12月1日)签字。

这时少奇同志提出，希望赫鲁晓夫以后少说一点话，如果有不同意见，希望不要站在第一线，亲自出来争论。否则我们也感到为难。我们给你们的《答复书》，好多地方都引你的话，点你的名，但是没有办法不这样。我们想找其他人的话，他们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只有你讲了那么多的话。少奇同志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言多必失”，希望你以后少讲话，不要站在争论的第一线，不要公开出面争论。有话我们在内部商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我们两党先协商达成一致，然后再提到国际会议上去。少奇同志直接问赫鲁晓夫，这个问题彭真同志未和科兹洛夫谈过，你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赞成？赫鲁晓夫说，赞成。以后有问题我们内部讲。但是他没

有承认他讲话太多了。

这次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不像9月间两党会谈那样大吵一顿，而是实打实地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同时，在会谈中间，双方再次肯定少奇同志在莫斯科81党会议结束以后在苏联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赫鲁晓夫表示，苏方一定热情接待，显示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向美国人示威。

少奇同志郑重地说，我们还是应该团结，不管有多大分歧。因为我们还是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共产党人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讲团结，国际无产阶级要讲团结。有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很难免的，因为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交换意见，出现分歧就内部协商，不要搞公开论战，不要搞指名的或者不指名的那种指桑骂槐的论战。这一点希望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特别注意。

因为少奇同志1921年就到过苏联，同赫鲁晓夫比算是长辈。所以少奇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赫鲁晓夫也没有说不同意，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

这样，少奇同志就和赫鲁晓夫敲定了两点：一是希望他自重，不要在争论的第一线；二是在国际会议上一定要协商一致，包括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群众团体的国际会议，都要协商一致。当时除了对这两点敲定以外，双方还对声明本身的一些分歧做了一些妥协，苏联方面让步的更多一些，我们在苏共“20大”问题上作了妥协。

这次中苏两党三巨头会谈后照了一张像，就是后来12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多了一个人，多的一个人是米高扬。当时米高扬没有参加六人会谈，而是在会谈结束后，他跑进来说照个相吧。结果他也站在旁边，成了七人的合照。当时小平同志拿着手杖，是因为小平同志在1959年腿部骨折，接起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起路来还需要手杖。

两党会谈结束以后，当天下午，我方由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领头，苏方由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领头各带几位助手对苏共"20大"和个人迷信的措词作最后的修改定稿。修定的声明草案中，对苏共"20大"的措词，我们退到最后一个方案，也就是维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苏方接受了。对个人迷信的措词，基本上也是维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措词，但增加一个短句：一些兄弟党在反对个人迷信方面取得了成就。

个人迷信当然是要反对的，作为原则，我们没有不同意见。过去我们所以跟他们有争论，是因为他们指桑骂槐，骂我们也搞个人迷信。其他兄弟党也是因为苏共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干涉他们内政、搞反党集团、进行颠覆活动，所以才反对，并不是赞成个人迷信。

双方商量在声明草案中加上协商一致原则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提出，达成协议就行了，声明里不要讲协商一致了。实际上他是想在措词上搞得含含糊糊，可以做

这样解释，也可以做那样解释。经过我们跟他争论，才确定在声明中明确地写上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中苏两党达成协议以后，起草委员会也好，《呼吁书》起草小组也好，很快顺利地通过了两个文件的修改草案。这时参加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欧洲党、美洲党的代表和原来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大喊大叫的人，都有点莫名其妙，都表示很惊奇、很愕然。他们说怎么搞得这么顺利呀？怎么苏共和中共没多大争论就通过了？这大概是由于苏共没有跟他们打招呼。苏共的一贯作风就是这样，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很少跟别人商量，很少跟别人通气。而跟我们观点接近的一些党，由于我们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所以他们都明白，中苏两方已经达成协议了。

经过三个星期的斗争，特别是经过起草委员会里的斗争，最后一致同意的莫斯科 81 党会议的声明，是一个比较好的文件。

从苏共方面来说，反映在他们最早提出的声明草案里的错误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基本上被否定了。比如，苏共原来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的出现是由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错误观点被否定了；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错误观点被否定了；苏共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错误观点也被否定了。

又比如，关于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观点，我们原来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就有不同的意见，认

为在那个《宣言》里表述得还不够确切，不够鲜明。所以当时我们就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在 1963 年中苏公开论战的时候发表了。在这次会议上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中，比 1957 年宣言又后退了一大步。我们党代表团因此在起草委员会中坚决要求修改。几经斗争，苏共才勉强同意维持 1957 年宣言中的提法。

又比如，苏共草拟的声明中关于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的提法也被删去了。苏共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各国单干，实际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这样的错误观点当然不能保留在声明中。

又比如，苏共在原来的声明草案中，有好几个地方写着要反对集团活动、派别活动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完全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否定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所以这个观点也被否定了。

又比如，苏共原先想做一个在国际会议上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内部决议，实际上这是要以多数压少数，否认兄弟党中间的关系是独立、平等的原则，借以干涉别党内部事务。但是，由于我党和好些党的反对，后来苏方再没有提它指使匈牙利党提出的那个决议草案。《声明》中不但把这样的观点删掉，而且还写明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应该是实行独立、平等，通过协商达到一致

的原则。

从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方面来讲，我们和其他兄弟党提出的许多带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写到声明里面去了，有些是原来苏共草案中没有的，有些是原来苏共草案里含含糊糊的。比如关于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写到声明中去了。对这个观点，赫鲁晓夫一直到开会的第一天发言时，还认为说帝国主义本性没有变不确切，他反对这个观点。结果苏共的错误观点被否定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写进声明中了。

又比如，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论点，也写进去了。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观点，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关于新独立国家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都写入声明了。原来苏共草案里根本没有提出的关于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主要斗争锋芒是对着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针对出卖民族利益反动势力的论点，也写进声明了。

又比如，关于兄弟党应该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和召开多边会议、多边国际会议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写进去了。这个问题原来我们已经跟苏共达成协议，直到起草委员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苏斯洛夫还不想用明明白白的文字写进声明，还想用错误的、含含糊糊的措词来代替。彭真同志指出，这个问题我和科兹洛夫

当面达成过口头协议，而且也经过两党代表团一致同意，应该写上。由于我们的坚持，最后才把这个原则写上了。

又比如，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论点，也写进去了。

这一系列观点，都是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提出来的，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这些观点得到了其他许多兄弟党代表团的支持，苏共代表团也被迫接受了。

当然，不能说只有上面讲到的我们否定了苏共的和苏共被迫接受我们的这两方面的情况，另外也还有第三方面的情况，这就是相互妥协、相互让步的方面。主要有两个问题我们做了让步。

第一个问题是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问题。原来苏共的草案里不仅充分肯定了苏共“20大”，而且还要肯定苏共“21大”，用了很多话来赞扬苏共这两次大会。由于我们坚决反对，最后他们不能不放弃写“21大”，但是还是坚持要写上“20大”。因为我们中央已经有指示，所以我们代表团对苏共原来声明草案的措词提出了四个修改方案。但是究竟怎么修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所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天开会的时候就反复磨，开始我们提出几个方案，他们都不同意，最后我们退让到第四个方案，就是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提法，他们没有话说，只好同意了。他们同意之后，我们代表团声明：维持这个提法这是我们代表团的让步。为了照顾苏共，为了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大局,我们党准备做这样的让步。但是,这是最后一次让步、最后一次照顾。从此以后,凡是有我们党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我们坚决反对在共同文件中维持苏共"20大"的提法。当时会上没有人出来说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个人迷信问题。个人迷信原则上要反对,我们也是赞成反对个人迷信的,但是苏共在原来的草案里讲了许多话,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提法当做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在兄弟党搞颠覆活动的借口。我们是不赞成在声明里说那么多。这个问题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等一些党特别强调反对的。他们不同意苏共原来草案的写法。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我们向苏方提出要修改措词。后来在起草委员会他们也同意修改措词。最后在声明里只保留了"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这么一句话,而且把这句话同"严格遵守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和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加强联系"的提法并提。这样就大大减弱了原来苏共草案中间别有用心的写法了。但是朝鲜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还是希望把反对个人迷信一词完全删掉,对保留反对个人迷信这一点他们还是不那么赞成,最后他们看到要再改有困难,要去掉也有困难,也就表示赞成了。会后,朝鲜同志还跟我们说,没有争取到把反对个人迷信打掉很可惜。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已经争取到取消了好多错误的观点了。总的来说,我们

的斗争是成功的。朝鲜同志也觉得总的来说应该这么估计。

81 党莫斯科会议最后通过的声明，基本上是好的，虽然某些问题可以做这样解释，也可以做那样解释，但是整个来讲还是一个好的声明。

12 月 1 日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厅举行 81 党会议全体大会，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签字以后由少奇同志出面讲话。所以签字完了以后，少奇同志站起来说，中国代表团对这次 81 党会议取得成功表示祝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制定了一个一致同意的纲领和告全世界人民书（纲领是指《声明》，告全世界人民书是指《呼吁书》），我们想大家是高兴的，全世界人民是高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是会高兴的，全世界工人运动是会高兴的。他们都会认为我们这次会议是成功的。少奇同志说，这是因为我们这次会议所达成一致协议的声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愿望的，是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有利于争取群众和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符合当前国际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少奇同志说，会议表明，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这种分歧是难免的，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是能够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在解决共同有关的问

题上达成协议。通过协商取得一致，这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少奇同志还说，我们会议的整个进程一共开了三个星期，中间有曲折、有困难、有障碍，也有斗争，但是事实证明，我们是能够最终克服困难，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我们相信，在 1957 年《宣言》的基础上和这次会议《声明》的基础上，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斗争也会能够走到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抱这样一个愿望、抱这样一个信心的。中国共产党希望今后要加强团结，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以集中力量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发展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

在讲到中苏两党关系的时候，少奇同志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大党，负有维护团结的特别重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跟苏联共产党一起，为这个团结尽一切努力。

最后，少奇同志说，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成绩。

少奇同志这篇呼吁加强团结、愿为团结而尽力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热烈反应，会场上多次响起了热烈掌声。

会议结束以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

会，招待各兄弟党代表团。招待会非常热烈，充满了一派团结的气氛。许多代表团经过三个星期的愁眉苦脸，现在也喜笑颜开，互相干杯。我们代表团的正副团长都坐在主宾席上，少奇同志坐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间。这时候赫鲁晓夫也很高兴，跟少奇同志表示亲热。

从招待会的气氛和互相交谈的情况来看，有些代表团的确曾担心会议会破裂，希望无论如何要达成一个协议，宁可不讲那些不一致的问题，把有意见分歧的统统删去，也要达成一个协议，要不然就表示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他们回去工作很困难，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回去后工作很困难。这个难题现在总算解决了。曾经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在起草委员会里攻击过我们党的一些党的代表，在招待会上对我党代表团的人员说，我们有过争论，也有过不大文明的地方，那都过去了。我们要向前看。他们做这样的表示，实际上是暗含着道歉的意思。而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顾问们在内，在招待会上跟他们都很客气，都着重强调有争论是很自然的，各个党所处的情况不同，经历也不同，经验也不同，有不同意见是难免的，但是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这是大好事。

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要说明，就是在 11 月 30 日同苏共双边会谈之后，晚上少奇同志亲自到波兰党代表团驻地拜访哥穆尔卡。因为在 1956 年苏联打算武力干涉波兰内政时，少奇同志曾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分别同苏、波两党代表团会谈，一面批评苏共，一面劝说波党。

当时率领波党代表团的就是哥穆尔卡。少奇同志对哥穆尔卡说，这次会议最后达成协议，争论已经过去，现在我们还是要讲团结，中苏当然要加强团结，中波也要加强团结。接着少奇同志就对波兰党、对哥穆尔卡提出了两点批评意见：

第一点，少奇同志指出，1956年我们党曾促成你们同苏共友好，支持了你们党的正确意见。但波兰党代表团在这次81党会议中没有起到促进中苏团结的作用。对这点我们是不满的。少奇同志说，我们过去花那么大力量来帮助你们、支持你们。为着你们跟苏共的团结，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你们在这次会上，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你可以讲，但是你对促进中苏团结方面没有起应有的作用，或者坦率地说，没有起好的作用。少奇同志所以讲这一点，是因为哥穆尔卡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态度非常恶劣，不仅攻击我们党，甚至还攻击毛主席。

第二点，少奇同志批评波兰党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不公道。少奇同志说，苏联采取那样霸道、那样蛮不讲理的做法欺负一个小党，在内部搞颠覆活动，你们一点也不说话。我们过去帮你说话了，你们这次对比你们更小的阿尔巴尼亚，你们不说公道话。相对而言，你们是大党，阿尔巴尼亚是小党，你们应该有大党的风度。对苏联搞大党主义的那种做法你们有体会，你们应该帮阿尔巴尼亚说些公道话。但是你们没有讲，反而谴责阿尔巴尼亚，用很粗野的语言骂霍查同志。少奇同志说，你这样做是

很不公道的，我们很不满。

哥穆尔卡为自己的做法辩解，不过最后他说，这些都是过去，现在我们还是讲团结。对中国党对波兰党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次盛大招待会充满了融洽、欢乐的气氛。招待会还没结束，我就离开大厅到苏共《真理报》编辑部去了。这是为了落实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达成的协议。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的协议有两项：一是以后中苏双方不在报刊上论战，不管是点名也罢，不点名也罢。有不同意见由两党内部谈判解决。这个协议是30日上午中苏两党会谈时达成的。二是这次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时，《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真理报》写一篇社论，互相交换同时发表对方的社论。这个协议是30日下午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会商会议声明最后措词时达成的。

我预先和《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约定，晚上10点去《真理报》拜访他。萨丘科夫也参加了苏共中央的招待会，不久也离开了。我到真理报时，萨丘科夫和他们的全部副总编辑都出来会见我，一起交谈。我除了对莫斯科会议经过协商达成一致表示祝贺外，同时还讲了两点。第一点是今后《人民日报》和《真理报》相互之间不搞论战，这点我们两党代表团已经达成协议了。他们表示他们已得到苏共中央通知，他们将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这样做。

接着，我说，第二点是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达成协

议，中苏两党党报互相同时转载对方关于这次会议的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在莫斯科写好，我带来了。我们只翻译了一个俄文草稿，你们看看该文有什么不妥的，请按照你们的语法习惯修饰发表。同时，我也希望得到你们的社论稿，俄文稿也可以，你们不用翻译，我们把俄文稿发到北京，由北京翻译。两篇社论同时在发表会议声明的同一天见报。当我说到这一点时，萨丘科夫和其他副总编辑表示很惊讶，说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没有接到他们中央的指示。从这点也可以看到，苏联党办事并不是那么认真、那么讲效率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直接打电话跟你们党中央苏斯洛夫同志联系。他们说这个事情没有问题。萨丘科夫收下了我们的社论，同时我正式邀请他访问北京。

萨丘科夫在 1956 年我党召开八大时来过中国。那时我还没有到人民日报工作，是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的。我 1957 年才到人民日报工作。萨丘科夫说，我访问过北京，可惜那次是参加你们党的八大，没有工夫到各地方去看一看，连北京也没有到过多少地方，都是在宾馆里。我很愿意再到中国去访问。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同时他也希望我作为真理报的客人访问苏联。我说，我这一次是要访问你们国家的，我将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他说，那请你以后作为真理报的客人单独来访问。我也表示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两家报纸同时发表了对方关于莫斯科会议的社

论,表示了团结的气氛,团结的愿望。

第九节 刘主席国事访问

12月2日中共代表团结束了参加莫斯科81党会议的工作后,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和部分代表团成员正式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随同少奇同志访问的有中共代表团成员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刘晓、刘宁一,部分顾问包括我、乔冠华、熊复、浦寿昌,在当天晚上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以小平同志为首,包括彭真、康生、胡乔木、廖承志等,也在当天晚上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少奇同志在苏联的正式访问,一共访问了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三个城市。在访问列宁格勒、明斯克以后又回到莫斯科,莫斯科举行了群众大会欢迎少奇同志,随后路过鄂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访问,然后回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代替赫鲁晓夫任苏共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全程陪同,一直陪到伊尔库茨克。

少奇同志是12月2日晚上10点钟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这是一辆专列,前面有办公室、会客室、餐厅,然后是住宿的车厢。当晚上车后,勃列日涅夫陪同少奇同志坐了一会儿,没有说多少话就走了。看样子他不像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勃列日涅夫走后,少奇

同志找我、乔冠华、熊复和浦寿昌一起商量修改第二天到达列宁格勒时在车站欢迎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大概工作到午夜才休息。

第二天上午10点钟，专列到达列宁格勒，苏共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原来是列宁格勒的市委书记，他从莫斯科先赶回来，带领列宁格勒市党、政、军领导人在车站迎接少奇同志，并在车站前广场举行群众欢迎大会。列宁格勒市委书记致欢迎词，接着是少奇同志讲话。

我们从旁观察，群众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冷清。原因是苏共一个月前散发了他们对我们《答复书》的答复，并在党内宣传说中国党如何反对苏联党，中国党如何错误。群众对现在居然举行这么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中国的国家主席，迷惑不解。他们在市委书记讲话时情绪不热烈。但是，到少奇同志致词时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少奇同志讲到十月革命是在你们城市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了第一声炮响开始，这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群众非常活跃，热烈鼓掌，长时间呼喊中苏友好。这个情况反映了苏联人民渴望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也反映了莫斯科会议的成功。少奇同志的访问是大受欢迎的。

在列宁格勒，苏联方面安排少奇同志住在过去沙皇的夏宫。这是一个布局非常讲究而典雅的别墅，里面有水池、喷泉、各种雕像，还有很大的一片森林，还有湖、游艇。因为当时正值冬天，湖面结冰了。少奇同志率领的

代表团有 30 来人，全部都住下，而且房间很宽敞。

少奇同志在列宁格勒访问期间，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冬宫，还专程参观了十月革命时列宁指挥起义的指挥部——斯摩尔尼宫，并特别看了列宁的办公室和他的住房。晚上观看了苏联演出的芭蕾舞剧《宝石花》。第二天白天还参观了十月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革命传统的基洛夫工厂。

12 月 4 日晚，少奇同志仍乘坐原来的专列离开列宁格勒，第二天上午到达明斯克。科兹洛夫也先期到达并跟白俄罗斯和明斯克党政领导人一起，在车站迎接少奇同志。然后少奇同志参观了明斯克郊区的一个农庄，晚上观看歌舞。

12 月 5 日夜，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离开明斯克，6 日上午 10 点返回莫斯科。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主席团成员到车站欢迎。6 日下午，少奇同志专门参观了利加乔夫汽车厂，晚上在大剧院观看乌兰诺娃表演的芭蕾舞片断。7 日下午，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联合在莫斯科中央列宁运动场体育宫举行群众大会，欢迎少奇同志。这是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期间举行的最大一次群众大会，整个体育宫可以容纳 12000 人。座无虚席。

在开大会前一天，就是 6 日晚上看完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之后，少奇同志把我们找到他的办公室去，商量修改第二天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其中有一些重要段落是少奇同志亲自动手改动的。这个稿子原来是由联络部的

同志起草的，外交部的同志和浦寿昌同志参加了。后来到莫斯科以后，熊复同志又改了一遍。在从明斯克回莫斯科的路上，我、乔冠华、浦寿昌三人又从头到尾改了一遍，然后送给少奇同志，请他斟酌这样改行不行。

少奇同志看了我们修改的稿子，并自己改了以后，又把我们找去，批评我们的稿子只讲原则问题，只讲大道理，不具体、不生动。他说，他想在这个稿子的开头部分讲一讲他1921年到苏联来的情况。少奇同志说，那个时候他还比较年轻，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莫斯科。他介绍了当时他们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一路上的艰苦情景。他说这一段路程一共走了三个月。他要我们在稿子里加一段那个时候的困难情景和苏联人民对中国同志的动人感情。我们根据少奇同志讲的意思，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修改。少奇同志看完以后说，这样讲苏联人才感到比较亲切、比较感人。这的确也是事实。经过这么长时间，从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现在是60年代，近40年前的那个情景非常感人，今昔对比很有意义。

欢迎少奇同志的群众大会是在12月7日下午两点钟开始的。苏联方面参加大会的以赫鲁晓夫领头，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米高扬等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到了。大会开始先由莫斯科市委书记杰米切夫致欢迎词，接着利加乔夫工厂的工人代表、科学院一位院士和莫斯科大学的代表讲话，然后勃列日涅夫讲话。他们都讲了一些团结的话，莫斯科大学的代表和利加乔夫工厂的

工人代表讲得特别热情、特别生动。

勃列日涅夫讲完以后，少奇同志才讲话。当少奇同志一走上讲台，群众频频欢呼"中苏友好万岁"，气氛既隆重又热烈。

少奇同志除了祝贺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和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以外，谈到他第一次到苏联的情景。他说，1921年春天他从上海到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军队占领下。他是从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港登陆的，然后绕过海参崴城市，坐火车经过赤塔到莫斯科，一共走了三个月，而现在（1960年）坐火车从北京出发，九天就可以到莫斯科了。他说，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煤，火车只能烧木头，乘客要沿路拣木头来烧锅炉。火车走走停停，一共走了三个月。苏联铁路工人看到是中国青年代表到苏联来开会，就帮助我们拣木头、修机车、修铁路，表示了热烈的同志般的感情。少奇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苏联人民在那样艰苦环境下同白匪军作战，同经济困难作斗争，努力克服经济困难的劳动热情，非常感动。我们对苏联人民在那种艰苦环境下所表现的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非常感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同来的中国同志大大增强了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也大大增强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少奇同志说，那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是作为少共代表参加你们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我留在莫斯科，而且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在莫斯科加入了共产党。我不是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而

是在你们国家加入共产党的。

当少奇同志说到这里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这个掌声充分表现了苏联人民对中苏之间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友谊非常激动。

此外,苏联群众对少奇同志的讲话还有两个地方反应也特别强烈。

一个是少奇同志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最大保证。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帝国主义像它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样,永远看不到中苏分离。这时会场上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不断欢呼中苏团结万岁,气氛非常热烈。

还有一个地方是少奇同志讲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中苏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的时候,群众也是长时间地鼓掌,热烈地欢呼:“乌拉!乌拉!”

据我们当场粗略的统计,在少奇同志的整个讲话过程中,热烈鼓掌有36次之多,群众情绪始终非常高昂,特别是在少奇同志讲话完毕,全场一万多群众都站起来,台上台下,都举着手高喊:“乌拉!乌拉!”少奇同志也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科兹洛夫几个人手挽手向群众致意。

会场的这种气氛反映了苏联人民、苏联党内和在场的许多苏联高级干部都希望中苏友好团结。苏联人民、

苏联党内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这么一个强大的力量，足以说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为什么到最后只好一步步向后退却，同意达成协议，接受我们的一些重要观点。而这种愿望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悠久的传统的，谁要是损害它那是要碰钉子的。可以说，这次群众大会也给81党莫斯科会议做了总结，反映了前一段赫鲁晓夫带头破坏中苏团结的所作所为终究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天(12月8日)上午，少奇同志专程到苏共中央向赫鲁晓夫等辞行，简单地谈了一会儿，讲了一些加强团结的话，就直接到飞机场，乘飞机离开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到机场送行。少奇同志仍然由勃列日涅夫陪同飞往伊尔库茨克，路经鄂木斯克的时候停了一下，当天晚上10点钟到达伊尔库茨克。

第二天(9日)少奇同志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最后出席了伊尔库茨克市委和州委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讲话，这是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最后一次讲话。

为了准备好这次讲话，少奇同志在8日晚上10点钟到达伊尔库茨克宾馆后，很快找我们商量修改讲话草稿。这个稿子是我和乔冠华、浦寿昌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之后经过修改送给少奇同志的。大概在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的飞机上，他看了这个讲话稿，所以一下飞机就把我们找去，说稿中要增加一段。增加的这一段完全是少奇同志口授、我们记录下来加上去的。

少奇同志在伊尔库茨克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虽然很短，但是含义很深。特别是少奇同志亲自口授增加的那一段，强调中苏两党、两国人民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这几天在苏联访问，使我得到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对增强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抱有强烈愿望。”他说，“任何损害这个团结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在苏联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而且我相信，在社会主义阵营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中间也是通不过的。”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结束语。

少奇同志这段话是有所指的。他特别强调任何损害这个团结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在苏联都通不过。这表示我们是要坚持团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从反面来讲也是暗含着一个警告，这就是谁要损害中苏团结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谁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是少奇同志在访问苏联的整个过程中讲得比较重的一段话，它暗含着遇到这种情况，中国还是要起来反对起来斗争的决心。所以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临时口授加的这段话后，感到很重要，非常必要。苏联方面对这段话也非常敏感。莫斯科《真理报》在转载少奇同志在伊尔库茨克送别宴会上的讲话时，恰恰删掉了少奇同志口授增加的这一段话。苏共方面不转载这段话，无视四个“通

不过",人们只能理解为他们并不想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想坚持这个团结的基础,仍然要沿着他们偏离列宁方向的道路走下去。

当天下午,少奇同志乘飞机离开伊尔库茨克回北京。到达北京时已经很晚,但是,毛主席和中央几位常委、政治局全体同志,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欢迎少奇同志胜利归来。

第十节 会后的评论

这次81党莫斯科会议的斗争空前激烈,情况也非常复杂。但是,由于我党坚持了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会议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中苏双方以及参加会议的所有兄弟党达成一致协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2月初,以胡志明主席为首,包括黎笋、黄文欢在内的越南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路经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和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毛主席总结这次莫斯科会议时说,这次莫斯科会议结果是好的,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大家都是共产党,一定要团结,争吵有时候是免不了的,但结果还是要团结,要和。终究是要和的。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宴会的时候,毛主席特别称赞胡志明起了和事佬

的作用。他对胡志明说，这次81党会议所以开起来是因为你做了说客。你当说客在先，后来又发起请愿，你当请愿团的团长。你是两重身份，既是说客，又是请愿团团长。这时胡志明大笑起来。毛主席又说，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上一次（是指8月间胡志明到北戴河的时候）我在北戴河跟你们两人（指胡志明和黎笋）谈话的时候向你们交了底。我说，没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怕原子弹会落下来。现在我想起我们那次谈话还有点好笑。毛主席说，这次又搞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看起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不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苏方达成了君子协定，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按：胡志明在8月间的北戴河会谈时说彼此不要“丢香烟”，要“递香烟”，意即要和不要吵）。毛主席说，到某个时候还可能丢呢，我不相信从此就不丢了，可能是丢一阵，递一阵，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

小平同志说，苏共一开头就向我们发动进攻，散发对我们《答复书》的答复，在会上组织对我们围攻。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对苏共方面讲，你们要压我们是不行的，我们要斗争到底，不怕分裂。毛主席说，如果他要分裂，我们有什么办法？苏共方面这次搞的是边缘政策，一步紧一步，先撤走专家，再来个经济封锁，破坏

团结还不够，还画漫画，指名公开批评中共。压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物质的，如经济封锁、撕毁协议等等；一条是精神的，就是谩骂。这是搞边缘政策。结果这次走到边缘又回来了。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的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是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

胡志明说，把辣椒都收起来。都多给点糖。小平同志说，光给糖恐怕不行，因为分歧还有。他挑起争论，他先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双方的意见不会那么完全一致，还会有争论的。

毛主席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同志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小平同志因为腿摔伤后还没有完全复元，参加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彭真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对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小平同志说，我这根棍子挨了两千次骂，有的时候一回骂十几次还不够，再骂第二回，都是指名骂我的。毛主席说，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党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都没有出面，都没有指名批评，都留一手，更不要说我这位主席了。我现在不讲话，看他怎么样，也许几年以后我要讲话，到那时候再说。

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有些问题我们这次会上回答了，有些过去已回答过，这次会上就没同他们纠缠。毛主席说，这是生活中间常有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各党保留着。比如“纸老虎”，现在中苏无法达成协议，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还是讲团结。我看这种办法还是需要的。这次会议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所预想的要早一点。本来我们是准备十年的，现在只争论了一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争论？也可能还有争论，我们准备着。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胡志明提到他在29日那天打电话叫醒少奇同志，请少奇同志到他住的地方来，同赫鲁晓夫见面。少奇同志说，那时还不到时候。小平同志说，是早了，那个时候见面只能吵架，因为他们还没有下决心让步。周总理说，是早了一天，我们中央给代表团的电报也是准备让

步的，但是要坚持到最后，要逼得赫鲁晓夫他们让步我们才让步，这样双方才能够互相妥协。

毛主席在这次会见胡志明和越南党代表团时的谈话，是对81党莫斯科会议结果的一个概括的总结。

1961年1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肯定了81党会议的成果，并决定从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全面调整方针，不受任何国外事件和国内事件干扰。

会议讨论邓小平同志作的我们党参加81党会议的汇报时，大家发表了很多中肯的见解。

会议认为，这次81党会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会议的结果是比较好的。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以中国和苏联两大党为对立两方代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斗争的性质是坚持还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阵地。

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的、重大的原则性分歧。这个分歧由来已久，从1956年苏共“20大”就开始了。而公开的争论，也就是两党分歧的表面化，是从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社论开始的，一直到这次81党会议，历时15个月。斗争是在公开情况下进行的，81党会议达到顶峰。

我党代表团的成员在会上列举事例指出，苏共操纵81党会议的方式、手段非常恶劣。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策动对中国党围攻，许多党就跟着他们跑。这个

习惯势力很大，就是苏共说了算，就是圣旨。在会议期间苏共采取冷遇、监视、高压、围攻、疲劳战术等种种手法，要挟兄弟党，组织对我们的围攻。他们凭空捏造和歪曲我们党的观点，大肆攻击我们党。许多党在大会上的发言不讲道理，不分是非，不是谩骂，就是瞎说，或是乱扣帽子。在苏共看来，他们手中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压力，就是毛主席讲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另一张是多数。用压力的时候，一方面毁约、撤退专家，一方面公开指责我们，但两方面都没有成功。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就想要用多数压少数的办法制服我们。他们使尽一切手段，组织多数党对我们进行围攻，一直到 11 月 29 日，都是采取这种办法。

小平同志评论 81 党会议过程时说，整个斗争过程都是赫鲁晓夫亲自领头的。我们刚到莫斯科的时候，两党会面时就是他领头发起攻击。大会开始的时候，又是他第一个发言领头组织对我们围攻，他第二次发言也是如此。当然，到最后也是他领头退却的，也就是到最后他节节败退，不得不跟我们达成协议。现在看来，苏共这样一个大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种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行动在全世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中国党站出来讲话，任何其他兄弟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领头，左派高兴，中间派发生动摇，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右派最后只好退却。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在具体做法上讲究灵活性，留有余地。代表团忠实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

小平同志说，应当指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不希望中苏破裂，都希望中苏团结，包括苏共党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他们党内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希望两党团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对我们很有利的因素，也是促成这次会议最后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

小平同志总结这次莫斯科 81 党会议的主要收获有四点：

第一，会议最后达成协议的声明是好的。

第二，这次会议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表明苏共也是可以批评的。过去那种苏共说了算、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跟着他指挥棒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这次会议锻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在起草委员会的 26 个成员中有 7 个党是坚定的。在 81 个党里有 12 个党的观点也是比较一致的，除了亚洲的，还加上拉丁美洲的一些党。由于有这样一个队伍的团结斗争，最后把赫鲁晓夫的围攻顶住了、瓦解了。

第四，经过这次莫斯科 81 党会议，确立了兄弟党之间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独

立的、平等的、平起平坐的关系。而且中苏两党之间还达成一个君子协议，就是对于重大国际问题，中苏两党一定要在协商一致之后才写到国际会议的共同文件中去。

小平同志最后说，看来81党会议这一场大斗争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不能说整个斗争就此完结了。赫鲁晓夫仍然保留他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而且这个人是善变的，他经常是临时应付，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一贯的。所以我们对整个局势应该谨慎对待，保持警惕。但是，既然有一个共同的文件，我们对苏共还是采取加强团结的方针，并且要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加强团结。

在这次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和毛主席在讲话时都谈到了莫斯科81党会议。周总理聚精会神搞国民经济调整，在会上和会前会后做了大量工作，没有多谈莫斯科会议。

1月18日少奇同志讲话，他说，这次代表团由我担任团长，看来毛主席这个设想是恰当的，就是说毛主席不出面，由我来出面，而且我又不在会上公开地跟赫鲁晓夫争论，处在前线的第二线。因为我曾在1921年到莫斯科参加过少共国际的工作，在赫鲁晓夫面前可以摆摆老资格，看来这个老资格还是有点作用的。

少奇同志又说，这次81党会议上苏方形式上气势汹汹，实际上赫鲁晓夫心里是虚的，因为他理亏。在我

们到达莫斯科那一天（11月5日），他发表对我们《答复书》的答复，但是在11月9日他来跟我们谈81党会议如何开的时候，还说他们的《答复信》和这个会议没有关系，不敢承认11月5日的复信就是要在会议上发动对我们围攻的一个号令。他总是吞吞吐吐，而不是堂堂正正。这表明：他的修正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旗帜，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地树起来的。这种情况和一年多以来的斗争有关。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以后，他们不能不承认帝国主义的性质没有变，赫鲁晓夫虽然说这不确切，他并没有说我们的论点完全错了。我们说赫鲁晓夫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百多次讲话中，没有一句话提到1957年《宣言》，这个是他赖也赖不了的。他觉得理亏，所以后来就在11月5日的信里面他们赶紧抓1957年《宣言》，在起草委员会里面也不得不赞成写上反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到最后他也只好接受签订一个要加强团结的《莫斯科声明》。所以说，一年多他们是被迫逐步地转，在莫斯科81党会议期间又被迫逐步地后退，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觉得站不稳了。少奇同志说，11月26日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到我们代表团来找我们谈，那是在胡志明向他们请愿，要求中苏达成协议，要求赫鲁晓夫让步之后。米高扬和科兹洛夫来谈话，实际上是来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是压得了还是压不了；同时想用恢复援助做诱饵，看我们上不上钩。应该说，这个态度是很恶劣的，但是，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阵脚开始动摇了。所以胡志明在 28 日约我去见赫鲁晓夫的时候，我们断然拒绝了，觉得还要搞边缘政策，还是要顶他，还是要采取强硬的态度。果然，其他兄弟党知道了胡志明约我们跟赫鲁晓夫见面没成功以后，都大为震惊，认为这个会非破裂不可了。少奇同志说，经过这个斗争，他们感到要压服中国党是不行了，除了让步妥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最后他们就约我们开中苏两党会谈，达成了一揽子的协议。

少奇同志说，当然，不能说赫鲁晓夫以后就不来整我们了，斗争就此结束了。但是，应该说，最近一个时期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把我们的力量集中搞好国内工作。我们国内积累问题很多，有必要狠下决心抓。中苏关系今后一个时期可能缓和，也为我们全力搞国内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条件。我们不去挑起争论，有争论也不要使国内工作受干扰。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马列主义，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基本理论，结合当前的时代的特点，进行系统的研究，准备以后的斗争。

少奇同志说，苏方在我们代表团到莫斯科之前，邀请我访苏。这说明他们从一开头就害怕分裂，做出一个在莫斯科 81 党会议结束以后也讲友好、团结的姿态。

但是，我在伊尔库茨克讲话中间讲到：凡是不利于和有损于中苏团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都是通不过的，这段话他们在发表时删掉，不敢登。由此证明，事情并不是那么太平。（这时，毛主席插话：我们不怕登他们的东西，我们也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分裂也不怕。）

少奇同志说，经过这次会议，看来对付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付那些要搞修正主义的人，也不太难，比较容易对付。我们党战略上有一套，策略上有一套，我们讲团结是认真讲团结的，这方面他就比不上我们。我们讲坚持原则，他们也谈不上和我们对比。斗争并没有结束，很可能是高一阵、低一阵，至少还要斗争十年，要做这个准备。因为修正主义要改是不容易的，有些党已经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了。毛主席讲过，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是不对的，还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有修正主义。斗争是长期的，经过十年、八年有可能争取到形势往更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现在要做一些基本理论工作。

陈云同志的发言主要是讲计划、农业等等问题。但也谈到了莫斯科 81 党会议。他说，莫斯科会议是成功的，代表团的工作是好的。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不足为奇，我们党这样坚决地跟它斗争是正确的，否则将来欠历史的账，辜负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这场斗争的实质是

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影响是深远的。

毛主席在九中全会结束（18 日）前，做了长篇讲话，他主要谈了国内情况，也谈到国际情况。

毛主席说，比较起来讲，我们中央对国际情况调查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了解情况也比较充分，因此决心也比较大。开始，我就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要搞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也急急忙忙地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做决议，而且把决议下达到支部，攻击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当时我曾讲过，他不这样做恐怕是考虑到不好办。现在看来，他们也估计错误，认为中国党是可以压服的。一个是他不这样做他不好办，一个是他们估计错误，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因为当时赫鲁晓夫对我们非常害怕，对三篇文章非常怕，因而不能不为维护他的权威而斗争。而我们什么都不怕，他们的文章我们登，而且把他们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公开发行，一共发了十几万本。赫鲁晓夫说我们闹宗派活动，说我们三篇文章和小平同志 11 月 10 日的讲话是纲领。从这方面来看，这三篇文章实在好，别的党也这么讲。三篇文章出来以后，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搞了几手，就是搞布加勒斯特会议，搞撤退专家，搞撕毁合同等等，这就搞到国家关系上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们压倒。结果并不如他所想的，而是比较合乎我们所想的。我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有研究、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对付，能够取得胜利。有调查

研究，有科学分析，才能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处理国际问题要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更要这样。

毛主席说，81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当然，这个反华浪潮也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有来自于民族主义国家的反动派。印度反华，南斯拉夫也参加了反华，有些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参加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领头，在今后还会有反华浪潮，还会有起伏，不可能根除，因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

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在党内要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81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们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觉悟。共产党人不挨骂就不是共产党人。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不是说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同样，我们讲团结也不是说不要必要的斗争，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年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骂了我们一大堆，我们不能不反击，批评了他们一顿。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

同样是杨柳，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是毛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对81党莫斯科会议讲的一番总结性的话。

第八章

赫鲁晓夫再度挑战

第一节 81党会议后的缓和

81党莫斯科会议后，我党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中苏关系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搞国内调整工作，同时争取进一步改善同邻近国家的关系。

早在莫斯科会议之前，我国同缅甸签订了边界条约。莫斯科会议后，周恩来总理亲率我国政府代表团于1961年1月间赴缅，同缅甸政府交换中缅边界条约的批准书，完成了条约生效的法律手续。同这差不多同时，我国政府在1960年12月同柬埔寨签订了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两个条约，都是根据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于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

订的。这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是认真倡导并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是真诚愿意同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尤其是邻近国家友好共处的。

1961 年 4 月间，中国又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同老挝王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6 月间邀请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相继访问中国。7 月间中国政府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0 月间，我国又同尼泊尔王国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

这一系列的工作，使我们有一个比较缓和和友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进行国内的调整工作。

这中间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日内瓦会议。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的第一阶段从 1961 年 5 月到 7 月，历时两个月。

因为我党跟苏共在 81 党会议期间有过一个君子协议，所以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把我们设想的方案先跟越南、苏联协商，协商好了再跟老挝的三位亲王协商。他们是富马亲王、苏发努冯亲王和富米诺沙旺亲王。

由于我们对老挝情况比较熟悉，又跟越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处于相当主动的地位。而由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对亚洲情况尤其老

挝的情况不熟悉，而且外交策略也比较简单化，在会议中成了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对法国、英国等国做工作的主要还是中国代表团；对美国进行斗争也是中国和越南站在第一线，同苏发努冯亲王相配合。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和苏联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论，一般还比较协调。我们提的意见也比较得体，苏联方面也没有完全反对或表示不可接受，中苏双方合作得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双方比较协调，但是，应当说，在整个 1961 年，中苏关系积极的改进很少。米高扬不是在莫斯科 81 党会议期间提出过可以派专家、可以给我们经济援助吗？但是，实际上，81 党会议后，他们再没有提过这些问题，我们也不理睬这些问题。在这方面还是保持 1960 年他们专家全部撤走、所有合同全部撕毁的状况。当然双方还做生意，既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多少。在 1961 年，中苏关系既没有坏到哪里去，也没有多大的好转，只是形势比较缓和而已。

相反的，在国际群众团体的会议上，中苏之间的分歧就很明显地暴露出来。虽然有莫斯科 81 党会议的声明和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但是苏联代表团还是照他们过去的那一套办，把赫鲁晓夫的“三无世界”那一套搬到国际群众组织中去。无论在什么会议上都强调裁军，把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对支持被压迫民族、支持第三世界的

斗争，则不愿意多提。这样不能不引起我们同他们争论。

在1961年，国际群众组织召开的会议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一个是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团结理事会会议，还有一个是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在这几个会议上，苏联代表每次都把裁军问题、实现"三无世界"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提出来。这当然就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反对，特别是遭到亚非拉那些受新老殖民主义的欺压、侵略、剥削的国家和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代表们的反对。苏联代表相当孤立，即使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也是这样。在新德里召开的亚非团结理事会会议上，不但苏联代表遭到冷落，印度因为想得到美援不敢得罪美国，印度代表提出的主张不敢高举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也为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所不满。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在这些会议上提出的支持各国人民为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支持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而斗争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比如我们的代表指出：裁军问题不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为了世界和平必须解决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问题、发展民族经济问题，还得支持欧美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为改善生活而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等问题。不能一切都得围着"裁军"转、围着"三无世界"转。我们

的这些主张都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虽然这样的国际会议是同各式各样的和平主义者搞统一战线的会议，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上，很多和平主义者也不赞成不提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问题。

从这三次比较大的国际会议来看，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尽管经过莫斯科 81 党会议的斗争，他们原来的观点并没有放弃，还是要贯彻下去。虽然没有跟我们发生正面争论，两党之间的关系在 1960 年到 1961 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也比较缓和，但是没有明显的改善，苏方也没有主动采取改善的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对我们暂停争论，采取比较缓和的姿态，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却不断施加压力。

在 1961 年 3 月间，苏联领导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一个指名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步骤，是过去没有过的。同时，苏联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出，把阿尔巴尼亚完全暴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前。5 月间苏联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到 8 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实际上就是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华沙条约国组织。

上面的这些情况，是莫斯科 81 党会议之后一直到苏共“22 大”召开之前整个 1961 年的形势。总的来讲，可以说比较缓和，但潜伏着严重的分歧。

在这个时期，赫鲁晓夫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压阿尔巴尼亚。当然，阿尔巴尼亚非常英勇，坚决不屈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不放弃他们支持中国的立场，坚决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

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当然引起了我们党的警觉。我们党是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党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公开表示，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单独出头来骂阿尔巴尼亚党。当时我党中央估计，既然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作出决议点名攻击阿尔巴尼亚，甚至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会议，那么很显然他们还要走下去，很可能完全破裂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中央决定看一看再说。

第二节　苏共错误观点的系统化

1961年8月到9月，中央在庐山召开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是苏共中央准备提到苏共“22大”讨论的，在苏共“22大”开会之前先在报上发表，供全党讨论。

9月5日，在毛主席住处开常委会的时候，周总理提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苏共发表了一个纲领草案，很长，现在忙不过来看，据北京的同志说，这个纲领草案不

是个好纲领。

当时在常委会上进行了议论，谈了两点意见：

一、苏共现在发表的这个纲领草案，是作为他们党的一个纲领。这是他们一个党的事务，不同于兄弟党会议的共同文件。现在我们不好表示反对，但也不好公开表示完全赞成，可以考虑支持其中积极的东西，不提其中消极的东西。就是说，将来苏方根据这个纲领采取什么行动，比如在外交上，是好的我们表示支持，消极方面的我们可以不提。当时大家已经知道苏共纲领草案中有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法，认为这两个提法都是违反马列主义原理的，很值得研究。

二、关于苏共“22大”。当时中央常委估计，苏共“22大”是要讨论这个纲领的。我们对这个纲领可以不提意见，但是要预计苏共“22大”会议上可能组织对我们围攻。要估计到这个可能。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在大会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在就要做准备。苏共“22大”也有可能不围攻我们，而围攻阿尔巴尼亚。如果这样，我们也要有所表示。现在要请中联部和外交部先行考虑，如果出现对阿尔巴尼亚围攻，我们怎么办？如果出现对我们围攻，我们又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个问题请两个部共同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毛主席说，苏共这个纲领草案很长，请大家抽空看看。在庐山会议后期抽点时间再来议一议。特别请秀才们好好看一看。

当时只有我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乔木同志在庐山会议之前，从夏天起就因病休养了。因为从1960年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到莫斯科81党会议他都参加，工作非常紧张，非常劳累，结果患了神经疲劳症，经常头痛。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要他完全休息，时间不限，休养到身体完全恢复才恢复工作。所以毛主席要我跟北京联系一下，告诉没有到庐山来的在北京的秀才，请大家研究一下，看看有什么意见。

这次常委会是9月5日下午在主席住处开的。这次庐山会议主席住的地方不是原来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住的蒋介石过去住过的"美庐"，而是住在庐山人工湖畔的新盖的大平房里。主席一般喜欢住平房，不喜欢住楼房。这个平房建在庐山剧院以东三五里的人工湖旁，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平房，外表看是西式的，里面很高大，整个别墅伸入湖中，主席平常就在人工湖里游泳。

在这以后，在北京和在庐山的同志都看了《苏共纲领草案》，大家都作了研究，特别是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做了比较仔细的研究。理论界的意见由宣传部集中，陆定一同志综合；外交部的意见由章汉夫同志集中；联络部的意见由王稼祥同志集中，他们三位都参加了庐山会议。

9月中旬的一天，陆定一召集刘宁一同志、章汉夫同志和我碰头，刘宁一、章汉夫把联络部、外交部的意见讲了，我也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意见讲了。然后大家一致推定，主席那里开会时，由定一同志把大家的意见综合

汇报。定一同志很客气地说，他大体上只能讲他的主要看法，别的部门有什么意见要补充的由各人自己讲。

9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开常委会，除了常委同志以外，陆定一、王稼祥、刘宁一、章汉夫，还有彭真、杨尚昆和我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在庐山只参加了前半段的会议，后半段他下山率代表团访问朝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主席先讲。他说，这个《苏共纲领草案》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他说，我看了一遍没什么头绪，很难看，文理、逻辑都不通，结论在前，很多问题都是两面讲，有两重性。今天我们先不做结论，不妨大家各抒己见。

陆定一同志接着讲了他的意见。他说，这个《苏共纲领草案》有两面性，刚才主席讲了。它包含一些正确的话，把赫鲁晓夫在"20大"的报告和"21大"的报告作了一些修补，比较起来有更大的欺骗性。这是他讲的第一点意见。

陆定一说，第二，这个《纲领》不仅比1957年《莫斯科宣言》倒退了，也比1960年81党会议的声明倒退了。倒退的表现就是他把原来苏共起草的81党声明草案中包含的一些重大的错误观点又写到他的《纲领》里去了。这些重大的错误观点，经过我们各兄弟党在81党会议上的斗争，在1960年《声明》定稿时已经删掉，现在他们又写上去了。比如，苏共纲领中写了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总路线，1960年声明里是修改的，因为不能只讲和平共处，还要讲国际主义，还要讲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比如，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反对单干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莫斯科81党会议上斗争很激烈，这是苏共针对我们安的两颗钉子。斗争的结果，都把它们删去了。这次在《苏共纲领草案》里又提出来了。可见苏共在莫斯科81党会议上的让步，同意删去一些钉子，补了一些正确的东西，是一种敷衍，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斗争的结果，虽然把他们的错误的东西搞掉了，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在思想上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放弃原来的立场。

陆定一认为，《苏共纲领草案》反映了赫鲁晓夫这一帮人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在世界范围内讲改良主义，讲人道主义，讲"三无世界"，不讲无产阶级革命，有一点西方资产阶级鼓吹的世界主义的味道；而在国内问题上，大讲全民党、全民国家，这就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粹，有如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早就讲过，阶级斗争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即：阶级斗争最终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新的意见。这是要害。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革命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现在苏共在它的《纲领草案》里大讲全民国家，说没有任何阶级冲突了，没有任何阶级斗

争了，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苏共纲领还大讲全民党，说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是全体人民的党了，党的阶级性质改变了。这是苏共在理论上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

第三，在国家关系方面，这个《纲领草案》讲了一些反对帝国主义的漂亮词句，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想跟帝国主义平起平坐，想争得一个跟肯尼迪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要跟帝国主义谈判达成妥协，搞"三无世界"。这实质上是一个先安内然后攘外的方针，矛头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针对中国、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国家的，就是要大家服从他的指挥棒，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实行大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合作，同社会民主党合作，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这就是过去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间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继续。

在这次常委会上，主要是陆定一讲，他讲得比较详细。在他讲话过程中一些同志也做了一些插话。插话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我们这两年的斗争是有效果的，把赫鲁晓夫拖住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拖住。

(二)赫鲁晓夫的思想反映在《苏共纲领草案》上是一种庸俗的唯物论，只考虑要生产多少吨钢、多少吨铁、多少吨石油、多少机床、多少粮食，而看不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既抹煞国内范围的阶级斗争，也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

级斗争。他的思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个规律反映在人类社会上,反映在当今世界上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有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也还有阶级斗争。所以说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是辩证的,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不是辩证唯物论。

在会议过程中,主席有很多插话。他说,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他是很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

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不服就整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说要搞裁军、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地位。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民族共产主义，说我们单干，其实我们搞的是自力更生。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学苏联的，首先是学列宁，其次是学斯大林，他们是搞自力更生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他不搞单干怎么办？只能单干。我们学的是他们，这有什么罪过？我们并没有要共苏联人的产，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呢？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们自己国家建设好。

毛主席说，当然，去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开得好的，我们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斗争是有成绩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限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撤退专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发表塔斯社声明谴责我们，是赫鲁晓夫搞的，是他首先骂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挑起争论，而是在他已经下了倾盆大雨之后，我们迫不得已起来抗争，才发表了三篇文章。不能不发表这三篇文章，我们应该坚持这三篇文章的立场。

毛主席说，现在，赫鲁晓夫又来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垒，就是把我们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质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22 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斗争很激烈，也可能只攻阿尔巴尼亚不攻我们，也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这个准备。说修堡垒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封锁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赫鲁晓夫这一套东西。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等他们通过以后就发表，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说，从这个《纲领》上看，现在赫鲁晓夫是违背81 党声明的。那个声明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是基本上

是好的，应该成为我们手里同赫鲁晓夫、同一切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要批评他们违反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81党《声明》，这两个文件是我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毛主席说，我们要高举这两面旗帜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要坚持团结。

毛主席说，当然，现在他们还没骂我们，他只发表了一个《纲领》，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也不好现在就来批评他。去年81党会议以后平静了一个时期，从去年12月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只是他要整阿尔巴尼亚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反对的。中苏方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维持1960年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那个状况，没什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公开吵起来。虽然现在是不死不活，但是比起公开吵起来还是有利一点。我们要尽量延长这个时间。如果他们在"22大"发动进攻，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被迫还击，叫做自卫反击。我们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也叫自卫反击。现在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民党，但是现在他背叛马列主义，已经对马列主义发动进攻，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首先对阿尔巴尼亚进攻，这些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是他还没有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围攻，

我们要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尽量延长这个时间,争取时间把我们国内搞好。

少奇同志在发言中说,这个《苏共纲领草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特别是1960年兄弟党会议否定的苏共领导的许多错误观点,又在这个《苏共纲领草案》中间出现了。应该说这个《纲领草案》是苏共领导、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执行的错误路线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讲,可以叫做"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个"三和两全"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个《纲领草案》是要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要继续革命了,实质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少奇同志还特别强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

第三节　赫鲁晓夫大搞"四反"

苏共"22大"是在10月16日到10月31日举行的。

在苏共"22大"召开之前,有消息说,苏共要在"22大"之后召开兄弟党会议,而且要各党都派第一书记参

加。因此我党中央在苏共"22 大"之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我党派什么人去参加苏共的"22 大",在"22 大"上采取什么方针;二是如果苏共正式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我党采取什么态度。

庐山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北京,因为当时主席还在外地,所以讨论这两个问题时,或者由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或者由小平同志召开书记处会议。

在少奇同志 9 月 20 日召集的一次小会上,少奇同志提出,从苏共的《纲领草案》上看,矛头是针对我们的,也是针对阿尔巴尼亚的,只是都没有点名。我党去参加"22 大",究竟对这个《纲领草案》采取什么态度?会议讨论后认为我党参加苏共"22 大"的代表团奉行的方针,仍然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前在常委会上提出的意见,即: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对苏方攻击阿尔巴尼亚,应表示反对,如苏方攻我,则进行反击。另外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苏共《纲领草案》中有建设共产主义的规划。我们在苏共"22 大"上表态的时候,采取的方针应该是只对它建设方面表态,只讲它是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只讲一些虚话,不谈什么实质性问题,根本不提苏共《纲领》本身。

第二,关于谁去参加"22 大",经过跟毛主席商量确定:毛主席当然不去,少奇同志也不去,只派恩来同志去。由恩来同志当代表团团长,而且在苏联只停留一个星期,

不等会议结束就回来,理由是国内事情很忙。因为这个时候国内事情的确很忙,正准备搞七年规划,这个规划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1961 年和 1962 年),再加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五年,一共七年。这个规划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

第三,如苏方提出要召开兄弟党会议,我应采取坚决抵制的方针。因为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时没有叫阿尔巴尼亚参加,这表明开兄弟党会议时他们也不会让阿尔巴尼亚参加。如果没有阿尔巴尼亚参加,那么只能是一个分裂的会,我们不能参加。所以如果苏共在“22 大”会议期间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要坚决反对。

中央提出这三点意见,经报告毛主席同意后,周总理即着手组织参加苏共“22 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彭真同志和康生等,着手做好各种准备。

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武昌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即返回北京。在节日前后,毛主席同常委曾多次议论苏共“22 大”问题,主要是在会见外宾前后。周总理在“22 大”的致词,是在 10 月 5 日小平同志主持的会议上讨论修改并经毛主席审定的。

苏共“22 大”前夕,总理率领的我党代表团于 10 月 15 日离京飞抵莫斯科。苏方表面上非常客气,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一直送到别墅,一路上有说有笑。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姿态是迷惑我们的。

据代表团发回来的报告,赫鲁晓夫在苏共“22 大”会

上做报告，有两点是出乎代表团的预料。

一点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首先是对美国的态度。在苏共《纲领草案》里，还是讲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还讲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祸根。可是赫鲁晓夫在报告里，对帝国主义的语气出乎预料的温和，近于乞求，大讲谈判、裁军、和平竞赛。

另一点是他大反"反党集团"、大反斯大林。所谓反对莫洛托夫等的"反党集团"问题本来早在 1957 年解决了，为什么事隔四年之后又来大反一顿呢？同时，赫鲁晓夫还在报告里大反斯大林，并大声疾呼要把斯大林遗体搬出列宁墓，焚尸扬灰。

原先我们估计他可能要反对阿尔巴尼亚，拿阿尔巴尼亚开刀，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这一点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公开指名大肆攻击阿尔巴尼亚。但是没有估计到他要大反斯大林、大反"反党集团"。

苏共"22 大"大搞"四反"，就是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

关于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配合反华的。因为他们一直是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来反斯大林，并要求各兄弟党也照这样做，比如要朝鲜党反对金日成，要阿尔巴尼亚党反对霍查，说中国党也搞个人迷信。这就是他反个人迷信、反斯大林的实质内容。这次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大叫要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可谓登峰造极。

关于反对"反党集团"的问题,就是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这些人。这个问题发生在1957年,因为他们党中央做了决定,当时我们只好表示支持。但当年举行莫斯科会议时,毛主席曾跟赫鲁晓夫说过,他们反对"反党集团"是不是可以考虑组织上不一定采取那样的措施,比方说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莫洛托夫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毛主席说,我们"七大"、"八大"都把王明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他实行"左"倾路线给党造成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直不做自我批评,反对中央的路线。他现在不是还住在莫斯科吗?我们还是选他当中央委员。事隔四年,赫鲁晓夫在"22大"又一次大反"反党集团",是出于一种什么需要呢?

当时中央估计,他们搞四反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就是毛主席讲的是安内的需要,就是说现在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受到国内的反对,党内也有人反对他。斯大林的幽灵时刻威胁着赫鲁晓夫,使他枕席不安,万般无奈,只好咬牙切齿地把斯大林大骂一顿,又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这个所谓"反党集团"拿来大贬一通。看来是这个需要。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在赫鲁晓夫做了报告之后,我代表团从莫斯科打电报请示中央,提出代表团对反阿尔巴尼亚问题要表态,对斯大林问题、"反党集团"问题不表态也可以,因为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都讲过了。但是对这样公开地在一个党的

代表大会上谴责另外一个兄弟党这件事，我们应该表态，请中央考虑。

中央收到代表团的电报后，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恩来同志以团长身份发表的致词中，除了原来的一般性内容以外，要增加一段表明我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大反阿尔巴尼亚。因为赫鲁晓夫讲话以后，其他支持他的兄弟党也跟着起哄，大骂阿尔巴尼亚。所以我们代表团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少奇同志指定我负责起草一段话插在总理致词的稿子里。这段话起草好经中央讨论修改并报毛主席审定以后发到莫斯科。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的、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具有的立场。"

周总理在 19 日致词的时候就加进了这一段话。这段话是比较含蓄的，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赫鲁晓夫等人大反阿尔巴尼亚，但实际上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中央的会议上，同时还决定要总理在致词以后再找赫鲁晓夫谈一次，表明我们反对他们大反阿尔巴尼亚的态度，然后立即动身回国。原来周总理只准备在莫斯科呆一个星期，现在更有必要提前回国。所以周总理在致词后，我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望在周总理回国之前跟赫鲁晓夫和其他苏共中央的同志会谈。

22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总理、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其他同志，苏方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的报告中间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做法，重申我党中央反对这种做法。周总理说，我们代表团在致词中谈到这个问题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我们对苏共的批评还是留有余地。周总理还劝告苏共要搞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周总理指出，他们最近对阿采取的行动，如3月间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通过谴责阿的决议，5月间苏军从阿港口法罗拉撤出，8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代表出席等等，都是不对的，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是不符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周总理希望他们郑重考虑中国党的意见，并且表示这些意见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向苏共中央提出的。

周总理还谈到关于斯大林问题，说明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多次向苏共中央谈过。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先后同米高扬和当时苏驻华大使尤金谈过，指出"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斯大

林功大于过。当年10月,毛主席又对尤金说,“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你们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间,毛主席又对尤金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斯大林。周总理还谈到:1956年10月至12月,刘少奇同志和他本人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会谈时,都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中国党对斯大林的系统意见,都写在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当时苏共《真理报》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但赫鲁晓夫却完全拒绝周恩来同志的劝告和批评。他反对中国党关于阿苏关系的批评和劝告。他也反对中国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立场,甚至说我们这样的立场是支持他们党内的“反党集团”,因此他表示要支持我们党内的反党分子。他在会谈中嚣张地说,“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赫鲁晓夫这些话的意思是表示:当他在困难的时候,就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他刚上台的时候,是很需要中国党的支持的,而现在他已经站住了,不管中国态度如何,他要走自己的路了,要沿着他的修正主义道路走下去了。

周总理在跟赫鲁晓夫谈话的时候,苏方没有谈起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提。

在周总理同赫鲁晓夫会谈之前，10月20日，少奇同志召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关于兄弟党会议问题。会上谈到，如果赫鲁晓夫提出要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怎么办。少奇同志预先就此同毛主席通了电话，商定采取坚决抵制、绝不参加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谈了81党会议以后苏共中央的表现。他说，苏共中央在过去半年内，在公开表现方面多多少少受81党会议《声明》的约束，表现得还比较缓和，但是他们在内部并没有停止反华。苏共"22大"之前，他们已经发表不指名地攻击中国的文章，针对我们党的观点，用阐述他们《纲领》的形式发表一系列的反华文章，为"22大"做准备。他们既要反对阿尔巴尼亚，又要反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兄弟党会议显然是不适宜的。小平同志说，兄弟党会议如果没有阿尔巴尼亚参加，我们决不参加。

小平同志认为，苏共"22大"形式上是围攻阿尔巴尼亚，实质上是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原因是阿尔巴尼亚曾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和后来的81党会议上支持了我们。现在他们拿阿尔巴尼亚开刀，这是杀鸡给猴看。他们想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来压左派，要他们不支持我们，孤立我们。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态度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看来，又一场争论不可避免，首先理论上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公开涉及政治方面、党的关系方面的问题，看来也难避免。所以今后召开兄弟党会议，如果没有阿尔巴尼亚参加，我们

决不参加。但是其他的国际群众团体的活动，特别是有关亚非拉的国际群众团体的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参加，还是要继续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和平运动。

少奇同志认为，公开反对阿尔巴尼亚、不指名地反华，是既成事实了，今后可能发展到指名反华。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请大家考虑。接着，少奇同志就提出他同毛主席通电话商定的方针，就是对苏共召开兄弟党会议采取抵制的态度。请大家考虑是否这样。

少奇同志说，在正常情况下面，兄弟党会议我们是应该参加的，但是现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出现了分裂主义逆流，首先是把阿尔巴尼亚驱逐出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可以设想有几种情况。少奇同志列举了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阿尔巴尼亚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

第二种情况，阿尔巴尼亚参加，他们也请我们参加。那样，我们必须提出：在兄弟党会议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对重大原则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第三种情况，中苏两党为召开兄弟党会议进行准备工作达不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反对召开这种会议；如果他们要开，我们决不参加。

第四种情况，如果苏共硬是要开，不管其他兄弟党参加不参加，即使他们拉了一帮人开会，不一定有 81 个党，也可能只有几十个党、甚至二三十个党参加，那样我们也

坚决不参加。不仅不参加，而且要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我们再也不能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踏进他预先布置好的圈套里面去。

少奇同志说，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已经上了当，以后再也不要上这样的当了。我们要坚决抵制。要开会就要先有准备，按去年莫斯科会议那个办法开，先是中苏两党会谈，然后是起草委员会开会。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不参加。这次我们给代表团的方针是抵制的方针。估计苏共可能不提召开国际会议，但也可能硬要开。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阿尔巴尼亚不参加以外，即使只有我们一家不参加，我们也抵制。因为这是分裂的会，不是团结的会。

少奇同志说，我们绝不能使苏共召开的这种分裂国际共运性质的兄弟党会议合法化，不受他们的围攻。总理在苏共“22 大”上的致词回答赫鲁晓夫是必要的，也是比较有分寸的。今后凡是没有阿尔巴尼亚党参加的兄弟党会议，我们决不参加。

少奇同志说，中苏关系今后可能会紧张起来，我们要求团结也没有用。中苏经济上的往来，他们不搞也没有什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极了。当然，赫鲁晓夫还是有他的两面性的。他还打着革命的招牌，因为有这个需要，他还需要打这个招牌骗人。但是，实质上他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相信苏联人民、苏共大多数人是不会完全跟赫鲁晓夫走的。至于西欧的党、美洲的党，可能有一些党变为社会民主党，但是革命

是不可阻挡的。

会议上少奇同志还决定把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电报发给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要他们在和赫鲁晓夫谈话的时候，如果赫鲁晓夫提出要开兄弟党会议，就坚决反对，并根据中央估计的四种可能来回答赫鲁晓夫。

周总理在苏共"22大"上的致词，在兄弟党中间的反应比较强烈，不少党很受震动。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没有提出要开兄弟党会议。可能他觉得在这次苏共"22大"上，那些跟他走的人在会上大反阿尔巴尼亚一通，他的目的似乎达到了，所以他再也不提开兄弟党会议了。

周总理10月24日回到北京，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机场迎接，表示支持总理在苏共"22大"上表明我们的立场。毛主席随即同周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一起到颐年堂，由总理汇报同赫鲁晓夫会谈的经过。周总理说，在苏共"22大"会上，苏共大反阿尔巴尼亚是不得人心的。在会上一共有40多个代表团的团长或代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在讲话时也大反阿尔巴尼亚。但是，另外有32个代表团的团长或代表在讲话时没有反阿尔巴尼亚，差不多是旗鼓相当。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赫鲁晓夫拒绝我们的批评，但理不直，气不壮。我没有参加听取周总理汇报的会议，是周总理在第二天（10月25日）找我去他办公室时扼要谈到的。他根据前一天在颐年堂商定的方针，布置我在《人民日报》上同时

发表苏阿两国报刊发表的苏共“22 大”期间有关苏阿关系的文件。我照办了。

苏共“22 大”之后，越南代表团回国路过北京，胡志明在跟毛主席谈话时说，对会上大反阿尔巴尼亚我就不鼓掌。他说，我坐在主席台上，看到在我坐的那一排对大反阿尔巴尼亚的讲话有多种对付的办法：一种是低头看文件，这是印度党高斯的办法；一种是埋头做记录、写东西，这是印尼党艾地和英国党高兰的办法；日本党野坂的办法是闭目养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下边，谁也看不见是鼓掌还是不鼓掌。胡志明说，这是我和黎笋的办法。胡志明说，这几种办法说明在兄弟党里面，好些人是不赞成苏共大反阿尔巴尼亚的。彭真插话说，我的办法是两手平摆在桌面上，动也不动，就是明白表示不赞成。

印度尼西亚党的艾地在参加苏共“22 大”后路过北京，他跟毛主席会谈时讲到：凡是苏共或其他党的代表谴责阿尔巴尼亚时，我就做笔记；胡志明就把双手藏在桌子底下，也不知道他是鼓掌还是不鼓掌；日共的野坂他一上主席台就闭目养神。艾地讲的这个情况跟胡志明讲的情况差不多。

从以上的情况看起来，一方面苏共“22 大”搞“四反”表面上是非常嚣张，但是也可以看到，同一年前的 81 党会议相比，不赞成反阿尔巴尼亚的人增加了。这次苏共“22 大”表明，赫鲁晓夫的地位不是如日中天，而是江河

日下了。

周总理提前回国后，由彭真同志任代理团长，继续参加苏共“22 大”的会议。彭真同志 10 月 30 日回国以后也作了汇报。中央常委在听取汇报时，对苏共“22 大”做了一些分析，但是没有详细地议论。因为当时中央正全力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第四节 对苏共“22 大”的看法

苏共“22 大”以后，中央对一年来中苏关系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是在 1962 年 12 月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对此专门作报告，少奇同志讲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最后毛主席也讲到反修斗争的问题。

在 12 月 21 日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前的）上，小平同志着重就反修斗争讲话。因为整个国际形势由周总理作报告。

小平同志说，苏共“22 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一个分裂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各国党都以这个为标志，有的赞成中国党的意见，目前还是少数，多数赞成苏共的意见。苏共内部也出

现维护斯大林的左派。其他党内也有分化。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从历史发展上看，这种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思想上的分歧必然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修正主义不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平共处”，马列主义者也不能和修正主义者同流合污，只有划清界线，才能领导人民继续革命。不仅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党已经出现了分裂，而且印度、法国、意大利的党也出现了分化的情况。许多党都面临究竟是跟赫鲁晓夫讲一样的话好，还是各说各的好的问题。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采取那种绝然的态度（按：12 月 15 日苏联政府宣布苏驻阿外交人员撤离阿尔巴尼亚和要求阿撤离驻苏的外交人员）以后，把阿尔巴尼亚推上按自己的立场独立发言的地位。各个党也都要考虑自己要讲什么话。这就使过去赫鲁晓夫一呼百应的那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小平同志说，苏共“22 大”表明，赫鲁晓夫又一次掀起一个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浪潮，以反华为特征。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现在的情况，同五年前苏共“20 大”以后的情况有所变化。中国的影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长了。孤立的并不是我们。相反的，赫鲁晓夫集团的威信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许多跟着他走的那些党的领袖们，在他们党内的威信也不是增加了，而是削弱了。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小平同志接着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不会来一个

挫折？他说，从这几年的情况看起来，挫折、倒退很难避免。从历史上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起有伏是合乎规律的。因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天也不会垮下来。因为世界上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斗争会继续下去，这中间可能有起伏，不会急转直下，我们还大有回旋的余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是一定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锻炼壮大。我们中国党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究竟是随波逐流、跟着赫鲁晓夫走，还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跟他斗争到底？中央反复考虑，认为红旗不能倒，我们还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全世界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希望我们能够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因为现在全世界确实只有中国这个大党能够担当起顶住赫鲁晓夫压力的重任。所以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

在接着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为说明书面报告而作的长篇讲话中，主要是谈国内问题，但是首先谈了国际问题。他说，这几年世界的形势本来对各国人民、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很有利的，对帝国主义是很不利的。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修正主义，威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分裂的危险摆在面前。这

是国际形势中间不好的一面。修正主义很早就出现了，有各种类型，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莫斯科型的。莫斯科型的修正主义开始于苏共“20大”，影响全世界。

少奇同志说，1956年苏共“20大”以后，召开过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1960年的81党会议，这两次会议对于世界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好作用。对修正主义者有一点作用。但是不能够完全约束他们，尽管他们在会议上签了字，但是会议之后仍然是他们干他们的，赫鲁晓夫还是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到了苏共“22大”，莫斯科型的修正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了。

少奇同志说，苏共“22大”的主要内容就是“四反”，而对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规划实际上并没有认真讨论。苏共“22大”以后，在12月3日苏联又断绝了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可以看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同志很狠，对敌人却很和，干了很多坏事情，暴露了他的面目。毛主席说过，苏共“22大”大暴露是一件好事情。遮遮掩掩、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会欺骗很多人。现在大暴露，大家就看出他的真面目了。苏共“22大”以后，修正主义地位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很可能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等四人所谓“反党集团”又加上一个伏罗希洛夫。他历来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掉他的对手的。

少奇同志说，据毛主席讲，在1957年毛主席访问莫

斯科的时候，在10月7日晚上的酒会上，赫鲁晓夫同毛主席交谈中大讲“反党集团”。赫鲁晓夫说，在斯大林断气之前，他就同布尔加宁商量，要采取一系列步骤消除和他们有分歧的人。赫鲁晓夫说首先要搞掉贝利亚，把克格勃抓过来；第二步是用布尔加宁取代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第三步是整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把他们和马林科夫打成“反党集团”。后来米高扬来中国时又得意地多次谈到赫鲁晓夫的计划，除了以上三个步骤外，还谈到第四步再把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搞掉，因为他们都是反对赫鲁晓夫的。至于朱可夫元帅，赫鲁晓夫怕他坐大，在搞掉莫洛托夫后很快就把他撤职，尽管朱可夫在打倒莫洛托夫等人时帮了赫鲁晓夫的大忙。

少奇同志说，看起来这次“22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大反“反党集团”是有他们内部的需要，就是内部有人反对他，他要用这个“反党集团”大帽子来吓唬人。所以说“22大”表明，赫鲁晓夫的阵地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关于大反阿尔巴尼亚也有同样的情况。赫鲁晓夫在他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这件事情是不得人心的，有三十几个党没有跟他一起谴责阿尔巴尼亚，不赞成他的人比81党会议的时候增加了。

少奇同志说，我们跟修正主义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关于世界革命的路线的分歧。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这三大问题，我们和修正主义之间有严重分歧。

因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不能不进行斗争，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听任他到处放毒。当然过去我们也没有完全听他的。在王明领导时是完全听苏共的。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干，不能学王明的样子，我们要坚决斗争，坚持原则。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回避。

少奇同志回顾历史时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欧洲组织了第二国际，把欧洲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这是好的。但是恩格斯死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叛变，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同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坚决的斗争，重建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并帮助许多国家组织了新的党。现在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也去世了，许多列宁和斯大林帮助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分歧、发生叛变呢？有这种可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分化了。这种分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好事，因为把界线划清楚了，不是糊里糊涂了，不是是非不分了。分清了是非就可以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就可以揭穿修正主义的面目了。

少奇同志又说，当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能够保持团结是好事情，而分化总的说来并不是好事情，只是在上述的一定意义上是好事。所以我们的方针是希望能把

分裂的时间推迟，使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做好准备。我们反对分裂，但也不怕分裂。他什么时候分裂也由不得我们做主，他要分裂有什么办法。到那个时候，我们要看到分裂的积极的一面，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分清了是非，划清了界线，泾渭分明，这样就可以使左派能够团结起来，使中间派不能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往哪里走，使右派越来越孤立。

少奇同志说，现在的形势比列宁那个时候好得多。列宁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很少，而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列宁那个时候多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关键是中苏关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看来不可避免，那么中苏关系是不是也一定分裂？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呢？少奇同志说，看来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维持现状；另一种可能是进一步恶化，但是还不分裂；第三种可能就是公开破裂。万一破裂怎么办？我们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有精神准备，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赫鲁晓夫一定要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实际上苏联对我们的所谓援助已经没有什么了，我们也不依靠他们的援助，我们搞自力更生。当然，他要做生意，我们也可以做，他不做也就拉倒。比方粮食，我们也可以跟帝国主义做生意。反正中国这块地方有自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玉皇大帝。毛主席多次讲过，天不会塌下来，树木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没什么不得了，不是地球就不

错误的东西，而是学正确的东西，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的经验。

毛主席说，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一定采取阿尔巴尼亚那种办法。即使苏联要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有 81 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现在苏联大反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党又指名反对我们，苏联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登反批评的文章，不要和他们争论，让他们骂。现在骂我们的人多着哩。历史上我们就是挨骂的，但我们也从来不怕孤立。现在我们的七千人大会代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开会，力量更大了，党更大了，还怕什么孤立呢！延安时期开"七大"的时候，解放区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人。现在我们新中国比那时的解放区大得多，我们更不怕孤立。实际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终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毛主席说，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不同于修正主义，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们要有倾向，就是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宁开始建党的时候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是少数，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苏维埃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决心发动十月革命。我们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我们暂时好像是占少数，实际上我们代表正确方面，终究

错误的东西,而是学正确的东西,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的经验。

毛主席说,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一定采取阿尔巴尼亚那种办法。即使苏联要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有 81 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现在苏联大反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党又指名反对我们,苏联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登反批评的文章,不要和他们争论,让他们骂。现在骂我们的人多着哩。历史上我们就是挨骂的,但我们也从来不怕孤立。现在我们的七千人大会代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开会,力量更大了,党更大了,还怕什么孤立呢!延安时期开"七大"的时候,解放区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人。现在我们新中国比那时的解放区大得多,我们更不怕孤立。实际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终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毛主席说,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不同于修正主义,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们要有倾向,就是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宁开始建党的时候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是少数,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苏维埃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决心发动十月革命。我们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我们暂时好像是占少数,实际上我们代表正确方面,终究

是会取得大多数人拥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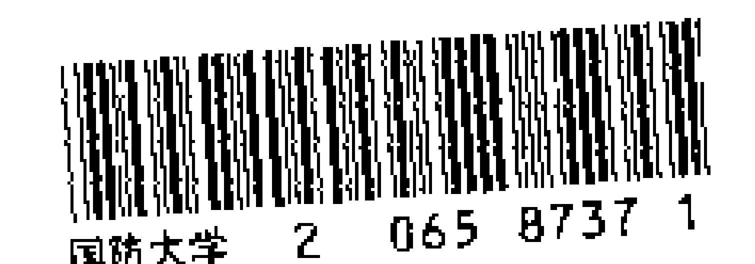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时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22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所作的报告。这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坡路了。

从上面小平同志、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对苏共“22大”的看法是：

第一，苏共“22大”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实际上反华，是一次“四反”的大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到此登峰造极，以后就走下坡路了。

第二，我们要有精神准备，要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于中苏关系，有出现破裂的危险。现在已经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苏共领导把公开破裂强加于我们。

第三，我们的方针是尽力推迟破裂。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也要坚持团结。他要破裂，我们要千方百计避免破裂，至少要力争推迟破裂。推迟破裂的目的，是使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能够有时间作充分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采取拖的方针、推迟的方针，就是过去曾经讲过的，即使赫鲁晓夫要破裂，我们也要赖着不破裂。到最后他一定要破裂，我们也可以采取对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各国党比较有利的



方式，原则是要坚持的，但方式可以灵活些。

第四，对目前苏共大反阿尔巴尼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做法，我们采取暂时不予理会、让他们骂、让他们充分暴露的方针，而把我们的力量集中搞好国内工作。七千人大会是一个全党总结过去三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全面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左"的倾向，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实行全面调整方针的大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调整时期，要集中力量把我们国内工作搞好。搞好国内工作是我们搞好国际斗争的最根本的保证。

第九章

走向公开论战

第一节　树欲静而风不止

苏共"22大"以后，我们党中央确定：继续集中力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采取力争缓和的方针。

在这个时期苏共方面又怎么样动作呢？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函我党中央，主要是回答我党代表团在苏共"22大"致词中不指名地批评苏共大反阿尔巴尼亚。来信给我党戴上"特殊立场"的帽子，指责我党采取和"兄弟党"不同的路线，支持阿尔巴尼亚党。来信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增进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党放弃所谓"特殊立场"，接受所谓"共同的

路线”。

我们党中央因为当时正集中力量解决七千人大会后的一系列国内问题，所以一直到一个月以后才讨论苏共这封来信。3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由少奇同志主持，对苏共这封信做了一些分析。会议上大家估计，苏共领导发出这封信的意图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真的想缓和一下中苏关系；另一种可能是为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制造舆论，装模作样地表示苏联是要改善关系的，把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还有一种可能是要挑拨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挑拨我们党和其他左派党的关系。

政治局会议确定：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首先是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如果我们不坚持原则，那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很难有力量来抵挡苏共领导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大反不赞成苏共领导的兄弟党的这种趋势。同时，我们也要把团结的旗帜举得更高，说明我们不是不要团结，我们是真正要团结，我们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

根据这样一个方针，政治局决定要给苏共中央写一封复信，在复信里主动提出要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同时要为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当时中央认为，与其这么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不如主动地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因为现在开会条件总不会比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时候更坏。布加勒斯特那次会是对我们搞

突然袭击，现在我们有准备地来开这个会，结果可能会好一点。我们可以建议苏联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苏联党和中国党先分别会谈；达成一定协议之后再开所有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12 个党的会议达成协议以后，才召开 81 党会议。

政治局当时认为，中苏两党可以先行会谈，但是目的是为着准备开兄弟党会议，而不是由我们两大党来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共同问题，这个要讲清楚。而且还要提出这次兄弟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共同路线问题和苏阿关系问题。所以中央同志要我们做起草工作的同志在起草复信时，首先要分清是非，讲清道理(但不要点赫鲁晓夫的名字)，然后提出建议。这封复信要写得理直气壮，合情合理，娓娓动听。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在二三月份有些兄弟党的倡议，如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都先后提议中苏两党先举行会谈，也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政治局认为，苏共 2 月间已经答复这些兄弟党，拒绝了召开国际会议，这次给我们来信也没有提到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把印尼党等的建议接过来，向苏共正式提出。我们先对苏共的来信作了答复，然后再答复其他兄弟党。对他们在来信里面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可表示在将来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予以讨论。

政治局会议同时还要求我们这些过去参加过莫斯科 81 党会议、起草过给苏共的《答复书》的秀才们组成一个

班子，收集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特别是苏共"22大"以后，苏联方面在正式的或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违反81党会议声明的材料，特别要收集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不指名地攻击我党的材料。还要联络部、外交部、新华社和调查部也专门成立一个班子，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当时还考虑，将来材料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班子就集中到钓鱼台，准备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

经过一个星期的起草工作，我们党给苏共的复信在4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定稿，正式发出的时间是4月7日，既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同时也由我国驻苏联大使交给苏共中央。

在这封复信里，我党中央正式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而且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分五个步骤来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苏阿两党举行会谈，召开苏、阿、中三党会议，然后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会议，最后召开81党会议。

对于我们4月7日的信，苏共在5月31日做出答复，实际上是拒绝召开兄弟党会议。因为它在复信中把阿尔巴尼亚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开兄弟党会议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要阿尔巴尼亚党放弃他们的立场，向苏共领导屈服。这实际上也就是拒绝了我们信里所提到的五项建议。

更为恶劣、更为严重的是，在苏共中央2月来信之后，在1962年四五月间，苏共领导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

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煽动好几万人（具体数目当时没有统计出来，后来统计约5万人）跑到苏联那边去。对这种颠覆事件，当时我国政府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而且要求苏联驻伊犁、乌鲁木齐的领事馆停止工作，要求他们撤销这两个领事馆，因为是他们在那里直接策动大批人逃到苏联去的。

事情也很凑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对我们进行挑衅，台湾蒋军在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先后有许多股国民党军小部队在那里登陆。

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面，都是趁我们经济困难、全力调整，无暇顾及边境的情况下，利用这个机会互相呼应，对我国突然袭击。当然，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登陆的一股股小部队都给我们消灭了，有的退回去了。但是，苏联的确骗走了我们几万人。这件事情反过来也说明苏共的2月来信是一个幌子，装出一点缓和的姿态，实际上是搞阴谋。尽管我们希望缓和一下中苏关系，但是苏联方面却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我们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搞颠覆活动。

这是1962年上半年中苏关系的情况。这种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们努力缓和而有所改变，而且从下半年9月起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节　中印边境冲突与美苏核对抗危机

中印边境冲突和美苏核对抗危机（通称“加勒比海危机”）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都在1962年10月份达到紧张的高峰。先讲中印边境冲突。

自从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以后，印度方面就在中印边境集中军队，1959年曾先后两次侵入中国领土，挑起边境冲突。一次是1959年8月25日，一次是1959年10月20日。前一次是从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中国领土，后一次是从中印边界西段，越过贡喀山口侵入新疆南部的中国领土。

前面已经讲过，对1959年的那次中印边境冲突，苏联方面采取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态度。赫鲁晓夫先是在9月9日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后来10月间到北京来的时候又无理指责中国。由于我们对印度一方面提出强硬的抗议，一方面顾全大局、主动退让，结果使中印边境的冲突平静了一个时期。

可是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又不断地入侵中国的领土，在中印边界东段的好些地方越过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中国领土一侧又建立起许多新的据点。到1962年底，西段越界的据点达到40多个，有的据点距离

中国的哨所只有几米。中国政府曾经向印度当局发出多次照会，要求互谅互让、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无理拒绝。

到了 1962 年上半年，印度大批军队向中印边界开进。7 月 22 日，印度军队侵入中印边界西段我国领土新疆的一个河谷地区。9 月 21 日，又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我方一侧地区，打死打伤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多人。

对印度军队这两次入侵行动，中国政府都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但是印度方面无理地拒绝了我们的抗议。我们一方面向印度提出抗议，一方面命令我们的边防部队不准开枪、不许同印度军队发生冲突，在印度军队进逼时我们要后退，力求避免冲突扩大化。但是，印度当局以为我国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印度军队越来越嚣张，后来发展到印度士兵把我们哨兵的枪都抢走了。到 10 月间，印度在边境一带集中了大批部队，摆出了要大打一仗的架势，形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我们接连七次之多的严重抗议，仍然没有停止印度军队前进，而且在议会里公开攻击中国，声称要把中印边界沿线的中国军队清除掉。

面对这种情况，又鉴于 1959 年中印边境冲突时苏联的态度，我国政府在 10 月 8 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印边界上印度集中了大批军队，看来它要发动战争，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说尼赫鲁悬崖勒马。

10 月 13 日，苏联方面由赫鲁晓夫出面找我国驻苏

联大使刘晓谈话。赫鲁晓夫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的立场，并且还表示，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是要对印度提出强硬抗议的，也是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赫鲁晓夫采取这种态度，同当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关系紧张有关，那时他需要中国支持。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就在我军进行自卫反击的同时，党中央预先对我们的边防部队下达命令：第一，打到喜马拉雅山山脚就必须停止前进；第二，稍后就要主动地撤退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北；第三，停火后主动地遣返印度军俘虏；第四，还要主动地把我们从印度军队那里缴获的枪支交还印度。在自卫反击中，我们边防部队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10月2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中印边境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这个时候，苏联《真理报》10月25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支持中国的立场，也认为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支持中国政府10月24日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

我国政府在声明中建议中印双方军队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并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在边界东段撤回到实际

控制线以北，在中段和西段保证不越过传统的习惯线，为此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但是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政府只好单方面宣布 1962 年 11 月 22 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且从 12 月 1 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撤到第一次发生中印边境冲突前的 1959 年 11 月 7 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而且还从这条实际线再后撤 20 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立场是十分克制的，做到仁至义尽，极力忍让，不愿意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突然改变了立场。他在 12 月 12 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公开指责中国。他说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前进呢？意思是说仗是中国打起来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国的领土。他的这个讲话，和他 10 月间跟刘晓大使的谈话以及 10 月 25 日《真理报》发表的社论，立场完全相反，从支持中国变为指责中国，从不赞成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变为指责中国越过边界。赫鲁晓夫这样翻云覆雨，虽然是他反复无常的一贯作风又一表现，但是，他这样做又同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美苏核对峙危机有关。

所谓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核对抗危机，就是 1962 年上半年美国积极准备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准备发动一场入侵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在这个时候，苏联是表示支持古巴的。但是，在 6 月左右，赫鲁晓夫竟然

把中程核导弹和能够携带原子弹的苏联伊尔－28轰炸机秘密运进了古巴。

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是十分秘密的，但是美国在8月间就开始发觉这种迹象。美国的情报说，苏联在古巴有核导弹，但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到9月初，肯尼迪发表声明，警告苏联不能在古巴设置核导弹武器。9月11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声明，否认企图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

过了一个月，10月16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建设导弹发射场，同时还发现苏联在古巴装配伊尔－28轰炸机。这时美国非常紧张。肯尼迪要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见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但葛罗米柯一口否认有此事。

美国总统肯尼迪为此下令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白宫班子紧急讨论应急方案。据肯尼迪的弟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讨论中有人主张马上轰炸在古巴的苏导弹基地，有人主张马上在古巴登陆，也有人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因为他们估计苏联这个导弹基地的导弹和原子弹不一定已经全部运到古巴，所以主张实行海上封锁，对所有来往古巴的船只进行检查。肯尼迪决定采纳了实行海上封锁的方案。

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500英里的范围内，

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他说美国已经动员了 100 多艘军舰对古巴实行封锁。

在这同时，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导弹基地。赫鲁晓夫在第二天（10 月 23 日）的回信中，声明苏联在古巴没有建立导弹基地，而且宣称苏联不遵守美国的封锁，认为这是海盗行为。这样一来，形势更加紧张了。

肯尼迪于是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如果苏联无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硬是继续用船把导弹、核武器和飞机部件运往古巴，美国怎么办？在一番紧张的讨论之后，肯尼迪决定，如果发现苏联船只进入封锁区，美国军舰将加以拦截，并上船检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报，说有 21 艘苏联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驶。这时白宫的气氛非常紧张。开会的时候肯尼迪一言不发，拉长了脸，脸色苍白。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跟他隔桌面对面地看着。据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这段情况时说，那时好像地球停止了转动。大家就这样紧张地等着苏联的船究竟是不是要越过封锁线，如果越过这个封锁线，美国海军就要登船检查，这就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以至爆发核战争。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国部队包括核导弹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B－29 飞机携带空对地核导弹升空盘旋警戒。同时还有 20 个中队的空降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袭击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发射场。可是最后传来消息说，苏联的船只驶到警戒线的地

方就停了下来，随后就掉头回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事后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地球好像一度停止不动了，现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参加白宫会议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隔了一天，又发现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还在继续建造，伊尔－28也还在装配。肯尼迪于是又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要求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

肯尼迪政府虽然实行海上封锁，但美国军舰并没有检查过往的所有船只，只选择了一艘苏联向巴拿马租用的客轮，检查以后就放行了。据罗伯特·肯尼迪讲，当时考虑检查客轮的时候，一方面是不要把苏联逼到墙角，留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给赫鲁晓夫一个警告，要他不要继续把导弹核武器运进古巴。

赫鲁晓夫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把携带核武器的导弹运到古巴，这本身就是极为冒险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决不会容忍别人在它的卧榻之侧放置核武器。苏联已有远程的洲际导弹，何必要在离美国这么近的古巴设这么一个导弹基地呢？而且这个导弹基地并不能保卫古巴，美国在古巴登陆时又不能使用核导弹加以阻止，而一旦动用核导弹，就会引发核大战。所以说赫鲁晓夫这一着棋实在是非常危险，是十足的冒险主义。

赫鲁晓夫这个人腰杆子并不硬，他骨子里害怕美帝国主义。所以他在肯尼迪政府采取这样的封锁措施之后

就软下来了。他在26日晚上给肯尼迪复了一封信，说美国的封锁已经毫无意义，导弹已经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议：一、苏联不再向古巴运进核武器，已经在古巴的导弹撤除或者销毁；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解除封锁，并且保证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国一架U－2飞机在古巴被击落，白宫会议决定轰炸古巴导弹基地，整个白宫空气紧张到极点。后来肯尼迪又不赞成，最后决定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即：赫鲁晓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并且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这是侵犯古巴主权）。

这样加勒比海美苏核对峙的危机以赫鲁晓夫的完全屈服而结束。

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了一本叫《十三天》的书，主要是回忆10月16日到10月28日这十三天的情况。他记录当时情况说，10月27日白宫开会时空气紧张到极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终生难忘。从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很心虚的。赫鲁晓夫先不该贸然把核导弹运进古巴，后来也不一定采取完全屈从美国的做法，表现了十足的投降主义。

赫鲁晓夫这个人，一方面可以犯冒险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犯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危机过程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国政府在10月25日、10月30日两次发表声明，

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也没有反对他把导弹撤出古巴。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惶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苏核对抗的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他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做法辩解，不指名地攻击中国，而且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时，一反他在10月间曾经赞成中国反击印度的立场，公开攻击中国自卫反击并在反击后主动后撤。他这样翻脸攻击中国，不但因为这时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讲话，是他发动新的反华浪潮的信号。

第三节 “围剿”和反“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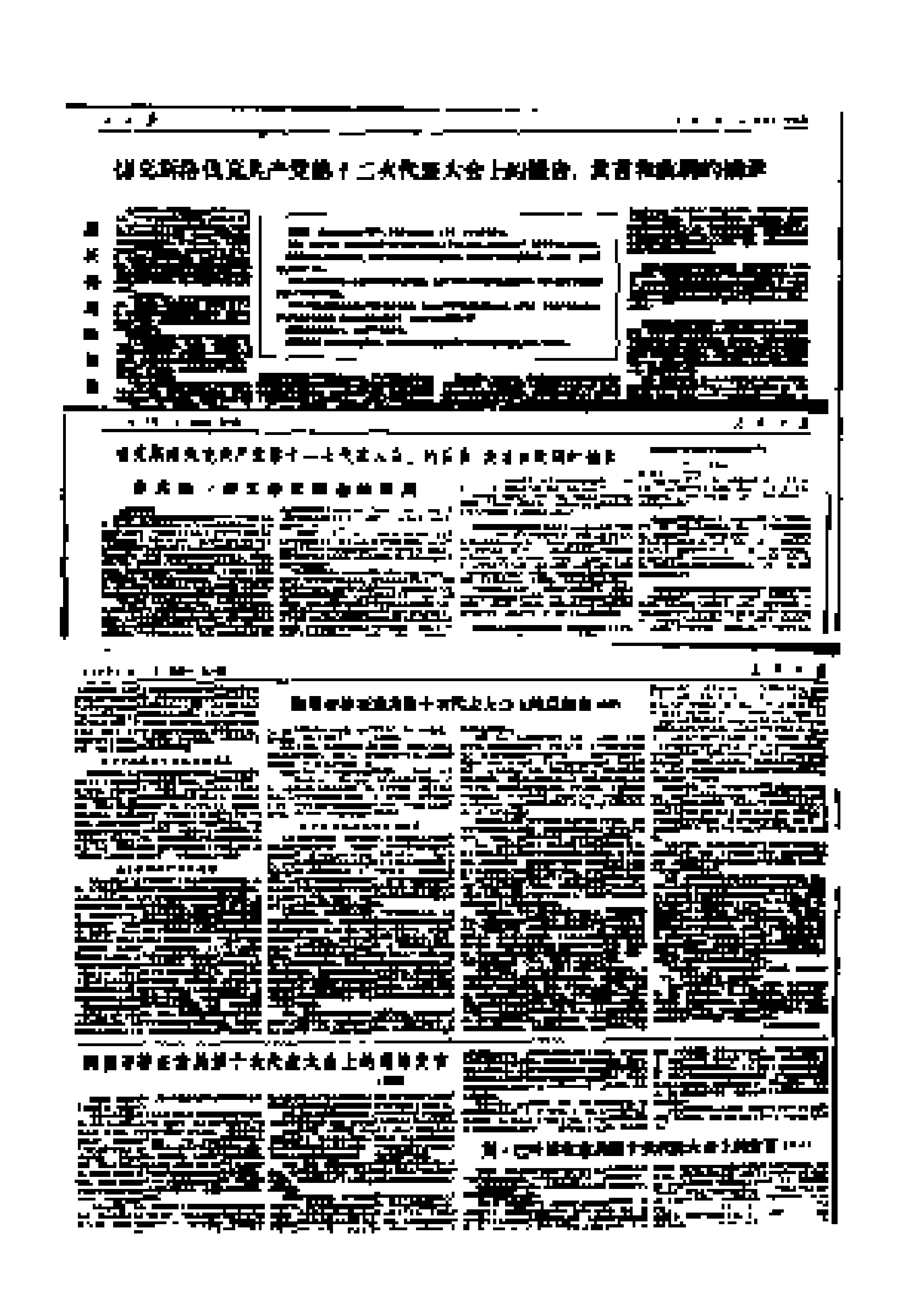
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失败后恼羞成怒，他没有

胆量把怒气冲向美国，而是把怒气冲向中国，冲向阿尔巴尼亚。加勒比海危机刚刚过去，从 11 月起，赫鲁晓夫发起一个“围剿”中国的运动。

从 1962 年 11 月初到 1963 年 1 月下旬，有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举行了代表大会。它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按照苏共“22 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一次比一次恶劣，一直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

我没有跟我党代表团去参加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除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是由赵毅敏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以外，其他四次都是由伍修权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的。他们两位当时都是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

参加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工作非常紧张，而我们在国内工作也同样紧张。当时中央指定我参加由宣传部、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我因为在这之前刚主持起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再论尼赫鲁哲学》这篇长文，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又主持写作《人民日报》的有关评论，连续作战，相当疲劳，但仍然尽力而为。这个工作小组负责对五个党的代





1962年12月至1963年2月,《人民日报》登载的欧洲五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表大会的情况先行研究、分析，然后提出对策，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起草有关的致词、声明和评论，还负责起草中央给代表团的指示电报。

这个小组日常工作由“秀才们”做，“秀才”周围还有七八位助手。我们每天都收到我党代表团从国外发回来的情况报告以及有关问题的请示。我们根据这些情况逐一地研究在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内容，把他们攻击中国党的问题加以分类、排队，然后抓住一些主要问题准备反击。同时，在代表团参加这些外国党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根据代表团的请示和中央对请示的答复起草电报；根据会议的情况对原来起草好的发言稿的相应部分进行修改、补充；起草我党代表团准备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发表抗议声明的稿子。每个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先发表他们主要的反华言论，然后发表我们的评论，加以答辩。

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多次会议，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因为在处理中印边境我军自卫反击战后，毛主席到外地休息和视察，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决定都跟毛主席通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大多数情况是毛主席同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决定，有时毛主席也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中，首先召开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 1962 年 11 月 5 日到 14 日

举行的。苏共是由苏斯洛夫当团长参加的。这次代表大会一开始,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在他的报告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时用比较隐晦的语言对我党进行不指名的指责。随后经过苏共代表团的策划,会议逐步升温。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和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指名攻击我们党。

根据对方的安排,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11月8日致词。代表团从国内出发的时候,小平同志向代表团交待,如果会上没有反阿、反华,我们代表团宣读已在国内定稿的祝词就行了,但是要准备他们像苏共"22大"那样反阿尔巴尼亚,所以要准备一段话来表明我们的态度。因为当时没有估计到这次大会上会指名地攻击中国党,所以在拟定的代表团致词稿里只准备回答反阿的一段话,没有回答反华的内容。代表团在8日致词时宣读了原来准备好的稿子,其中包括回答反阿的一段。我们代表团致词后,有些兄弟党和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在发言中进而接连指名攻击我党,这时代表团才感觉到,我们在致词中间只回答反阿,没有回答反华是一失着,但这时没有发言的机会了。

第二个大会是从11月20日起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事先向代表团交待,鉴于保党大会的经验,代表团在致词中要准备不仅回答反阿,而且要回答反华。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会议一开始,匈牙利党的代表和外国党的代表在发言和致词中就攻击

阿尔巴尼亚党和我党。我们代表团被安排在第二天(21日)致词。伍修权同志在致词中明确对会议出现的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言论表示遗憾。

在这之后,在整个匈牙利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有三十几家兄弟党的代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也不指名甚至指名攻击我们党,比起在保加利亚党代会上只有二十几家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们党的数目显然是增加了,调子也升高了。针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应该如何表态。

中央收到这个电报以后,少奇同志召集会议商量,认为匈牙利的这个会很快就要结束了,对这个事情要做紧急处理,要我们立即起草一个声明,发给代表团,以便在会议结束之前能够发表。同时还要起草小组再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要求代表团抓紧时机,抓住要害来进行答辩,集中讲三点:第一,中苏关系和苏阿关系的恶化责任在苏共;第二,这场反华大合唱是苏共一手导演的;第三,提出召开兄弟党代表会议来消除分歧。我们把这个电报连同声明一起发给了代表团。

我党代表团的声明稿中,先讲我们代表团带着加强团结的愿望来参加大会,然后讲到现在有一些党、有一些人还在不断地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分歧,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利用一个又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指名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声明着重指出,这种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来攻击另一个党或另一些党的

做法，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是极不正常的，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声明最后主张召开兄弟党会议，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代表团收到这个声明和中央复电的时候，正是匈牙利党代会上午刚刚结束并定于晚间举行招待会之前。代表团根据中央指示，抢在匈方举行的招待会上宣读了这个声明。据代表团同志回来后说，因为我们的声明稍微长一点，如果当时我们讲一段翻译一段，比较费时，容易中途被打断，于是将声明稿译成匈牙利文和俄文，在招待会上先由团长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翻译把声明的全文用匈牙利文念完，念完之后把声明的匈文稿和俄文稿当场散发。

据代表团同志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匈牙利党和苏联党都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当时他们表现得很慌乱。苏联代表团马上同匈牙利代表团商量，临时找出一个党的代表，可能是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临时发言，乱骂一气。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走到我们代表团面前，说对我们发表这个声明表示遗憾。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当时就非常生气地对他说，你们大会上骂我们，现在又在招待会上骂我们，你们的招待会我们不能继续呆下去了。说完后我们代表团立即退席。

第三个大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 12 月 4 日开始到 12 月 8 日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诺沃提尼开始作报告时，就猛烈地攻击了阿尔巴

尼亚，同时还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党，说支持阿尔巴尼亚就是支持他们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个发言的是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他也是大骂了阿尔巴尼亚一顿，而且还不指名地攻击他所说的“所谓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暗指我们党的。

他们两人的讲话等于是发出动员令。所以在他们两个发言之后，除了个别的党以外，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在会上讲话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攻击阿尔巴尼亚，而且公开地、指名地指责中国党。这样，在这次捷克党的党代会上，反华再一次升温了。在60多个外国党代表团中间，有50多个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其中有20多个指名攻击我们党，从数量上讲，比保加利亚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增加了。

在这次大会上，朝鲜党的代表团团长挺身而出，在致词中不同意会上对中国党的攻击，指出这大大损害各国工人阶级的共同事业。朝鲜代表团团长明确说，“如果说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朝鲜党代表的这个致词也受到了一些党代表的指责。所以说这次大会的情况比前两次的大会要严重得多。

捷克党这次也学匈牙利党的样子，把我们安排在第二天致词。看来他们的企图是要我们代表团先讲，然后在我们发言之后他们再骂我们一通，使我们没有机会反驳。但是，因为诺沃提尼和勃列日涅夫已经首先攻击了

我们，所以我们代表团在致词中间就回答了他们对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我代表团在致词中说，"我们对于一年以前开始发生的(指苏共'22大')、以后又一次再次发生的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对别的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攻击的做法，表示深切的痛心。你们的代表大会又一次重复了这种破坏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做法，使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在我们代表团致词的时候，会场上出现一场闹剧：拍桌子、跺地板，一阵阵嘘声、起哄、喊叫。但是我们代表团没有理会这些，镇定地坚持把稿子念完。

中央接到代表团的报告后，少奇同志在12月7日上午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情况。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东欧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反阿反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捷共的大会极不正常，我们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会议决定由我代表团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并批示代表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但是要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退出大会，要坚持参加会议到底。在常委会上，小平同志要我们一方面起草一个电报，把中央的指示告诉代表团，另一方面再起草一个特别声明，一并发到布拉格。我们在当天就起草了这两个稿子，当晚送小平同志修改后即由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核定，8日凌晨发给代表团。

在北京拟定的我党代表团特别声明说："我们党的代表团是抱着增强兄弟党的友谊、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团结的真诚愿望来参加这次大会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和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利用这次代表大会的讲坛，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且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利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动，我们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声明同时还批评了这次大会的反华闹剧，说这次大会甚至采取喧嚷、嘘声等不正常的方式，并不能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也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错误做法，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只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据我党代表团回京后汇报说，代表团收到北京发来的指示和特别声明稿以后，马上把声明稿译成捷克文和俄文，并赶在大会结束前把打印好的声明带到会场上去。在诺沃提尼总结讲话结束之前，我们代表团就把这个声明送交给大会的执行主席，请求大会执行主席把我们的声明发给各国党的代表团。我们代表团去交稿子的时候，还特别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份俄文稿。

大会执行主席收到我们的声明后，马上拿了一份送给正在讲话的诺沃提尼。诺沃提尼中断了他的闭幕词，拿起我代表团的声明看，表示很生气的样子。但是，有意

思的是，他接着就在会上宣布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来了一个声明，要我转给各兄弟党代表团，现在我把他们的声明先念给大家听一听。这样他就把我们党的声明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诺沃提尼这样做是表示一种气愤呢，还是认为不得不向中国党做一点交待呢？这就无法肯定了。但是，无论如何，大会所有的人终于都听到中国党的回答了。

散会的时候，捷克党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声明的俄文、捷克文的稿子退还给我们，说他们的大会没有义务给我们分发。于是我们代表团自己发，既在会场上发，也在会外发，把这个声明发给各个兄弟党的代表和在场的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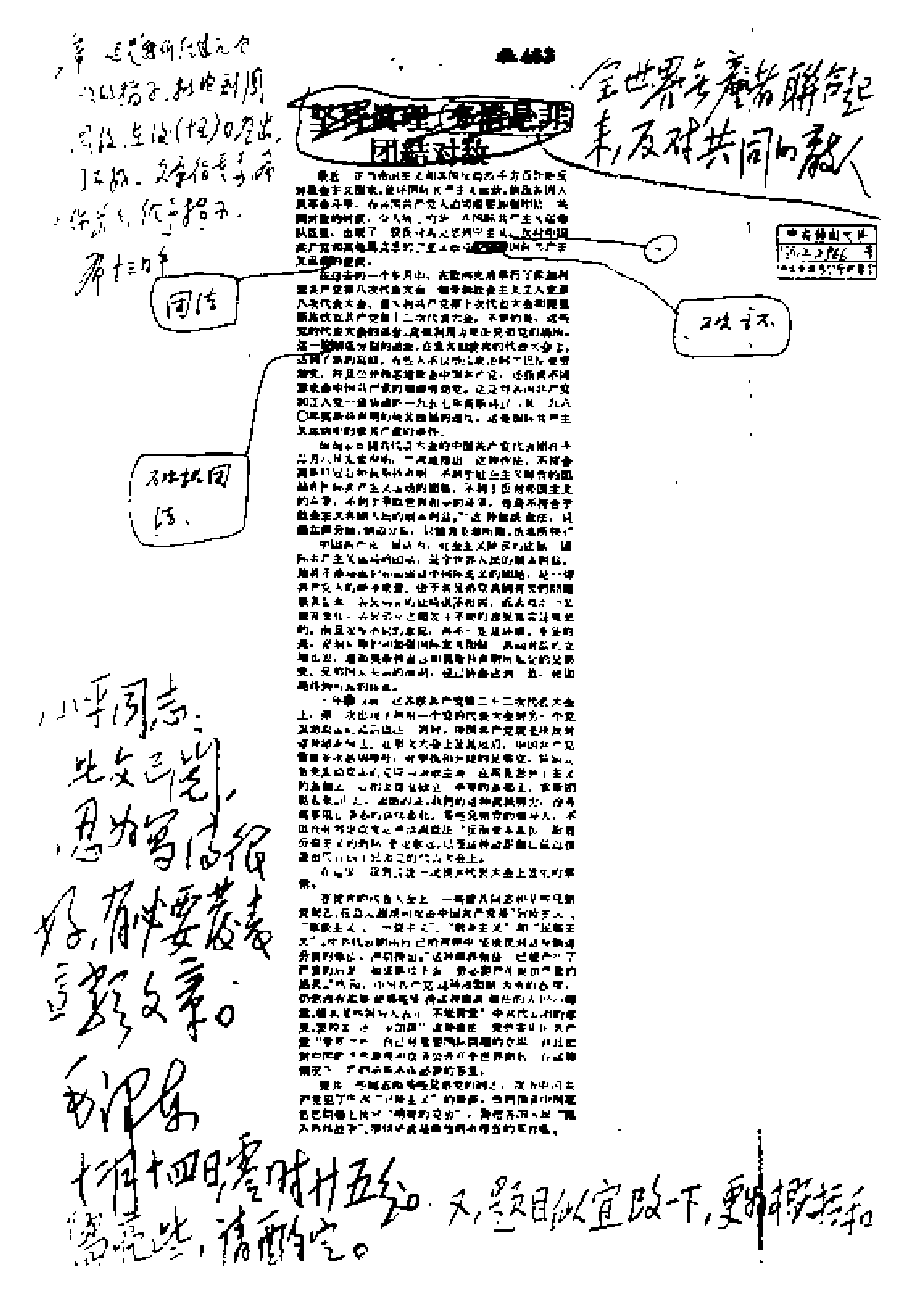
在上述12月7日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除讨论决定给我们代表团发指示和发表一个特别声明外，当时还决定准备写几篇评论，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攻击，首先要评论捷共大会。在公开评论之前，先发表他们的重要反华言论。但是根据毛主席多次意见，我们暂时不公开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留有余地。会议的以上意见，由杨尚昆同志打电话给毛主席，征求他的意见。毛主席同意常委会的决定。于是我们马上动手起草评论。

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14日回到北京。我们也在这一天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在《人民日报》刊登诺沃提尼和其他兄弟党以及捷共代表在捷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反华言论。第二天(12月15日)就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的标题是毛主席改的。毛主席当时在武昌,我们写好以后就发到那里,请毛主席最后定稿。毛主席在这个稿件上作了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毛泽东　12月14日零时25分"。他把社论题目改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并写了几句话:"题目似以改一下更为概括些和响亮些,请酌定。"(按:原来底稿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

这篇社论在12月15日发表。社论综述了保、匈、捷三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党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述我党的观点。社论着重回答了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并指出这些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社论还指出,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能采取以多数压少数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社论最后呼吁各国共产党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



1962年12月14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稿重新拟写的标题及给邓小平的批语手迹。

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从苏共“22大”开始，经过保、匈、捷这三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进行“围剿”之后，我们发起反“围剿”，也就是在他们开始公开论战之后，我们被迫不得不同他们进行公开的论战。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意大利共产党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都是在12月份。在这次意共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和其他人也公开攻击中国党。少奇同志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回答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的稍有理论色彩的讲话，由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回答，同时也指示《红旗》杂志写一篇论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长篇论文。

这样我们在1962年12月31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3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篇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送给在杭州的毛主席审定的。他在12月30日写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这样，公开论战就全面展开了。由于苏共领导这时还没有公开指名反华，这两篇评论同对捷共大会的评论一样，都只是指名回答了捷共和意共领导，或者泛称现代

修正主义的论点，都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但是，我们评论的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的论点。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评论，分七个章节，主要回答了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兄弟党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的观点，既批判了陶里亚蒂，也详细阐述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评论最后说，我们不得不公开讨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某些意共同志同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这本来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不是他们首先公开挑战并且坚持要公开辩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诚挚地希望，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能够消除这种分歧。尽管令人惋惜地看到陶里亚蒂和同他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我们仍然热烈地期待着他们不要越陷越深，能够迷途知返，回到马列主义立场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上来。我们愿意向前看。我们多次提出，应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当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现代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社论

1963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1965年第1期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文。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什么等问题。评论概括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斗争类似于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就从理论高度阐述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为这场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以上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63年1月15日到21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由赫鲁晓夫亲自出马,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耍了一个花招,他一方面在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的同时,第一次指名攻击中国党,另一方面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大会在安排发言的时间上也费了心思,就是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两人先讲,而把我党代表的致词安排在他们讲话几天以后。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讲话以后,其他兄弟党也根据他们的口径,一方面攻击中国党,另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就是说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后要求我们不要答辩。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他们把我们代表团发言的时间安排到18日,而且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说这次代表大会只邀请各国党的第一把手为团长的来宾在会上致词。这就是说只有代表团团长是本党的第一书记才有资格在会上讲话。但是他们又说中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党除外。因为捷克斯洛伐

克党的诺沃提尼没有来参加这次大会，所以他们说，允许中国党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同志跟捷克党的代表团团长有在会上讲话的机会。至于其他党的代表，只能每一个地区派一个代表讲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他们鉴于一个多月前在捷共代表大会上朝鲜党的代表团团长发言时反对他们指责中国党的做法，所以他们要剥夺那些支持中国党的其他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他们想控制大会上的发言，只允许那些攻击我们党、听赫鲁晓夫指挥棒的党的代表讲话。

从赫鲁晓夫的发言看，他看到我们开始反击，而他自己本来就很虚弱，许多观点也站不住脚，公开争论下去对他不利，所以他毫不讲理地指责我们党进行答辩，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且还把阿尔巴尼亚党放弃自己的观点作为停止论战的条件，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要停止公开论战，而是拿这个做幌子，迷惑一些人跟他走，以压服我们放弃答辩的权利。在他讲话之后，许多党的代表在讲话时也是攻击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并要求我们党改变立场，停止公开论战。

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我党代表团打电报请示中央如何表态。少奇同志于1月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根据上述情况修改代表团的致词，采取高姿态，主张真团结，反对假团结，揭穿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诡计。会议还决定指示代表团：要力争在大会上讲话，而且要准备可能在讲话过程中间

遇到干扰，甚至打断我们的讲话、不许我们讲完。所以代表团一定要事先把讲话翻译好、打印好，并且动员所有在柏林的中国同志，包括我们使馆的、代表团的、新华社的同志和留学生，在代表团讲话后从几个方面把代表团的讲话稿散发出去。

经过修改后的代表团致词，主要是强调各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那个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我们在致词中不指名地指出，对那些表示和解的建议，我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致词还强调：我们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并且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来攻击另外一个兄弟党的做法，对此我们再一次表示极大的遗憾。

由于我们代表团的发言揭穿了那种搞假团结、真分裂的诡计，所以在我们代表团致词过程中，大会执行主席一再摇铃制止我们的发言，而且从主席台上一直到整个会场，都发出一片喧闹声，吹口哨、拍桌子、跺地板，胡闹一气。但是我们代表团团长还是很有耐心，在他们闹的时候，就暂停讲话，让他们闹，等他们闹完以后又接着讲，他们再闹的时候我们又停下来，闹完以后我们又再讲，坚持把祝词念完。同时对他们这种胡闹的做法，我们代表团团长临时离开讲稿，说他们这种做法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文明”。当时我们自己的翻译也把这些话同声传译翻译出去了。我们的致词稿也由柏林的中国同志全体动员散发出去了。

在北京，中央根据代表团的情况汇报，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修正主义者们反阿反华的新高峰，赫鲁晓夫亲自出席指挥，而且还假惺惺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因此很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一方面高举团结的旗帜，一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诡计加以揭露。中央认为，现在还不到公开点赫鲁晓夫本人的名字的时候，但既然提出公开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公开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 大"开始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 月 21 日结束。《人民日根》在 1 月 27 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主席在杭州审定这篇社论。他在 1 月 25 日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护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的《莫斯科声明》。社论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 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我们党曾做了种种努力，要求停止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反受到了某些人（社论没有点名）一连串的指责。

社论还讲到，我们党从 1962 年 4 月起就主张召开兄

弟党会议,通过同志式的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建议各兄弟党应该进行准备工作,以缓和关系、改善气氛,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在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创造条件来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党中央在 1962 年 4 月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们的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这次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的两个多月中,有不少兄弟党的代表,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坛来攻击阿尔巴尼亚,攻击中国党,甚至还攻击朝鲜党。

社论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严格遵守两个文件,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只能是假的团结。

社论强调说:我们认为,一面要求停止攻击,一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社论最后呼吁:希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这篇评论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响应。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违反《宣言》和《声明》,继续攻击

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们当然有权利予以答辩。

这时，毛主席已从杭州回到北京，主持2月11日到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原定是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也讨论城市“五反”运动和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四清”运动。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会议议论很多的议题之一。会议决定继续抓住几个主要问题写答辩文章。

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继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即：《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2月27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评论综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回答那些指责中国党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兄弟党的。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兄弟党最恶劣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等人。评论追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始于苏共“20大”。但评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表示不准备在本文中讨论这个问题。评论只从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通过《宣言》以后，特别是1959年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并采取了违

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一系列行动。评论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党把分歧公开化时，指出分歧公开始于1959年9月9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评论在这里没有指明苏联和塔斯社，仍然留有余地。评论指出，鉴于发生上述错误言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澄清是非。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某些同志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策动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突然袭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在这之后，又不顾国际信义，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恶化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评论在这里仍然没有指出这些都是苏共领导干的。

评论追述1960年兄弟党代表莫斯科会议之前以及会议期间经过激烈争论才通过协商一致，消除了分歧，达成了协议即《莫斯科声明》。评论回答多列士等指责中国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违背《声明》时指出：违背的不是中国党，而是苏联同志没有听取中国党的多次劝告，反而采取了进一步恶化苏阿关系的措施，直到在苏共"22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直到在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反阿、反华，并指责其他兄弟党。

评论特别申述了中国党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回答多列士等人对中国党的攻击，并列举

一系列事实，指出法国共产党的立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跟着指挥棒转。

评论最后重申：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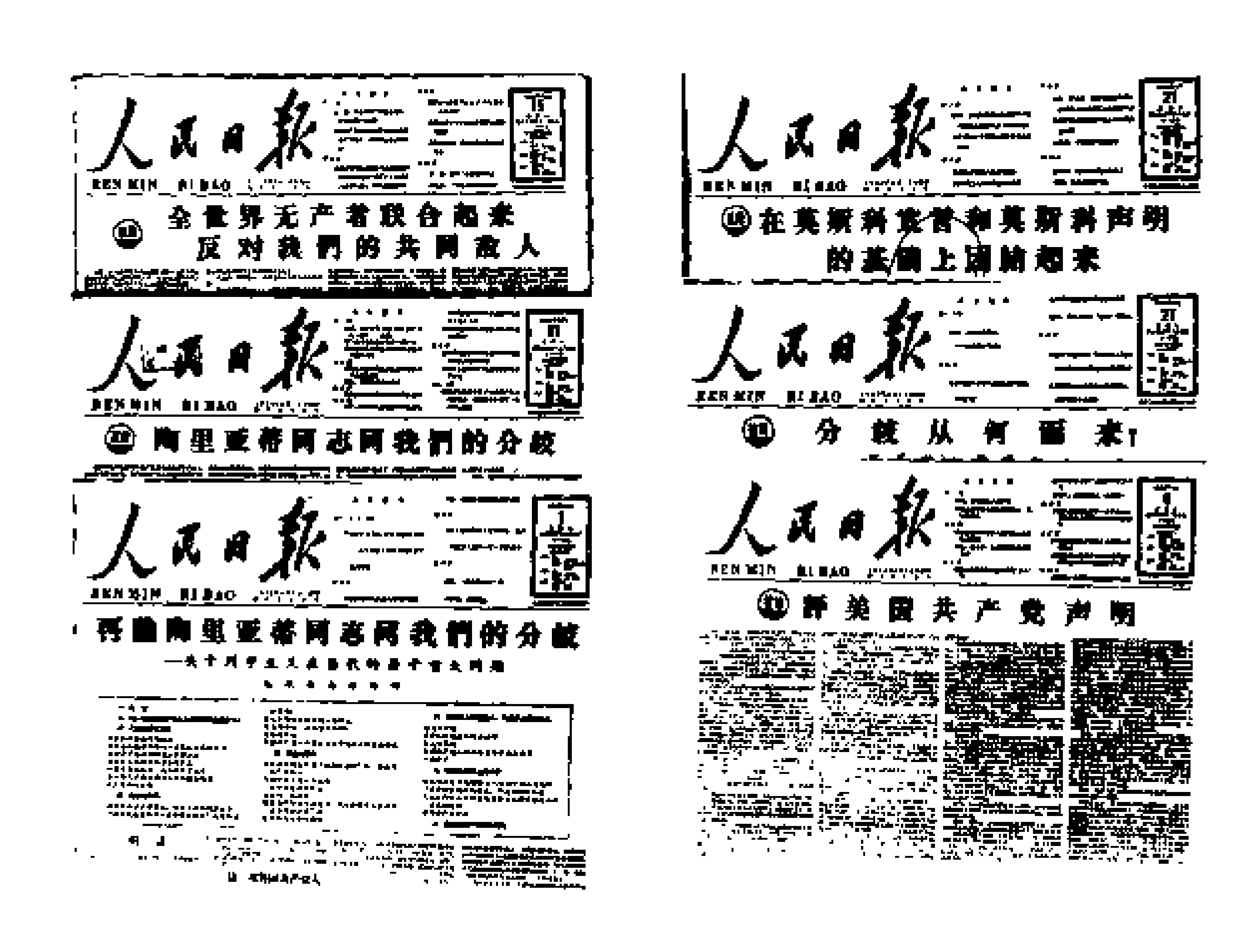
《红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发表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观点。这是陶里亚蒂长期以来宣传他的"结构改革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潮的典型理论，而且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提出的"和平过渡论"要早得多，系统得多。这篇长达11万字的文章分为八大章节（这八大章的题目是：一、引言，二、这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着重从理论上展开批判。这与《人民日报》

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社论不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着重从政治上批评陶里亚蒂。那篇社论发表后，陶里亚蒂很不满，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缺乏明确性”，是“教条主义”，并表示要把公开争论继续下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因此撰写了这一长文，索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同陶里亚蒂敞开大辩论，彻底揭穿了“结构改革论”的理论错误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危害，从而也附带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

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在整个2月份里，提了许多意见，并亲自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个题目是毛主席最后确定的)长文首先指出，目前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大争论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挑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

文章从分析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当代世界的新概念，根本抹煞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完全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他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已没有战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已不存在、世界正朝向结构改革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可以通过议会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等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社会主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分歧从何而来？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人民日报》
发表的评欧洲五党和美国共产党反华文章。

义国家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3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是回答美共1月9日的声明的。美共在声明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篇声明特别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恶毒地诬蔑和诽谤我们党。社论指出:美共的一些领导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社论着重回答美共声明中说中国同志"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没有采取冒险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却鼓励别人采取冒险政策",这是"双重标准"。社论指出,采取"双重标准"、出尔反尔的不是中国,而是别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是这样,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也是这样。

这样,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我们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而每一次发表答辩文章之前,都用很大的篇幅来刊登对方的反华言论。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七篇评论都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反华议论最多的就是苏共的报刊,而兄弟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或者总书记)中,公开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多的也是赫鲁晓夫。当然,我们批驳的反华观点,大都是苏共领导讲过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1962年12月间少奇同志主

持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他当时不在北京）的意见，确定了留有余地的方针。这就是给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留有回旋的余地，不直接点他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并不希望公开破裂，特别是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

第四节　第一轮论战小结

在这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过程中，正在外地休养的毛主席写了有关反修斗争的一首诗和一首词。一首诗是 1962 年 12 月 26 日写的七律《冬云》，全文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 年 1 月写的词《满江红》，是和郭沫若的，全文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两首诗词，反映了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诗人的胸怀和气魄。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公开论战的第一次反攻议论纷纷。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细讲到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讲了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和几年来斗争的过程。小平同志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始的七年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这样，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

小平同志指出，苏共"22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在理论上系统化，赫鲁晓夫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越来越粗暴、恶劣，以至最近发展到利用欧洲五个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我们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把争论推向新高潮，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论。

会议上大家指出，这次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有几个特点。第一，赫鲁晓夫由于在一系列事件中，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中，大大暴露了他的面目，十分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反华，企图用反华来转移视线。

第二，这次反华是公开的，但是对我们还留有一些余地。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德国党的大会上发表了反华演

讲,《真理报》也发表了指名批评中国的文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还是处在第二线,还不是公开打头阵,而是让其他跟着他指挥棒走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打头阵。

第三,赫鲁晓夫企图用"多数"来压我们失败了。虽然有20多个、30多个、以至40多个党的代表在这五次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这当然是"多数"了,但是,比起1960年莫斯科会议内部指责我们党的数目,还是少了,许多党对公开攻击我们党有顾虑,而且也没有压服我们。我们坚持斗争到底。面对这种形势,赫鲁晓夫也无可奈何。

第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兄弟党中,左派公开出来说话了。朝鲜党、印尼党都讲话了,新西兰党也讲话了,委内瑞拉共产党也跟我们比较一致,还有亚洲的一些党,比如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同我们都比较一致,越南党也是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一致的。日本共产党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也是一致的。这许多左派党都敢于出头讲话,反对或者不赞成苏共反阿、反华。

第五,这次反华浪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问题提出来了。赫鲁晓夫这样反下去,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分裂;而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是害怕分裂的,他们要求团结,特别是要求中苏两党能够和解。这种状况对赫鲁晓夫压力很大,使他感觉到继续反华难以为继。同时,他也害怕我们发表文章,他害

怕我们进一步就要点苏共和他的名了。

许多同志总结这次论战时指出，这次我们公开答辩、反对修正主义，其性质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赫鲁晓夫领头全面篡改马列主义。他们否定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他们提倡和平过渡即所谓议会道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任务，把它放在世界革命之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从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放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间混淆了敌友我的界限；在共产主义的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论点。这些错误集中地表现在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中。所以说，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反对它全面篡改马列主义。这场斗争既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前途，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

在谈到斗争的前景的时候，许多同志认为，经过反复斗争，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六年多，看来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多数党里边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会议一致认为，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是以让步来求团结。某些让步是允许的，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我们是做了某些让步的，这是允许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上，是不能让步的，在关系到我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更是不能让步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中央曾经反复讨论过，要尽力避免分裂。你要分裂，我不分裂，采取“赖”的办法，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一直这样做。但是，看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兄弟党之间，这种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在一个党内，这两种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从长远来看，这种矛盾发展和激化下去，分裂是很难避免的。无论在一个党内，或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现在已经有42个党公开指责中国党，这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分裂了，也就是说在重大原则、基本观点上已经是分裂了。矛盾激化下去，其结果就会从理论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提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还是要提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宣

言》和《声明》这两个共同文件是我们斗争的武器。我们应该力求做到不公开破裂，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这样比较有利，同时也有这种可能。苏共领导集团看来也有这种需要。但是，应当估计到，公开的完全分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苏共领导集团的冒险主义，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公开分裂。

在会议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就分裂好了，说又分又不分的状况很麻烦，分裂比不分裂好。党中央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所谓分裂问题，关键是中苏两党、两国是不是分裂，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党要权衡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决不能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至于苏共领导集团是不是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肯定。因为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也是最大的冒险主义者，这是历史上证明了的。"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这样，调动部队镇压波兰也是这样，对中国撤出全部专家、撕毁所有合同也是这样，对阿尔巴尼亚断绝国家关系也是这样，不久前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也是这样。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有思想准备。

会议议论到分裂的后果会怎么样，无非是断绝党的关系，断绝国家的关系。断绝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但国家关系不可能完全断绝，做生意恐怕还是要做的，即使完全断绝了也没有什么，生意不做也没有什么。这对我们有一些损失，但也不大。分裂之后是不是会打仗？除非

在苏联实行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否则照现在的情况他不敢打，他也没有理由打。如果真是要打，我们无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沟里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设想到了，无非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但是，要把中国完全吞下去，美国人是没有这个肚子，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肚子。

中央同志认为，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因为他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搞好。两霸相争，很难妥协。从这一点考虑，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更不用说和我们打仗了。现在的公开争论无非是笔墨官司，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我们要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中做思想工作，要告诉他们分裂的可能不是不存在，是有这种可能的。要不然，将来一旦真的分裂到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就不好了。而且对左派兄弟党也要做工作，也要他们有思想准备。在日本投降之后，由于我们党中央对国民党可能进攻解放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我们干部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在作战部署上也有所准备，因此很快就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比预计更短的时间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也叫“四情”）问题。他在 2 月 28 日总结发言时谈到反修斗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

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43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一切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来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小平同志赞成并传达中央常委的决定：预定撰写的文章发表完了以后，要停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出现要求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可以停止公开争论一个时期，准备谈判，首先是中苏两党的谈判。通过这个谈判，如果达成一些协议的话，也可能召开第三次兄弟党会议。但是要看到，现在要达成协议的困难比过去大得多，因此中苏关系可能出现这么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分歧和争论依然继续，彼此我行我素。

第二种情况，国际共运四分五裂，但是中苏两党维持不分裂。

第三种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两个派别，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分裂。

第四种情况，党的关系分裂了，但是国家关系不分裂，国际群众团体不分裂。

第五种情况，一切都分裂了，党的关系分裂了，国家关系也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分裂了，国际群众团体也分裂了。

小平同志说，由于存在这些可能，我们在考虑分裂危险的时候，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可以不分裂。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中央常委决定，现在我们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要把计划发表的文章写完，然后集中力量来写小册子，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些要做充分准备。这是基本功。

第二，要准备中苏两党双边会谈，这个会谈可以逐步展开，问题逐个讨论，哪些可能取得协议的就达成协议，不可能取得协议的就暂时摆在一边。

第三，要加强对外宣传，加强对外广播，加强外文书

籍的出版,加强对左派的工作。但是现在还不适宜召开左派党的会议,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且苏共也没有带头召开部分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如果他召开这种会议,就是开分裂会议。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要召开左派兄弟党的会议。现在还不是时候,条件还不成熟。

第四,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内要防止修正主义。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助于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能够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内发展,我们应该很好研究怎么样防止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后一代不出现修正主义。在做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我们要把党的建设做好。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我们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从这个时候起,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是康生,我是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我们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许立群、姚溱、乔冠华(他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副组长)、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不久胡绳和熊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陈伯达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个时候陈伯达主要承担国内方面文件的起草工作。

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讨论修

改，然后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为身体有病，从 1961 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 1962 年 11 月份就开始工作，从 1962 年 12 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到 1963 年 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 1966 年 5 月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这个班子就散了。

第十章
两条总路线

第一节　菊香书屋的评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1963年2月11日—28日)期间,当我们发表了第四篇文章即1月2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着急了。因为公开论战实际上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们很怕我们跟他继续论战下去。所以在1963年2月21日,他们用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党中央发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并且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这封信的签署日期是2月21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于2月22日交给我们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同志。

收到这信以后，毛主席以他特有的高度政治敏感，迅速抓住这个机会。2 月 23 日他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在常委会上决定马上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卧室里开常委会的时候，毛主席穿着睡衣、里面穿着棉毛衫裤，靠床头半坐着主持会议。因为毛主席在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不久才从外地回京，正在患感冒，到 23 日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带病主持会议。

在常委会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几位常委一致认为，苏共这封信中提出的意见，本来就是我们早在 1962 年 4 月间用正式建议的方式提出过的。苏共这次终于以自己建议的形式接受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抓住这个机会，使我们过去的主张得以实现，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维持中苏两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状况下的团结。大家也感到，苏共现在迫于形势，接受我们过去的主张，也可能是缓兵计，以便将来把分裂的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即使如此，目前我们把这封信接过来，采取主动的姿态，认真对待，还是适当的，有利的。

常委同志商量以后，其他同志就离开了，只留下少奇同志、周总理，以便同毛主席一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我也跟随小平同志等离开毛主席卧室。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还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穿着睡衣，半坐在床上接见的。契尔沃年

科来到以后,毛主席开门见山说,我到外地跑了两个月,害了一场病,刚从外地回来,现在感冒还没有完全好。很抱歉,只能在卧室里见你,穿着睡衣,衣冠不整。

毛主席的这个卧室就在他的住地——菊香书屋内,菊香书屋包括整个大院子,过去是光绪皇帝念书的地方。毛主席住进去以后,东厢是他的书房,卧室就在北房的东头,中间一个过厅是吃饭的地方。西边和西厢是他的藏书室。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也是在他的卧室里,他也是穿着睡衣。那是1956年10月波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我和胡乔木在场。那次跟尤金的谈话是很重要的,这次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也很重要。但是,毛主席的性格就是这样,从不受外交礼节的拘束,即使是很严肃的问题,他也还是采取一种比较随便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一次谈话给尤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一次的谈话当然给契尔沃年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接见外国大使的。

根据我后来所知道的,毛主席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主要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毛主席说,你们2月21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第二,毛主席说,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

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毛主席说，我们从2月20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43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指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指苏共《真理报》1963年1月7日社论和1月10日编辑部文章）。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意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第三，毛主席说，兄弟党互相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也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12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上，挂一笔账，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第四，毛主席说，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

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坐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五个欧洲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接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的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毛主席说,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

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对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这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的冲突吗？

第五，毛主席说，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5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4月7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5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以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说，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我们今后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的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

摘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走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那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毛主席还说，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到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一下。

毛主席又说，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尼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4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5月的信，表面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5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

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谈。

第六，毛主席说，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先要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者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

毛主席又说，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1959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自己是母鸡，不好斗？毛主席说，如果真正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的身体衰弱，你们那里经常骂我，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毛主席说，关于筹备各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1960年的方式，也可以用1957年的方式。1960年的方式

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前的一天才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1957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地达成协议。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1957年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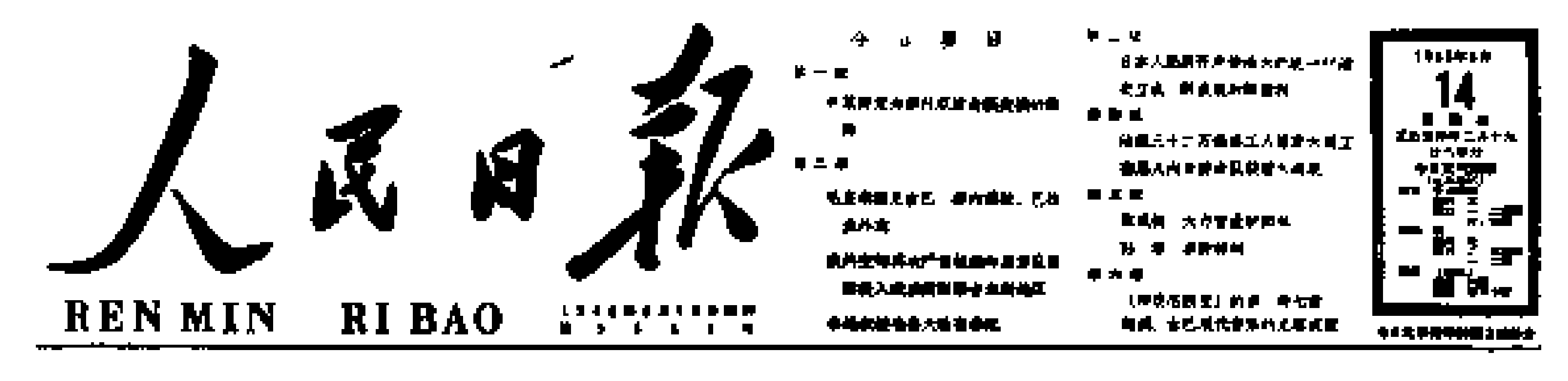
毛主席最后说，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这次谈话从晚上8点钟持续到10点多，中间主要是毛主席讲，少奇同志和周总理也有一些插话，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主要是听，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毛主席这次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具体体现了常委会议的意图，也生动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这就是索性把问题捅开，谈透彻，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见，态度鲜明，有些问题提得也很尖锐，但总的来讲是一种和解的态度。

这以后，我们写作班子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开始起草复信，同时也按原定计划再写三篇文章，即后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和《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我们起草的复信在3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以后，3月9日由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召见苏联驻华大使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中苏两党为举行双边会谈交换的信件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1963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为举行双边会谈交换的信件。

契尔沃年科，当面把这封复信交给他。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里，赞成停止公开论战，并且宣布我们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进行论战；同时也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复信还说，“我们建议苏共代表团到北京来举行中苏会谈。”这里没有再提赫鲁晓夫了。因为后来苏联大使说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的时间还没商定，所以我们在复信中不提要赫鲁晓夫到北京来，只提希望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如果不行，中共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第二节　京、杭之间的酝酿

我们党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3月9日发出的。在这之前两天，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3月7日)，对这个信做了最后修改，然后就提交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3月8日)审定。

在这两次会议上，大家对复信稿的意见不太多，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会议结束以后，只做了一些小的文字上的修改。

但是，上述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复信时，大家回顾了前一阶段反修斗争的情况，对目前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毛主席、少奇同志、总理、

小平同志以及政治局其他同志发表了不少意见。

对于前一阶段公开论战中我们发表的七篇文章（还有一篇《人民日报》3月9日评论印度共产党丹吉集团的文章，只批评丹吉本人对中印边境冲突的错误立场，未涉及国际共运队伍论战问题，因此未计入），大家认为，我们击退了苏共策划的反华浪潮，既反驳了从欧洲五个党的会议开始的公开对我党的攻击，同时又就当前若干重大的问题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从政策到理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态度鲜明。在这一阶段中，我们打击的主要对象实际上还是苏共领导集团。在七篇文章中，有四篇谈到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问题、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这几个重大问题都直接同苏共领导有关，虽然没有采取公开点名批评苏共的方式，但是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另外有两篇是回答陶里亚蒂的，是针对陶里亚蒂提出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论，从理论上作了分析、批判。这是一个关系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有一篇是讲分歧从何而来的，是回答法共领导的，实际上是讲他们怎么样没有主见地跟着苏共领导的指挥棒转，结果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论战是必要的，实际上是同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论战。

大家认为，我们发表的七篇文章主要对象是苏共赫鲁晓夫集团，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

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同时，对我国人民来讲，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这些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从思想上武装全党，使全国人民辨明是非。

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从这个阶段的斗争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整个反华运动形式上是进攻性的，实质上是防御性的，是为着维护苏共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因此赫鲁晓夫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尽管他有时候好像是来势汹汹的样子，但是公开论战起来，他的弱点就暴露了，他害怕了。而我们被围剿，是受害者，似乎很被动，但是“哀兵”的地位在反围剿时能理直气壮地答辩，较能博得理解和同情，实际上在战略上则处于主动地位，能够比较放手地批评他们的错误。在论战中，我们的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选择那些最关紧要而又利于讲理的问题答辩，牵着他们鼻子走，不受他们左右。当然，在这七篇文章里，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开讲，并没有完全把我们跟苏共领导集团之间的分歧全部摆出来，而是有所保留。

大家还指出，随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策略方针还是毛主席所讲的有理、有利、有节。毛主席经常叮嘱我们，不要一次把子弹打完。我们这些文章就是这样。比方

说，在批评多列士的那篇《分歧从何而来?》的文章中，明显地有很多保留，只讲了一些公开的，内部情况都没有讲。一方面放开手，一方面有所保留、有所节制、留有余地。我们采取这样一个策略方针证明是对的。

在这两次会上，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和将来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大家都提出一些看法，大致是：苏共领导这一次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被迫的，很勉强的。从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点应付的态度。来信讲了很多空话。毛主席对他们的空话也表示赞成，意在"立此存照"，而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做。因此，在中苏会谈中，我们可以采取将计就计的方针。而且我们也需要暂停一下，看看情况怎么发展，看看各方面有什么反应，看看左派、中间派有什么动向。我们采取力争和缓的方针是必要的。

大家认为，苏共领导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不谈吧，不好交代；谈吧，又不想放弃他们原来的错误的东西，那怎么达成协议呢？他们处境很尴尬。而我们则可进可退。对于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为着达成协议、保持团结、避免分裂，可以做些适当的让步。如果还是达不成协议，我们可以再次论战，再把问题揭深揭透、批深批透。

根据这样的分析，大家认为，对于中苏两党会谈，既然赫鲁晓夫借口访问柬埔寨的日程未定，不肯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他不愿意亲自出面，那么，我们方面，毛主席当然是不能出面，甚至少奇同志也不出席这次会谈，不能像

1960年莫斯科兄弟党会议那样，可以采取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前中苏两党会谈的级别，就是由小平同志带队。

大家议论到，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时，我们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准备谈好，达成某些协议；一手是准备破裂，继续论战，这样就不至于被动。会谈很可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像1960年夏天中苏两党会谈那样，没有达成一个提交兄弟党会议讨论的共同草案。谈判本身是斗争的继续。我们可以全面地展开来跟他们谈，把过去在七篇文章里面没有讲到的问题也摆到桌面上来，但对达成协议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提高警惕。因此，我们目前可以采取暂时停止公开论战的步骤，同时要对继续发表那些反对中国的言论，挂上一笔账，将来再答辩。

在谈到将来召开兄弟党会议时，大家认为，要力争能够召开兄弟党会议，不怕在这个会议上他们拥有多数，这种状况是暂时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不要怕围攻，力争能够使更多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认识赫鲁晓夫集团的真面目。如果能够开会，当然很好，我们不怕开会。我们的方针是力争推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时间。如果不能有所改进的话，至少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绝不采取主动分裂的行动。要分裂由赫鲁晓夫搞分裂，让他背这个罪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分裂的条件不成熟，许多中间状态的党没有思想准备，左派党的思想准备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力争推迟分裂。

根据中央同志在这两次会议上所确定的方针，我们

写作班子进行酝酿和准备中苏两党会谈的文稿；同时动员了联络部、宣传部、调查部、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编译局等单位的力量，围绕反修斗争做各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材料的准备，就是收集有关材料并加以核实。对收集的材料，包括中苏两党历次会谈的记录、苏共领导集团反华言论和行动的材料，都要准确，一定要保证准确无误。特别是在起草文稿时，凡是引用和批评苏共领导集团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一定要认真核对原文，不能有半点差错。另一方面就是做理论上的准备，要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熟悉他们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的，并根据当前世界形势加以研究。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要被苏方唬住。

经过对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我们分头起草专题发言稿。这就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他们是什么观点，我们是什么观点，他们的观点错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分析批判，据此分别准备各个专题发言稿，供中苏两党会谈时发言使用。这好比准备各种部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部件，会谈时谈到哪个问题就把哪个部件拿出来，把一个一个的部件组装成为一篇发言。

这些准备工作既繁重又紧迫，所以在政治局常委决定以后，写作班子集中到钓鱼台，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一些不住进钓鱼台的同志，就以部门为单位集中在一起，根据分工进行准备，收集材料和起草专题发言稿。

在 3 月底以前，我们都是这样按部就班地为中苏两

党会谈做准备。

但是，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党中央来了一封长信，改变了我们原来准备工作的进程。

苏共中央3月30日给我们党中央的长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阐述了他们对这个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问题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

苏共3月30日的来信很长，我们陆续翻译排印，分批送给中央有关同志和有关部门，直到4月2日才全部印出。

4月3日下午，毛主席在他的家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封信。毛主席开头就说，来信太长，他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

周总理说，从苏共中央这次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而且极力梳妆打扮来推行他们的路线。来信提出要把这个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根本不行。两党会谈决不能在他们来信的基础上进行。

接着，大家谈到我们要考虑也提出一个对案。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也要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代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什么。我们要提出一个对案。像1957年那样，他们先提出一个草案，我们接着也提出一个草案。那时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分歧，

得出一个共同草案。小平同志说，这一次能不能够这样做，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一个对案，也提出我们对总路线的看法。

毛主席说，他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毛主席说，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世界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的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毛主席说，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讨论中大家也认为（周总理特别强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苏方已经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要教训我们而不是想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要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时大吵一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马上就要动手，集中力量起草一个关于总路线的稿子。要把原先准备会谈时用的各个专题发言稿暂时放一放，先搞一个全面阐述我们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

这样，常委会议很快结束。小平同志要彭真、康生和我跟他一起，直奔钓鱼台八号楼（即写作班子的集中地），主持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商量怎么样起草。这个小组虽然组长是康生，但是实际上是小平同志主持的。小平同志先传达了常委会上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意见，然后要大家讨论。参加小组会议的同志一致赞成中央的想法，并提出赶快写出一个草稿的意见。小平同志最后要我根据讨论的意见，先提出一个初步提纲，然后由大家讨论、修改、补充，即赶紧动手起草。这样，我们就非常紧张地开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草稿，答复苏共 3 月 30 日的来信。

4 月 4 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 3 月 30 日的来信。这以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杭州。毛主席到杭州以后，要陈伯达也起草一个有关总路线的提纲，同北京平行作业。

这样一来，在北京由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一个稿子，陈伯达一个人在杭州自己起草一个稿子。

在整个 4 月份，经过不断地起草，不断地修改，到月底，北京和杭州两方面的草稿都印出来了。

北京起草的稿子出来以后，小平同志认为还不成熟，还要费很大力气加工，但是可以送给毛主席，说明这个稿子是不成熟的，还要做比较大的修改，请主席看一看，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们。

同时，陈伯达在杭州起草的稿子也送到北京。毛主

席打电话要小平同志主持讨论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小平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要秀才们准备意见。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熊复，还加上戏称“后排议员”的一些直接参加起草的年轻同志（他们来自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中间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因为是初稿，对一些枝节问题、文字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多议论，主要是议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后来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整理了一个比较简洁的意见要点。

4月底，我们接到毛主席秘书的通知，说要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要我们写作班子也去几个人。“五一”节过后，我、姚溱、范若愚等人，随小平同志和彭真、陆定一、康生在5月2日上午离京飞杭，因为天气不好，中途在南京短暂停留，然后续飞杭州。

5月的杭州已非常炎热，气温在摄氏30度以上。我记得我们5月2日到达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4度。我们到达杭州以后住在新落成的西泠饭店，这是杭州第一座现代化的饭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跟我们一起都住在西泠饭店，同时到达的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李富春、薄一波，还有廖鲁言，也都住在一起。惟独陈伯达，是早先到达杭州的，没有住在西泠饭店，而是住在西

湖边的别墅里。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了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外,各大区书记也参加。少奇同志因出国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讨论两个问题,总的题目叫做“反修防修”。一个是国内防修的问题,一个是国际上反修问题。毛主席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似乎也感到在国内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当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上阶级斗争很复杂,资本主义因素在增长,要整顿农村人民公社,要在农村进行“四清”,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说,他把中央局的同志找来,要酝酿起草一个关于“四清”的决定(后来叫作《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为《前十条》)。这个决定草案差不多全是毛主席口授,由陈伯达整理的。各大区书记主要是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于国际上反修问题,会议主要是讨论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两个稿子。

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刘庄召开常委会议,除常委外还有彭真、陈伯达、康生和我参加。会上,毛主席问到关于总路线的两个稿子的情况时,小平同志认为,两个稿子都不成熟,还要进一步做相当大的修改。他说,杭州对北京的稿子有不少意见,而北京对杭州的稿子也有很多意见,需要交换一下,因为是在两个地方起草的。毛主席当即提出,小平同志召集双方,交换意见。他不参加,但派他的秘书林克旁听。这样一来,毛主

席就集中力量搞《前十条》。

5月3日、4日、5日连续三天，每天上午由小平同志召集有关的人在西泠饭店八楼西头的会议室开会，讨论这两个稿子。参加的人有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起草人员有我、姚溱、范若愚、王力，还有康生的秘书李鑫。林克参加了三天的会，把双方的意见记录下来向毛主席汇报。

会议开始有些冷场，于是我先讲，我把北京讨论时的主要意见讲了。我这些意见大都是北京秀才们的意见，主要是说他的稿子理论联系实际不够，讲一般道理多，而很少针对苏共的观点。因为从公开论战以来，他很少参加讨论中央的有关文稿，我估计我们收集的许多材料他也没有看。他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一般理论观点出发写出稿子的。比如对时代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和平共处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等等，他只是作为一般的理论原则泛泛论述，并没有提出当前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策略，针对性较差，所以给人有教科书的感觉。

陈伯达发言为他起草的稿子辩解。他说，这个稿子是毛主席叫起草的，毛主席指示要从矛盾讲起，然后再展开。他说，既然从矛盾讲起，那么整个稿子就要更着重于理论上的阐述。所以他这个稿子就是着重从理论上讲的。

陈伯达这么说，引起了北京来的秀才们意见纷纷，大家指出，从理论上怎么展开，归结起来还是要结合实际，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论点和当前形势的具体分析，要明确回答当代革命的重要问题。

陈伯达一向自视甚高，不大习惯这种讨论方式，认为大家对他不尊重。其实，这种讨论方式，在钓鱼台写作班子中以至小平同志主持的会议上是习以为常的。因为一方的论点要站得住，要驳倒对方，就得百家争鸣。在钓鱼台起草文稿过程中，我们提倡百家争鸣这种作风。你讲话的时候别人可以插话，不管是谁，有时彭真同志、小平同志讲话中大家也插话，有补充的，有认为这样讲不合适的。经过辩论，你驳倒了大家，你的论点就站得住了。在我们跟苏共领导进行公开论战的时候，毛主席早就定了一条，就是我们的论点一定要站得住，叫人家驳不倒。在我们内部首先就要驳不倒，要从正面和反面反复讨论，这个观点是不是驳不倒。或者引述别人的话时要核对有没有歪曲原意。一定要的确是别人的原话或者是他的原意，否则你的批判就等于放空枪，别人会说他不是这么讲，你就站不住了。关于这一点，在陈伯达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讲了。特别是小平同志，他一再强调，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不要紧，谁的意见都可以反驳。因而会议上的辩论相当激烈。

会上对北京起草的稿子也提了不少意见，主要是这个稿子对现实的情况、现实的矛盾讲的比较多，这是这个

稿子的长处，但在理论上阐述则比较少，这是它的短处。两个稿子相比较，北京的稿子讲实际问题比较突出，而泛论较少。

陆定一同志对北京起草的稿子和陈伯达的稿子都提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对北京的稿子也提了意见，但是对陈伯达的稿子没有多讲，只是说陈稿中的那些观点恐怕还是要跟当前我们同苏修公开论战的一些观点联系得更密切一点、衔接得更好一点、针对性更强一点，这样文章就更加有力。这是比较客气的话。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问林克，这两天的情况他是否都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林克说他都详细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很认真，并且说等开完会以后再把大家找在一起谈。

5月5日，毛主席在西湖西南边的刘庄住所召开一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北京和杭州两地起草的稿子怎么修改的问题。毛主席在刘庄的住所，建在伸入西湖的半岛上，三面环湖，风景秀丽，建筑是中国式的园林别墅，黄墙绿瓦，高大方正，坐落在高大古木和花草丛中，虽盛夏亦不觉炎热。这次常委会议，除了周、邓（少奇同志正在国外访问）外，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也参加了，我也参加了。当我跟着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房间时，还没坐下来，毛主席就冲着我问，你多大啦？我说44岁。毛主席接着说，哎呀，还是年轻人行呀，我们都是老头子了，伯达你也算是老头子了，被年轻人攻得不行了。

他说,依我看,还是年轻人的意见对。毛主席就这么概括地讲了一下,没有具体地讲这个稿子有什么优点,那个稿子有什么缺点。

但是,毛主席接着又说,我们这次复信,是针对苏共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作为向苏共和各兄弟党的建议。因此,复信中关于总路线的阐述,既要有理论的概括,又要结合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回答苏共来信中和它在过去争论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

毛主席说,他在北京时讲过这个总路线要从分析当代矛盾讲起。这一点陈伯达做得对。他希望经过七改八改,最后形成比较正确的文件,不至于一下子被人驳倒。接着毛主席提出,先由陈伯达根据大家提的意见,改出一个稿子来。不一定所有的意见都接受,自认为哪些意见可以接受的就接受。毛主席要求,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出来后就到北京去讨论,同北京的秀才们一起修改。周总理、小平同志都赞成这么做。

然后毛主席又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比方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有印尼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毛主席说,但是,这不是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

的建议，针对苏共3月30日给中共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议。因为既然苏共可以提，别的党也可以提，我们也可以提，但不是作为左派几个党的共同建议。人家不是说我们搞宗派主义吗，其实这不是宗派主义，但是要避这个嫌。而且，要其他兄弟党完全同意我们的文件也比较困难。大家开会也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求得完全一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大的方面能够得到他们的赞成就很好，但是只能作为我们中国党的建议提出来，而不是作为好几个党的共同文件提出来。这点一定要十分慎重。

最后，小平同志提出，陈伯达修改稿子时是否一定需要添些助手，是不是把钓鱼台写作班子中的一些同志留在这里做伯达的帮手。最后商定，除了原在杭州的范若愚和王力外，我和姚溱也留下。但后来陈伯达感到我和姚不称他意，又叫我们回北京。

5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以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班子把两个稿子的优点合并起来，按毛主席的指示重新起草，俟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出来后再参照修改。陈伯达带着稿子从杭州回到北京。这个稿子毛主席没有看。毛主席说他现在不看这个稿子，等小平同志、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过以后再看。

这样，从5月17日起，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和秀才们，在钓鱼台八号楼的大会议室里边讨论边修改。这期间，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搬到钓鱼台里来住。小平同志住在11号楼，彭真同志住在10

号楼，我们住在8号楼。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开会讨论，晚上秀才们加班，把会上讨论时还未修改好的段落再加工修改，提到第二天会上讨论。这样连续讨论、修改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逐段修改，终于搞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稿子。

第三节 征求兄弟党意见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起草出来以后，送给当时在武汉的毛主席。第二天毛主席来电话，建议先征求在北京的外国党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要联络部作具体安排。我们把这些外国同志的意见综合整理，能修改的即时修改，待斟酌的开列清单分头认真研究。被征求意见的外国同志中有缅甸党、马来西亚党、泰国党等东南亚一些兄弟党的负责人，还有中联部的顾问艾德勒和柯弗兰，他们都是美共党员。柯弗兰曾任美国国务院财政司司长，是50年代末到中国来的。

根据中央常委原先的打算，我们的修改稿出来后，就邀请朝鲜党和越南党派代表团来中国，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这之前，毛主席还在杭州的时候，5月22日曾经跟新西兰共产党的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做过一次谈话，主要是征求威尔科克斯对当时还没有经过北京讨论修改的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的意见。毛主席说，这个文件还

要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他说，现在的文件还不太成熟，我对总路线的第一部分很不满意，文字太长，而且有些重复，不够简练、鲜明、概括。还有，稿子中说要批判五种观点，其实全文21条，再加一个尾巴，都是批判他们的，不仅是批判五个观点，每一条都批判他们的错误。

毛主席在这里之所以讲全文21条，是因为当时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全文一共只有21条。后来经过北京讨论修改，加了四条，最后成为25条。当时毛主席还提出，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苏共“20大”、“21大”、“22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这个关于总路线的文件里不展开讲，只出一个题目，留一手，将来在中苏两党会谈时再考虑提出。因此在我们的修改稿中没有专门讲这几个问题，只在最后一段中提了一下。

在征求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意见后，接着在5月底6月初分别征求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朝鲜党的代表团是由金日成率领，在5月26日到达北京，先在北京同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会谈，28日由少奇同志陪同飞到武汉，住在东湖边上的百花宾馆1、2号楼。小平同志也带着起草班子的秀才们另乘飞机一起飞抵武汉，也住在百花宾馆。毛主席住在湖滨别墅，这个别墅在1959年重新改建成高大的石头房子，同一个室内游泳池连接着。我们住在百花宾馆的3、4号楼。

5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举行第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朝方由金日成率领，有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等，还有几位秀才；我们方面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康生，我同王任重、伍修权、范若愚、姚溱、王力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郝德清也参加。会谈地点在毛主席的湖滨别墅。

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说明这次请朝鲜同志来的想法。毛主席说，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到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能够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尼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毛主席说，对这些兄弟党，我们只是征求意见。这封复信不是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党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力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因为这封信是同全世界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不论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或者是个别观点、文字词

句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毛主席说，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毛主席说，这个复信你们刚刚接触，也许有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多加考虑。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我也看过几次。这样的文件不反复若干次是搞不好的。我们已经反复了好多次了。

毛主席说，金日成同志和其他同志在北京提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都告诉我了。你们提的意见很好。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把问题搞得正确一些，只要是正确的就不怕孤立，如果错了那就闯祸了。正确的东西人家暂时不理解，将来人家就会理解的。

金日成在会谈中讲到他们只粗看了我们的稿子，还可以再看看提些意见。

少奇同志谈了他最近访问越南的情况（少奇同志是在5月6日到5月16日去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他说，我在访越期间，把我们的主要观点跟胡志明同志、黎笋同志谈了。他们担心破裂。我跟他们讲，你们担心也没有用处，要设想一旦真的破裂怎么办。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要破裂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不破裂当然好，可是如果他硬要破裂，我们怎么办？要有精神准

备，要把这个问题想通。少奇同志说，我们在越南谈的结果，胡志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不破裂，最好不破裂，但是对破裂也要有准备，要准备破裂。少奇同志说，越南同志的态度不错。

这次会谈时间较短。到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征求金日成的意见。毛主席说，你们跟少奇同志在北京谈过了，你的意见初步讲了。在这里是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秀才们来搞。你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吴冷西、伍修权、王任重、姚溱、范若愚、王力，还加上康生和大使郝德清，共有八个人。你们出多少呢？金日成说，我们就出朴容国、许锡瑄、蔡喜正、金忠源、金珖政，再加驻华大使和两个翻译，一共也是八个人。毛主席说，正好各出八个，这就对等了。让他们去讨论、修改，争论也可以，反正总的是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

毛主席和金日成第一次谈话以后，我们八个对八个，在当天下午和晚上一起商量怎么改，一段一段地交换意见。朝鲜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但说明只供我们参考，不要我们当场修改。其中有些是稿中文字表达不够明确的，我们作了解释。他们的许多意见我们都接受了。

第二天（5 月 30 日），毛主席和金日成，加上双方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由金日成先讲。他说，文件我看了好几次。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他还说，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

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毛主席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金日成说，这个文件原则方面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要考虑一下发表后刺激有多大。毛主席说，这个文件是辣椒多、糖少。金日成说，糖多了没有辣椒也不好，两样都要给他们吃。

然后双方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间派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民族主义国家的问题。双方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争取中间派还是宽一点好。中间派有不同的程度，民族主义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所以有些问题要斟酌，要提得恰当，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有些原则问题，还是要讲。会谈中对这方面的议论比较多。

最后，毛主席说，原则问题你们都提了很多意见，文字上、词句上有什么意见你们还可以提。金日成说，因为我们看的是翻译过来的朝文，所以只能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问题交换意见，文字、词句恐怕还是请你们自己多加斟酌。

在这两次谈话中，朝鲜党代表团提出的意见，我们都记录下来。后来在小平同志主持讨论时，也根据他们的

意见作了很多修改。

这两次会谈结束后，金日成在5月31日离开武汉回国。

接着，越南劳动党代表团6月2日到达武汉。他们以黎笋为首，还有长征、阮志清、陈琼、武遵和越南驻华大使黄明芳。

6月3日，小平同志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越南同志谈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见是，对苏共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究竟怎么看，复信中应该有所阐述。

6月4日，毛主席和越南党代表团会谈。因为前一天小平同志已经和他们谈过一次，所以毛主席和他们谈的时候，首先是谈越方的意见，然后听他们介绍越南的情况。

毛主席在谈到越南同志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时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没有触及，你们越南同志看出来了，这很好。你们提出的意见可以使这个问题讲得更有说服力。这说明交换意见很有益。我们总是想多听听兄弟党的意见，目的就是搞得正确一些。

毛主席还谈到，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比方说，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公开讲。在1958年跟赫鲁晓夫的争论，不但当时没有公开，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对敌的声明。原来赫鲁晓夫是秘

密来的，后来临走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变成公开的了。虽然当时内部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搞共同舰队、反对他控制我们，但是公开声明还是一致对敌，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不怕人家攻击我们，也不怕发表人家攻击我们的演说和文章。有一些我们只发表不加评论。比方说，我们发表了苏联四篇东西，有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还有《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我们都公开发表了。但是，我们没有直接答复，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只批评了陶里亚蒂、多列士等同志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中有些也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接着，毛主席又介绍了最近几年我们同苏共争论的情况，以及我们对苏共"20大"、"21大"、"22大"的意见，其中讲到苏联是怎样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讲到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以及同阿尔巴尼亚断交等等。

小平同志谈到了我们不怕苏联施加压力，反正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欠苏联的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的武器贷款，占五十几亿卢布总债务的百分之六十。所谓贷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贷款的形式把军火半价卖给我们。所谓援助是要收半价。其次是旅顺、大连的装备，就是他们从旅大撤退时，把那些海军炮台的一些旧的大炮、旧的设备也算钱，作价14亿卢布算入我们的债务，而给我们的贸易贷款不到3亿卢布。这50多亿贷款已

偿还了百分之八十，还有12亿卢布，准备在明、后两年还清，很可能提前还清。

小平同志说，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厉害得很，连抗美援朝的武器、旅大的设备，他们都要我们这么多钱。我们援助越南，帮助你们抗美、抗法战争，是当作我们的责任。我们援助你们的军火是根本不要钱的。

毛主席此时问越南同志，他们还欠苏联多少债。黎笋说还有6亿多卢布。毛主席说，我们下决心要把债还清，这几年我们平均每年还7亿卢布，明年要还6亿，后年再还5亿，就差不多了。

在毛主席和朝鲜党、越南党领导人会见期间，我们在武汉的写作班子考虑他们提出的意见，不断修改稿子，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毛主席会见黎笋以后，要我们回北京去，召集起草小组的全组人员，再加一些其他同志，再讨论，再修改。他还说，他很快即回北京，那时候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文件。

这样，我们在6月6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从第二天起，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小组会议，从头逐段反复修改我们在武汉修改过的稿子。修改一段就重印一段，陆续送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有时候少奇同志也参加讨论和修改。经过不断的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21条逐步增加成25条。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在6月10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复信稿。接着6月12日，少奇同志又主持召

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复信。因为每一次的修改稿子都预先发给政治局的同志，他们一稿接一稿的看了。送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的稿子，都是由我们用红笔把增加和修改的地方画出来后送给他们看。由于许多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已经吸收，大家对稿子修改经过比较熟悉，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只作较少的修改，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

这个稿子原来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说，题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提出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为1963年6月14日，大家都赞成。因为这么一来，就鲜明地突出了这封复信的重大意义，它既是对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的答复，又是作为一个建议向各兄弟党提出来的。

毛主席提出修改复信题目的时候着重说明，我们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既建议中苏两党讨论这个问题，又建议准备召开的兄弟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想强加于人，而是建议大家考虑。这是我们中国党的意见，他们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毛主席最


六月五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人们，都对中苏两党会谈十分关切，希望我们的会谈有助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为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和加强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神圣责任。中苏两党，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负有更大的义务，应该作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不管这种分歧多么严重，我们都应当有充分的耐心，尽一切可能，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中共中央是抱着这种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对

— 1 —

1963 年 6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稿拟写的标题手迹。

后定稿以后，由专人带到莫斯科，由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中央递交。6月15日，苏共中央由苏斯洛夫出面接见我们的大使。我们的大使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一封复信交给苏斯洛夫。

因为考虑到要把各种外文本搞得更准确，外文广播也要和中文同时广播，所以复信交出两天之后，在6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同时播出。

第四节 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要点

6月17日公开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建议》)，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一共有25条，前面有一个导言，后面有一个结尾。

这封信的导言申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在4月初开始考虑要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给予答复，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当时考虑到，在

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之前，我们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宣言或声明草案，只好在苏共的草案上修修补补，打不破它原来的框框。毛主席认为，借苏共的来信为由头，由我们提出同苏共的来信相对立的纲领性文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在复信的开头，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提出我们的意见，就是因为苏共先提了，所以我们也提出对案。

关于总路线的25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建议》的第一条明确提出，总路线只能根据1957年和1960年共同签署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而不能根据别的其他什么东西。这就表明了我们所提出的总路线的出发点是站在两个兄弟党会议所达成的共同文件的基础上的。

第二条指出，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

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第三条指出,各国共产党人只能根据上述的总路线进行革命斗争,而不能把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样片面概括为"三和",是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

(以上三条,表明我们提出总路线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是从当前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加以分析,提出指导革命实践的路线。)

第四条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并对这些基本矛盾作阶级分析。当代世界四大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中,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这个矛盾而抹杀其他矛盾。其他三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

第五条批判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五种错误观点。这五种错误观点是:第一,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阶级内容;第二,只承认社会主义阵

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其他三种矛盾；第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解决，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需要经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第四，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紧张斗争的新局面，而认为它们之间可以调和甚至消除它们的矛盾；第五，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其他三种矛盾也随这个矛盾的消失而消失，可以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世界。这里指出的这五种观点，是苏共理论上重大的错误。

第六条论述社会主义阵营。文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阵营赋有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任务，要保持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文件列举了七项任务，并着重论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当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是不是维护这个团结，成为检验每一个共产党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分裂，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条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能不分敌友，把

革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于同帝国主义的合作。

第八条论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

第九条指出，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的光荣使命就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要同它划清界限，不要成为它的俘虏。

第十条指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间，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

第十一条批判和平过渡论。主要论点是：共产党人从来是愿意经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不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准备两手，在准备革命和平

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做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突然袭击和武装进攻的时候给以有力的回击。

第十二条论述人类的历史是经过各种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发展的。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借口牺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认为革命必然一帆风顺，或想得到不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以后才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一个革命者。文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共产党可能丧失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既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原来起草的稿件中，在这一条里曾列举一些国家革命失败的历史事实，后来考虑到不宜指名论述，因为这个党或那个党在同样情况下都可能犯错误，指名反而减弱了历史教训的普遍意义，于是就修改为泛论几种情况，没有指名。）

第十三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十四条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文件根据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指出：因为害怕战争而反对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区别是什么样的和平，不区别是什么样的战争，对战争一律加以反对，对和平一律加以赞成，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文件批判了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谬论。

第十五条阐述我们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完全消灭核武器的观点，并且指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文件批判了那种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否定人的作用、否定革命的观点。

第十六条着重讲和平共处问题。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一项重大的原则，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同时也指出，不能对和平共处作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不能把它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借以反对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不能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因为还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革命斗争。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第十七条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权以前。文件引述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提出的论点：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被夺去的天堂；第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在国家机关职员中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文件指出，列宁所讲的这些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即使苏联也是如此。

第十八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文件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十九条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十条论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文件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只能依据列宁提出的三条原则：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三、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

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里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指出它实际上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更严重的是,他们借口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是搞颠覆活动。

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原则基础上。同时,每一个国家主要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兄弟党关系应当遵守四项原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

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

第二十三条指出，为了实现各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即 1957 年和 1960 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在反对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十四条论述革命能不能胜利的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文件论述了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论述如何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分歧。文件指出，对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分歧，马列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文件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按:没有指明苏共)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我们认为，既然公开论战挑起来了，那么各兄弟党之间就应该在平等的、民主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来解决。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地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论战，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来回答他们。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接着叙述了过去几个月中双方论战的情况，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一些兄弟党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从 1962 年 12 月起，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包括苏联和苏共领导人的主要演讲都发表了，苏共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发表了，其他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也发表了。有些做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比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但是苏共 3 月 30 日来信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是完全颠倒了是非。复信说，既然你们认为我们的文章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们那样，把我们的文章加以发表，然后逐篇逐条加以批判，让苏联人民来判断是非呢？

复信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中共中央决定，我们从 1963 年 3 月 9 日起，对于兄弟党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复。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我们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怎么样停止公开论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复信最后说，除了上述 25 个问题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中苏两党会谈时交换意见，比如批判斯大林的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原

人民日报

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1963年4月4日、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则性的问题，等等。复信在这里这样讲，留有余地，也是作为伏笔，就是说，我们的意见还没有讲完，除了这些意见以外，还有好些其他意见。

苏共3月30日的来信我们在4月4日就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6月17日发表，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广播和各种文字出版小册子。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这样，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明摆着两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来信中所阐述的他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一条是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阐述的总路线。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一重要文献之得以形成，主要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也得助于兄弟党提出很好的意见。这个文献的形成过程中，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据当时粗略的统计，为着搞好这个文件和为后来写文章做准备，曾经收集了大约有400万字的材料。除了出版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论国家、论党、论民族解放运动等小册子以外，还按照专题，收集了苏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它过去怎么讲，后来怎么讲，又是怎样自相矛盾的，都整理得清清楚楚，并且作了研究分析。对各国党在

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都进行了分类整理；对所有公开攻击我们的兄弟党的重要言论，差不多全部都翻译出来。由于收集和整理了这么一大批材料，为起草和反复修改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些材料是分别由中央联络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许多单位收集和整理的。

第十一章

中苏两党会谈

第一节　会谈前夕的“声明战”

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中央要看看苏共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决定我们代表团到苏联去谈判的方针和策略，但我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时的发言稿要先做准备。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个声明，完全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建议，说它是对苏共中央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且说他们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这个文件。由于我党已经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里希望他们也能够发表我们的复信，苏共中央在声明里拒绝了我党的要求。

接着，6月21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

作出决议。这个决议态度蛮横，断然拒绝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并表示苏共坚定地执行“20大”、“21大”、“22大”的路线，同时还表示要责成苏共代表团，在将要到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根据这个路线来阐述和捍卫苏共的立场。

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苏共中央的声明和决议，一致认为，从这种迹象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现在要做充分准备。常委会议决定，这次中苏两党会谈，我党代表团由小平同志率领，彭真同志协助，还考虑增加几个人。毛主席要小平同志先考虑会谈的方案。小平同志认为，此事需要缜密考虑。前一段时间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搞得大家都很疲劳。为着养精蓄锐，现在需要休息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到苏联去之前，我们先到成都去休息一下，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是玩，放松一下，迎接下一场战斗。毛主席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们6月25日从北京飞成都。跟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成都的，有我、姚溱、熊复、范若愚、王力，还有写作班子的一批“后排议员”。在飞机上我提出，我们写作班子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峨眉山，这次想趁休息的机会到峨眉山去一趟。小平同志同意，说要去就要快去，说不定毛主席想起什么问题来马上要我们回去。

我们中午到了成都，住在金牛霸宾馆，吃过午饭后，立即分乘三辆汽车出发，赶到峨眉山下已是黄昏。我提

议马上上山，在山上吃晚饭，明天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是，由于姚溱腰部有旧伤，熊复心脏病刚好，他们两位不赞成马上上山，认为还是在山下过夜。我觉得也不能勉强，只好同意明早上山。

可是，不出所料，当天午夜，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从成都打来电话，把姚溱叫醒，说毛主席要我们明天就回北京。小平同志要我们明天一早就回成都，不要游峨眉山了。

真是军令如山倒。我们虽然到了峨眉山脚下，也只好望山兴叹。但见云雾飘忽，不识真容。第二天一清早赶回成都，下午飞返北京。

当天(6 月 26 日)晚上，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以后又接连开了两次会。这几次常委会主要是议论中苏两党会谈应如何估计，要做什么准备。

在开始的时候，政治局常委会议分析了形势。少奇同志认为，从苏共“22 大”以后，苏共领导的言行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被 1960 年兄弟党会议否定了的观点又重新拿出来到处宣传；二是违反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包括断绝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发动公开论战；三是大肆宣扬南斯拉夫。由此看来，苏共领导总的趋向是沿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因此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不会有好的结果。

毛主席指出，苏共中央 6 月 21 日作出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 大”、“21 大”和“22 大”的路线行

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1957年严重，而且比1960年也要严重得多。

周总理指出，为了准备这次中苏会谈，赫鲁晓夫到处修筑防御工事，同一些国家搞好关系，但关键是苏美关系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至多只能就某些个别问题达成协议，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他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马列主义，三怕人民。

这几次会议议论到一系列问题：

(1)会谈从什么问题谈起？可考虑：一为从总路线谈起，一为从分歧从何而来谈起，一为从斯大林问题谈起，大家比较倾向于由分歧从何而来谈起，但要看苏方如何谈而定。

(2)苏方可能如何谈？估计：一为从答复我方6月14日的信谈起，即从总路线谈起；一为不谈总路线问题，而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谈起。大家认为，如果苏方撇开总路线不谈，一上来就谈召开兄弟党会议，那么，我方应提出先分清是非、达成一致看法，才能召开兄弟党会议，否则实际上是开分裂会议。

(3)如果苏方拒绝听取我方意见，那么我方应预先准备好书面发言稿，在会场散发，并公开发表。

(4)如苏方一上来就要求发表联合声明或公报，我方可考虑：一为拒绝联合声明，提出先把原则分歧谈清楚了才考虑联合声明问题；一为同意发表联合声明，但要就联

合声明涉及的问题先谈清楚。大家倾向于前一办法。认为绝不能搞一个低标准的联合声明，并认为要申明不能再像1957年和1960年那样"照顾"苏方。

(5)如果苏方提出停止公开论战，那么我方应重申：要就停止公开论战达成公平的协议，首先要苏方承认它过去发起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才能停止公开论战。

(6)会谈开始时，先让苏方讲还是我方争取先讲？大家倾向于让苏方先讲，我后发制人。

经过大家反复议论，毛主席归纳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

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毛主席说，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毛主席还说，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谈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决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其中我、姚溱、范若愚、王力等作为代表团顾问。还有一批来自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联部的助手，也跟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去。

这几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责成我们起草一个声明，准备在代表团出发之前发表。

6月3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毛主席和常委对中苏两党会谈的分析、方针和策略。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通过了我党中央的声明。这就是中共中央7月1日发表的声明。

在这个声明里，宣布了参加7月5日在莫斯科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团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团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和伍修权（他们两位都是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位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秀才们是以顾问身份参加代表团的。

声明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并责成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同苏共讨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有关的原则性的问题。声明还说，苏共中央6月18日的声明、6月21日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说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对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我们现在暂时不作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责成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阐明我们的意见，做出一定的评论。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苏共领导是吞不下这颗苦果。在我们7月1日发表声明之后，他们在7月4日也发表

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除了再次指责我们对苏共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还为他们不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辩护，说他们不能发表这样的信件，要发表就得答复，那就导致论战的加剧。声明最后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

在7月4日苏共发表声明之后，中央要我们马上写一个简短的声明，把苏共的声明驳回去。我们又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的声明。

毛主席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指出，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毫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会上常委们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了声明，这时已是5日凌晨。这个声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告，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7月4日的声明，已责成我们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对苏方7月4日的声明给予必

要的评论。声明强调，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间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表达了我党维护团结的愿望和立场。

第二节　列宁山上短兵相接

在中共中央7月5日声明发表的当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邓小平同志率领，分乘两架飞机赴莫斯科。少奇同志、周总理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到机场送行，表示我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中苏两党会谈。

我跟小平同志坐第一架飞机，当天下午到达莫斯科，彭真同志坐的另一架飞机，因天气不好，中途在西伯利亚作短暂停留，比我们晚到了几个小时。

到了莫斯科以后，苏方安排我党代表团住在列宁山上的两个别墅里。小平同志和尚昆、修权住在一个别墅，彭真同志和康生、刘宁一住在另一别墅，这两个别墅是紧挨着的。我们这些秀才本来也安排住在别墅里的。后来我们看到住得很挤，跟上次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一样挤，于是就同助理工作人员一起搬到我驻苏大使馆去住了。这次代表团的活动中心还是在大使馆，有什么事情需要议论或者开会，还是在大使馆内的一个经过重新装

修、能防苏方窃听的保密室里进行。

这次我们到莫斯科以后的一个最明显的感觉是，苏方的态度比起1960年冷淡得多，连饭菜也不大好。住在别墅里的代表团正式成员吃的东西还不如我们在大使馆吃得好，我们可以吃中国餐，还有烧猪蹄、鸡翅膀等。有一次从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开会回来的路上，彭真同志有意在车上发牢骚说，真是岂有此理，这次给我们的伙食搞得这么坏。过去苏联代表团到中国去，尽管是吵架，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地招待他们。这次他们太小气了。我们估计，苏方很可能在汽车上装了窃听器，所以有意说给他们听。果然，第二天，代表团的伙食就有所改善。以后，我们有什么要苏方听到的话，就有意在汽车上或者别墅的客厅里大声讲。

中苏两党会谈就是在这样紧张气氛下开始的。会谈之前双方频繁发表声明，你来我往，紧张地打声明仗，同时气氛从一开始就很冷淡。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0日举行，一共开了九次会。出席会议的苏方是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格里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曾经率苏工会代表团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同我代表团激烈争论）、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当时地位仅次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伊利切夫（苏共中央书记，曾任《真理报》总编辑，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为苏代表团发言人，同我有来往）、

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1959年随赫鲁晓夫来华,同我会晤过)和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代表团的构成带有很浓的所谓"理论权威"色彩。我们是代表团全体正式成员参加,另加我和姚溱两人。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

我代表团在北京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一篇是阐述我党6月14日信中提出总路线的观点,同时具体指名批驳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一篇是讲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篇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一篇是着重批驳苏共关于"三和"、"两全"的谬论,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专门问题的部件。代表团要秀才们一下飞机就赶去分工修改各篇发言稿,哪篇先用看苏方发言确定。

第一次会谈(7月6日)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的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辩解。他着重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都是陈词滥调。接着就谈到苏共为什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我们6月14日的复信中尖锐地批判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这些观点是苏共的独创。苏斯洛夫说:为什么说苏共是全民党呢?第一,全国人民都拥护党;第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马列主义;第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各阶层。他认为根据这三条理由,所以说苏共是全民党。

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完后休会。

当晚，代表团在我驻苏大使馆开会，针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决定先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对原来在国内准备好的稿子作了修改，回答他对我们6月14日复信的攻击，但重点仍然是原来稿子的主要内容，即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对苏斯洛夫所谈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论点，代表团决定留待以后发言时再加以批判。

第二次会议是在7月8日举行的，由我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发言。

小平同志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小平同志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从苏共的"20大"就开始。他接着列举苏共"20大"、1956年苏波关系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9年中印边界和戴维营会谈、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苏共"22大"以及1962年至1963年欧洲五个兄弟党大会反华等一系列事实，说明分歧逐渐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这个发言，是后来我们评苏共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基础。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苏方没有发言，会议即休会。

中苏两党在第二次会谈后，苏共中央在7月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专门针对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归来的。声明认为中国这样做只会使中苏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

我党中央在7月10日发表声明，答复苏共中央7月

9日的声明。我党声明说，苏共中央在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国党的新的攻击，使我们不能不公开做出回答。声明指出，我们6月14日的信是回答你们3月30日的信的，并不存在诽谤的问题。

声明说，过去苏共的人员一直在中国散布苏共的文件，现在还这样做。那么我们驻苏大使馆人员和研究生散发我们6月14日的信也是正常的、对等的活动，怎么能说是干涉苏联的内政、破坏苏联的主权呢？按照你们的这个逻辑，那你们过去这样做，中国早就不是主权国家了。

声明最后还强调说，中国还是一贯坚持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立场。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7月1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又是苏斯洛夫发言。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回答小平同志讲的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苏斯洛夫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之后开始，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不同意我们说分歧是从苏共"20大"开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在发言中讲到1956年苏波关系紧张和匈牙利事件问题，还抵赖他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偏袒印度。他攻击我们搞分裂主义，说什么我们发表七篇答辩文章就是搞分裂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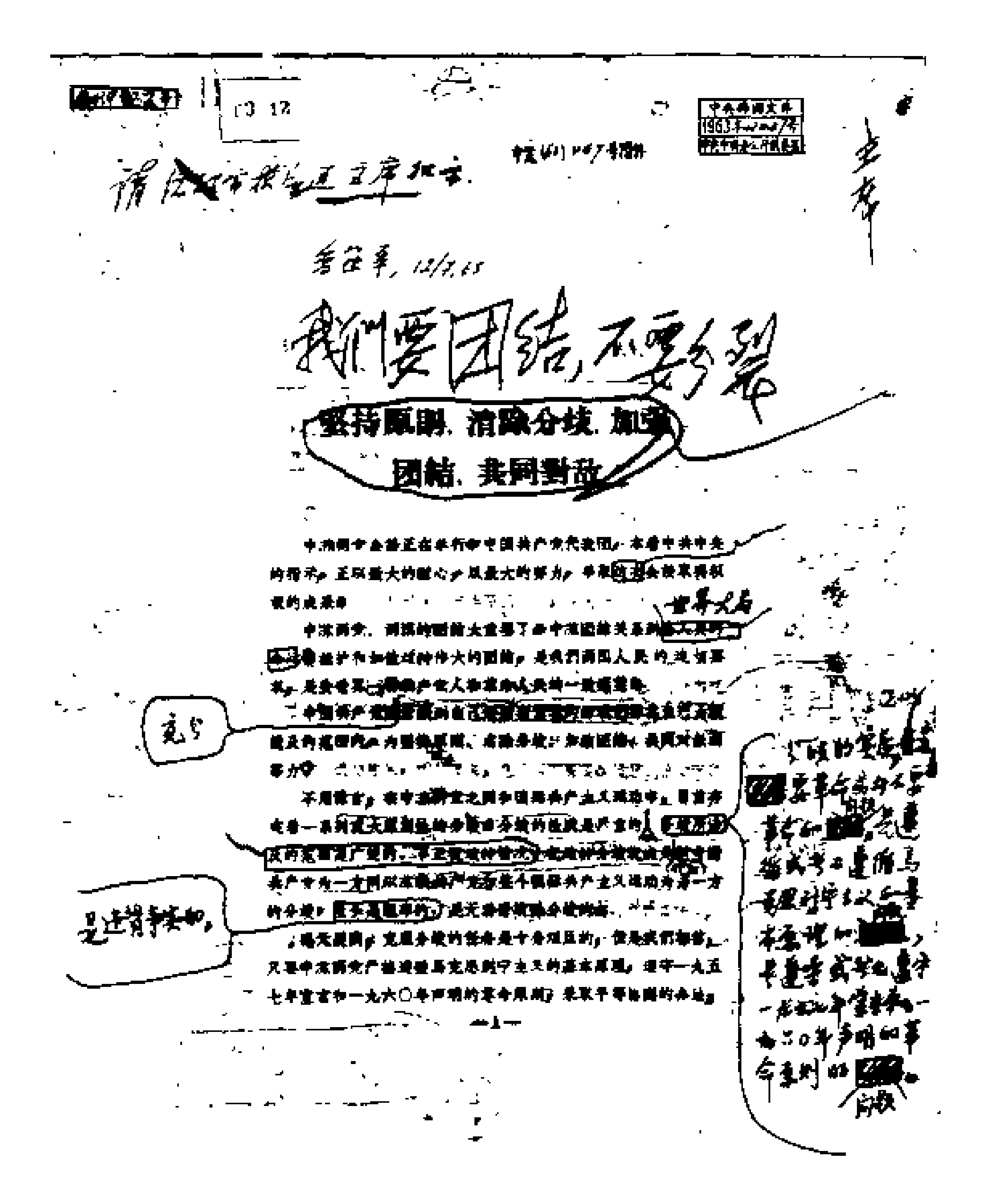
苏斯洛夫的这次发言同他第一次发言一样，完全是强词夺理。据我现场观察，苏斯洛夫在讲话的时候总是

低着头，很少抬起头来正视我们。可能是他自己也感到他在诡辩，理不直因而气不壮，他作为苏共的理论"权威"，也只能说些连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的话。

7月10日当晚，我党代表团又在大使馆开会。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中央当天发表的声明。大家联系会谈的情况，认为中央在声明中阐明我党一贯立场(即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时强调团结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团在会谈中可以针对苏方两次发言，着重批判苏共领导搞分裂主义，以斗争求团结。据此对下一次发言稿，只作了小的修改，维持原来的基调。

7月12日举行第四次会谈，由小平同志作第二次发言。小平同志的发言着重讲了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的事实，说明苏共是怎么样搞分裂的，怎么样挥动它的指挥棒，不仅自己发动分裂，也指挥跟随它的其他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

小平同志特别质问苏方，他们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为什么对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不谈。小平同志还质问：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搞分裂，但是试问在古巴问题上你们说过什么？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个说法算数？你那个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我们也不想跟呢！跟着你们走就自己打


我們要团结，不要分裂

堅持原則，消除分歧，加强团結，共同對敌

1963 年 7 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稿重新拟写的标题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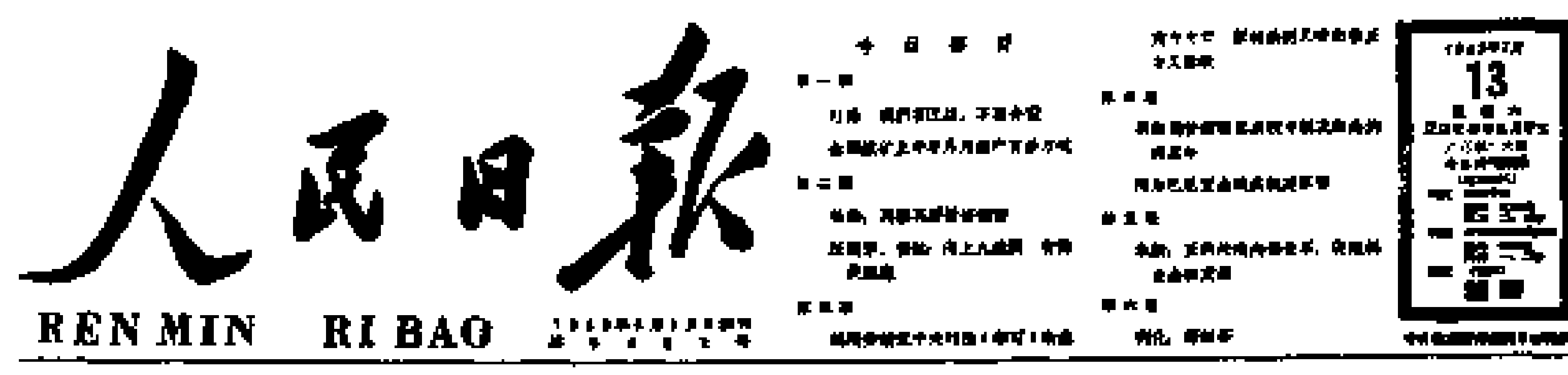
自己的嘴巴，违反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

小平同志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么能说你们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搞分裂主义呢？

在小平同志提出这一系列质问时，苏斯洛夫很紧张，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他在休会前表示，这些问题他们要在下一次会谈时答复。

他们提出下午继续开会。我们原以为他们要马上反驳小平同志的发言。但是，在当天下午第五次会谈的时候，波诺马廖夫发言并没有回答小平同志的问题，只是按他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大讲为和平而斗争，为彻底全面裁军而斗争，为"三无世界"而斗争。波的发言软弱无力，完全是一种应付的姿态。

在两党第五次会谈之后，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这是党中央观察了一周来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后指示乔冠华他们的写作班子起草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明确表示我们党是顾全大局的，绝不做任何不利于中苏团结的事情，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社论同时指出，令人不安的是，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以后，苏共中央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苏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人民中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社论提出质问，苏共中央是不是要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



社论　我們要团結，不要分裂

不許美帝国主义插手中苏分歧

观察家

必須同叛徒鉄托集团划清界限

观察家

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

观察家

短评　揭穿美国的核骗局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期间，《人民日报》发表的五篇社论或观察家文章。

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大敌当前，中苏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团结只有敌人高兴，扩大分歧只有敌人高兴。我们呼吁苏共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

第三节 苏共《公开信》出笼与联美反华

我党代表团13日上午在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社论，研究当前形势。当时西方报刊已经公开报道，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同时，苏、美、英三国代表将在莫斯科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代表团多数同志认为这件事情同中苏两党会谈有关。苏方所采取的方针，很可能像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所做的那样，为着讨好艾森豪威尔不惜损害中苏关系，不给我们提供原子弹原型，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发表塔斯社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根据这样的经验，代表团倾向于认为，苏、美、英三国谈判不是一个好兆头，因此确定对彭真同志在下一次会谈的发言稿加以修改，着重讲和平与革命的关系，回答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第二天（7月14日）早晨，翻译同志告诉大家，据莫斯科电台广播，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作为对我们6月

14日《建议》的答复。这是用公开信的形式来逐条批驳我们6月14日的《建议》。因为他们的《公开信》是针对我们的《建议》逐条辩论的，所以苏联《真理报》不得不同时发表了我们的《建议》。苏方这样做还是第一次。（后来我们经过调查才知道，《真理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向外国和在苏联的外国人发行的，印数不多。在发表他们的《公开信》时也发表我们的《建议》的就是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向苏联国内发行的，这个版本只登了他们的《公开信》，没有登我们的《建议》。）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代表团当天下午在大使馆讨论时一致认为：苏共中央采取这一严重步骤，表明赫鲁晓夫撕破假面具，露出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这预示着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只能大吵一场。他们发表这个《公开信》，很明显地表明他们是下了决心，不准备在这次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什么协议，索性公开论战了。同时，这也表明，他们过去所讲的要停止公开论战都是假话，一旦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或有需要，他们要怎样公开论战就怎样公开论战。这次他们等不到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在会谈的过程中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这个《公开信》，是很有用心的。《公开信》的发布，正是苏联方面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始（7月15日）的前一天。这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估计，即：赫鲁晓夫重演戴维营会谈前夕的故技，联美反华。代表团估计，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根据这样的分

析，代表团向中央请示会谈的下一步打算。代表团紧急请示电报说，考虑到目前这种情况，原来想争取达成一些协议已不可能，但也不一定完全破裂。代表团的意见是，要放手回答苏共在会谈中间提出的问题，以不公开破裂为限度，争取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

代表团好些同志在一起议论时谈到，联系过去几天会谈的情况，苏方发言都是照稿子念，除了偶尔涉及我方前一次发言外，大都是陈词滥调。原来，他们的写作班子忙于起草《公开信》。《公开信》本身显得是急就章。因为从6月14日到7月14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至少在6月份还没有准备要答复我们的《建议》。直到7月初，在7月4日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逼得很紧，不断要他们发表我们的复信，而他们又不能只发我们的复信，不作答复。估计他们是从7月初起，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匆匆忙忙写出这个《公开信》作为答复，然后也发表我们的《建议》。后来，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充分利用《公开信》的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痛加批驳，淋漓尽致。

据当时苏共中央的写作班子成员费·布尔拉茨基所著《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一书称，《公开信》是苏斯洛夫在中苏会谈过程中匆促布置，并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中草草写出来的。当时，苏斯洛夫神秘地说，这是“给中国意料之外的打击”。这就更加说明《公开信》是为了

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谈的需要。(见该书 1993 年中译本第 115 页)

晚上,代表团再次开会,讨论修改彭真同志准备在 15 日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修改内容主要是把苏共发表《公开信》的问题放在最前面讲,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张旗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是苏共中央采取的一个严重的步骤。

7 月 15 日,中苏会谈举行第六次会议,彭真同志发言。他首先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是否有诚意在会谈中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彭真同志质问苏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地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究竟想干什么? 彭真同志代表我党代表团郑重声明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

接着他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原先在北京我们就准备好一个稿子,12 日波诺马廖夫发言后,又针对他的发言作了修改。彭真同志着重批判苏共提出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也针对波诺马廖夫的发言,点名批驳他的观点。讲完以后,苏方当场没有反驳,随即休会。

7 月 17 日上午,举行第七次会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为赫鲁晓夫辩解,指责我们在 6 月 14 日复信中不指名地攻击赫鲁晓夫,而且在这次会上又多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他认为,赫鲁晓夫跟他们

党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他们党，批评赫鲁晓夫等于批评苏共。他还说我们挑拨赫鲁晓夫跟他们党中央的关系。

安德罗波夫也连带讲到国际共运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即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他讲不出什么新的道理。苏方发言以后也休会。

7月18日下午，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经下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恶劣。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这说明苏共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要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建议休会一个时期，可以发表一个简单的中苏会谈公报。公报可以双方各自说明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以后再继续会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因为他们已发表了《公开信》，我们要公开答复。

中央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6月14日的信里面讲到，中苏两党会谈除了讨论6月14日信里面讲到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准备就斯大林问题，苏共“20大”、“21

大”、“22 大”的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在两党会谈之前，我们在北京时已经准备了一个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稿子。中央指示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团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中央在复电里告诉代表团：中央对苏共中央《公开信》将发表一个声明，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同时重新发表我们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把两个都登出来，让全世界评判。

代表团收到中央复电以后，都很高兴。大家心里有数了，没有什么约束了，可以在以后的会谈里放开手脚了。代表团当天下午议定，要坚决贯彻中央复电的精神，放手批判，不怕破裂，把我们准备好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稿子在下一次会谈时讲出去。同时，代表团还考虑：要准备结束这次会谈。在讲完斯大林问题以后，在下一次的会谈（第九次会谈）中提出会谈暂停的建议。

7月19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因为本来就有协议，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表东西，不互相指责，不透露会谈的内容。所以代表团在发言一开始就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公开地把两党会谈中间的分歧，用《公开信》的形式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着就专门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联系到这个问题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然后就谈斯大林问题。这个稿子是我们原来在国内就准备好

的几个部件到莫斯科后修改组装的，后来在评苏共《公开信》时，再加以补充，形成两篇文章。

我党代表团的发言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时苏斯洛夫满脸通红，而且当场表示说，你们这么攻击赫鲁晓夫同志和我们党，我提出抗议。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我们的这个发言，但小平同志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念完以后，苏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议，说断然拒绝我们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我们关于苏共领导反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苏共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最痛处，触到了他们的命根子。

当天下午我党代表团发电报给北京，向中央报告下午会谈的情况，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在下一次会谈时提出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并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会谈，而且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来。因为他过去曾请毛主席到莫斯科去，毛主席已经答复他不去莫斯科，所以我们这次提出请苏联派代表团到北京会谈时也表示希望赫鲁晓夫来。

当天晚上，周总理就直接打电话到莫斯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同意代表团的意见，方针已定，不必细说了。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小平同志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的情况看来，中苏两党存

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看来，苏方也是有准备的，很可能他们窃听了周总理从北京给我们代表团打来的表示同意代表团方案的紧急电话。所以在小平同志讲完以后，苏斯洛夫表示，听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建议以后，他对这次两党会谈未能够达成协议感到遗憾。他同意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另行商定。这就是说他们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答应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

小平同志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亲自率代表团到北京来。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还在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

小平同志所讲的赫鲁晓夫对我们大加指责，是指赫鲁晓夫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讲

话时大肆咆哮，虽然没有指名，但是人们一听就知道他在骂谁的，而且他还特别攻击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所以小平同志在20日的会谈中说他有意见可以到北京来讲，可以直接对我们讲。小平同志说，既然苏联同志认为时间和地点以后再商定，我们也同意。

会谈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要发表一个公报时，苏方拿出了一个公报草稿。在这个草稿里，除了讲到两党代表团什么人参加会谈以外，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第二句话是“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

小平同志看过苏联的这个公报稿子以后表示，对这两点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是不是请双方指定两个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同时他提出我方由我和姚溱两个人参加，请苏方也指定两个人一起讨论修改。苏方同意，并指定萨丘科夫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处长参加修改苏方提出的公报草稿。

当时我请示小平同志如何修改。小平同志说，第一句说什么“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都不要，按中央复电指示，改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句话根本不要，如果要讲达成协议，只讲会谈暂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另定。这也有中央指示，文字上怎么表达你们去考虑。

双方确定了修改公报的人选以后，我们离开会议大厅，到会议厅旁边一个小房间里讨论公报的草稿。代表

团的其他人员休息、喝咖啡。

在讨论的时候，双方对公报草稿前面讲两党代表团都是什么人参加，没有什么争论。接着就谈到会谈的气氛怎么样的问题，我说，关于会谈在什么气氛中间进行，我们觉得你们的提法同实际情况不符，是不是可以只讲各自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经过反复争论，萨丘科夫坚持以不要把会谈分歧公开化为由主张维持原来的提法。于是我反复说，在会谈中双方分歧很大，你们讲了很多意见，我们也讲了很多意见。你们有些话既不友好，也不是同志式的。你们在会谈期间发表了《公开信》，早就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了。你们的报刊上这几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报道，谁都知道中苏存在严重分歧，在公报中没有必要加以掩饰，自欺欺人。争论到最后，我提出，把"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我再三说明我们这样修改的理由。双方争论了一下，最后他们也只好同意，只是在"双方就"之后加了"现代世界发展"这几个字。最后的句子修改成为"在会谈中双方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

针对他们草稿中的第二句话，我强调说，会谈并没有达成停止公开争论的协议。我们已经讲了，你们发表了《公开信》，我们有必要也有权利加以评论，不能你们说了

就完。我们要答辩，我们有答辩的权利。会谈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任何协议，所以在公报里面不能这样写。萨丘科夫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说会议上是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考虑到我党6月14日的复信中对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曾经提过建议，于是提出，把苏方草稿修改为“中苏两国代表团一致认为，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代替他们草稿中的“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一句。

萨丘科夫听了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记了下来，马上跑到他们代表团那里，请示苏斯洛夫。萨丘科夫回来说，苏共代表团不同意我们这样修改，那是你们的建议，不能作为双方一致的协议。他们的意见还是要写上“达成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他说，这是苏共代表团现在提出来的建议，希望中共代表团同意。这简直是强加于人，我们当然不能同意。经过一番争论，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只好不写他们的提法，也不写我们的提法。

关于继续会谈的问题，我们代表团已在会上建议，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因为这样就表明这次会谈不是完全破裂，还有回旋的余地。据此，在讨论公报草案时，我提出，公报中写上：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谈。我们还建议苏共由赫鲁晓夫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来谈。苏方不同意这么写，他们说这个问题以后再商

量，实际上是不确定会谈的地点，也不确定日期。最后，双方同意把最后一段写成："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双方修改公报草稿后，就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团，然后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念了一遍，双方都表示同意。这次中苏两党的正式会谈就这样结束。公报于7月22日发表。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我代表团举行宴会。因为会谈中间双方已经吵了这么多，祝酒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为彼此健康干杯而已。

但赫鲁晓夫很滑头。他在19日的苏匈友好大会上骂了我们一顿，在宴会上交谈中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对小平同志说，我们两党中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对他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

这时赫鲁晓夫要赖说，哎，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什么严重分歧。他就这样支支吾

吾地企图把问题撇开。

但是小平同志还是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小平同志说，你们发表我们6月14日的信，我们觉得这样做好。你们3月30日的信，我们已经在4月间发表了。你们这次《公开信》，我们也准备发表。你们的历次重要的声明、信件和讲话，包括你（指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有些我们已经发表，有些我们还准备陆续发表。我们希望你们也发表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声明和文章。我们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发表的七篇文章和7月份连续发表的几次声明，希望你们也能够发表。既然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究竟谁对谁错。

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我们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

小平同志说，不是什么"毫无根据"，很多都是直接引了你讲的话。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经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许多话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的多。

赫鲁晓夫只好耸耸肩膀，摊摊双手。

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们代表团当天晚上11点

分乘两架飞机回国。

第四节　破裂的边缘

北京时间第二天下午，我们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董必武同志（当时是国家副主席）都到机场欢迎代表团。欢迎队伍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群众，一共约五千多人，这么隆重的欢迎意在表明：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工作是得到中央完全支持的。据我的记忆，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来，只有少数几次，一次是少奇同志 1960 年率领代表团参加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和访苏后回国，一次是 1961 年周总理参加苏共“22 大”后回国，再一次就是这次小平同志率领代表团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后归来。

代表团下飞机后，毛主席要代表团到中南海颐年堂去。到了颐年堂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昨天晚上赫鲁晓夫举行宴会的情况，你一句我一句，煞是热闹。

在谈话中间，毛主席给代表团的工作做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说，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小平同志说，那种情况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我们去的时候就准备他们不同我们达成协议，还准备他们完全破裂，但是我们力争不破裂。毛主席说，现在

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又谈了一会，毛主席说，好了，大家很疲劳，都回去休息。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天不开会，后天也不开会，因为我们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了。

毛主席所讲的已经对苏共的《公开信》表明态度，是指7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结束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这个声明是7月19日晚广播，20日见报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发表的这个《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声明还宣布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问题，加以澄清和评论。

声明还讲到，我们将全文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同时也发表我党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均在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时也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我们是欢迎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希望苏方应该像我们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那样，继续发表中共中央有关的文件，希望把我们去年12月以来所发表的七篇文章、7月初的连续三次声明

言人声明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本舞蹈家代表团

陈毅副总理接见日本客人寺本光照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

（二）

（四）

人民日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96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和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和这一次(7 月 19 日)我们发言人的声明,都能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我们也将在我们的报刊上陆续发表苏联报刊和苏共中央发言人、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公开信》以后对中国的攻击,我们准备摘其中精彩的部分发表,对其他共产党支持苏共《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准备摘其重要的发表。而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夸奖苏共中央《公开信》、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我们也将摘一些精彩的在报上发表。

《人民日报》在 7 月 20 日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加了一篇比较长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着重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采取的是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且列举了四个问题加以揭露和批驳。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核战争的问题。按语指出,《公开信》攻击毛主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毛主席曾经提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抵抗,要么是投降。有人说抵抗就会全人类死绝。毛主席针对这种论调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核战争,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全世界就可能有亿万人民遭到牺牲,但是人类绝不会毁灭,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的这个观点是针对上述那种认为全人类要死绝的悲观绝望的论调提出来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歪曲的那样,说什么我们主张打核战争,全世界死掉一半人也

不要紧。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共"20大"的评价。《编者按语》指出,从1956年3月到11月,我们一再向苏共提出,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有片面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毛主席就曾一连四次跟米高扬和苏联其他同志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个时候完全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三个问题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编者按语》指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向苏共提出意见,特别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的时候,我们向苏共提出过一个备忘录,全面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所讲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赞成他们,现在又反对他们。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编者按语》指出,首先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方面。早在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通知中国,要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1000多位苏联专家,而且撕毁数目达几百个之多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设备物资。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列举了这四个例子之后说,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像这样颠倒是非的地方一共有七八十处之多,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这次历时半个月的中苏两党会谈，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苏方毫无诚意要通过这次会谈来解决分歧，不仅7月14日发表的《公开信》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7月19日在苏匈友协会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在这之后不久，7月25日苏联、英国、美国签订的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表示什么呢？这个条约表示：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因为这个条约禁止的是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而不禁止在地下进行核试验。美苏两国的技术条件比较先进，发展核武器走在前头，可以不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只在地下试验。而中国起步较晚，当时，只能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还不能搞地下核试验。他们达成这个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就是想把中国套上，逼迫中国不能发展核武器。我们当然不能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当时法国核技术也较美苏落后，也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美国代表哈里曼当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曾明白无误地提到这个条约是针对中国的。哈里曼在到莫斯科去谈判之前，6月21日发表谈话说，美国同苏联、英国在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协议可以制止扩散核武器。他说，我们能够合作防止中国获得核力量。

而在莫斯科谈判以后，哈里曼回到华盛顿，在7月29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同赫鲁晓夫讨论过中国发展核能力的可能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先生对这样一种发展似乎并不过分不安。他告诉我，在他们（按：指中国）获得任何重要性的核能力以前，还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哈里曼又说，赫鲁晓夫表示他相信中国缺乏发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工业基础，因为自从1960年以后，苏联再也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工业性的技术援助。

哈里曼的这段话表明得很清楚，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向美国靠拢，要和美国达成协议，而这个协议并不妨碍他们发展核武器，目的是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1963年7月间的中苏两党会谈没有能够达成任何结果就结束，而苏、英、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谈判，却在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后第五天达成了协议，签署了条约。

这件事情也表明了赫鲁晓夫颠倒敌我已经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中国政府7月31日发表声明，揭露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声明还指出，苏联政府领导人赫鲁晓夫过去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现在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抛弃过去的正确立场，背叛包括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利

益,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立场。

苏联政府8月3日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的声明,为苏联政府辩解。

中国政府发言人8月15日发表长篇声明,驳斥苏联政府声明。

至此,中苏两党会谈结束后,分歧即在中苏两国政府之间展开。赫鲁晓夫为了反对中国,不惜同美帝国主义共谋。

第十二章
公开大论战

第一节　公开论战新阶段

本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早在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这以前，在意识形态上、在理论问题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不指名的争论早已有了，至少1956年就开始了。但是，公开指名的论战，是由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挑起的。在这之后，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不指名攻击中国的文章、讲话以至声明、决议，很快就多起来。自1962年12月12日起，赫鲁晓夫带头策划，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不仅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而且还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党，这就使公开论战进一步激化。

当时我党中央认为,既然有这许多公开攻击,我们党就有权利公开答辩。我们从1962年12月起,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来回答在这个时期对我们的攻击。因为在这个时期,一些党公开地指名攻击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公开地指名答辩,批评这些党及其领导人。但是,一直到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之前,甚至在我们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答复苏共来信的长信里,我们没有指名批评苏共,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真理报》刊登的文章,已经指名攻击我们,但我党中央还是决定要留有余地,不直接点苏共的名,也不直接点赫鲁晓夫的名。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方针。

在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苏共中央全面地、系统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进行恶毒的攻击,这样才使公开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共这样的系统攻击,而且采取公开信的形式,是过去论战中未曾有过的第一遭。

我们党中央决定在7月20日发表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初步揭露该信中歪曲事实的事例。

中苏两党会谈结束，我党代表团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起草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毛主席在我们开始准备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主席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中央确定我们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但他们的反华言论，仍应摘其精彩者登报，挂一笔账。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十分冗长，达 33000 多字，共有五个部分。

《公开信》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但是它并不讲分歧是中共一方和苏共一方，而是讲“中国一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兄弟党一方”。其实，它所讲的实际上是我们同苏共的分歧，尤其是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它从 1960 年 4 月我们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讲起，讲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为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诡辩，说什么这是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

助”。《公开信》还歪曲1960年81个兄弟党代表会议的情况，说什么在这个会议上，绝大多数党都反对中国党的意见。其实，对苏共起草的声明草案，我们党和其他好些兄弟党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删除或修改了他们的绝大部分错误意见。最后只是为了照顾整个会议能够取得成果，我们在一两个问题上做了让步。这些在前面都已经讲到了。《公开信》还为1961年的苏共“22大”辩解，说什么我们策动阿尔巴尼亚反苏，其实是赫鲁晓夫在“22大”上带头发动公开攻击阿党。更可笑的是，《公开信》说什么是因为中国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使中苏两国贸易减少了。它根本不敢讲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所有的协定、合同，把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才是造成中苏贸易额下降的根本原因。

《公开信》的第二部分，是讲中苏分歧的实质。它列举了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问题、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公开信》说，分歧的实质是中共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路线”。它根本不谈，正是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还有别的一些问题上，苏共领导怎样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背1957年和1960年两次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和《声明》。《公开信》特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同时抵赖他们提出的

“三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它极力为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行动辩解。

《公开信》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斯大林问题，即所谓“个人迷信”问题，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辩解。它歪曲事实到这种地步：说什么中国党过去完全赞成苏共“20大”反斯大林，现在又反对，前后矛盾。其实，早在1956年4月起，毛主席同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先后多次指出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只是因为照顾当时苏共领导的处境，没有公开批评他们。但人们只要看过我党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1956年4月和12月）就不难看出我党是不同意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

《公开信》的第四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苏共“20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同意他们的观点。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我们还专门交给他们一个不同意苏共观点的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公开信》在这个问题上极力为苏共领导的错误辩解。

《公开信》的第五部分是总结。它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教条主义的，而苏共提出的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公开信》在这里把他们的路线归纳为五项原则，虽然与过去相比是做了一些弥补和修改，但是依然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这五项原则是：第一，强调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都要在社会主义体系起决定

性作用的前提下来进行。这就是要大家都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二,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拯救人类免于核战争。这就是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要求各国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斗争、各被压迫民族为民族解放的斗争,都服从于"三和"路线。第三,强调通过和平的、不同于国内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放弃准备对付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非和平的武力的镇压。第四,强调民族解放运动要为争取非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这两项都是"三和"路线的内容和注解,这就是只能"和",不能"战",即使敌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也应如此。第五,强调社会主义各国要共同确定一致的立场,并要保证"忠诚"。这是要听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的换一种说法。《公开信》在这里,攻击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攻击中国党支持各国党的左派,说我党削弱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说我党违反共同路线,等等,等等,硬给我们党加上一大堆的罪名。这些指责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他们居然振振有词,装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党坚决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反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

对苏共中央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不仅公开发表了,而且还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五种外国文字广播了。同时我们也再次发表了我们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我们把这两封信轮番广播,连续广播了一个月。用

毛主席的话来讲，这是为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以及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人民，来共同分析、评价这两封信究竟谁讲的有道理。我们不怕辩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合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员、各国人民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第二节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我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以后，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以分类，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我们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我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有关于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就分头准备。

那个时候，我们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有我、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当时熊复和胡绳两位都病了，没能够参加起草工作。我们每个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包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

次序起草。另外还请中宣部、中联部分担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小平同志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小组的成员见前)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小平同志认可后再送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再拿到由毛主席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主席首先提出:

1. 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 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 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 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公开信》已发表过),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账。

5. 评论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其他常委也提了不少意见,如评论可以依苏方来信分若干个问题写,但又不能完全跟它走。他打他的,我打

我的。又如可先从分歧由来讲起，因会谈中已有讲稿可作基础，很快修改发表，不致冷场。斯大林问题也有讲稿，稍加修改可作为第二篇，火力很猛。其他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都要独立各写一篇评论，我们有许多话要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强调，写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明、讲话、文章等中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使别人驳不倒。尽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

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9月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用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评论，起于1956年。这就是在1956年4月，针对苏共"20大"以后掀起的反共反苏浪潮，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当修改这篇文章将近结束时，还没确定用什么形式发表。毛主席提出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毛主席说，《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就是中



人民日报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

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

共中央。所以到1956年4月发表这篇文章和后来12月间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在副题中写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以后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讨论定稿的重要文章,都沿用这种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1956年还没有《红旗》杂志,只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1958年《红旗》创刊以后,公开宣布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所以它的编辑部也代表中共中央。从这时起,重要评论就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一篇文章(简称《一评》)是讲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苏共《公开信》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我们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就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发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发言稿是我们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之前,中央领导同志审定的。有这个发言稿做基础,我们回北京以后,经过补充、修改,很快定稿,9月6日就发表了。

《一评》首先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并不是像苏共中央《公开信》里所讲的是从1960年4月开始,而是早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时就开始了。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这样

一个重大原则错误。从那次会议以后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从产生到形成、到发展成系统化，也就是苏共“22大”所通过的苏共纲领。

《一评》的第二部分，是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里讲我们对苏共“20大”开始拥护、后来反对、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列举了从1956年4月起，我党中央领导同志同苏共领导谈话时多次表示不同意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毛主席在讨论此文过程中强调这笔历史账一定要写上，向全世界公布。文章列举了毛泽东同志4月同米高扬的谈话、4月和11月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谈话。1956年10月苏联和波兰关系紧张的时候，苏共邀请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当调停人。少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在周恩来同志1956年10月和1957年1月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谈中，都明白无误地表明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

《一评》还指出苏共“20大”引起严重后果。当时在全世界，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一个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浪潮。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努力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共产主义，维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声誉，帮助苏共领导渡过困难。在这中间有两个突出的事件，一是波兰和苏联关系紧张，一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都尽力帮助苏联，从内部纠正苏联对波兰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帮助苏联正确对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而在公开场合，

我们并没有指责苏共领导在这两个事件中的错误。

《一评》指出，在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争论很多，特别是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苏共在会议的《宣言》草案中硬要塞进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争论到最后，尽管苏共的主要观点作了修改，但是我们对这个文件的表达方式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们给苏共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对关于苏共“20大”的那段文字，我们本来是不同意的，也提出过修改意见，后来考虑到当时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困难，我们没有坚持一定要把这段文字改掉，还是照顾了苏共。对于那次两党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没有公开。

《一评》的第三部分，叙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批评苏共提出“三和”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一部分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我们第一次把过去按留有余地的方针而没有公开披露的1958年和1959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加以公布，指出：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领导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苏方在1959年6月撕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文章指出，中苏思想分歧演变成为国家关系恶化，完全是苏方挑起的。9月间，塔斯社又发表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声明，这是第一次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戴维营会谈之后，赫鲁晓夫在

几次讲话中不点名地指责中国共产党,说什么我们"超阶段"、"平均共产主义"、"好战"、"冒险主义"、"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固性"等等,一直到指责我党是"托洛茨基主义"、"公鸡好斗"。

《一评》的第四部分,叙述苏共中央1960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一评》的第五部分叙述1960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评》的第六部分论述1962年苏共第22次大会通过新纲领,把苏共领导的观点系统化,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苏共这次大会,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创了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的先例。

《一评》的第七部分论述苏共领导从苏共"20大"开始发起一个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流,直到1962年11月策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华运动。文章在列举十件大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面对这样一个反华大浪潮,不得不对兄弟党的公开指责进行公开的答辩。从1962年12月起到1963年3月,我们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公开地、指名地回答攻击我们的兄弟党领导人。

《一评》的最后一部分,总结七年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苏两党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1957年《宣言》和

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

《一评》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经反复地、几十次地考虑，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可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岂不也成了修正主义者吗？如果我们对苏共领导的错误缄默不言，岂不也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我们也曾经几十次地在内部会谈中间，特别慎重和耐心地对苏共领导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但是都没有用，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苏共领导越走越远，对我们的好意劝告的报答是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粗暴的攻击。迫不得已，我们只好同他们进行由他们发起的公开论战。

在发表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同时，我们还发表了三个附件：第一个附件是1957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第二个附件是1960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时的声明，第三个附件是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9月13日我们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二篇评论，题目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这篇

文章也是以我们党代表团7月间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一个发言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而写成的。

毛主席在《二评》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

《二评》开篇提出,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都发表了种种各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这段文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

《二评》指出,从十月革命开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1963年)只有46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30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赫鲁晓夫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

《二评》在回顾列宁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得出结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为一个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家，在他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文章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分析。文章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间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文章列举了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还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他的功绩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不加以任何歪曲，那么对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二评》说，苏共中央在《公开信》里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要理直气壮地宣布我党要为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的斯大林辩护。文章明白宣告：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的。在赫鲁晓夫歪

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地、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光荣历史辩护，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这是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正直的人，都应该这样做，而且也已经这样做，或者正在这样做的。文章还说，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就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国际方面来说，都是同斯大林有关。但是，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犯错误的那些同志，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这样做是为着接受教训，把我们的革命事业搞好。

《二评》指出，赫鲁晓夫和苏共某些领导人从苏共"20大"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对斯大林，不是全面分析，而是全盘否定；不是用同志的态度，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他们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有些是他们自己编造的错误也硬要栽到斯大林身上，甚至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面他们自己却根本不做自我批评。

《二评》评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咒骂时非常尖锐，充分引用赫本人的话，毫不留情地指出，赫鲁晓夫咒骂斯

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说什么“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暴君”、“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在咒骂斯大林的时候讲过的。文章指出，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那岂不是说，苏联人民在长达30年之久的这段时间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吗！那岂不是说，苏联30年的历史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而是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历史吗！岂不是说，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以强盗为首的国家吗！岂不是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以混蛋为领袖的政党吗！岂不是说，伟大的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那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里面，竟然把一个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岂不是说，世界各国人民是把一个赌棍作为旗手吗！文章指出，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对伟大的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对苏联军队、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是莫大的侮辱。

《二评》列举确凿的材料，指出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怎样称赞斯大林。他不但多次说过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战友和朋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他甚至说过，斯大林是“自己生身的父亲”。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1963年7月19日在莫斯科苏

匈友好大会上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也攻击了斯大林。他说，哎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文章指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进行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的1943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掉的是谁呢？是希特勒。

《二评》最后指出，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原因在于：第一，他们想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第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的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开辟道路；第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安插他们自己的代理人；第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而言之，苏共领导那样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

9月2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三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这个问题是当时我们跟苏共争论很激烈的问题之

一。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参加了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全面对抗《莫斯科宣言》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接着又公开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因此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了南共联盟。

《三评》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分析，同时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61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

《三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三评》指出，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背弃1960年《声明》，并不是因为像赫鲁晓夫所讲的那样，是由于南斯拉夫勾销了错误，而是由于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看起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三评》发表之后，我们的国庆节临近。国庆节期间，我们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苏联也派了以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为首的代表团

来华。党中央决定，在国庆庆祝活动期间，暂时停止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他反修文章也暂不发表。一共暂停了四个星期，一直到10月22日才发表第四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文章指出，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样，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严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世界人类的进步事业，终究是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四评》批驳了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是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是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是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第四是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四评》指出，苏共领导的四个"药方"，实际上是取消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一句话，这就是他们

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走上了社会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鼓吹帝国主义曾经鼓吹过的“种族论”。赫鲁晓夫特别热心鼓吹“黄祸论”。他在1954年跟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会谈时，就曾经要求阿登纳帮助他对付来自东方的“黄祸”。

在我们连续发表四篇评论《公开信》的文章以后，赫鲁晓夫在10月底到11月初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我们，一面又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当时我党中央估计，这并不是他真心要停止公开论战。1963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他们发表了两千多篇攻击我们的文章、讲话和决议。我们的回答仅仅发表了四篇，还差得远。我们不能不为自己答辩。所以中央决定对赫鲁晓夫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不予理会，抓住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放，继续发表评论。

《四评》发表以后，我应朝鲜《劳动新闻》总编辑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代表团访朝。当时还有几篇文章需要我主持写作班子修改。一篇是讲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篇是讲和平共处问题的，由于我出国访问，都由乔冠华（他从7月间中苏两党会谈起提为起草小组的副组长）接手主持继续修改。因为这两个问题过去辩论过多次，现在同苏共论战，要多费一些功夫。我临出国前毛主席已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

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如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在日内瓦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和目前仍在华沙进行的中美谈判。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

我到朝鲜去访问了一个星期，先访问了平壤，然后又访问了开城和东海岸的咸兴。按计划本来还应该再继续访问一个星期，但因国内打电报要我提前回国。在访问了咸兴回到平壤后，金日成接见了我们人民日报代表团。他在接见时说，他差不多每天都看《人民日报》，特别喜欢看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一评》、《二评》讲得非常好。在金日成接见以后，我离开朝鲜回国，留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继续在朝鲜访问。

11月19日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五篇文章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这篇文章回顾了第二国际在对待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照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论证赫鲁晓夫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尘，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脉相承的。《五评》列举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全副武装同苏联对峙的一系列事实，揭露赫鲁晓夫吹捧美帝国主义头子的种种语言的破产，并指出苏共领导的路线，不是导向真正的和平，而是导向战争。《五评》说，赫鲁晓夫的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五评》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路线，是争取和确保世界和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五评》发表以后不久，苏共中央在 1963 年 11 月 29 日给我们党中央来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们的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他们在信里首先大讲了一番好听的话，说他们希望改善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定货，可以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从这封信看，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威胁，重新修好是诱饵，目的主要是为着停止公开论战。

第三节　为什么苏共要“停战”

我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 11 月 29 日的来信后，毛主席在 12 月初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指出，考虑到我们对他们 7 月 14 日《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 42 个兄弟党发表的大量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

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毛主席谈到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提出有关中苏国家关系的几个问题时说,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再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当时中央要求有关部门把这些问题研究研究,先不急、不忙,观察一个时期,研究一个时期再说。

毛主席在常委会议上交代,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据此,写作班子重新布局并对原来的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

12月12日,我们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六篇文章,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

《六评》)。《六评》说和平共处政策有两种,一种是列宁、斯大林倡导和实行的和平共处政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中国一直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开始,我们就宣布了这个政策。而且在 1954 年同印度缔结协定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这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1955 年的万隆会议又制定了和平共处十项原则。我们对待一切国家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就是说,我们把加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运动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

《六评》指出,另一种和平共处政策是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这种和平共处政策要求各国人民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都服从于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讲"妥协"讲"合作"的方针。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它的实质内容就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六评》发表以后,在 1964 年元旦过后,毛主席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研究怎么样处置苏共中央 1963 年 11 月 29 日的来信。

归纳起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有以下一些看

法和意见。

苏共中央为什么来这封信？大家认为，第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害怕公开大论战。大论战的火是他点起来的，现在引火烧身。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现在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对于公开论战中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对他的揭露十分恐惧。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他们党内有不少人不同意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不同意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那种修正主义的政策。许多过去跟着赫鲁晓夫走的党，现在内部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认为这样争论下去不得了，要求赫鲁晓夫设法停止公开论战。

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美国总统肯尼迪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美国南方城市达拉斯被人暗杀，接替他的是副总统约翰逊。美国政府处于软弱的过渡期，难于果断处理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寄希望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难更大。

第四个原因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赫鲁晓夫搞的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都不好，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这是赫鲁晓夫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可以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毛主席认为，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

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中央常委会要求外交部、外贸部、财贸口、文教口、计委和总参谋部(因为苏方来信里谈到边界问题)都认真研究如何答复苏方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由秀才班子考虑怎么样答复。

少奇同志和其他常委还补充说,在最近期间,如果有兄弟党问我们对苏共 1963 年 11 月 29 日来信的态度时,我们可以解释我们的态度:

第一,我们是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公开论战的,公开论战不是由我们挑起的,而是由苏方挑起的。

第二,苏共既然挑起公开论战,发表了那么多决议、文告、讲话、文章,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他们公开地、指名地攻击我们,我们就公开地、指名地答复他们。现在我们只是答复苏共中央,对其他兄弟党的指责我们还没有答复,但是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说,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答。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第三,苏共领导一贯出尔反尔,说了不算数。这方面我们多次上当过。现在他们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

但是又在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因此我们还要看一看，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看看他们对停止公开论战到底有多少诚意，然后才谈得上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

第四，兄弟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公开论战也应该讲民主、讲平等，不能苏方要论战就论战，要停止就停止。这不行。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要承认过去公开指责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是错误的，要宣布撤销那些决议、讲话、文章。如果不这样，达不成这样的协议，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保留答复的权利，我们要什么时候答复就什么时候答复。

毛主席说，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他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毛主席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现在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

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计划要继续进行，而且要抓紧，要用充分的事实、充分的论据，分清是非，这样有利于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是长期的斗争，要看到这一点。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我们起草班子在1963年12月份和1964年1月份，着重起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经毛主席这一指示，秀才班子才豁然开朗，才在小平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点，不但批判赫鲁晓夫

的分裂主义，彻底揭露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而且还要把他的分裂主义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详细的分析，为左派和中间派对赫鲁晓夫最后分裂国际共运做思想准备。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过去的文章一般是七改八改，修改七遍到八遍，至多十遍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篇文章的修改稿（已经是第十稿了）在1月下旬送政治局的同志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讨论，做了不少修改，到2月初最后定稿。题目改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2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七评》开门见山地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威胁，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七评》最大的特点，是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评论指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

结和制造分裂之间的斗争，一国范围如此，国际范围也是如此。

《七评》的第一部分，在总结从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历史教训时指出：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每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使它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分裂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七评》的第二部分，论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系统地分析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地形成为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维护和壮大社会

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分裂和瓦解它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七八糟，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得四分五裂。评论指出，由于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它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造成的损害特别巨大，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评论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不仅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而且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苏共领导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七评》尖锐地批驳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

《七评》最后呼吁维护和加强团结。评论指出，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如果苏共领导真要团结，就应当放弃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分裂主义的活动，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遵守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准则。这是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惟一可行的道路。

第四节　同兄弟党商量

在2月4日《七评》发表后，党中央开始研究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稿。这封信稿，起草班子已准备好一个经过多次修改的初稿。

我趁这个空隙去越南访问。当时中越两党的关系很好，我们的《人民日报》跟越南的《人民报》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越南方面希望我率领人民日报代表团到越南过春节。

我们代表团2月9日上午从北京起飞，当天下午到达河内。按原定计划，我们准备在越南访问三个星期。我们到达河内以后，听了越南高级领导人介绍越南情况。阮维桢介绍国民经济情况，阮志清介绍农村情况，春水介绍宣传方面情况。范文同还接见了我们。我们代表团参观了人民报社和越南通讯社，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在河内过春节以后，我们到海防、鸿基访问。在鸿基期间，收到我国驻越南使馆给我的电话，要我赶快回河内，说北京来电话说有任务。这样我就匆匆忙忙从外地赶回河内。

回到河内以后，才知道中央派小平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河内，要我参加代表团的工作。我赶到宾馆去看小平同志时，他告诉我，他们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请越南考虑做一个长远的经济建设规划，使越南的经

济基本上能够自给，特别是农业、轻工业这两方面能够自给，重工业不可能搞得很多，但是煤矿是可以搞的。小平同志还告诉我，我国政府准备给越南2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希望他们考虑一下怎么样用这20亿元，主要是搞好农业和轻工业。过去他们的粮食主要是依靠我们接济，轻工业品大部分也是从我国进口，军火是我们无偿援助的，不像苏联对我们抗美援朝的军火援助那样按半价计算付款。中央考虑用20亿元帮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

小平同志还告诉我说，这次来河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越南对我们答复苏共中央来信的意见，这个答复信的稿子也翻译成越南文带来了。在他们来越南的同时，我们党中央也请金日成到北京，征求他对我们答复苏共中央11月29日的信的意见。小平同志说，凡是能够接触到的亚洲党、欧洲党、大洋洲的党，以至美洲的党，都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们这封复信牵涉的问题比较重要，不仅仅是答复有关中苏两党的问题，而且还答复关于召开一次新的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和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不能继续带领代表团在越南进行下一步的访问，只好指定一位代理团长，继续在越南访问。后来他们到靠近北纬17度分界线那个地方去访问。

越南党方面出面会谈的是以黎笋为首，包括范文同、长征和他们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我们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小平同志，还有康生和中央联络部的负责同志，我也

参加了这次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间，越南方面表示，非常欢迎并且感谢中国拨这么大笔款来专门帮助越南加强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他们说，他们虽然也曾经想过，这的确是他们建设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但是因为经济上有困难，所以也不敢搞大规模的建设。现在有中国政府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根据越南的资源、人力情况，开始比较大规模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们说，重工业他们也想搞，但是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多搞，只有煤矿这方面可以多搞一些。鸿基的煤很不错，是可以出口的。其他还有一些矿山也可以开发，但是现在不能大搞重工业，只能首先搞好同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粮食和生活用品的生产。他们说，因为20亿人民币的建设规模比较大，他们还要详细讨论一下，做出详细计划后再跟中国同志商量。

由于原则定了，方针、规模也定了，所以这方面会谈没有多大困难，彼此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越南同志还一再表示中国的这次援助来得正是时候。

关于我们党中央对苏共中央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稿，越南同志也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强调，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要提出一些条件，要苏共方面切实停止公开论战。不仅苏共，而且其他兄弟党也要停止对中国党、阿党的攻击。要苏共跟兄弟党商量，保证做到这一点。他们说，他们赞成中国党在复信中的意见，就是要达成一个公平合

理的协议才能够停战，不能苏方要停就停，苏方要攻就攻。

关于兄弟党会议问题，越南同志特别强调说，为了召开兄弟党会议，首先要中苏两党会谈谈好。如果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兄弟党会议就不能开。他们希望中国党考虑，怎样能够跟苏共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原则的协议，特别是在兄弟党关系、反对美帝国主义共同斗争等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开会，否则开起会来大吵一顿，像过去1960年中苏两党没有谈好，26党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谈好，结果在81党大会期间还继续吵，到最后才达成协议。那种情况不能再重复。他们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在开会之前，中苏两党能够达成协议。

在会谈过程中，黎笋和长征先后提出，他们看了复信初稿以后，感到我们的语气尖锐了一些、强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欧洲一些党的情况，能够稍为委婉一点，那样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小平同志在会谈中表示，我们希望在兄弟党会议之前中苏两党能够达成原则协议。这一点我们完全赞成越南同志的意见，我们一定努力这样做。但是，也要准备万一苏联不愿意达成协议，不肯放弃他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从中苏两党会谈一直吵到起草委员会，吵到大会，很可能重复1960年的情况，甚至比那时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他们的做法更加恶劣。小平同志说，当然，中国党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在原则问题上

决不让步，同时尽力做到保持团结，使关系不致完全破裂。但是，也要考虑到苏共领导决心破裂的可能性。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保持目前这种状况，但是也要准备苏联方面要破裂，还得有这种思想准备，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要吃亏。小平同志说，至于复信的语气，我们还可以斟酌，可以和缓一些，看怎么样能够使更多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原则问题必须要旗帜鲜明，是非必须讲清楚，不能含糊其词。

中越两党代表团会谈了三次。胡志明主席没有参加两党会谈。他最后出面宴请中国党代表团，并且再三表示感谢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抗美战争的大力支援，感谢这一次又帮助越南搞经济建设。他还说，这一切都证明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比兄弟还要亲。

中越两党会谈结束以后，小平同志要我不再在越南继续访问，跟他一起回北京，因为修改复信的工作还很繁重。当时我也知道，苏共中央2月间又开了全会，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和采取“集体措施”，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哩。

当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知道金日成同志率领的朝鲜代表团已经早两天到达北京。而且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2月27日），毛主席已经和他们谈了一次话。

本来，中央原定派彭真同志到朝鲜去，专门把我们的复信稿送给朝鲜劳动党，征求他们的意见，跟小平同志到

越南去担负同样的任务。后来金日成觉得此事关系较大，所以他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

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代表团是由包括朴金哲、金昌满、朴容国等重要的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他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和他们一共会谈了三次，第一次是 2 月 27 日，第二次是 2 月 29 日，第三次是 3 月 5 日。我党代表团以毛主席为首，多数常委都参加了。周总理正在访问非洲和亚洲各国，没有参加。

在第一次会谈时，毛主席跟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在去年 11 月 29 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 7 月 14 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毛主席说，从内容上来讲，去年 11 月 29 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个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作为 1963 年 7 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 17 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做准备。

第三，召开全世界81个或者100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们考虑，看妥当不妥当。

毛主席说，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7月举行，现在已是2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10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7月来不及。

毛主席说，过去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1960年81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党会议上去。如果17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

毛主席还谈到，这个月（2月份）发生的两件事情值

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2月12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2月20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月22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2月27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毛主席说，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金日成说，他到中国来之前，苏联驻朝鲜大使要求见他，交来一封苏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党的信。在这封信中提到要对中国进行“坚决反击”。金日成说，我曾经问他，不知你们所说的“坚决反击”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中国是怎么样反击，然后再给你们复信。你们的坚决反击到底是什么？难道能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吗？不管你们开除不开除，中国仍然存在。那么你们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关系吗？断绝外交关系吗？除此以外你们还有什么？金日成说，当时苏联大使只说要公开发表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谴责中国，其他没有多谈。

金日成说，我看他们这一套没有什么，只不过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就是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以不要采取威胁人家的态度为好。他说他要把我的话报告他们中央。

金日成说，苏联大使还讲到，他们最恼火的是中国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按：指《七评》)，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我就劝他们，你们还是要有耐心，你们发表上千篇文章骂中国，中国仅仅发表几篇文章，怎么就没有耐心了呢？你们现在说要给中国一个坚决的反击，你们一发起反击，那么中国势必还要自卫，还要答复你们。这样，公开论战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毛主席说，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的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快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来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3月1日动身，2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共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让什么步呢？

毛主席说，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的，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也是可以的。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金日成表示，能够照顾一下，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

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

毛主席说，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毛主席跟金日成的这次会谈我没有参加，是后来看会谈记录了解的。

小平同志从越南回来后，当天(2月28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开会。小平同志简单地谈了一下在越南会谈的情况，然后就商量对即将来华的罗马尼亚代表团采取什么方针。

常委同志议论到，这次罗马尼亚代表团来，看来是赫鲁晓夫策动的，而罗马尼亚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到中国来摸摸底。我们应该估计到苏罗之间虽然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不少矛盾。老实讲，我们跟赫鲁晓夫公开论战，我们顶住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有好处。如果我们让步，跟赫鲁晓夫妥协，那么赫鲁晓夫加在罗马尼亚头上的压力会更大。罗马尼亚同志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讲清楚。

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欺软怕硬

的。我们硬一点，罗马尼亚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软下来，不仅我们吃亏，而且罗马尼亚也连带吃亏。这个道理也要给罗马尼亚同志讲清楚。

少奇同志说，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策动罗马尼亚出面调停呢？看来他还是怕公开论战，一方面是压我们，虚张声势说要"坚决反击"，要采取"集体措施"，摆出教师爷的架势；另一方面又策动罗马尼亚来调停。这是他的两面政策。罗马尼亚过去跟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虽然有布加勒斯特会议，但后来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经常给我们通气。它有这个资格出面调停，比起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有资格一些。而且这样也可以抬高它的地位，来对付赫鲁晓夫。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摸一下情况，既摸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也摸一下赫鲁晓夫企图要罗马尼亚干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样打算的。

最后，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决定我党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是：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

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天(2 月 29 日)毛主席和金日成进行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朝鲜代表团住地钓鱼台 18 号楼举行的。朝鲜方面参加的除金日成以外，还有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崔喜政、金光政、金基南、郑凤珪。我们方面参加的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伍修权，还有我和姚溱。

会谈开始，毛主席首先要小平同志向金日成介绍他去越南的情况。

小平同志扼要地汇报了中越两党会谈的情况。他说，总的会谈情况是好的，他们很赞成我们的复信。黎笋还表示要把反修斗争干到底。在我们谈到穷寇要追的时候，他们有些顾虑，希望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前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小平同志说，我已经给越南同志讲清楚，我们争取拖，但是不怕破。争取拖就是保持目前这种不破裂的局面。

这时候，毛主席对金日成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

放南京的。这首诗里面有那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

金日成表示,看来苏联方面很怕公开论战。

毛主席说,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公开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指名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问题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激他一下很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了。

接着,双方就如何接待罗马尼亚党代表团问题交换意见。

毛主席说,原来他们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少奇同志认为,跟罗马尼亚同志会谈时,在主要问题上很难达成协议。所谓主要问题还不是讲实质问题,比如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还有什么全民党、

全民国家，等等，不是讲这些问题，而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主要问题。停止论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赫鲁晓夫要承认错误，因为论战是他们挑起来的。我们可以把情况摆出来，让罗马尼亚同志知道。

小平同志说，要赫鲁晓夫承认“20 大”是错误的，也要他承认他们给我们戴的许多帽子是错误的。看来罗马尼亚同志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来。

接着又谈到开 17 国起草委员会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召开 17 国起草委员会之前，先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苏两党会谈能不能谈出一个共同的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这恐怕很难，实际上可能出现两个草案，苏共一个，我们一个。

毛主席说，我们给苏共的复信，准备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之前就发出。我们在信里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 10 月举行。他们可能会说太晚。那么我们第一步让到 9 月，第二步让到 8 月，让了两步就不能再让了，因为需要时间做会谈的准备。这样，从现在到 8 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毛主席还问金日成，他们对复信还有什么意见。金日成说，意见已谈了，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复信写得很好。

接着少奇同志提出对中苏两党会谈的估计。他认为，从目前情况看，中苏会谈很难搞出一个共同草案，这就意味着召开 17 党会议的时候要讨论两个草案。所以会谈本身就是争取拖，准备破。毛主席说，我们采取谈的

办法，他们没话说。达不成协议不是我们的责任。

接着又谈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来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答应它暂时停一段时间的问题。

毛主席说，同赫鲁晓夫谈判好办，同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就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方针，对他们不能采取对待赫鲁晓夫那样的态度，不能让他们空跑一场。那么，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呢？当然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在不那么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出于礼貌，可以考虑在一个短时间内，在他们来的时候，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公开论战的文章，甚至到中苏两党会谈之前几个月，也不发表我们公开论战的文章。这样也有好处，可以让秀才们集中力量，准备将来中苏两党会谈时我方提出的宣言草案，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对罗马尼亚同志说，我们也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我们并不是像公鸡那样好斗，并不是每一天都斗，我们半年多才写了七篇文章，现在可以暂停一下。

毛主席接着就请金日成在北京留一段时间，待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来后帮助我们做做他们的工作。金日成表示，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他可以留下，其他负责同志可以先行回国，他同代表团商量一下再说。金日成说，乔治乌·德治同他比较熟，在他面前曾流露过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看来罗马尼亚同志可以争取。金日成说，这次罗马尼亚同志来，可能是以中立立场来跟你们谈。

朝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朝鲜党政治局的主要负

责人，差不多等于第一、二、三把手，全都留下来不行。后来他们商定，金日成同志留下来，朴金喆和金昌满先回去，还留下几个同志陪金日成。

第五节 针锋相对的答复

毛主席同金日成第二次会谈之后，当天(2月29日)晚上就决定发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这封复信，主要是针对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针锋相对地给予答复。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苏边界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中谈到，两国政府可以商谈边界问题。我们在这封复信里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未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是这样做，那么双方在边界上本来是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的。复信接着指出，但是，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的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方在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诱骗和胁迫几万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去。复信还说，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在1964年2月25日(就是在复信发出前几天)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会谈，如果苏联方面也采取同中国政

府同样的态度，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援助的问题。复信说，中国对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并且多次表示感谢。但是，你们老提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其实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而主要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所提供的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用贷款的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国际货币来偿付的。而且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说要贵得多。应该说，这十多年来，一直到1962年为止，我们向苏联提供的粮食、油料和其他食品有21亿新卢布，提供的矿产品和五金有14亿多新卢布，用这些钱来偿还苏联给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也包括偿还贷款。

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其中绝大部分是军事物资的贷款，这些军事物资大部分是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间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负担重，损失大。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用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的，而是要中国按半价购买的，甚至还要计算利息。我们一直是按原来的规定逐年偿还。据周总理计算，在过去十几年中间，我们一共欠了苏联74亿多卢布的债，到1964年3月，我们已经偿还了71亿多卢布，还有4亿卢布左右未还清。经过1964

年整年的努力,我们到年底也全部还清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苏共中央来信说可以向中国派专家。我们在复信里说,过去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而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积极工作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对他们那种辛勤劳动,我们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

复信说,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违背双方协议,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表示愿意挽留这些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你们重新考虑。但是,你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悍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这样做,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也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你们现在表示可以向中国派专家,坦白地说,中国人民是信不过你们的,我们不愿意再上当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苏贸易的问题。复信指出,近年来中苏贸易的确是减少了,真正的原因是苏联方面把思想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使我们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按原来条约的规定,进口那些

设备和物资,因为你们条约都撕毁了,专家都撤走了,难道我们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堆在那里让它们长锈吗?所以说,近年来中苏贸易的减少,原因完全在苏联方面。

复信还指出,最近你们提出要增加中苏贸易,而你们却一再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提出把今年从苏联进口额增加到2.2亿新卢布 ,我们向苏联的出口额增加到4.2亿新卢布 ,而你们却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要的东西你们不给,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你们又硬要给我们,这样的贸易怎么能做成呢?我们本来是不想单干的,单干是你们逼出来的。也可以说,单干是学列宁的办法,那个时候不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吗?你们在贸易方面欺负经济落后的国家,欺负我们。如果你们要我们参加经互会,那么这个经互会就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不能由你们一手把持。

第五个问题,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复信指出,公开论战本来是你们挑起来的。过去我们再三说:分歧要内部解决,不要公开化。但是你们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公开论战的结果走向你们原来愿望的反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指挥棒的错误影响,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

复信指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最早是越南劳动党在1962年1月间提出来的。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新西兰共产党也提出类似的建议。当时我们响应他

们的建议，于 1962 年 4 月向你们提出加强团结、消除分歧的五项主张。但你们却把这些建议当成耳旁风，根本不理睬，继续扩大公开论战。我们在 1963 年 3 月 9 日给你们的信中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并且提出：为了停止公开论战，需要两党和有关各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公平的协议。可是你们一直不理会我们的建议。1963 年 7 月 20 日中苏两党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又主张在会谈的公报中写上：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

复信指出，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期间，竟然在 7 月 14 日发表了给你们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从 1963 年 7 月 15 日到 10 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你们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你们还登载了 42 个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就是在你们 11 月 29 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复信指出，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根本没有开始

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屈膝投降吗？

复信指出，事情十分清楚，我们同你们之间的分歧，是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是遵循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放弃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绝对含糊不得的，必须弄个一清二白。

最后，复信指出，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而竭尽自己的努力。苏共中央在去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间只是空喊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连中苏两党会谈你们都不提。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给予答复：

第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第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克服困难和障碍。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第三，中苏两党继续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1964年10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四，我们提议，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17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以便为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做进一步的准备。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签署日期是2月29日，送出是3月1日，但当时没有发表，因为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团过两天就来北京。

第十三章

难为的调停

第一节　路经莫斯科

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团3月1日离开布加勒斯特，3月2日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从3月3日起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连续会谈。

罗马尼亚党的这个代表团，是由当时的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毛雷尔率领，他公开的地位仅次于乔治乌·德治，跟他一起来的有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和政府总理斯托伊卡，就是说，他们党内的二、三、四、五把手都来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在这几个人中间，跟乔治乌·德治最接近的、最活跃的是齐奥塞斯库。在整个会谈中间，他说话最多，提的问题也最多，而且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态度也相当傲慢。同时，在这之前

已有传闻,乔治乌·德治准备选择齐奥塞斯库做他的接班人。

我党代表团团长是少奇同志,成员包括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伍修权和我。周总理当时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未参加中罗会谈。

中罗两党第一次会谈,是3月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会谈一开始,首先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毛雷尔讲话。他在发言中,首先谈到罗马尼亚跟苏共有分歧。他讲到,苏共要把经互会变成一个超国家的组织,罗马尼亚反对;苏共想由华沙条约国首脑政治协商会议统一各国的对外政策,罗马尼亚也不赞成。他还说,苏联过去干涉罗马尼亚内政的事情太多了,罗马尼亚是逐步认识这个问题的。毛雷尔说,苏联要把各国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这个事情是不能答应的。苏联运核武器到古巴去,事先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使我们面临一次核大战的危险。我们怎么能赞成统一对外政策呢。他还说,经互会虽然没有变成为超国家的组织,但是始终存在着有把各国经济统一到苏联控制之下的问题。毛雷尔讲这番话,是要表示他们跟苏联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毛雷尔讲的第二点,是说他们担心中苏破裂。他说,中苏分歧由小到大,争论由不指名到公开指名。罗马尼亚很担心这会导致分裂,希望双方停止公开论战。他说,他们经过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有愿意停止的意思,但不是那么肯定。因此罗马尼亚党建议中共采取主动,即

使暂时的停止也好。

毛雷尔还说，他是赞成中共2月29日给苏共的信的。他说，这个信里面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很多观点，包括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罗马尼亚都是同意的。

（罗马尼亚代表团到北京以后，我们把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送他们看了。所以毛雷尔讲话时这么说。）

毛雷尔讲的第三点意见，是说他代表罗马尼亚党，希望加强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党和国家的双边关系。

接着，波德纳拉希发言。他着重谈到，希望中国党能够理解罗马尼亚党的地理环境，理解罗马尼亚党现在的这个态度。他说他们也不是完全站在苏联一边，对中国的许多意见也是赞成的，特别是对中国党2月29日信里面的四点建议是赞成的。他讲这番话的意思，是表示他们是不偏不倚的。

罗方讲完以后，会谈休会。

第二天（3月4日）上午中罗两党举行第二次会谈，由少奇同志发言，少奇同志详细讲了我们的观点。

首先，少奇同志谈了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少奇同志说，开始，我们主张中苏之间有意见分歧只在内部谈。从“20大”起，我们就有意见。后来是苏共首先公开指名的，在“22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当时我们不赞成，劝苏共不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不听，硬是要蛮干下去。一直发展到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向他们的全体党员、向全世界公开中苏之间的分歧，指名谴责中国

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公开答辩，被迫进行公开论战。

少奇同志说，公开论战是苏共发起的，要停，首先它要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是不能停的。从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个党，一共发表了两千多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每一篇文章都是要答复的，我们有这个权利。他攻击了我们，我们就有权利答辩，为自己辩护，回答他们的攻击。所以，如果要停，那么这些党，首先是苏共，应该承认他们发动公开论战是错误的，撤销他们的决议，撤销他们的声明，撤销他们的文章，公开向全世界宣布。这样，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可以放弃回答的权利，因为他们认错了，我们不必再算旧账了。

少奇同志鲜明地把我们党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态度讲得清清楚楚。

少奇同志接着说，我们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不能停。不能他说要攻就攻，要停就停。我们不听他的指挥棒。谁要听苏共领导的指挥棒那随他的便。少奇同志说，苏共中央最近又开全会，做出决议，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还给兄弟党发了信，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倒要看一看，他的所谓"坚决反击"、所谓"集体措施"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更不能停。

少奇同志还说，你们在发言里面讲到公开论战有害，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这个话我们早就说过了。在81

党会议的时候，我当面跟赫鲁晓夫讲过。在“22大”的时候，又由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公开讲过。但苏共就是不听，赫鲁晓夫就是不听，他们先是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其后又公开指责中国党。可见他们没什么困难，觉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没什么害处。至于其他兄弟党，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为什么他们要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公开反华？不是我们先批评他们，而是他们先批评我们。可见他们并没有什么困难，而且认为公开论战对他们是有利的。

至于说到被帝国主义利用，少奇同志说，这个意见，我们也早就说过了。我们在苏共“22大”上劝苏共领导，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可是赫鲁晓夫就是不听。至于说到国家关系受影响，其实，没公开论战的时候已经受到影响。你们也知道，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撕毁一切协议和合同，这不是影响国家关系吗！根本的原因，是赫鲁晓夫想要控制中国。谁反对他，他就对谁施加压力，对我们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

少奇同志说，现在有人把公开论战讲得那么坏，可是，过去赫鲁晓夫说公开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唯一正确的办法。我们现在赞成他过去的观点，而不赞成他现在说公开论战有害的观点。我们现在就等着看，我们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四项建议，他接受不接受。这是我们第三次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

看他怎么办。所以你们与其来劝我们,不如去劝赫鲁晓夫。

3月5日下午,举行中罗两党第三次会谈,从这个时候起,齐奥塞斯库就唱主角了。

在这次会上主要是齐奥塞斯库发言。他的发言分两个部分,首先讲了希望中国党能够理解罗马尼亚党。他讲到:苏共一贯以领导自居,对罗马尼亚指手画脚;罗马尼亚党谁可以当领导、谁不可以当领导,都要苏共点头;过去罗马尼亚驻有苏联军队,我们多次提出没有必要驻扎苏军,他们一直拖延,后来才撤走;罗苏联合企业其实完全是苏联管的,罗马尼亚建议撤销,赫鲁晓夫说,你们不愿意要这个企业,你们就把它卖给人吧,蛮不讲理;苏多次说我们是民族主义,现在又讲民族主权论已经过时;1962年赫鲁晓夫到罗马尼亚来,带来苏共中央一封信,但是不直接交给乔治乌·德治,而是在罗马尼亚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宣读,想整垮乔治乌·德治;1963年6月乔治乌·德治叫我(齐奥塞斯库)去苏联,带去罗党给苏共的信,结果遭到赫鲁晓夫大骂一顿,不久赫鲁晓夫又到罗马尼亚来,结果又吵了两天,谁也没说服谁。

齐奥塞斯库说,我们坚决顶住赫鲁晓夫的国家主权过时论,内部争论很激烈,只是没有公开化。我们反对把经互会搞成为超国家机构。

齐奥塞斯库讲完这番话以后,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意见。

齐奥塞斯库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他说他希望中国党能够体谅罗马尼亚的建议，真正理解罗马尼亚的建议，紧急停止公开论战。他在这里用了“紧急”这个词。

齐奥塞斯库说，他同意少奇同志说的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或在中央委员会上批评另外一个党是不对的。“22大”批评阿尔巴尼亚是不允许的。他说他参加了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对当时会上对中共代表发言采取那种很不正常态度他也很不高兴。但是他没有说他在这次会上讲了什么。

齐奥塞斯库还说，他不同意苏共去年11月29日的信，也不同意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说，苏共今年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也不好。这封信表示要坚决反击中共，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加速了论战的进程。这意味着要分裂。所以罗马尼亚党中央在2月14日给苏共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发表给兄弟党的信，但是苏共方面表示，可以不发表，条件是中共停止公开论战。所以我们就要求到中国来，把我们的意见说明白，希望中苏停止公开论战，特别希望中共能在这方面采取主动。

齐奥塞斯库讲完以后，毛雷尔也表示，感谢少奇同志介绍中苏分歧的由来和经过，认为少奇同志介绍的情况很详细，观点很清楚，对他们认识上有帮助。

由于齐奥塞斯库讲了很长时间，少奇同志提议休会，并表示我代表团将在下次会谈时发表意见。

3月5日中罗两党第三次会谈之后，当天傍晚，毛主席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到钓鱼台18号楼(金日成住地)，同金日成会谈。

毛主席同金日成先谈起来，少奇同志等在下午中罗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也来参加会谈。

这次谈话，主要是金日成介绍他昨天(3月4日)到罗马尼亚代表团那里去谈话的情况。金日成说，看来他们同赫鲁晓夫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害怕分裂。他们同赫鲁晓夫的矛盾不是属于理论原则问题，而是由于赫鲁晓夫干涉他们的内政，对他们施加压力，这些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所引起的。金日成说，从昨天谈话的情况看，他们比1960年有进步，不过现在他们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而的，他们对中苏两党的争论表示想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毛主席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些不同。他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

金日成还讲到，昨天谈话的时候，毛雷尔、波德纳拉希都问到亚洲党的情况，并表示在中国访问之后，要访问朝鲜，还要去越南。他们还打听越南的情况，询问越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想法，还谈到越南代表团最近到莫斯科去了趟，问我们是不是知道有什么情况。我们

说不知道。他们好像对许多问题都不清楚。

毛主席说，他们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但他们想说服胡志明，说服你们，还想说服我们。金日成说，看起来，他们想要形成一个中间势力，要扩大这个中间势力。这种中间立场，在亚洲没有多少市场。他们最好在欧洲扩大中间势力。

少奇同志也在会上谈了下午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说齐奥塞斯库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谈了三个钟头。少奇同志说，他们讲来讲去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要求在10月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之前就停止，最好是中苏两党，加上他们，三家发表一个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书。齐奥塞斯库认为最好是中国党首先发表。少奇同志说，我答复他们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还没有发表，他们给兄弟党的那封信还没有发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是办不到的。

小平同志说，今天算是开始正式交锋。齐奥塞斯库的讲话里有不少刺，说我们发表文章公开指赫鲁晓夫的名字是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在休息的时候，他还说赫鲁晓夫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应该多做赫鲁晓夫的工作。

毛主席随即宴请金日成，谈话在宴会中继续进行。少奇同志分析，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是赫鲁晓夫派来的，罗党自己也有这个需要，齐奥塞斯库少年气盛，不胜任扮调解人的角色，不如毛雷尔老练。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认为下次会谈时要针锋相对，但又委婉说理，回答齐奥塞斯库的发言。毛主席赞成这样做，并且指出，齐的发言代表了罗党的真正意图，讲得很直率，这也好，捅破了窗户纸，便于我们回答。

最后，毛主席对金日成说，今晚给你送行。你这次到中国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我们以后还准备到朝鲜去，希望你们给他们多做工作。

3月6日下午，中罗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这次会谈先由波德纳拉希解释罗马尼亚党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他说，罗马尼亚对南斯拉夫的关系，同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有关，这是因为赫鲁晓夫要控制巴尔干，罗马尼亚要联合南斯拉夫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接着他就讲到从1948年以来，罗马尼亚跟南斯拉夫的关系，作了长篇的说明，表白他们现在和南斯拉夫保持关系是对的。

波德纳拉希讲完以后，小平同志回答他说，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是有评价的，现在我们还是认为那个评价是正确的。赫鲁晓夫也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字，但是当天晚上苏共中央宴请兄弟党代表团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这个《声明》。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这么做。我们是一个郑重的党，我们不能够采取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态度。

少奇同志也针对波德纳拉希在发言中提到斯大林问题，着重说明，我们对斯大林是有评价的，他有错误，但是功大于过。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不同于我们跟斯

大林的分歧。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和他的分歧是路线性的分歧，主要的问题是他不反美而反华。关于美英苏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在条约签字前60天，赫鲁晓夫还讲过，这个条约是骗人的；可是60天以后他就签字了。我们批评三国条约，是指出它的欺骗性，指出它要束缚中国，要实行三国核垄断。我们反对三国条约的那些话，也就是过去赫鲁晓夫讲过的。我们是要团结一切直接的、间接的同盟军，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赫鲁晓夫却相反，他要联美反华。我们根本的分歧点在这里，他搞大国沙文主义，自己不革命，也不让人家革命。他根本不同于斯大林。我们跟他分歧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

少奇同志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革命家，当然他有过错误，但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过一些坏主意，曾经不许我们进行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但是，后来在我们胜利以后，他承认了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斯大林根本不同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不能做自我批评的。他曾经说过他们一做自我批评就要垮台，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自我批评。要赫鲁晓夫改正错误很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做不到的。

少奇同志这样讲，既回答了波德纳拉希说斯大林犯了大错，也回答了齐奥塞斯库说赫鲁晓夫可以改正。他

们的这些话虽然不是在正式会谈中讲的，而是在休息喝咖啡的时候讲的，但是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小平同志和少奇同志都郑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缘故，少奇同志对上次会谈中齐奥塞斯库发言的意见，没有来得及在这次会上讲。

第二节　中罗会谈既激烈又友好

3月7日下午，中罗两党举行第五次会谈。因为上一次会谈时牵涉到许多实质问题，这次会谈一开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表示，他们的代表团出发之前，罗党中央授权他们只谈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不谈分歧的实质。关于上次会谈涉及的许多问题，中国党的一些看法，罗党是同意的，有一些看法还值得考虑。毛雷尔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一两次会谈就可以讨论完，也得不出结论，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代表团的任务。我们代表团希望，集中讨论紧急的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看起来，罗马尼亚代表团是想避开争论，避开到现在为止他们和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谈实质问题，只谈停止公开论战。

但是，接下来发言的是他们的总理斯托伊卡，他又提出经互会的问题。他说，经互会是苏联一个国家操纵的，把其他国家都作为原料基地，只是某一些发达国家，主要

是苏联，也包括捷克和东德，他们可以搞工业化，而我们这些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至匈牙利，只能作为一个原料基地，还包括阿尔巴尼亚和波兰在内。我们坚决反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方针。他还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参加经互会。

少奇同志表示，我们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就提到经互会问题，我们认为经互会应当改组，这是我们参加的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个条件。齐奥塞斯库说他完全赞成，并说经互会不应该由一个国家来主宰。小平同志说，我们信里只是提出经互会的章程要重新修改，并没有提出申请加入。这要在有关各国商量重新修改章程以后，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参加和用什么形式参加。

这样，双方的讨论才转到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少奇同志以非常郑重的态度发言。他说，据我们看，赫鲁晓夫现在需要公开论战，他希望用这个公开论战来转移国内干部和群众对他的不满。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在11月底给我们的信中根本不谈中苏两党会谈，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他就召开中央全会，做出决议要对中国党进行“坚决反击”，同时又写信给各兄弟党，表示要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如果他是希望停止公开论战的话，就不应该采取这些步骤。由此看来，公开论战要停下来比较困难，即使我们想停，赫鲁晓夫也并不想停。

少奇同志说，你们希望我们对你们的建议做答复，那

好，我现在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答复你们。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要求苏共中央公布二月全会决议，要求苏共中央把2月间致兄弟党的信给我们看，要求他们拿出所谓"坚决反击"，要求他们赶快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请你们转告赫鲁晓夫，他采取这些措施以后，我们就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诚意停止公开论战。这是我们党中央对你们要求中苏停止公开论战，要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停止公开论战，而且要求中国率先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的答复。少奇同志还说，去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有40多个党攻击我们，现在我们只回答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他的攻击我们还没有回答。在这样的时候，凭什么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凭什么剥夺我们回答这些反华文章的权利？

小平同志说，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我劝他们不要参加公开论战，但他们不同意。他们回去后做出反华的决议。你们党过去也是赞成公开论战的，现在又要求停，那么，对过去怎么交待呢？

彭真同志说，你们没有提那些反华的党怎么样了结这笔账，反而要求我们先停，这太不公平了！

小平同志说，首先发起公开论战的是苏共"22大"，如果要停，首先是赫鲁晓夫要有个交代，要宣布"22大"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不指名地攻击中国党是错了。你们认为赫鲁晓夫能这样认错吗？如果他真的能认错，我们就可以停止公开论战。

彭真同志接着说，苏共中央搞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二月全会的决议，一个是2月间给兄弟党的信。这好比架了两门大炮，一个是“坚决反击”，一个是“集体措施”，这两门大炮都对着我们。你们设想一下，我们能够在这两门大炮面前投降吗？你们设想一下，中国这么一个讲原则的党，能在这样的威胁面前屈服吗？你们怎么好意思提出要我们首先停止公开论战！

我党代表团的几位领导人这么连珠炮式的质问，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当时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这时候罗马尼亚代表团的四个主要负责人，毛雷尔、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你看我、我看你。

少奇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有意识地缓和一下空气。他说，不管停止公开论战还是不停止公开论战，不管什么样情况，我们中国党对罗马尼亚党还是友好的，我们两国、两党之间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友好关系。你们来得好，经过这次会谈，你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彼此更加理解了。

这样，空气缓和下来了。还是毛雷尔比较老练，少奇同志一讲完，他马上接上来说，我们这样坦率交换意见，有助于加强两党的互相理解，加强两党的友谊。

但是，齐奥塞斯库还是不死心。他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们单方面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先向苏联提出来，这次也向你们提出来，希望你们先停止公开论战，然后造成达成协议的气氛。

彭真同志说，不是这样，你们一来就要我们先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为了礼貌，为了友谊，在同你们会谈期间，我们确实停止了发表论战的文章。至于两党会谈结束，你们代表团走了之后怎么样，是停还是不停，我们党没有做过任何许诺。齐奥塞斯库同志的说法不公平，也不符合我们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建议。我们的建议里明确提出，要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不达成协议又怎么保证他们承认错误？有什么办法保证他们不继续攻击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就没有这个保证，没有这个保证就不能停。

齐奥塞斯库说，你们延长目前这个停火好不好？彭真同志答复说，我们现在暂停是为着你们，是对你们表示最高的礼貌。

彭真同志这么讲了以后，毛雷尔马上接着说，我们罗马尼亚党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敬意，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党的接待，同我们进行真正同志式的、坦率的会谈，使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了。从我们方面来讲，没有什么需要再进一步讨论的了。

少奇同志看到他们要收场，所以接着说，毛雷尔同志讲的很好，我们完全赞成你们对我们的讨论能够增加了解、增加友谊这么一个看法，我们也是这么看的。经过这次会谈，现在我们是更加接近了，而不是更加疏远了。少奇同志说，既然没有什么需要再加讨论，毛主席还准备会见你们代表团，是不是我们的会谈暂时休会，明天（3月8

日)也休息,你们看怎么样?罗马尼亚同志也表示同意。这次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代表团所以在第五次会谈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方针,态度这么强硬,坚决拒绝由我们首先停止公开论战,是因为3月6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分析了罗马尼亚代表团这几天的表现后决定的。当时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说,看了你们会谈的记录,我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当时会上决定,不给罗方任何资本,坚持保留我们对所有指责过我们的兄弟党的声明、决议、文件、文章、领导人的讲话予以答辩的权利,不能停止公开论战。同时要指出,罗马尼亚代表团要我们率先停止公开论战是不公平、不公道的;还要适当地点明赫鲁晓夫并不是真正要搞团结、真正要停止公开论战,他要的是分裂。

所以在3月7日的第五次会谈上,我党代表团采取连珠炮式的攻势。尽管齐奥塞斯库还想纠缠,但是从整

个罗马尼亚代表团看来，他们觉得要中共单方面首先停止公开论战是办不到了。

3月7日中罗两党会谈第五次会议开完以后，毛主席在住处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分析了这五天来跟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看法。少奇同志算了一下说，一共谈了五次，第一次、第二次，特别是第五次，都是着重谈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他们一上来就提这个问题，但是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又都是先谈罗苏关系，然后才谈中苏公开论战的问题，差不多每一次在谈停止公开论战之前，都提到罗马尼亚跟苏联有争论，什么南斯拉夫问题、经互会问题、华沙条约国的问题、联合企业的问题、苏联撤军的问题，甚至于还讲到斯大林时期对罗马尼亚党怎么样表现大国沙文主义等等。这些情况表明，罗马尼亚同苏方有分歧是事实，但他们这次来华，的确像我们过去所分析的，是苏联策动的。最先是罗马尼亚害怕苏方加剧论战会导致分裂，要求苏共不要发表二月决议，不要发表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赫鲁晓夫趁这个机会，指使罗马尼亚党要求中国党停止公开论战。罗党自以为，讲出他们同苏方有分歧，可以增加他们来华调停的资本。

少奇同志说，虽然这次罗党出面调停是苏共策动的，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是真正要停止公开论战，他是想把分裂的责任推到中国党头上，说中国党不愿停止公开论战，因此需要"坚决反击"，需要采取"集体措施"。赫鲁晓夫的逻辑是这样的。而罗马尼亚党的逻辑是，如果苏共要

“坚决反击”，要采取“集体措施”，那就要分裂，那就不得了。因此无论如何要把公开论战停止下来。他们是从这样一个实际利益考虑来响应赫鲁晓夫的策动的。但是也可以看到，罗马尼亚同苏联的确存在不少的矛盾，就是一个要搞大国沙文主义，一个要维护民族利益，两个撞在一起了。

少奇同志说，因为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对罗马尼亚党拉一把，使它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反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可以趁罗马尼亚害怕分裂，把它推向要求赫鲁晓夫而不是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可以推动他们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提出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所必须要答应的条件。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中罗两党会谈第五次会谈结束以后，按双方协议，8日休息一天，9日毛主席要会见他们的。但是，9日早上，罗马尼亚代表团突然提出齐奥塞斯库要紧急会见我们。当时书记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以后，决定由彭真同志、伍修权同志和我三个人一起到钓鱼台会见齐奥塞斯库。

我们到达他们的住处以后，齐奥塞斯库神情显得非常紧张又非常兴奋。他说，他收到国内来的消息，说许多兄弟党表示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所以代表团就同乔治乌·

德治通了电话。党中央从国内给我们指示，要求代表团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转达罗党中央的正式意见，即：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把目前中罗两党会谈期间的这种暂时停止公开论战的时间继续延长。齐奥塞斯库说，因此代表团委托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两党代表团再会谈一次。

从他的谈话看来，似乎他们在到中国来会谈期间，同许多兄弟党都有接触，还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所以彭真同志警惕地问他，你说许多兄弟党希望停止公开论战，是不是包括苏共？齐奥塞斯库赶忙说，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和苏共商量过。我们将在回去路上经过莫斯科时同苏共谈。

彭真同志在听了他提出要再会谈一次以后说，我们暂停发表论战文章已经八天，还有明天、后天，加起来就十天，这是我们党主动这样做的。在你们在北京的时候暂停，完全是为了你们，表示我们党对罗马尼亚党的尊重。你们一走就恢复公开论战。至于赫鲁晓夫，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如果他真的希望停止公开论战，为什么背着我们在2月12日发出给各个兄弟党的信呢？为什么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呢？我们一再写信给他，请求他把这个信给我们，直到昨天，我们收到他的来信，还是不答应把这封信给我们。那信里面究竟讲一些什么呢？他们二月中央全会作了决议，说要对中国党采取“坚决反击”，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坚决反击”

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相信赫鲁晓夫有停止公开论战的诚意的。你们是不是能代表赫鲁晓夫？你们是不是能够代表四十几个党？他们不撤销他们的反华决议，不撤销他们的反华声明，不撤销他们的反华讲话，不承认错误，我们能不回答吗？能停止公开论战吗？

齐奥塞斯库仍然纠缠不休，他们只是请求中国党延长这个暂停，以便坐下来谈判，达成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彭真同志回答说，在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时候，赫鲁晓夫组织一批人对我们围攻，打了我们一闷棍。当时你们劝我们要忍耐。如果我们照你们的劝说，忍下去，吞下赫鲁晓夫的攻击，不抵抗，现在会怎么样呢？可以说，如果我们当时不坚决顶住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会更大，你们的情况也不会比那个时候好。你们现在可以跑到中国来谈，那个时候你们敢这样做吗？如果我们支持赫鲁晓夫整别人，你们的困难肯定会更大。所以我建议我们中罗两党共同来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齐奥塞斯库还是要求延长暂停。彭真同志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在29日的信里面讲的四条建议，要停止公开论战就要达成一个经过各党协商、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协议。不能赫鲁晓夫说要攻就攻，说要停就停。他不是老爷，我们也不是奴隶。

最后，齐奥塞斯库还是说，根据布加勒斯特来的电

话，我们党中央建议罗中两党代表团再举行一次会谈。彭真同志当时没有完全答应，只是说，这件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讲很突然，我要报告代表团，商量以后再告诉你们。但是我想，你们最好还是向赫鲁晓夫呼吁，呼吁他把2月12日的信给我们，呼吁他公布所谓"坚决反击"、所谓"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代表团是没有新的意见了，你们是不是还是要谈？齐奥塞斯库说，还是希望再谈一次。彭真同志说，那我们要报告代表团。

当天晚上，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家里开会，彭真同志扼要地把齐奥塞斯库的意见作了汇报，主要是说他希望再开一次会，希望把暂停延长。

常委会经过短暂的议论，决定：第一，为了礼貌起见，同意两党代表团可以再谈一次，但是我们要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所有指责过中国党的那些兄弟党，都要公开承认错误，没有这一条就不能停止公开论战；第二，正式通知罗马尼亚代表团，他们一离开北京，我们就继续发表公开论战的文章。

接着会上又谈到，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评、九评还没有写好，暂时还不能发表。所以毛主席提出，罗马尼亚代表团一走，我们就发表左派党的文章，同时要加紧修改八评、九评和十评。

3月10日上午，中罗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六次会谈。这次会谈首先是齐奥塞斯库发言。他说，我们收到国内党中央领导的电报，要求我们向中共中央再次呼吁，请中

共重新考虑我们代表团关于暂停的建议。他还说，代表团也收到了苏共中央最近给中共中央的复信，在复信里面提出的建议也包括了中共的建议。因此请中共重新考虑我们曾经提出的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接着他就讲了一套什么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出发，应该响应几乎所有党的一致的要求，停止公开论战。齐奥塞斯库还说，他们的党认为，谩骂不能够加强团结。没有根据的指责，给一个党和它的领导人扣上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的帽子，或者认为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帝国主义勾结等等，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能加强团结，只能导致分裂。

很显然，齐奥塞斯库这篇发言是得到他们国内同意的，既批评赫鲁晓夫，又批评我们，因为赫鲁晓夫说过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说过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反华。他们似乎认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中间人来讲话。

少奇同志很直率地回答说，既然你们建议再开一次会，那么我们再申明我们的立场。我们党的立场已经包含在2月29日复信的四项建议里面。我们党认为，达成协议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我们怀疑那些要停止公开论战的人的诚意。赫鲁晓夫是不可信赖的。如果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人真有诚意，那就应该首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40多个党做了反华决议，只有他们宣布撤销这些决议，承认错误，我们才能停止公开论战。这才是公平合

理的。你们罗马尼亚党也是赞成赫鲁晓夫发动的公开论战的。当时我们说不要公开论战，你们是反对的。现在你们又讲谩骂不能加强团结。那么，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你们过去赞成赫鲁晓夫大骂阿尔巴尼亚，大骂中国党？

波德纳拉希看情况不妙，赶快想缓和一下气氛。他说罗马尼亚党只是建议暂停，而不是解决问题，只是为解决问题创造一个平静讨论的气氛。齐奥塞斯库接着提出，可不可以停一两个月，继续目前这种暂停，以便达成协议。

少奇同志说，我们本来早就主张这样的。几年前，在1960年、1962年我们就劝过苏共，说兄弟党之间有分歧可以内部讨论，不要公开，如果内部讨论达不成协议，可以暂时把分歧放一放，让时间来检验究竟谁对谁错，不要公开争论。但是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不听，几十个党也不听，都认为应该公开论战，包括你们党在内。现在的情况正像我们前几年所指出的，公开论战会使亲痛仇快，当时我们就担心这一点，而且是严重的担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公开论战已经展开，担心也没有用处了。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我们答复还是不答复的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赫鲁晓夫挑起这个公开论战，我们就一定要答辩，如果他不认错，就无权要求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停止答辩。

少奇同志的态度非常强硬，意思就是说不管哪一个党，不认错就无权要求我们停止答辩，这里当然也包括罗马尼亚在内。

波德纳拉希接着就问：如果认错呢？

少奇同志说，如果认错，那我们就不答辩，就停止公开论战。但是请问，赫鲁晓夫能够认错吗？

小平同志说，请你们回去说服赫鲁晓夫，说服苏共，攻击我们党是公开的，承认错误也必须是公开的，爽爽快快，不要耍花招。

看到我们态度非常坚决，毛雷尔跟他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会，然后说，你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在回程路过莫斯科的时候将告诉赫鲁晓夫。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再谈的了。我们将要把我们在这里谈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党中央。我们明天就要到朝鲜去访问。他再一次感谢中国党的接待。

最后，少奇同志说，我们还是有许多一致的意见的。这次交换意见，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发展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少奇同志讲完以后，会谈就结束了。然后等候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

第三节　毛主席亦庄亦谐

这一天(3月10日)的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罗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我们方面参加的还是我们代表团的少奇同志、

小平同志以及彭真、康生、伍修权和我。

这次会见从下午5点半一直谈到7点多。开始的时候谈了谈北京、布加勒斯特的气候、纬度怎么样。然后，毛主席就问少奇同志，你们刚才谈的怎么样？少奇同志说，他们（指罗马尼亚方面）要求现在就停止公开论战。我们说除非苏共和其他40多个党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他们发表的攻击中国党的决议、文件统统是错误的，宣布撤销，我们就停止答辩。如果哪一个党不承认错误，我们总要答复的。罗马尼亚同志说他们可以到莫斯科去商量。

毛主席说，好，你们去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少奇同志接着说，此外还有一条要达成协议，即以后他们不要再把那些争论的问题公开化，这些问题只能在内部讨论。如果他们公开提出来，那我们也必须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为了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我们坚持这两条。

毛主席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的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

员会开会有 6000 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毛主席接着说，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 40 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过去我们的那个朋友，叫做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 25 年，因此我就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是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毛主席说，闹翻的是开始于 1958 年，还不是 1960 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 1958 年赫鲁晓

夫要搞所谓中苏共同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毛主席又说，在这之后还有1959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去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要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毛主席说，赫鲁晓夫那次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毛主席这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的一番话，实际上是告诉给罗代表团：你们要来劝中国停是不行的，你们劝赫鲁晓夫停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是说调停是不行的，除非他们认错。

然后，毛主席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

毛主席又重复地说，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死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够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你们叫他不要发表决议，我看赫鲁晓夫总有一天要发表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

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7篇，还差1993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毛主席说，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鬼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那些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一大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好像我自己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

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已经谈了一个多钟头，于是说尽是我谈不行，罗马尼亚同志们，你们也谈一谈吧。

接着，毛雷尔先讲。他说，毛主席讲了很多话，你们

有许多问题的看法跟我们是一样的。你们讲了许多你们想的，你们过去的情况，过去跟苏联的关系，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也把我们的思想坦率地告诉了你们，也是很诚恳的，希望停止中苏论战、停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的论战。但是经过这么一个星期，一直到现在，看来我们没有能够把你和你的同志们说服，也正如你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说服一样。

这时齐奥塞斯库插进来说，公开论战造成许多损失，甚至也造成一些牺牲，有许多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是在座中间比较年轻的人，看样子可能是最年轻的，但是我做党员已经做了 30 年了。毛主席问他多大，齐奥塞斯库说，我 46 岁，我坐过牢。接着他又讲他在牢里面怎么样佩服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知道长征，等等。

齐奥塞斯库说，执政的党，公开论战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些。但没有执政的党，公开论战给他们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毛主席就问，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齐奥塞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时候，我们代表团的好几位同志插进来问齐奥塞斯库：四十几个党中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他们没有取得政权，但是他们跟着赫鲁晓夫向中国发动进攻，攻击中国共产党，可见他们对此并不感到困难。如果他们感到困难，那为什么跟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

攻击呢？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攻击他们，是他们发动对中国党的攻击，可见他们并不困难！齐奥塞斯库几次讲话不公平，根本不谈四十几个党首先攻击我们党，这一点我们很不满意。有的同志甚至指名质问他：你为什么只说我们答辩不好，不说他们首先攻击我们不对？这是公平吗？这时齐奥塞斯库脸都红了。

看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你们是不是要打架？我们代表团的同志说，就是不公平。毛主席说，还是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继续讲。

齐奥塞斯库接着说，我们很早以前说过，也告诉过这些党，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你们有没有要求他公开取消那些东西？如果他取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就不来答辩，不再批评他们了。齐奥塞斯库说，我们的建议只是要创造一个条件，暂停几个月。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天也不会塌下来，妇女也照样生孩子。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

毛主席说，这不对，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

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毛雷尔看到这个情况，就想收场。他说，我们如实地记着毛泽东同志刚才所讲的话。我们也如实地记住中共代表团在会谈过程中间所讲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再重复我们在会谈过程中讲过的话，那会使人感到厌倦，因为在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相吻合的。

毛主席就接过他的话说，是的，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跟你们过去的观点是相吻合的，你们过去也是赞成公开

论战的。毛雷尔说,那是对的。毛主席说,那么,我们赞成你们过去的观点,不赞成你们现在的观点。毛雷尔表示,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赞成公开论战的时候我们做错了。

齐奥塞斯库也插进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我们党的领导在内部讨论过这个问题。毛主席就问,那你们为什么又公开赞成论战了呢?少奇同志说,在"22大"的时候,你们都赞成公开论战,都批评我们,说我们不赞成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毛主席说,我看你们还是回到你们过去的立场比较好。毛雷尔说,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做错了,那为什么回到原来的立场呢?毛主席说,但是你们没有公开声明,没有公开地在你们报纸上宣布你们过去做错了。毛雷尔说,对的,我们在报纸上没这么宣布。毛主席说,为什么不能宣布呢?

接着,大家就议论纷纷,谈到在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这几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许多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伍修权同志特别提出,齐奥塞斯库和斯托伊卡两个人出席过这些会。齐奥塞斯库赶忙说他们没有攻击中国共产党。伍修权马上说,我有记录。当时我们不赞成公开论战,但是罗马尼亚同志不赞成我们的态度,你表示遗憾。

这时毛雷尔出面想把空气缓和一下。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在过去的五天里边,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轰

击了你们代表团，你们代表团也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轰击了我们。毛主席说，两个堡垒都没有攻破，原封不动。毛雷尔说，是的，我看交换意见是一件好事。毛主席表示赞成。毛雷尔又说，这次交换意见，在一系列问题上表明我们的想法是相同的。毛主席说，对，我们彼此更好地了解了，更直接相互了解了，彼此把话都讲出来了。你们轰击他们，他们也轰击你们，但是并不伤害我们中罗两党之间的友谊。

毛主席说，我看我们先吃饭吧。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毛雷尔说，我们也有相同的看法。毛主席说，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国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毛雷尔也表示赞成。这样就一起去吃饭了。

在宴会上，毛主席着重谈到，这次会谈很好，因为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两个堡垒都没有被攻破，但是彼此更加相互了解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见是团结的会见，大家再不要吵架了。

在宴会上毛主席首先提议，为中罗两党友好关系的

发展、为乔治乌·德治的健康干杯。毛雷尔也站起来说，我特别高兴地提议，为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干杯，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乔治乌·德治本人祝毛泽东同志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他说，这一祝愿表达出我们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佩心情，同时也请允许我为毛泽东同志的助手们的健康干杯。

这次会见就是在这种热烈的，也可以说是激烈的但最后是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从3月3日开始的中罗两党代表团会谈，到10日毛主席会见的时候，整整八天。双方都相当充分地发表意见，阐明了各自的立场。我们没有赞成罗马尼亚党所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也不赞成延长暂停的建议。

罗马尼亚代表团11日休息一天，3月12日离开中国到朝鲜访问。我们报刊上从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3月2日)起，就暂停发表公开论战的文章，一直到3月12日晚上。从3月13日起，即罗马尼亚党代表团离开的第二天起，我就陆续发表左派党同苏共进行论战的文章和讲话。

第十四章

新的反华运动

第一节 “坚决反击”的预谋

罗马尼亚党代表团离京以后，第二天《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左派兄弟党批评苏共的声明、决议、文章和讲话，其中有阿尔巴尼亚党、越南党、印尼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比利时共产党人和澳大利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系列的声明、决议、讲话和文章。也是从这一天起，我们又恢复重播我们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七篇文章，即《赫鲁晓夫是当代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同时起草班子加紧修改《八评》，也在起草《九评》。

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3月7日给我党中央来信，这是对我党2月29日给苏共中央信的答复。

苏共中央在这封信里面，根本不谈他们在前一次来信中提出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四个问题，什么贸易问题、专家问题、边界问题，都只字不谈，一开始就攻击我们，指责我们在2月29日的信中说他们怎样进行一系列的反华活动，是对苏共的“污蔑”。

在谈到停止公开论战时，苏共中央3月7日的信说，中国党的信中建议发表互相批评的材料，这不是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加剧公开论战。其实，我党2月29日的建议第一条是很清楚的，我们并没有以他们发表我们的材料为条件，而是要达成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协议。

苏共中央复信强调说，你们的信是2月29日发出的，而你们在2月4日就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按：指《七评》），使公开论战达到极点。应当说，我们的这篇文章揭穿了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内容确实很尖锐，但也非顶点。苏共中央3月7日的信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再沉默了。因此，他们召开了有6000名党的积极分子参加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一致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路线。

复信中还说，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同中国共产党的分歧通知兄弟党，所以我们在2月12日给兄弟党发出了一封信。你们没有权利要求把这个信给你们，尽管你们把“要求”改成为“请求”，我们还是不能给你们。苏共中央复信说，中共这样提出要求，就是向苏共提出最

后通牒。复信甚至说,中共批评苏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苏共中央在信中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苏共中央的信说,他们已经通知兄弟党,准备在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有关材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裂行为给予反击。

苏共中央的复信还认为,中共对苏共去年 11 月 29 日的信拖延了几个月才答复,动机是不好的。苏共 3 月 7 日的信说,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中苏两党会谈(其实,关于中苏两党会谈,苏共 1963 年 11 月 29 日信中并没有提出,是我党在 1964 年 2 月 29 日的复信中提出的)定在 10 月,这样太久了。而且还说,他们也不理解中共为什么提出要 17 党来参加筹备会议。他们认为,应该由 1960 年莫斯科会议时的 26 个党起草委员会参加这次筹备工作。

苏共中央的复信最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1964 年 5 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会谈。第二,1964 年 6、7 月召开 26 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第三,1964 年秋举行各兄弟党会议。

苏共中央在这封信里,根本不提他们在此之前一再强调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苏共中央 3 月 7 日的这封信,我们在同罗马尼亚党代表团会谈时已收到。当时中央的意见是暂不处理,待同罗马尼亚党会谈以后再说。

在罗马尼亚党代表团离开北京之后，3 月 16 日，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苏共中央的复信。参加这次常委会的，除常委以外，彭真同志和陈毅同志也参加了。陈毅同志当时是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周总理访问非洲、亚洲和阿尔巴尼亚共 14 个国家后，3 月 15 日刚刚回到北京。周总理这次在国外访问历时 4 个月，所以我们党 2 月同朝鲜党的会谈、3 月同罗马尼亚党的会谈，他都没有参加。

在常委会上，先由周总理概括地谈了一下访问的观感和非洲 10 国的状况。总理说，整个访问情况都有电报报告中央了。总的印象是非洲国家还相当落后，受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很严重，都很贫困，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留学英国、法国的，还有留学意大利的，他们都希望能很快地把自己的国家搞好。这些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 10 年里才陆续独立的，虽然政治上独立了，但实际上经济命脉还是掌握在新殖民主义者手里，经济很困难。即使有些企业收归国有，但相当落后，经营状况不好。所以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在技术、人才、卫生医疗方面帮助他们。

总理在会上提出，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帮助亚非拉国家，特别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困难比较多的非洲国家。要使这些国家政治上真正独立，发展经济，提高文化，还需要长期的努力。我们要培养大批外事干部到这

些地方去工作，勤勤恳恳地帮助当地人民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医疗卫生。总理说，古人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现在我们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有“志在四方”的胸怀，不仅在中国要革命、搞建设，也要帮助亚洲、非洲这些国家搞建设，而且要准备长期在那里工作，最后牺牲在那些地方。周总理还说，中国的技术虽然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对非洲这些国家来讲，还是比较适用的，还是比较先进的。现在，他们农业技术很落后，多数还是刀耕火种，手工业也很落后。我们还要帮助这些国家培养干部。

周总理谈完以后，毛主席提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问题。他说，苏共来信嫌我们29日的信把中苏两党会谈定在10月太迟，提议5月就开会。他们还不同意我们提的17党参加起草委员会，要求按1960年26个党参加的老办法。他们还说秋天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毛主席说，他们信里说还要公布苏共中央二月会议的文件，要对我们反击。信中承认苏共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通知他们要反击我们，但是仍然不肯把这信给我们。（按：中共中央曾在2月20日和27日两次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把他们2月12日给各兄弟党的信给我们，均遭苏方拒绝。）毛主席说，这个问题请大家议一下，看看怎样答复。

会上，大家分析当前形势，一致认为，我们对他们去年11月29日的信，拖了三个月，到2月29日才答复，看

来这样做对了。当时主席决定不急于答复，观察一下形势，看看他怎么讲、怎么做再说，这是对的。

大家指出，我们的信3月1日他们才收到，仅仅一个星期，他们就作出答复。而且从他们的信里，也证实了去年11月29日他们给我们的信发出以后，中间隔了两个月，到2月中旬，他们就召开中央全会，作出决议，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在这之前，2月12日已给兄弟党写了信，说明他们要对我们进行反击，要采取“集体措施”。这说明苏共去年11月29日的信里讲的什么要改善中苏关系、要再派专家、要谈判边界问题、增加贸易等等，都带有很大的欺骗成分。他们的目的是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看到论战公开展开以后，过去跟着他们指挥棒走的一些党已经发生动摇，北欧、西欧一些小党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亚洲、大洋洲一些党还向苏共提出建议，要求苏共跟中国党谈判。所以赫鲁晓夫越来越怕论战下去。怎么办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能够说服中国党停止公开论战，不然就采取高压的政策，发动一个反华的大运动，把中国压下去。

大家估计，苏共早在去年11月间已做了准备，如果不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就以此为理由，对我们进行所谓“坚决反击”。因为只隔了两个月，他们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不等我们答复就开中央全会、作决议；没等中央全会召开，就发出给兄弟党的信。这说明他们是预先计划好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预谋。

大家认为，他们表面上表现要友好、要团结，目的是要做出一个姿态，应付西方国家的一些小党，甚至包括像波兰党在内。因为波兰党给我们来信说，他们已给苏共去信，说中苏两方面都不对，建议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苏共做出这样的姿态，意在表示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中共不愿意停止公开论战，想把责任推给我们。他们这次来信表明，他们还是要采取高压政策，对我们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来挽回赫鲁晓夫的威信，稳住他的阵脚。这是从国际方面来讲的。

大家认为，从苏联国内方面来看，当时有许多报道，甚至苏联的报纸，都报道说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什么垦荒，把党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都遭到下面的反对。搞垦荒是不成功的，花钱太多，收益甚少。搞工业党、农业党，把组织搞乱了。所以这些政策不得人心，赫鲁晓夫威望下降。许多人都骂他，说他国际上跟中国党闹翻了，国内又把经济搞坏了。

大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企图转移目标，拿反华来转移目标。现在回过头来看，赫鲁晓夫的确是布置了这么一个阴谋。去年 11 月 29 日的信是一个圈套，是进一步大反华的预定先行步骤。3 月 7 日的信就是证明。

大家还指出：3 月 7 日的信同时还说明，赫鲁晓夫急着要开国际会议，提出 1964 年秋天就召开国际会议。那么，国际会议之前做什么准备呢？如果他真是想要达成

妥协，真是想维护团结，那么他就应该为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留出充分的时间。但是，他不是这样，而是以秋天召开国际会议为目标，在这之前，5月就开中苏两党会谈，6、7月间开26党会议。他列出这么一个急促的日程表，只能说明他要走过场，并不是准备坐下来认真解决问题，而是急于对中国采取所谓"集体措施"。而在这封信里根本不提停止公开论战，那就是说他要继续公开论战，他要发表他们的二月决议，要对中国采取坚决的回击。

大家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从13日起转载左派党的文章，估计赫鲁晓夫感到很为难。因为他转载了很多骂中国的文章，现在我们转载批评他的文章，也是有理的，他也不好说我们什么。但是，估计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出来以后，赫鲁晓夫一定会暴跳如雷。

毛主席这时看大家议论差不多了，他归纳大家的意见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毛主席说，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要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领导，这个决心大概也下了。

毛主席说，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

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在上次复信中提出了这三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

毛主席说,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毛主席说,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5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从来是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毛主席还说,两党来往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是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

在这些会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第二节 用“拖”的办法推迟分裂

第二天(3月17日)毛主席在家里又继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这些会议主要讨论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线建设问题(后来在5、6月间举行)。毛主席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在会议过程中，还是谈了同赫鲁晓夫斗争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决定答复哥穆尔卡的来信。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同时还说他也写信给苏共，要求苏共也停止公开论战。毛主席说，我们的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

第二，毛主席提出，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毛主席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

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会上常委们都同意了。

毛主席离京南下之前,3月26日和27日又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主要谈到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但他更多的是谈到赫鲁晓夫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毛主席说,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换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

马上公开破裂，我们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是要准备这个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

毛主席说，我们对苏共3月7日来信的复信已经有了草稿，要做一些修改。一是要说明中苏两党的会谈，不仅今年5月间不能举行，今年10月也还太早，要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5月，较为适宜，而且还要加上这样的意思，即到那个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就是说要采取拖的办法，因为没有一定条件，会谈中大吵一架，没意思，还不如不会谈。

毛主席说，再一个意思是，要说清楚我们提出的17党参加筹备会议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要指出苏共要求26党参加筹备会是没有道理的。1960年那个时候是26党，但是当时只是筹备1960年的会议，这26党并没有世袭权，不能说那个时候当筹备会议成员，以后也是当然成员。没有世袭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是要经过协商的，而我们认为17党是妥当的。

毛主席还说，关于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要讲清楚如果赫鲁晓夫他们不是急于分裂，就不应该急于今年秋天召开，我们劝他们还是迟一点开好。我们建议到明年秋天再说，到时候再考虑是否召开。可以考虑推到三年之后再开，也可以不定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推到明年5月间，兄弟党会议筹备会什么时候开也没有定，国际会议就更可以不定时间。

毛主席还说，在复信里还要增加一段，提出我们要求他们考虑我们2月29日信里面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还要重新建议：中苏两党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复信中要指出，他们在3月7日的来信中拒绝我们的这个建议的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们还是请他们再考虑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咬住不放，说纠缠不休也可以，理在我们这边。这也是拖的办法。

会上还讨论继续评论苏共《公开信》的问题。《八评》的稿子毛主席已经看过了，也基本定稿，只须在文字上再斟酌一下就可以发表，并且考虑在月底发表。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现在要做准备，到时候再说。

毛主席最后还说，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贺信要用四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联合贺信，用毛、刘、朱、周四个人的联名签署。

毛主席这时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大家都看过《水浒》，《水浒》的第一回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

妖魔”。现在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水浒》第一回里边讲，洪太尉领了皇帝的圣旨到江西信州，上龙虎山上清宫去请张天师来开封禳灾。因为当时天下闹灾，瘟疫盛行。这个洪太尉到了龙虎山上清宫，没有见到张天师，而看见一个大殿，大殿的名字叫做“伏魔之殿”，殿门上贴满了封条，还锁得非常严实。洪太尉问领路的真人，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打开？领路的真人是一个道师，他对洪太尉说，从大唐祖师开始，里面就关了一大批妖魔鬼怪，一直到现在已经八九代祖师了，都不敢开，而且每一代祖师都要在门上贴一次封条。据传说，一打开就不得了，妖魔鬼怪都跑出来，天下就要大乱。洪太尉不相信，硬是叫人把封条扯开，把铁锁也给砸烂，打开大殿的门。门打开以后，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下面是一个石龟，碑上有碑文，刻着四个字，叫做“遇洪而开”。洪太尉看到这四个字，心想我不是洪信吗，我就是洪太尉。碑上刻着“遇洪而开”，正是碰到我就开了。因此他叫人挖开石龟。道师赶忙来劝，说动不得，动不得，动了就不得了了。洪太尉不听，挖开石龟，底下还有一块大青石板，洪太尉又叫再挖，把石板挖开了。挖开以后，底下是一个很深的、见不到底的地洞，里边哇喇哇喇的响，响过以后，一道黑气一下子从洞里滚起来，一直冲洞口而出，冲到大殿，冲到半空中，化作百把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吓得大家都倒下，洪太尉也吓得发抖，面色如土。他问道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道师说，你不知道呀，这里边锁着 36 员

天罡星，72座地煞星，一共是108个妖魔。你把他们放出去就不得了了，天下就要大乱了。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在1956年底访问东欧的匈牙利、波兰这些国家，经过莫斯科的时候，跟他谈了一通，把我们的意见，对他们“20大”、对斯大林的问题都讲了。赫鲁晓夫把这说成是总理给他们上了大课。总理在“22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毛主席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

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主席在他离开北京之前，连续两天(3 月 26 日和 3 月 27 日)在他家里开常委会的时候，谈了上面这些意见。第二天(3 月 28 日)他离京南下武汉，后来又到了长沙。

在毛主席离开北京之前，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已经定稿，当时要等待外文翻译最后的审定，所以决定在月底发表。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天，在 3 月 31 日我们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八篇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简称《八评》)。

这篇文章主要是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的谬论，而且把他同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拜倒在美帝国主义脚下的白劳德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说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先生。

根据毛主席离开北京之前的指示，我们在文章最末一段增加了下面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文章还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

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文章最后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结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三节 给赫鲁晓夫祝寿

《八评》发表以后，我们开始同时起草给赫鲁晓夫 70 寿辰的贺电和对苏共中央 3 月 7 日来信的复信。

我党中央给苏共中央 3 月 7 日来信的复信，在 4 月初定稿，少奇同志批送到武汉，请毛主席最后审定。主席审定后正准备发表，恰恰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 4 月 3 日公布了他们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在公布这两个反华文件的同时，《真理报》也发表了一篇反华的社论。这是苏共中央发动所谓"坚决反击"的一个严重步骤。

我们在 4 月 3 日上午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在毛主席离京后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的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要考虑一下我们采取什么对策，我们已经定稿的给苏共中央 3 月 7 日来信的复信，要考虑推迟交给苏共，也推迟发表。这件事情果然像我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我们发表了《七评》、《八评》以后，赫鲁晓夫坐不住了，跳起来了。《七评》1 月初发表，他 2 月中旬召开大反华的中央全会；《八评》3 月底发表，他 4 月初就发表二月全

会的反华决议。这是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的重大步骤。少奇同志说，这个事情还要请示毛主席才作最后决定。

少奇同志还说，估计苏共在发表二月全会这两个文件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我们要等着看一看。他们所谓的“坚决反击”开始了，这是个新的情况。我们答复他们3月7日的信，要联系到这个新情况进行修改，然后再发出。这个事情也要请示主席。

当天下午，少奇同志给小平同志打电话说，主席同意复信不忙发出，要修改，但怎么样修改要等等看，要看看苏共还有什么动作再说。小平同志通知了我们。

4月5日，少奇同志在他家里主持召开一次小会，周总理、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都参加了。在这次会上，少奇同志说，已经报告了主席，对苏共采取的这样一个新步骤，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事件。当然，从翻译出来的三篇东西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这三篇东西除了谩骂以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三篇东西一共有6万多字，连篇累牍的都是歪曲事实、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这说明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理屈词穷的地步，所以说这事没什么不得了。

小平同志在会上指出，他们过去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现在又发表那么三篇东西，这表明的确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他们要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要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他们原来是想停的，但中国不愿意停，所以要坚决反

击，表示他气壮如牛的样子。其实一看这些东西，就知道他们的心里是虚的，没有什么新东西。

陈毅同志说，看来苏共发表的这些东西，整个来讲是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和过去不同的，就是在这三个文件里边点了好多人的名，不仅点了我和陶铸，还点了毛主席、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我们只点赫鲁晓夫一个人，而他们现在点了我们七八个人。这就是说赫鲁晓夫撕破脸皮，采取泼妇骂街的办法，直接攻击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过去是不指名的攻击，现在是指名的攻击了。

陈毅同志说，点我这个人那倒无所谓，现在他们点了我们党的主席、国家主席、总理、总书记，这个事情就不简单。看来赫鲁晓夫是要大闹一场的样子。

陈毅同志说，我主要是 1959 年跟他大吵了一顿，这是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谈的时候。赫鲁晓夫来参加我们国庆十周年庆祝会。他刚从美国会见艾森豪威尔后来北京。我批评他发表塔斯社声明偏袒印度，跟他大吵了一顿。他一直记恨在心，现在咬我一口，这也无所谓。

小平同志赞成陈毅同志的看法。他说，看来赫鲁晓夫是下决心要大骂一场，估计他这样做可能是为召开分裂会议做舆论准备。他 3 月 7 日来信急急忙忙要在 5 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现在还不到 5 月，他却发表三个反华文件，发起一个反华运动。他这样做是有预谋的。

小平同志说，苏共 3 月 7 日来信要 5 月举行中苏两

党会谈是一个幌子。他明知这样急忙会谈是来不及准备的。他也明知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会谈起来就是大吵一场，会无结果而散，以至完全公开破裂。当然，现在赫鲁晓夫是不是已经完全下了决心公开破裂，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他的这种做法绝不是为着5月间中苏两党会谈解决问题。

周总理说，可以这么说，赫鲁晓夫发表这三个文件，表明他实在忍不住了，表明他对我们同他公开论战、批评他的错误实在是咽不下去了。他的所谓“坚决反击”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三篇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东西，无非还是笔墨官司。但是要看到，如果他还继续不吭气，他在我们这么尖锐的批评面前不做一点表示，那他的地位就稳不住。最近兄弟党（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公开反华的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赫鲁晓夫不做一点表示也不行。所以也要看到他虚弱的一面，看到他被逼到墙角了。

少奇同志说，现在我们要看他这场戏怎么唱下去，我们要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要考虑准备先发表他们这三篇东西，就是苏斯洛夫的报告，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和《真理报》4月3日的社论。我们先按兵不动，观察一个时期，但也不能太久。

大家议论我们下一篇评苏共的《公开信》的文章怎样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九评》要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际根源，批评他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指

出他们高薪集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席指定的还有一篇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谈判,我们可准备稿子,晚一点发表。主席还出了几个题目,也都要准备。看来,对付赫鲁晓夫新的一轮公开论战,《九评》要作大的修改,着重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源,挖他的老底。

小平同志说,这篇文章要费些气力,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站得住,理论上站得住。我们想先观察一个时期,再来最后完成这篇《九评》。

小平同志还说,秀才们从去年准备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忙到现在,一年到头很辛苦,太紧张了,现在可趁观察一阵的时机,放松一下,索性离开北京休息一些日子。

少奇同志和总理都赞成,说你们累了一年了,应该休息一阵。会上决定,小平同志带领秀才班子到外地去参观。

过了两天(4 月 7 日),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就带着我们,乘专列出发。先到大同,参观了云岗石窟。然后到包头,参观包钢和那里的稀有金属矿山。在包头停留两天,然后又到银川。在银川呆了一天,看了大雁塔,听了宁夏党委书记介绍宁夏的情况。然后到兰州,在兰州停了两天,听甘肃省委介绍情况,还参观国防工业。

可是,在兰州的第二天晚上,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要小平同志带几个人马上从兰州飞长沙,说毛主席要在那里开会。当时兰州还没有大飞机场,只有在陇西,在我国核试验基地附近才有大飞机场,而那里离兰州太

远，当时又正在进行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去那里。后来想从兰州先到西安，然后再去长沙，但是西安也没有大飞机可以降落的机场，只有武功有个大的军用机场。于是决定从兰州经过武功飞长沙。

根据主席点名，4月12日小平同志带着康生和我，三个人一起从兰州到长沙。其他同志由彭真同志率领从兰州到西安参观。当天中午我们飞抵长沙。刚吃完午饭，毛主席就通知开会。

我们到达毛主席住处。那是高大、宽敞的平房。毛主席喜欢住这样的房子。如果房子太小，太矮，他就感到压抑。参加会议的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主席在中南地区巡视一般都由他陪同）和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主席见到我们后即说明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要修改。这个贺电稿子原是我们在北京时准备好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写得比较长，其中谈到了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少奇同志修改后送毛主席审核。

毛主席对我们说，他不赞成这样写法。他说，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什么公开论战不能停呀，要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呀，等等，这些问题不要多谈。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主席说，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

团结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毛主席说，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这是主席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22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

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毛主席说，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第三点意见，毛主席说，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

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11月29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第四点意见，毛主席说，《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此外，毛主席还谈了一些事情，要小平同志告诉总理。毛主席说，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当天晚上，小平同志打电话把主席的意见告诉总理。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们改写给赫鲁晓夫的贺电，由我先改写，然后小平同志加上王任重、张平化和康生，一起议论修改。在议论过程中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稍微详细一点好，一种意见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后来小平同志要我把大家的意见集中一下，根据大家意见起草两个不同的稿子，一长一短。下午再讨论，讨论完毕再送主席。

主席下午收到我们两个稿子后马上开会。毛主席说，原来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长不好，但现在搞得太短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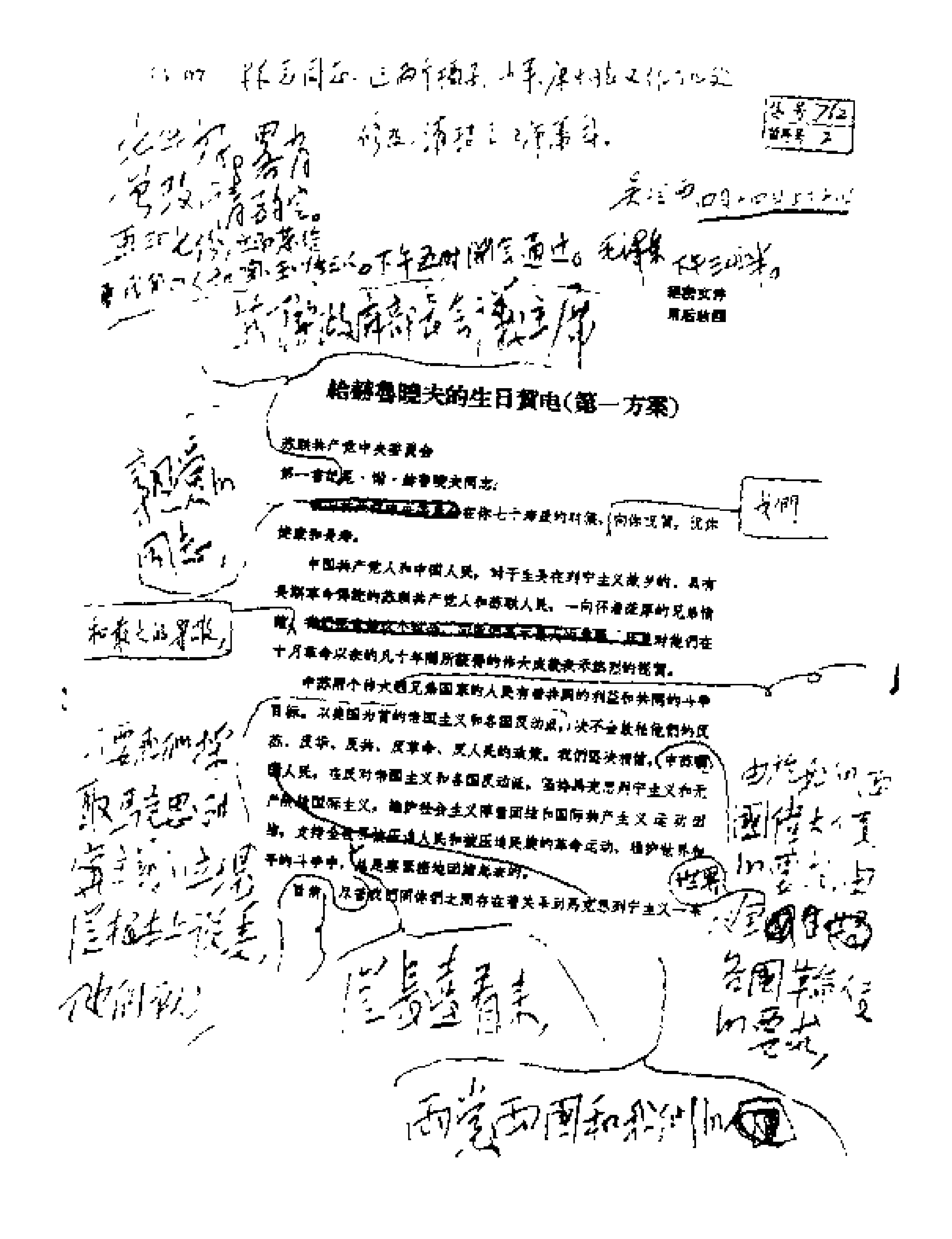
好，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毛主席基本上同意第一个稿子，就是稍为详细一点的那个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主席在开头的地方加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原来我们稿子的开头只是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第一段就是“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毛主席在“在你70寿辰的时候”之前加了“亲爱的同志”。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电报是一个和解的电报，而且使他能够发表。

同时，毛主席在最后的地方又加了“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这么一句。

修改以后，毛主席要我们马上电发到北京，请少奇同志和总理再过目，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的70寿辰是4月16日，在长沙定稿的时候已经是4月14日。这个贺电必须在4月16日前发出。同时毛主席还要小平同志告诉总理，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


给赫鲁晓夫的生日賀电(第一方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redacted]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長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長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長期革命傳統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誼，[redacted]对他們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間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賀。

中苏两个伟大的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决不会放松他們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我們堅决相信，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堅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維护社会主义陣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維护世界和平的斗爭中，总是要紧密地团結起来的。

目前，尽管我們两党之間存在着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

1964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对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稿的修改及批语手迹。

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毛主席说,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毛主席还谈到,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那样,像后来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毛主席说,如果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 5 月,还提出两三年以后再开国际会议。虽然我们这样提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万一他提前开,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他针锋相对。让各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电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

1964 年 4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赫鲁晓夫 70 寿辰的电报全文。

议论完了以后,毛主席请大家一起吃晚饭。小平同志在晚饭前指示立即把贺电稿发给北京。后来总理来电话,说少奇同志和他都同意主席在长沙修改过的稿子。这样,贺电在16日凌晨用明码发到莫斯科(当地时间正是15日夜),16日晚上新华社广播,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的全文。

报纸登出来以后,当时就有许多干部反映说,怎么给赫鲁晓夫这么一个温和的贺电。特别是对贺电中讲"亲爱的同志"和一旦有事还要团结这两点反应很强烈,当时人们推测这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这里有必要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记录下来。贺电的全文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

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绝不会放松它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从4月17日起,中国报刊和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毛主席原来批示是要暂停一个星期,实际上停了十天。

第四节　苏共反华文件出笼

4月27日,《人民日报》开始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一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反华报告,二是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三是苏联《真理报》4月3日的反华社论。这三个反华文件都是在4月3日在莫斯科同时发表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的报告,全文一共有8万字,《人民日报》用五个版的篇幅全文转载。

苏斯洛夫的这个报告充满了歪曲事实、造谣生事、颠倒是非和对中国的恶毒攻击。全文一共分八个部分,它原来的标题是:第一部分,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用的问题的两种态度;第二部分,关于战争与和平和革命问题;第三部分,中共领导人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运动的方针;第四部分,关于苏中关系;第五部分,中共领导

人对苏共纲领的攻击;第六部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第七部分,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的危险性;第八部分,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在第一部分里,苏斯洛夫把我们党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的论点,说成是我们贬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作用,而且把他们首先发动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说成是我们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把我们批评他们在经互会内搞的所谓专业化、要各国服从苏联的计划、一国统治经互会,说成是我们反对他们联合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

第二部分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革命的问题。在这里苏斯洛夫还是宣传他们的"三和"路线,把我们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不要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吓倒的论点,歪曲成为我们主张发动核战争。他还特别引了毛主席的话,并加以歪曲,连我们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句话他也加以歪曲,以此来攻击我们不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把战争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的规律性、不可避免性同争取和平、争取裁军对立起来,为他们幻想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和"三和"路线辩护。他甚至把中印边界冲突,说成是我们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有意挑起来的,偏袒印度,指责我们。他把我们反对他们1963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停止部分核试验条约,

说成是我们根本反对核裁军。

其实，我们早就提出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建议。而他们在莫斯科签订的那个条约，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禁止中国进行核试验，来保证他们的核垄断。苏斯洛夫极力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辩护，为他们的“三和”路线辩护，为他们要求把各种革命斗争服从于他们“三和”路线辩护。对于我们指出他们的路线的实质是自己不革命又反对人家革命，他非常恼火，大叫大嚷，大骂我们是“战争贩子”、“跟战争贩子站在一起”。

苏斯洛夫报告的第三部分，等于是第一部分的延伸，不过，他更强烈地反对当时世界上特别是非洲许多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认为亚非拉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应该服从苏联争取和平的斗争。对于我们强调不能把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工人运动分割开来，不能因为争取和平运动就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论点，也就是对我们揭露他们所谓“星星之火可以引起世界大战”的错误口号，竭力辩解。

在这里，苏斯洛夫还把我们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歪曲成为是亚非拉压倒全世界，并把我们这个口号说成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他还说我们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反列宁主义的，其实这个口号正是列宁提出的。

本来，我们讲的“东风”，是包括全世界所有革命力量，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各国工人运动，包括民族解放斗争，包括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比喻性质的口号。当时毛主席为说明这个比喻，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列举了十大事件，其中首先就讲到苏联卫星上天。但苏斯洛夫完全歪曲了我们的观点，硬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

第四部分讲到苏中关系的时候，苏斯洛夫说他们过去怎么样援助中国，援助的很多，苏中关系变坏是因为中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主义、“反苏”所造成的。他在这里根本不敢提他们1958年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搞长波电台，要在中国驻扎苏联空军，要控制中国的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中苏关系便从1958年开始变坏。但是分歧不仅仅如此，从苏共“20大”开始就有分歧了。1958年关系变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苏联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遭到了我们坚决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没有能够使中国屈服，他就说中国开始反苏。苏斯洛夫还责备我们从1960年起大大减少了中苏之间的经济往来。但是，中苏贸易为什么减少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撤退专家，把全部专家都撤走了，把所有合同都撕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设的步骤被打乱了。专家撤走和合同撕毁之后，中国再买原来合同规定项目的设备就等于把一堆废物放在那里。我们要的你们不给，我们

不要的你们硬要卖给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就减少从苏联买的东西。

苏斯洛夫还把他们用撤退专家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我们对专家散布反苏观点，说我们对专家意见不尊重，关系非常恶劣。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许多苏联专家离开中国的时候，跟中国同志难舍难离，是流着眼泪离开的。大多数苏联专家的确是诚心诚意帮助中国搞建设的，我们对此一直是表示感谢的。

苏联专家撤退以后，他们后来又曾提出要再派专家来，我们当然拒绝了，我们不再上当了。对这一点，苏斯洛夫在他的报告里指责中国对苏方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不回答。他一股脑儿地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我们，这又能骗得过谁呢？

苏斯洛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完全隐瞒了 1958 年中苏争执的真相，颠倒了 1960 年的历史是非。

报告的第五部分，苏斯洛夫对我们批评他们从“20 大”到“22 大”逐步形成修正主义的错误，大肆谩骂，说我们指出他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违背马列主义，是抱着无产阶级专政教条不放；说我们对马列主义断章取义，为他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辩护。

第六部分是为他们从 1959 年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搞分裂活动辩护，想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苏斯洛夫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老子党自居、挥动指挥棒、要大家服从它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行为辩解，说他

们是列宁主义,我们是反列宁主义。苏斯洛夫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他掐头去尾地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列宁在谈到党内组织原则时说的。列宁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应该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列宁讲的明明是在一个党内的事情,根本不是各国党之间的事情,拿这句话来为他们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辩护,太可笑了。

在这一部分里,苏斯洛夫还把我们说他们挥舞指挥棒,说成是我们挥舞指挥棒,要他们服从我们。这简直是蛮不讲理、颠倒黑白了。他在讲到比利时、巴西、澳大利亚这些党发生分裂时,把这些党分裂的责任都推给我们,说是我们煽动少数人搞分裂。其实,这些人是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他的"三和"、"两全",不满意他们党的领导人屈从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另一方面,苏斯洛夫对他们在别的兄弟党里边制造分裂,根本不提。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在日本共产党内部进行分裂活动,他们拉拢少数人来反对日共中央。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引起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引起大家的反抗,正像我们在《七评》中讲的,是赫鲁晓夫的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对于这个要害,他完全躲避不谈。

第七部分,苏斯洛夫似乎想从理论根源上来攻击我们党,但是,他讲得牛头不对马嘴,硬是把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这三顶帽

子扣到我们头上。其中特别提到托洛茨基，说我们重复了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其实，正是托洛茨基派的所谓第四国际，正式作出决议支持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的理论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证明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是错的。

苏斯洛夫攻击我们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在边界问题上。其实，边界问题，只是中印和中苏之间对边界问题一直纠纷不断，没有解决，中国同缅甸、尼泊尔、蒙古等国家的边界问题近几年都先后解决了。中苏边界问题没有解决，那是因为苏共搞大国沙文主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斯洛夫在这一部分本来是要污蔑我们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倾向、民族主义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文章做到这里该收场了，但是他却东拉西扯。前面已经是东拉西扯了，后面又扯出了一个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问题。他说我们不赞成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就是跟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一样，说我们现在反对他们就等于是支持了他们的"反党集团"。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大反中国的国内因由是他们的领导内部出现危机，赫鲁晓夫的一套招致党内和国内的严重不满。所谓莫洛托夫"反党集团"这个"魔影"使得他们睡不着觉。苏斯洛夫的报告在这里就露了马脚。

第八部分，说的是要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实际上是要大搞分裂，为大分裂做准备。这一部分透露了赫鲁晓夫对我们2月4日的文章指出他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非常恼火，并且表示他们不能再沉默了，要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坚决的反击了。他们提出，要召开兄弟党会议，“通过集体的努力来确立怎么样维护团结所必须的途径和手段”。这句话意味着他们要采取步骤来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谓“维护团结”所必须的“途径和手段”，就是搞分裂，也就是他们提出的所谓要采取的“集体指施”。

但是，在这一部分里，有一个很笨拙的地方，就是苏斯洛夫攻击我们在公开论战中、在中苏会谈中，把火力集中在赫鲁晓夫身上，是企图达到把赫鲁晓夫和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分开，挑拨他们的关系。很显然，他说的这个问题，同这一部分讲的国际共运团结的问题，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苏斯洛夫居然硬在这里面插了很长的好几段大讲他们中央内部团结。这也是透露了他们的心病或隐痛。就是说，在我们连续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赫鲁晓夫首当其冲。这使他们感到赫鲁晓夫声名狼藉，他的一套谬论也被我们批得体无完肤。苏共领导集团在二月全会时已经感到赫鲁晓夫处于相当孤立状态，地位不稳，所以有必要在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时，特别强调维护赫鲁晓夫的领导。这至少是赫鲁晓夫本人所迫切要求的。至于其他苏共领导人当时是怎样想的，不得而知。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这个八万多字的报告，主要的内容就是上面这些。

根据苏斯洛夫的这个报告，苏共中央全会2月15日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污蔑我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搞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滚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上，而且在各个国家搞派别活动。这是他们在正式决议里面给我们党扣上的帽子。

然后，决议不顾事实地硬说我们拒绝了他们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其实，我们的几次复信都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有些是把苏联的建议接过来，加以具体化。他们却认为这就是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在决议里宣布，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维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苏共中央全会作出这么一个决议，就表示他们是下了要"坚决反击"的决心了。而且，决议还说，苏共现在沿着今后仍然沿着经过检验的列宁的道路前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这就表示他们决心把修正主义搞到底了。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是一个决心把修正主义搞到底、决心采取所谓坚决反击、所谓集体措施等分裂步骤的决议。它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一样，表示了苏共

中央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集团要顽抗到底。

苏联《真理报》在4月3日发表上述两个文件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社论。这个社论的主要内容，是讲1963年11月以后，苏共中央所采取的所谓停止公开论战、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些步骤（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社论说，从那个时候以来，《人民日报》发表了200多篇反苏的文章和其他材料。其实，我们只发表了八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余的都是各兄弟党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点名批评苏共领导。

《真理报》的这篇社论，对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七评》特别恼火。《真理报》的社论说，这是苏共采取“坚决反击”、“集体措施”的“理由”，说我们发表《七评》就是我们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实，赫鲁晓夫下决心要分裂，并不是因为我们说他搞分裂他才搞分裂，而是他早就搞分裂活动了。

《真理报》的社论在讲到二月全会的苏斯洛夫报告和通过的决议时说，苏共中央决定揭露中国分裂主义的观点和分裂活动。接着社论讲到他们7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社论说，苏共中央在这封信里面就拟定中的措施，同兄弟党进行磋商，并得到他们的谅解和支持。这就是说苏共中央在二月全会开会（二月全会是2月14日到15日举行的）之前两天（2月12日），就给兄弟党发出了这封信。不等全会通过什么决议，赫鲁晓夫就决定要对中国进行“坚决反击”和采取“集体措施”，并就此写信给兄

弟党了。就是说他不等我们2月29日对他们去年11月29日的信的答复，就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抢先给兄弟党写信，紧接着就召开中央全会做出决议。而我们2月29日的复信，恰恰是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就是前面讲到的四项建议。而4月3日《真理报》的社论，居然把我们2月29日的复信说成是拒绝一切建议，来为他们2月12日给兄弟党的信，为二月全会决议采取所谓“坚决反击”、“集体措施”的公开分裂的步骤辩解。苏共领导这样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竟然忘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了。

我们的《人民日报》在4月27日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两个文件和《真理报》4月3日的社论，4月28日，《人民日报》又把赫鲁晓夫从4月3日到4月18日这16天里接连发表的12篇公开讲话中的有关反华部分全摘录发表了。

在这16天里面，赫鲁晓夫从4月3日起，也就是说从苏共公开发表二月全会文件那一天起，访问匈牙利。他在访匈期间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这六次讲话中，除了攻击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滚到托洛茨基和大汉族主义的泥坑里去以外，还讲了很多非常粗野的话。

赫鲁晓夫4月5日在匈牙利的一个车站讲话时说，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赫本人在苏共“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他说，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

吧。

4月6日他又在一个工厂的群众大会上造谣污蔑，露出一副下流相。他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足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赫鲁晓夫在这些讲话里，讲了很多这样粗野、下流的话。当时外国记者对他访欧期间的讲话是这样报道的：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期间，在田间、在工厂，不时显出疲倦和劳累的样子，他的脸上变得毫无表情，说话声音疲软，常常用沙哑、单调的声音读着演讲稿。然而，当他讲到反华时，他又变成了一个街头鼓动者，他把讲稿放在一边，提高嗓门，挥动两臂，紧握拳头，这时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赫鲁晓夫。

4月13日到4月18日，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这期间赫鲁晓夫一连讲了四次话，恶毒攻击中国。最恶劣的是他在4月15日莫斯科举行的波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赫鲁晓夫在攻击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潮流占上风时，大讲什么中国党要分裂全世界白种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诬蔑我们说白种人永远不会理解黑种人和黄种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利益是不同的。赫鲁晓夫在这里是煽动种族主义，跟他在1954年对西德总理阿登纳说"黄祸"，同出一辙。

赫鲁晓夫还攻击我们要他们不要搞经济建设、不要改善人民生活。他讲到这个问题时，离开讲稿大声叫嚷说，中国人说我们太胖，要防止资产阶级蜕化，要我们的工业转向生产腰带，以便把肚皮勒得更紧一些，要我们向坟墓前进。他说，中国人说我们是资产者，这就是指我们的肚皮。接着他把自己的外衣撩开，露出他的肚皮，说这就是我们的肚皮。然后他自己也承认说，我这样讲是粗野一些，也离开了讲稿，但是没有办法。他甚至还十分恶劣地说，有一条蛀虫，爬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的那个地方去了，蛀虫乱爬乱转，于是蛀虫竟以为它是真正指导世界的发展了。

赫鲁晓夫还大放厥词说，中国现在什么也没得吃了，中国人把鸡蛋都吃光了，把鸡都杀光了，也没有鸡来下蛋了。中国经济一片混乱，国内发生了饥荒。我们因"大跃进"中犯了错误曾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但是，赫鲁晓夫拿经济困难嘲笑我们时是 1964 年的 4 月，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了。赫鲁晓夫还攻击我们调整经济是放弃工业化。他这个话又说的太晚，这时我们经过三年调整，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正在高涨。

赫鲁晓夫在这个讲话里，仍然对我们批评苏共"20 大"耿耿于怀，因为那是他的护身符，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通灵宝石。他重申，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意义，说大个人迷信和小个人迷信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的幽灵仍在徘徊。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幽灵的确一直缠着赫鲁晓夫。

当时外国驻莫斯科的记者，在报道、评论赫鲁晓夫在这次波苏友好大会的讲话时是这样说的：他在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不时愤怒地挥舞拳头，提高嗓门，他用一种特别带讽刺性的态度和假怜悯的语调。他指名道姓地骂，拍桌子，使用威胁性的语调和跺足，总之几乎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所差的只是没有像在联合国大会上那样，脱下他的鞋子敲桌子了。他用急促的、愤怒的声调讲话，他的反华言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野蛮残忍。

在发表上述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和赫鲁晓夫反华言论的时候，《人民日报》用编辑部的名义又加了一个按语。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的。

这个按语说，“半年多以来，苏共领导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而且威胁中国，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坚决反击’、采取‘集体措施’，耍两面手法。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东西，但是二月全会文件的发表终究是看到一点眉目了。苏共领导的这些文件和讲话，彻底暴露了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日，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时。”

这个按语还说，“我们早就料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货色来的。果然如此，他们这次公布的文件，充满了陈词滥调，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对方是错误的，活像个泼妇骂街，

实在不够论战的水平。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文件中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造谣说谎的地方，就有一百四五十处之多。这些谎言有许多早已经被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篇文章里面批驳得体无完肤了。”按语还说，“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以外，只不过增加一些拍桌子、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表演而已。”

按语还指出，“苏共领导这一次特别集中地攻击毛泽东同志，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人民日报》的按语还讲到，这三个反华文件和赫鲁晓夫各次讲话的反华部分，不仅本报全文发表，而且省一级的报纸也都将刊载这些文件、讲话的摘要。我们不仅向国内广播，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全世界人民看一看，从这些反面教材中间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

按语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说，我们全文发表你们的反华文章、讲话了，你们以后所发的一切这类反华的言论，我们还要继续发表。你们敢不敢发表我们答复你们《公开信》的八篇评论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因为你们害怕真理、害怕阳光，害怕人民群众识破你们的原形。

按语最后说，我们声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之前和在此以后公布的一切反

华文件、讲话、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以回答。

这个编者按语是我们在外地参观完毕，回到北京后写的。

毛主席在26日审定了这个按语，并批示："按语看过，很好。可以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小平同志在修改完给赫鲁晓夫的祝寿电后，又同我们从长沙飞回西安，同彭真同志率领的写作班子会合，经洛阳、三门峡、郑州、徐州，到山东曲阜、济南，20日返回北京。

我们回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时会上主要是谈老挝问题，同时少奇同志要在暂停期结束以后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他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一个编者按语，加在发表苏共反华文件和言论前面。我们根据小平同志在路上同我们一起议论酝酿的内容，起草了编者按语，同时还加紧修改复信和《九评》。

因为在一路上已经酝酿，《九评》的大架子要做些变动。毛主席在长沙时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可考虑彻底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国外根源和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现在有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更应该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小平同志设想，如果这篇文章写得好，那么就可以作为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总结，要大家下功夫把《九评》这篇文章写好。

我们写好《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以后，经过少奇同志修改，就发到杭州请毛主席最后审定。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从长沙到了杭州。

和这个编者按语同时送毛主席的，还有我们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答复信的修改稿。毛主席把这个答复信留下了。

毛主席是在“五一”前夕回到北京的。4月30日他在家里开会讨论复信的修改。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现在步调乱了，指挥棒不灵了，不仅意大利、波兰这些党不赞成开会，还有瑞典、挪威一些西欧、北欧的小党也不赞成开会。现在赞成开会的不到十家。看起来赫鲁晓夫这个国际会议开不成，他可能也看到开会对他不利。

毛主席说，对这个国际会议我们要坚决反对开。不开好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就不能开17国筹备会即起草委员会。没有开筹备会，就不能开国际会议。这个立场绝不能动摇。毛主席说，因此这个复信里原来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需要两三年的准备，现在看来两三年不行，要四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毛主席要我们再修改，要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一些，把国际会议不能开的理由讲得更充分一点。他在稿子上作了修改，并加了三小段文字，其中一段说：“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始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各方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今天分裂

吗?”

过了“五一”节,5月3日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而且对复信又做了具体修改。他认为原来信中对赫鲁晓夫要开国际会议是非法的这方面讲得不够,他已经改了,加强了。毛主席说,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晓以利害。要着重讲明,在目前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好、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导致团结,而是导致分裂。这个道理要反复地讲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苏共领导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要劝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因为开起来就要分裂,不开还能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不至于完全破裂,这比公开破裂要好。

毛主席在复信中还亲笔加了两句话,一句是:“如果你们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那么,这样做是非法的,是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另一句是:“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的、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时会上还议论到我们这封复信什么时候发表,因为他们的信是3月7日来的,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毛主席说,索性整整两个月的时候发出,就是说,他们是3月7日来信的,我们5月7日把复信给他们,5月8日晚上广播,5月9日见报。发表时间就这么定下来。

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首先指出，你们3月7日的来信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可是你们在这之前三个星期，在2月中旬，实际上是2月15日、16日，你们就在有6000多人参加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反华报告，通过了反华决议，要公开地、坚决地反击中国共产党。现在你们在4月3日已经发表了你们在2月做的事情，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你们3月7日的来信，不过是玩弄两面手法的把戏。

在这封信中，我们还是坚持要达成协议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复信指出，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在这个《公开信》以后，你们又发表了2000多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声明和文章，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

接着，复信谈到关于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里说，关于为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原来是建议在今年10月开。而你们提出要提前到5月开，而且要在这之后，在6月或7月就开兄弟党筹备会议，还限定秋天就举行全世界兄弟党国际会议。看来似乎你们很热心，但是这恰恰证明，这是你们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复信说，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年10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

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 5 月较为适宜。到那个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关于兄弟党代表筹备会议,我们原来提出由 17 个党的代表参加,苏共不赞成,还是坚持要 26 个党参加。我们在复信里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的情况和 1960 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你们提出的 26 个党的名单中间,有两个党已经分裂了,例如澳大利亚党已经分裂为两个党了,巴西党也分裂为两个党了,那么究竟是由哪一个参加呢?又如印度丹吉集团已经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走卒,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还能请它参加我们的筹备会议吗?所以我们坚持还是 17 个党比较好。

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复信说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应该开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而绝不应该开成为一个分裂的大会。因此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而不应当匆匆忙忙召开。我们这样一个态度,也是世界上许多兄弟党的态度,而这个态度也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 1963 年 11 月 29 日的信里就这样讲过。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你们就不应该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这个国际会议。

复信明确指出,现在没有像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

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开这样一个会议,那么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现在我们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复信接着说,我们认为,为了开好兄弟党国际会议,需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与其他兄弟党的双边、多边会谈,举行兄弟党筹备会议并达成一致的协议,等等。照目前情况看来,这些准备工作也许需要四五年,或者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

复信最后说,你们今年二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和《真理报》今年4月3日的社论,都歪曲和透露了从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中央内部交换信件的情况。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因此我们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采取同样的措施,在自己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与这封5月7日复信同一天全文发表的,还有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三封信,和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

我们党中央在这些复信里面所表示的态度,以及采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給苏共中央的信

1964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取公布来往信件的措施表明，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是很清楚了。至于究竟是否召开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这些问题，从当时的形势看，也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所以从复信发表以后，中央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并决定于5、6月间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中心是关于一、二、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

第十五章

形势急转直下

第一节　《九评》的彻底揭露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会议议程为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5月27日在毛主席住处开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决定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按照我国地理状况和战略构想，中央大致规定：国防第一线为沿海边疆地区，第二线为京广路沿线中部地区，第三线为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腹部地区）；并决定在改进常规武器的同时，着重加紧研制核武器和导弹。这就是要加强战备。常委会还专门讨论了农村"四清"运动，正式决定在农村展开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

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毛主席在常委会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

毛主席还提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要认真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他接着询问《九评》写得怎样。我回答正在写，已经反复修改多次，还不满意。毛主席说，不要紧，要认真分析，充分论证，使人驳不倒，不要匆忙，但要抓紧。

毛主席说，《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作班子又对《九评》稿子作了比较大的修改。

在工作会议后期，6月8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常委和中央一些有关同志外，还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谈到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时，又提出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他说，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

毛主席接着又问及《九评》写好了没有。小平同志回答说，秀才们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还需要再作些修改。毛主席说，丑媳妇不要怕见公婆，梳妆打扮好了才出来，披头散发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来请大家议论修改。小平同志说，再修改一次就可以拿到起草小组上讨论，讨论后再修改就可以送主席、少奇同志、总理审查。

6月底，我们将修改了多次的《九评》稿子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第二天到钓鱼台来，主持起草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7月初印出了修改稿，送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

7月5日起，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也是逐段边讨论边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动笔修改。（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因事在外，没有参加这些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修改的意见，或者他自己动笔修改。主要

有以下几点：

毛主席说，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毛主席强调，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匪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是赢得了拯救人类伟大胜利的主力军。

毛主席说，除了这些要讲以外，还要讲到，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是不满赫鲁晓夫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抗的冰山之巅。

毛主席说，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坚决相信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在文章结尾时还要重复这个意思。我们历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还要对广大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寄予厚望。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我们对原来起草的稿子做了补充。在《九评》的最后部分补写了一大段："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毛主席还强调阐述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讲到全民国家问题时,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九评》最后一段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主席强调,在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说,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人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

我们根据毛主席6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一段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列举了他提出的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

毛主席还说，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些原因要在《九评》中逐一加以分析，使人有一个系统的清晰的概念。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我们又对《九评》从头到尾作了通改，主要是事实与论证的衔接和文字的修饰。毛主席看过这些修改以后，又把文章的标题改了。我们原来用的标题不是这样。我们用过好几个标题，曾用过《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等。最后，毛主席把标题改成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经过这么一改，就突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全世界革命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样一个题目，使人立即感到文章的宏大气派、理论光彩、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此外，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对毛主席最近两年来关

急28号文件　　　　　　　　绝　密
第22次稿　　　　　　　　用后收回

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
假共产主义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目　录

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
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
驳所谓"全民国家"
驳所谓"全民党"
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1964年7月，毛泽东为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改拟的标题手迹。

于反修防修问题的论述加以系统整理，写入《九评》中去。因此我们在毛主席主持会议讨论之后，又作了一番修改。其中主要的是把这几年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论述，系统地归纳为15条。

《九评》最后定稿是7月12日，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大家在会上逐段议论并修改。

在这次定稿过程中，毛主席对新增加的15条中的第二条又做了修改，这一条基本上是他自己重新改写的。他改写后的全文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在这次定稿会议上，其他中央同志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文字上也有多处修改。最后，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两天以后（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距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刚好一

年零一个月。

《九评》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从这个命题出发，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部分是讲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文章列举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第三部分是讲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里主要阐明，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在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上并不占统治地位，而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文章说，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第四部分是驳斥所谓的全民国家。文章着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结合现实情况，阐述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不可能是全民的道理。文章指出，如果阶级不存在、全民一致了，国家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消亡了。

第五部分是驳斥所谓的全民党。文章对赫鲁晓夫集团列举的苏共是全民党的四条理由逐条加以驳斥。文章指出，如果像赫鲁晓夫集团所宣传的那样，苏联党之所以变成为全民党，是由于苏联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是由于苏联全体人民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是由于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是由于苏联党的活动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是符合全民性质的。文章说，如果这四条理由是正确的，那么，苏联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称为全民党了。可见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文章指出，苏共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第六部分是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文章做了各方面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

文章最后一部分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这

一部分着重是讲在前面已经提到的毛主席关于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一共归纳为15条：

第一条，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在这一条中增加了前面说过的那一大段文字。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条，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条，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条，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条，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第十五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文章在讲完这15条以后，全文抄录毛主席的一段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这样办，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接着，《九评》还论述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列举了接班人的条件。

《九评》最后说，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须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已经变得，并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

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以上15条是在当时激烈的公开论战中间提出来的。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提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有着深远意义。

当然，这些观点中，有的是他在谈到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的观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但是，他提出的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反修防修，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都是根据苏共"20大"以来，而且不仅是苏共"20大"以来，还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1956年毛主席根据苏共"20大"、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持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可以说这次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是1956年以来的反修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第三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包含了前两篇文章的观点，而且加以发展了。特别是跟苏共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总结怎么样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重大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这篇文章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国际上震动很大。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样防修，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的第二天，7月15日，毛主席在他家里又召开一次常委会。在会上谈到《九评》的问题时，毛主席说，《九评》发表以后，他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

毛主席在会上除了谈到《九评》以外，还问《十评》怎么样，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的那个纲领草案怎么样。我回答说，正在起草。《十评》比较难，纲领也比较难，牵

涉的问题比较多。毛主席说，你们反正是蚂蚁啃骨头，要啃，要想办法把这两篇东西搞好。《十评》要准备发表。那个纲领草案要准备跟兄弟党商量，在商量之前，我们要拿出一个草稿来。

小平同志还提出，除了上述两个稿子外，秀才们还在起草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恐怕首先要把复信写出来，因为苏共来信已有一个月了。毛主席也同意先把复信写出来。

第二节 急于采取“集体措施”

1964年5月20日，我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对我党5月7日信件的复信。签署日期是6月15日，但我们五天后才收到。当时我们正在忙于修改《九评》，毛主席指示对来信可暂不处理。

苏共中央来信主要是谈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来信说，中国党建议推迟召开国际会议，实际上就是拒绝召开国际会议。来信说他们仍然坚持要在短期内召开国际会议和26党的筹备会议。来信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召开26党的筹备会议，认为中方提出的17党是不对的，苏方提出的26党才是对的。他们还把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信中没有说在开见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之前，先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苏共中央来信说：苏共中央再一次建议，召开有26个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1960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苏方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同各兄弟党商定。关于国际会议，苏方建议原则上应该在短期内商定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信中一再说"最短期间内"，表明了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要尽早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集体措施"。

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到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无关的问题提出来的。它没有说召开这两个会议之前举行中苏会谈，更没有把中苏会谈作为召开这两个会议的必不可少的准备步骤。来信只说"苏共中央仍然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中苏两党双边会谈，这个问题由中苏两党随时协商解决"。这里表现了苏共领导的虚伪和狡猾。他们在信中既不敢不提中苏两党会谈，又不愿肯定表示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在5月7日的信中建议明年5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做准备。苏共中央来信既没有提出中苏两党会谈的具体日期，只虚晃一枪说"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又没有提出怎样协商确定这个日期，只说"随时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任何日期"者，没有日期也；"随时协商"者，不要协商也。一句话，就是不要中苏两党会谈。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这样做，违反了许多兄弟党的意愿。当时许多兄弟党都提出，要中苏两党先开会，然后再开筹备会，最后再召开各国党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越南劳动党在4月21日给各兄弟党一封信说，为了准备召开国际会议，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恢复中苏两党会谈，以便取得一致并共同准备兄弟党预备会议的内容。第二，举行有若干兄弟党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讨论和充分准备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越南劳动党还在它的中央刊物《学习》杂志6月号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在准备分裂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明确宣布，谁也无权把13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社论还说谁也无权在他认为对他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下令公开论战，而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就停止公开论战。这篇社论表示，必须在各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任何人和任何党都无权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议。

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6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新、印两党一致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国际会议应当通过双边会谈，解决有关各党的意见分歧，做出适当的准备之后再召开，不允许强行召开或者匆促召开这个国际会议 《联合声明》还要求中苏两党恢复会

谈，在会谈之前做充分的准备。苏阿两党也应该举行双边会谈。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5月2日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郑重表示：印尼共产党绝不会宽恕修正主义者。我们要把公开论战看成是一个免费的、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学，从这个公开论战中间学习。

日本共产党政治局6月20日发表声明说，为了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日共原则上赞成举行国际会议，但是坚决反对用那种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做法来举行国际会议。

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很明显地表现他们要强行召开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

6月29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的这封来信。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对这封信要答复，可以逐条驳斥，也可以简单地把它顶回去，指出苏共硬要开会，就是决心要开分裂的国际会议。

毛主席倾向于简单地把它顶回去，不必纠缠，要我们起草复信。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九评》，不为他的来信所干扰。《九评》是重头文章。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还是集中力量批评他的《公开信》。发表《九评》以后，还要准备《十评》，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写文章。我们现在要充分利用公开论战这个时机，彻底揭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毛主席那里开完会，我回到钓鱼台。当时起草班

子都集中在钓鱼台，住在8号楼，已经两年多了。回来后我跟大家商量，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究竟是按毛主席设想那样简单地答复，还是逐条驳斥它。因为苏共中央的这封信里有很多迷惑人的地方，特别是对中间派，所以大家意见还是倾向于逐个问题驳回。我把大家的这个意见打电话告诉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他第二天上午到我们这儿来，和大家一起商量。

第二天(6月30日)上午，小平同志到钓鱼台8号楼，和我们一起商量复信应该怎样写。小平同志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赞成复信要逐个问题驳斥，写得既要讲清道理，又要相当挖苦，说明赫鲁晓夫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他将这个意见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同意后，他要求秀才班子兵分两路，一些人搞《九评》(已见前述)，一些人搞复信。《十评》草稿和纲领草稿可以往后推。

由于《九评》修改花的力量较多，同时中央也考虑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要看看形势再说，因此复信一直没有写好，中央常委也没有讨论。

在《九评》定稿并发表后，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会上周总理谈了他到朝鲜去向金日成通报越南战争形势的情况，同时也带回朝鲜党对当前反修斗争的意见。

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没有参加，他们两位在《九评》定稿以后，都到外地视察去了。所以在会上毛主席要彭真同志通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回京以便商

量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答复。

毛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修改复信稿的意见。他说，我们在复信稿中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八个条件，包括要他们承认错误等等，这样做是否妥当？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正在加剧论战，公开论战停不下来。现在正是论战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提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根本不提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求他同我们发表他们的反华文件、文章一样，发表我们的文章。我们已刊登了他们许多反华文章，彼此对等，他也应当发表我们的答辩。只提这个问题。估计他是不会发表的。但是，我们的复信发出后，估计赫鲁晓夫会非常恼火。因为我们发表《九评》，挖了他的老底。现在我们再把复信发出去，估计他会跳起来。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个沉不住气的人，一触即跳，很可能他会铤而走险。但是，复信定稿以前，要请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回来开会讨论。

周总理在汇报的时候，谈到了朝鲜党中央提出，目前形势很复杂而且很紧急，如果苏共强行召开筹备会议怎么办？可否考虑左派各党在一起交换意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关系比较大。现在要慎重考虑。因为国际会议开不开，筹备会议开不开，还是未知数。苏共现在把中苏两党会谈同筹备会议、国际会议脱钩了。如果不是为着筹备国际会议，那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苏两党不会谈，大家到筹备会议里面去争论。他们拿

出一个纲领草案，我们拿出一个纲领草案，双方对着干，这样的话，估计筹备会议也开不好，也就是说国际会议也开不成。所以这个问题要多考虑考虑，再想想看。

后来毛主席又提出，关于复信的问题，要等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回来商量。从这里看，毛主席的意思不单是考虑到复信的问题，而且还考虑到整个反修斗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方针究竟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加上当时美军侵略越南战争情况又比较紧张，所以他提出，对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要一起充分议论，看怎么处理得当。

7月25日，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已回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彭真、陈毅等有关同志都参加了。在会上，毛主席提出，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大家议论，从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看，现在赫鲁晓夫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是对国际会议什么时候召开，没有确定一个日期，而3月7日来信中曾说要在1964年秋召开，现在则说"在短期内"。二是对召开兄弟党会议的筹备会，也不确定日期，而是说"最短时间内"确定；说要由26党参加，但是又没有说死，而是说最短期间同兄弟党"商量确定"。看来他们是不会同我们商量的，因为他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脱钩了。所以，看来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

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急于这么搞，是因为内部不

稳。现在连米高扬也排挤，把他放在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上，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苏联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为了想稳住一些老年人、老布尔什维克，大概这部分人对他最不满，所以他最近提出要提高养老金，而且还答应普遍提高工资。他想这样来收买人心。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想采取这样那样的办法来稳住他的地位。

至于跟其他兄弟党的关系，大家认为，赫鲁晓夫的处境也比较困难。罗马尼亚跟我们谈了以后，对苏态度比过去强硬。赫鲁晓夫要压他们，但压不下来，也不听罗马尼亚的意见。波兰也表示反抗，东德对苏共也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也跟苏共不完全一样，匈牙利最近对我们的态度看起来也不坏。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面临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危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这两个党，最近也不赞成召开国际会议。以后我们不要再批评意大利党了，不要再批评南斯拉夫了。要尽量多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工作，这样来孤立赫鲁晓夫。我们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击赫鲁晓夫，对其他人一概不问，不仅对其他兄弟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问，这就是首恶必批、胁从不问。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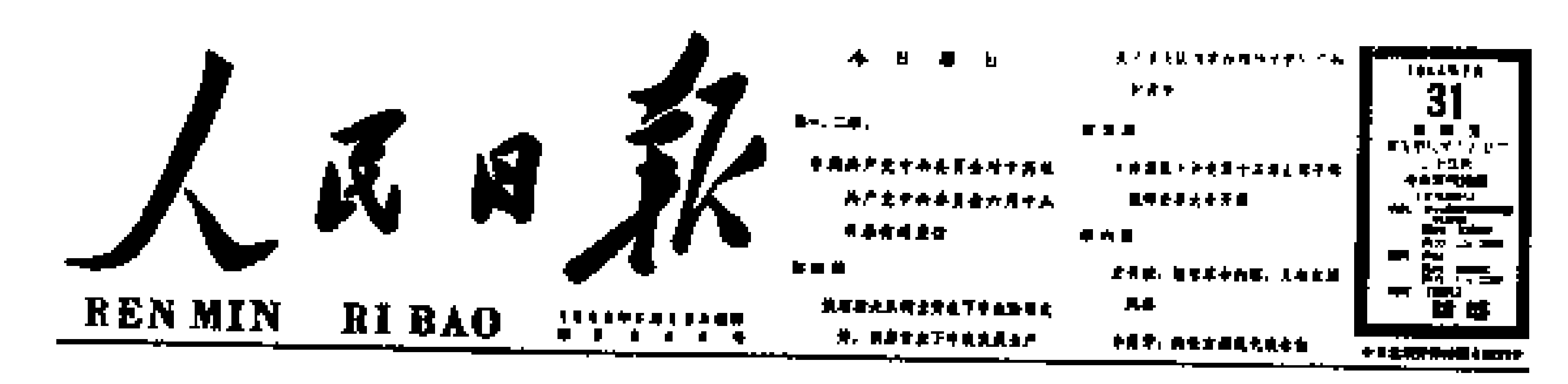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大家议论比较多。有些同志估计赫鲁晓夫可能要开,有些同志觉得他不一定开。毛主席认为,对于国际会议,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但是,估计赫鲁晓夫不敢开,至少最近不敢开,也可能只开筹备会,不开国际会议。我们可以用点儿激将法,让他犯错误,犯下去,犯到底。这样他就更加暴露,更加被动,更加遭到反对,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他。

会议最后讨论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由于这个复信稿谈到的问题过去已讲过多次,毛主席和其他中央常委对这个稿子会前已提过不少意见,并经过多次修改,因此在这次会上只略加修改就定稿。毛主席根据前述激将法的意思,在复信的末尾亲自加了两段话。少奇同志在2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复信,并决定在7月28日晚上广播、7月29日登报。

中共中央这封复信一开头就指出,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对兄弟党各方面的意见根本不理会,硬要开分裂的会议,而且为兄弟党的国际会议规定了修正主义的纲领和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这就暴露了苏共领导已经下定决心,要蛮横地、片面地、非法地筹备和召开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

中共中央的复信以揭露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实质为开头,接着分五个部分来批驳。

第一部分是关于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经过。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四)

(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

1964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苏共中央 1964 年 6 月 15 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和中共中央 7 月 28 日的复信。

因为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说我们要推迟国际会议、放弃国际会议。我们在复信里指出，从1962年春天起，在苏“22大”以后，我们响应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倡议，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以消除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加强团结。我们在1962年4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愿，但苏共中央的答复是拒绝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在1962年冬天五个欧洲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掀起了一个新的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浪潮。

接着，复信指出，为着召开国际会议，1963年夏天，我们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但是在那次会谈并没有缩小分歧，相反的暴露了苏共没有诚意解决分歧。1964年2月底，我们又给苏共中央一封信，就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提出了四项建议，但是苏共不仅没有响应我们的建议，反而从1964年2月起，发动了又一个反华高潮。

复信指出，过去苏共中央拒绝开会，现在又急急忙忙要开会。真正180度转弯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中央。这说明苏共中央主张匆匆忙忙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开一个分裂的会议。

第二部分是关于苏共中央6月15日信里提出的政治纲领问题。复信指出，来信提出的政治纲领，仍然是“20大”、“22大”路线的继续，而且还坚持要把这个路线强加给国际会议。复信指出，苏方坚持这个路线就是坚

持修正主义的路线。根据这样一个路线来开会，只能进一步说明苏共是决心要开一个分裂的会，不是要开一个团结的会。

第三部分是评论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为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部署。

复信指出，苏共中央来信要召开筹备会议，而且坚持要由26个党的代表组成这个筹备会，是没有道理的。26个党的起草委员会是起草1960年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其成员没有世袭权，并不是每次国际会议的文件都得由它来起草。所以参加将要召开的国际会议的筹备会的成员，一定要由兄弟党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才能够开会，否则就是非法的。

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复信指出，你们过去一贯说为着召开国际会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解决分歧是一个必要的准备步骤。你们今年3月7日的来信也是这样说的。而你们这次6月15日来信却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分割开来了。你们这样做，分明是不把中苏两党会谈作为筹备国际会议的一个步骤，而是把它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你们的计划是不等中苏两党会谈取得一致意见，就匆忙召开筹备会，这更说明苏共领导是决心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

关于参加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成员问题，复信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说，参加1957年和1960年兄弟党会议的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没有

参加那两次会议的党就不能参加。而从那个时候以来，许多国家的兄弟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里究竟哪个共产党或工人党有权参加，哪个党无权参加，这就成为疑问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取得一致意见，剥夺那些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参加，那就是要开分裂的会议。

关于苏共中央来信认为它有权召集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指出，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引用了1957年兄弟党会议的内部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硬说苏共负有召集会议的特殊责任。苏共对1957年决议做这样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由苏共负责召集兄弟党会议的意见做这样的解释，都完全错了。因为那次会议的内部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句话说明，召集会议一定要同各兄弟党协商，经过协商才能够召开，不经过协商就不能召开。协商是召开会议的条件。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也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一致为前提的。如果苏共领导胆敢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那么苏共领导就根本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如果强行召集，那是完全非法的。

第四部分是关于那些重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或者小组参加国际会议的问题。中共中央复信指出，苏共领导无权把他们排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也没有

权利排挤他们参加国际会议。复信还指出，苏共领导正在对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干涉和颠覆活动，特别指出他们支持日共的叛徒志贺和铃木颠覆日本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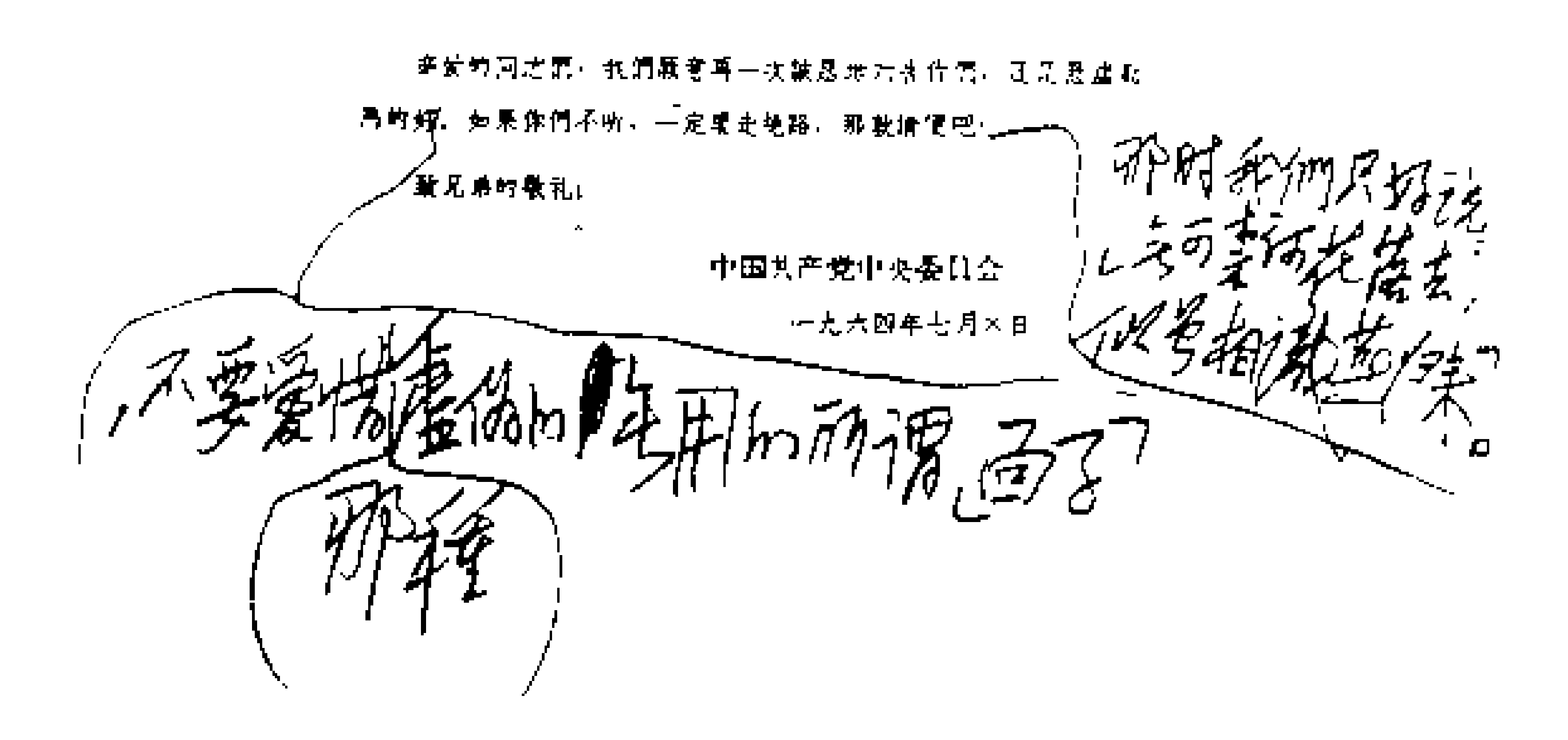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的复信还指出，苏共特别攻击那些同苏共进行公开论战、揭露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尤其是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复信质问苏共领导，你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对于你们发表那么多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怎么能够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剥夺我们答复的权利呢？你们说你们不发表我们的材料，是为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你们发表那么多文章、材料，恶毒地攻击、咒骂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这难道不是破坏中苏友谊，而是维护中苏友谊吗？你们老说你们正确，说时间会证明你们正确、我们错误。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你们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为什么匆匆忙忙地要召开国际会议呢？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时间来证明我们的路线错误而你们的路线正确，这岂不很好吗？复信说，说穿了，时间不在你们方面，你们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形势逼人，你们的来信，理不直，气不壮，色厉内荏，胆小如鼠，正好反映了你们的心理状态。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又能怪谁呢？

中共中央在复信的第五部分，正式重申我们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意见。复信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中国共产党庄严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严正警告，一定要非法地、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那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公开分裂。

在这封复信的末尾，毛主席加了两段话，这两段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献忠告于你们，这不是[illegible]的话。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

不要爱惜那种陈用的所谓"面子"

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致兄弟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

1964年7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手迹。

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封复信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特别是加了最后那么两段话，嬉笑怒骂，自成文章，的确是大大地挖苦了赫鲁晓夫。

第三节 赫鲁晓夫孤注一掷

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这个人一触即跳。果然是这样。我们7月28日发出的信，只隔了两天，7月30日，他就复信了。在这封信里，苏共领导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劝告，而且下了死命令召开筹备会。信里说，苏共中央邀请26个共产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这里所说的26个党，就是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由26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这就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也不跟其他兄弟党协商，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了。

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还说，"如果起草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能在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投入工作，那无疑是符合共同的愿望的。但是我们认为，即使26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这段话的意思是，都得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筹备会开定了。有人不到，比方说你中国共产党

的代表不到，或者其他党的代表不到，他也要开，而且把开会的日期定死在12月15日，到那天非开不可。赫鲁晓夫在这里把文章做绝了。

苏共中央7月30日的来信还说："只要起草委员会制订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以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这方面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所有81个党的代表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这一个或那一个党拒绝参加集体工作，都不能成为再行拖延实行业已成熟的措施的理由，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就在于制订加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途径和方法。"

这段话的意思是，国际会议在1965年年中非开不可，不管这个党或者那个党拒绝参加，都不能成为拖延召开国际会议的理由。也就是说，国际会议将不顾这个党或那个党不参加都要召开。而且在召开的时候要采取措施，采取措施的目的，据说是"制订加强……团结的途径和方法"。意思就是要像苏共二月全会决议里所说的要采取所谓"集体措施"，似乎要像过去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那样，或者像不久前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开除阿尔巴尼亚那样，开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这样一封来信，说明赫鲁晓夫是下定决心，要开分裂会议，时间定死了，参加会议者也定死了。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使形势急转直下。

苏共中央7月30日的这封信，我们是在北戴河看到的。中共中央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发出以后，我们到北戴河去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在那里。

我们看到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以后两天，8月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小平、彭真等同志开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未到北戴河，刘准备南下广州修改《后十条》，周准备住院做手术），讨论这封信。毛主席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28日发出的信，他30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当时大家认为，赫鲁晓夫这样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原先我们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估计到他会这么快。这可能是他有一种什么样的需要，非要这么急急忙忙开会不可。小平同志说，如果讲需要的话，那就是说赫鲁晓夫遇到的困难熬不住了，想用开会的办法，吆喝一班人马，来为他吹捧，稳住他的阵脚。只能是出于这么一个需要。彭真同志认为，苏共二月会议就预示赫鲁晓夫要走绝路。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大动干戈，召开有6000人参加的中央全会，而且做出决议，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还事先给兄弟党写信，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其后的一些来信，无非是做舆论准备，无非是想骗我们，想欺骗世界

舆论，想把分裂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既提出积极的建议，又提出缓开国际会议。越是这样，他越着急，故而急急忙忙要开国际会议。这样一来，他自己背上了一个大包袱。

过了两天，8 月 6 日，毛主席又召开会议，也是谈这个问题。毛主席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

接着，毛主席对我说，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纲领草案不搞了。既然没有中苏会谈，又不参加筹备会，更不待说国际会议，还要什么纲领草案呢？

在这次会上，还议论到我们国庆 15 周年时要不要邀请外宾的问题。原先中央是不准备请左派兄弟党来参加的。后来阿尔巴尼亚建议，左派各党要利用这个机会碰碰头、交换意见。大家认为，现在看来，不要请大批左派兄弟党来参加，因为他们的负责人不可能都来，大家事情都很多、很忙。有些兄弟党的代表来参加庆祝国庆，也不要开会商量。在苏共召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不走第一步。因为如果我们左派党在苏共的分裂会议之前在一起开会，就给苏共一个借口，他们就会说，你们可以开会，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开，好像他们有理由开了。所以我们在

国庆的时候不宜大请左派，更不要开左派党的会，只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也请苏联派代表来，只是惯常的外交礼节，只参加庆祝我们的国庆，不开会，也不争论。

几天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从朝鲜回国时，路过中国，到了北戴河。13日毛主席会见了他。在谈话中，黎笋告诉我们，朝鲜劳动党也接到苏共的信，他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拒绝参加这个筹备会。黎笋还说，他已跟国内商量好，在朝鲜党发表声明之后，越南劳动党也发表声明，也拒绝参加26党的筹备会。当时毛主席对黎笋说，等你们两家发表声明以后，我们也发表声明，支持你们两家拒绝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

8月15日，毛主席又在半山腰上他住的那间宽敞的平房里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谈了同黎笋会谈的情况，并且说，我们要发表声明，支持他们两党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

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最好把我们这样一个立场通报有关的左派党，比如日共、新西兰党、澳大利亚党、印度尼西亚党和亚洲其他一些党。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政治局正式讨论一下再决定，现在还不忙，等到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正式做决定。

会上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7月30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

隔了几天，在8月19日毛主席又召开会议，再次讨

论不参加苏共召集的筹备会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我们也决不参加，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后退。

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已接到日共的来信，他们征求我们是否参加筹备会的意见。他们说他们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参加，想知道我们的态度。从日共的来信看，他们似乎倾向于参加到里面去进行斗争。因为过去我们退出情报局在布拉格办的那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以后，日共还留在那里进行斗争。所以这次他们也考虑这么办，参加进去斗争。

由于有日共的这封来信，所以8月19日的会议确定：我党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即使只有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党也坚持不参加的方针，会议同时决定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日共。至于他们是否参加，请他们自行决定。毛主席说，我党采取这样坚决的立场，可以使左派兄弟党更加坚定。若欲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修改了对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的复信稿。毛主席召开会议定稿后，又由少奇同志于8月29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主要讨论《后十条》修改稿）。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采取这样的立场，拒绝参加苏共强行召集的、片面的、非法的26党筹备会，并通过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这封复信是8月30日发出的。复信比较简单。复信指出，苏共领导一直想要开分裂会议，以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想开就开，根本不考虑许多兄弟党反对匆忙开会的意见，彻底破坏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复信郑重重申中共中央今年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的立场，即："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庄严声明，我们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你们片面决定在今年12月召开起草委员会，明年年中召开国际会议，你们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后果。"

复信最后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善自抉择。"

第四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党中央在8月3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里，已经明白地宣布我们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绝不参加这个会议，也绝不参加它的筹备会，态度明确坚

定。当时中苏关系实际上已陷于僵局。

在这封复信发出以后不久，毛主席要离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临走之前，他在住所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上，毛主席提出要继续发表反修文章。毛主席说，我们7月14日发表了《九评》，从这以后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他问我原来计划要写的《十评》准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十评》正在准备，主要是讲中苏关系，包括边界问题，但是边界问题准备写专门文章来谈，《十评》中只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细节不谈。毛主席说，要继续准备，在我们发表《十评》之前，可以陆续发表左派兄弟党的反修的文章。

在这次常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召开国际会议。毛主席提出，苏共定在12月召开筹备会议，是让它开成好，还是开不成好？有些同志觉得，要使他们开不成，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反对开会。毛主席说，依我看，还是要他们开成好，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么一张王牌，经常用来吓唬我们，那个会议一开，他们手里就没什么牌了。

会上也谈到左派各兄弟党的态度，大家分析了各党的情况：朝鲜、越南跟我们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苏共召开兄弟党会议。越南党提出，中苏两党先开会，为国际会议做准备，这是召开国际会议的必要前提。他们拿这个来抵挡苏共召开国际会议。朝鲜党的态度是准备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苏共承认错误才能开会，如果不承认错

误,朝鲜党就不参加。

据中央联络部同志跟日本党的同志接触,了解到日共是反对开国际会议的。现在他们党中央准备正式答复苏共 7 月 30 日的信,也准备提出条件。如果苏共不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就不参加。据说,他们提的条件之一是,苏共要承认支持春日庄次郎和志贺义雄在日共内部搞分裂活动是错误的。春日庄次郎和志贺义雄两人原来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苏共支持他们在日本党内搞分裂,反对野坂和宫本。

印尼党的态度也比较鲜明。据印尼共的同志说,他们党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提出要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不能开分裂的会。要苏共同中共先商量好,要同有分歧的党先商量好(意思是要苏共同阿尔巴尼亚党先商量好),然后再来开会。

阿尔巴尼亚党的态度是根本不理会这个会议,更谈不上参加。

毛主席指出,大概现在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这几个党反对苏共召开国际会议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新西兰党,一共有七个党。还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赞成开会。据说,陶里亚蒂为这件事情专门到苏联去。当然他身体也不好,要在苏联克里米亚休养。他先是跟苏联中央的一些同志会谈,是跟苏斯洛夫还是谁,不大清楚。他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后来他说他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谈

话提纲。这个提纲后来发表时叫做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意大利党的意见是不赞成开会。大概一方面因为这个事情跟苏方吵得很厉害，一方面身体也不大好，陶里亚蒂很快在苏联去世了。现在意大利党还是坚持陶里亚蒂的方针，不赞成开会。这就引起了西欧一些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陶里亚蒂在西欧的影响比较大。北欧一些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动摇，不那么坚决反对，但是也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团结的会。欧洲党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这可以使赫鲁晓夫在决定是否开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

毛主席说，我的意见还是让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好，那样他最后一张牌就打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牌好打了。因为开会无非是开除中国党，像斯大林主持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那样，这是公开分裂，责任完全由赫鲁晓夫承担。现在中苏关系陷于僵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形式上的团结，但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距离分裂只隔一层纸。我们的方针就是让赫鲁晓夫自己去戳穿这层纸。

这次常委会议上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我们国庆15周年庆典是否按照过去的规矩，即逢五逢十庆祝活动热闹一些，请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来参加，也请亚洲、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说，考虑到现在公开论战吵得这么厉害，是否请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来参加

值得考虑。如果大家到北京来大吵一通，也不是个办法。后来周总理（他住院做手术，刚出院不久）提出，可以考虑都请，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来，也请一些亚洲、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兄弟党，能够来的也可以请他们派人来，但不一定都是第一把手。开庆祝会的形式，就是我们自己讲话，其他兄弟国家发来贺词、贺电，我们在报上发表。在庆祝大会上，所有外国人都不讲话，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会上吵起来。毛主席说，看来可以这么办，大家再考虑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按惯例，逢五逢十是大庆，今年因为有公开论战这么一个因素，是不是还照样大事庆祝，可以再研究一下。

接着周总理还谈到，因为今年是国庆15周年，专门委员会（即负责研制核武器的委员会）已认真讨论，准备争取在国庆节前或者国庆节后，爆炸一个核装置，就是首次核试验。技术上的准备已经完成，什么时候爆炸，这决定于气候的因素。总理说，虽然这个核装置不大，但是一旦爆炸，就说明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自己会做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能爆炸核装置的国家。这可以让大家高兴高兴。这也向全世界显示：尽管苏联不给我们样品，把专家撤走，把资料、图纸拿走，但是我们还是自力更生搞出来了。这对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示威。

总理问：是不是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实现爆炸？当时大家认为，能够在国庆前后爆炸最好。毛主席说，主要看

准备情况，不要勉强，要一切都准备好，万无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抢时间，宁可在国庆节之后，甚至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

在9月间，在国庆节前，我们报纸上陆续发表左派兄弟党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的一些文件和文章。其中有新西兰共产党书记处重申他们反对苏共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的声明；也有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发表的演说，他不赞成开会，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开会是不会成功的；还有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的社论。

朝鲜《劳动新闻》的这个社论明确地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条件。这篇社论实际上是朝鲜劳动党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内容，不过阐述得更详细一些。

朝鲜《劳动新闻》社论对召开国际会议提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在召开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之前，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为召开这次会议造成必要的气氛，其中包括那些坚持错误观点、背离列宁主义原则和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党，要大胆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过分裂活动的人，应该

虚心接受兄弟党的忠告，对自己的错误大胆地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今天的论战已经在敌人面前公开进行的条件下，更无需害怕承认错误，而且也不可能遮遮掩掩地蒙混过去。

第二个条件，不应当允许某一个党将自己的立场预先片面地强加给兄弟党会议的这种行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不能够成为接受和承认某一个党的政策的场所，不能成为谴责、审判和制裁某些党的场所。所有兄弟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赋予的特权地位。

社论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要想使国际会议筹备会能够为团结利益服务，首先必须经过所有党的协商，以便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组成筹备委员会。任何一个党都无权不经所有兄弟党的同意，擅自指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更不能把它强加给别的党。

第四个条件是，国际会议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严格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召集。急于召开国际会议的那些人说，在他们任意指定的所谓起草委员会成员的 26 个党中，即使有些党不派出自己的代表，会议还是要开。他们甚至威胁说，不参加会议的党将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按：朝报社论的这些话，是针对苏共 7 月 30 日的那封信，只是没有指名“苏共”，而用“那些人”来代替。）接着社论驳斥这种主张说，事实上这只能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不会

是任何别的东西。一方面说要聚在一起解决分歧,另一面又说即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党不参加,会议还是要开。这是根本不讲道理的。这里找不到对团结的任何愿望。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的这篇社论的确是很尖锐的。

我们还转载了日共中央8月26日对苏共中央4月18日信的复信。日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很长,是《赤旗报》在9月2日发表的。这封复信除驳斥苏共要召开国际会议,严厉谴责苏共分裂日本共产党、搞颠覆活动外,还着重在有关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批驳了苏共的错误观点。

我们还发表了日本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引用了1960年81党会议《莫斯科声明》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斗争中的共同行动。"这段话就是强调要协商一致。日共和印尼共的《联合声明》说,只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真正以国际共产主义团结为目标,同时在进行协商以达到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准备并加以实现,从而为团结服务,并保证团结,这样才能做到以上保证。《联合声明》还说,双方强调如下的一致意见:召开这一次国际会议的结果,应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不应该进

一步加深分歧，也不应该导致分裂。

以上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兄弟党的文件和文章，都是反对赫鲁晓夫召开分裂会议，提出召开国际会议必须要以协商一致为前提，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防止分裂为目标。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转载左派兄弟党反对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的这些文章，陆陆续续的一直到9月中旬。

这时中央认为，国庆节快到了，邀请的外国客人也陆续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暂不发表我们自己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也暂不转载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我们的报刊和广播从9月15日起暂停发表这类文章。

以上情况表明，当时反对召开国际会议的意见，包括像陶里亚蒂在去世之前写的备忘录中的意见，是相当强烈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召开国际会议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我国国庆15周年的时候，一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外国贵宾，来北京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其中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了代表，一些兄弟党也派了代表，民族主义国家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刚果（布拉柴维尔）共和国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代巴都来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代表默勒阿布杜拉亲王也来了。

从我国领导人会见西哈努克、刚果(布)总统、马里总统和非洲、拉丁美洲学生代表团的情况看,他们的反帝情绪都非常激昂,他们对中国的友好、钦佩之情令人十分感动。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青年学生代表,他们讲话非常坦率,不仅对我国人民表示敬意,而且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同帝国主义勾结、要民族独立运动服从于他跟美国搞大国外交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因为我们通知时告诉他们,我们是例行的纪念,可以不派第一把手来,可以不派最高的负责人来,所以他们代表团领头的都不是最高负责人。朝鲜是由委员长崔庸健当团长,越南是由范文同总理当团长,阿尔巴尼亚是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团长,罗马尼亚是毛雷尔当团长。毛主席分别同他们会谈。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毛主席同毛雷尔和巴卢库的谈话。

10月8日,毛主席会见了以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毛雷尔在上一次中罗两党会谈时,曾极力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而这次他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他谈到,他这次来华时,路过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辩论了五个钟头。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开国际会议,坚持要在12月开筹备会。毛雷尔说,他们代表团到北京以后,跟朝鲜、越南和波兰代表团都谈了话,都谈得不错。毛雷尔说,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的谈话比较困难,德国党的同志劝我们参加12月的26党会议,结果吵了起来。

毛主席说，跟德国同志可以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谈，跟他们争吵不好。乌布利希处在第一线，对面是西德，东柏林的对面就是西柏林，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苏联要跟西德谈判，乌布利希不高兴。我们应该支持乌布利希。

接着，毛主席谈到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毛主席认为，现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硬要26国党的代表在12月15日以前报到，这种事情简直是以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了。我们说，你开吧，我们不到，会议是非法的。毛雷尔说，我们党已经通知苏共，路过莫斯科也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不参加12月15日的会议。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软体动物，许多人起来反对他，他会软下来的。几次都是这样子。1960年莫斯科会议就是这样子。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波德纳拉希说，赫鲁晓夫也会蛮干的。如果有可能他就要干下去的，只有实在做不到的时候他才不干。毛主席说，你这个说法也对，他也有这一面，蛮干的一面。比方说，我们劝他不要公开论战，他不听，他说这是"列宁的方法"，他硬干了，公开论战了。我们不知道劝了他多少次，他不听，还是干，还是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利。你看，现在适得其反，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在谈话过程中，少奇同志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要看他有时候那么强硬，但实际上他不要面子也会下台阶的。比如过去的柏林危机就是这样子，他硬是不顾面子，完全屈服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又比如1962

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也是这样子，他硬是完全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撤出导弹武器时让美国人上船检查。再比如过去对波兰，苏方要搞武装干涉，哥穆尔卡顶住了，我们也表示反对，结果他不要面子也下台阶了。所以，对这个人给不得他面子，给了他面子，他会反过来整你。比如对苏共“20大”，我们为着照顾他，在1957年、1960年两次用同样的措词写在兄弟党会议的文件上。这算给他面子了吧。好，结果他就拿这个来整我们，说你们过去赞成，为什么现在又反对呢。其实，我们赞成的时候是有保留的。我们说明，这只是为着照顾，本来我们是不同意的。为了照顾他，我们给他一点面子，他反过来拿这来整我们。所以这个人是给不得他面子的。

毛雷尔还谈了他们党怎么样坚决地顶着赫鲁晓夫压力的一些情况，如反对把经互会搞成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毛主席说，这一点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经互会要改组才行。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是在10月9日进行的。在谈话中间，毛主席谈到，赫鲁晓夫这个人，这几年来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远了。从1960年开始是很凶的，特别是在“22大”上，那是达到顶峰了。他在那次大会上公开攻击你们阿尔巴尼亚，发动了公开论战，这是他的顶点。“22大”以后，他就走下坡路了。虽然现在还有几十个党跟他走，但他们内部不一致，四分五裂。

毛主席说，反动的国家、党派和集团，他们内部的矛盾会导致他们垮台的。他说，第二次大战前，比如希特勒，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墨索里尼，他们和英、美、法这三个帝国主义之间，是矛盾重重的。他们都大喊大叫反苏，但最后他们先打谁呢？是不是先打苏联呢？当然，希特勒是打了苏联，意大利也跟着打了苏联，但是他们首先打的是英国和法国，日本首先打的是美国。这三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垮台了。所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以导致它们之间打仗，可以导致一批帝国主义垮台。

毛主席说，依我看，赫鲁晓夫的情况也不妙。他要12月开筹备会，可能开成，也可能开不成，但是两种可能对赫鲁晓夫来讲，都是灾难。开不成当然脸上无光，讲了话不算数，这当然是灾难了。如果他开成了，依我看，这个灾难更大一些。12月会议开成之日，就是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时。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就是等他开，激他开，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集体措施"呀，断交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呀，以至出兵呀。让他把所有法宝都抛出来，那时他就跌到沟底里去了，垮台了。当然，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自

己一步步地走向坟墓。

在国庆节前后，从9月15日起，到10月10日，我们暂停发表反修文章。国庆节过后，外宾都走了，中央决定从10月11日起继续发表反修的文章。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毛主席还交待，要我们赶快准备《十评》，还要发表其他的反修文章。

根据中央的决定，从10月11日起，我们开始继续发表左派兄弟党反修的文章和评论，并在前一天（10月10日）晚上，开始在对外广播电台（当时称"北京电台"，用三四十种外语广播）重新继续广播《九评》。

《人民日报》在10月11日发表了秘鲁共产党政治委员会的声明。这个声明批评苏共领导拒绝耐心准备世界共产党会议，还批评了苏共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破坏《莫斯科声明》，擅自决定召开国际会议，擅自决定由哪些党参加筹备会，而且定出日期。声明说，不能允许这种老子党对儿子党的作风存在。并且宣布：秘鲁共产党不参加苏共领导召集的分裂会议。同一天，我们还发表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苏共召开分裂会议的声明。

第二天（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印尼共产党和锡兰党的《联合声明》，声明要求对国际会议要做充分准备，要达到协商一致，反对召开导致分裂的国际会议。

同一天，还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这封信说，苏共赫鲁晓夫集团擅自非法召开国

际会议,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决定不答复苏共赫鲁晓夫集团 7 月 30 日的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这封公开信很长,历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罪行。

10 月 13 日,我们又发表了日共《赤旗报》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的社论。社论说至少要有参加 1960 年 81 党会议的所有兄弟党同意,才能够为召开国际会议进行筹备工作。

10 月 15 日,我们还发表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所有共产党反对召开分裂会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我们在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遇到的困难已达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没有预料到他已经处在垮台的边缘。但是,从越来越多的兄弟党发表正式声明和文章,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看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第十六章

赫鲁晓夫下台

第一节　初步分析

1964 年 10 月 14 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要求紧急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向少奇同志请示，由谁会见契尔沃年科。按照过去的老规矩，由中央联络部一位副部长去见他就行了。少奇同志确定由伍修权同志见他。

因为是深夜，伍修权同志在他家里的会客室会见了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见到伍修权的时候，劈头就说，他接到苏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知：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

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伍修权同志会见契尔沃年科后,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尚昆同志。尚昆同志直接报告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第二天一清早,中央办公厅把这个情况通报所有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据当时西方报刊、电台传出的消息说,赫鲁晓夫是先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罢免的。苏共主席团会议是从10月12日开到14日上午。会议参加者指责赫鲁晓夫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要求赫鲁晓夫自己提出辞职。开始,赫鲁晓夫不答应,一直到最后,在14日上午才答应。其实这个时候,苏共主席团已经通知在莫斯科和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到莫斯科来开会,并且把主席团开会的结果都告诉了他们。

10月14日下午,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开会,由勃列日涅夫主持,苏斯洛夫作报告。报告完了以后也没有讨论,就匆匆忙忙地通过了一个决议。它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天(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开会,由米高扬主持,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公报

是这样说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这两件事情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4日先后决定的，当时没有发表公报，16日才公布。

也凑巧，我国第一个核装置也在10月16日试爆成功。我国政府当天晚上发表声明，同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一同刊登在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当时许多人都争相传说，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

其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周总理经中央批准下令在16日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周在14日下午紧急通知我、乔冠华和姚溱三人，晚上到他惯常住的钓鱼台6号楼去起草文件。

14日晚饭后，我们三个人到6号楼去。周总理对我们说，现在叫你们来，是要起草一个关于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我们决定何时爆炸原子弹（准确说应叫做原子装置）主要是要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预报，后天天气比较好，爆炸大致不成问题，至于几点钟起爆，还要看现场的情况。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就得准备好这两个稿子。

接着，总理概括地介绍在苏联方面撕毁协定、撤回专家之后，我国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经过，着重谈到我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政策。他还交待了声明里要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成就 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新闻公报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同志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

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

接见参加演出《东方红》的全体人员

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和少年儿童热烈欢呼"万岁，万岁，毛主席"

我国领导人致电苏联领导人

祝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任新职

招待我国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1版同时刊登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电贺勃列日涅夫等就任新职的新闻。

讲几个什么问题，然后就叫我们起草。

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到午夜过后不久，把这两个文件都起草出来了。

总理看了我们起草的稿子以后比较满意，认为只做个别文字修改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他对我们说，你们秀才真是快手，现在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我家乡的双黄蛋煮挂面。总理说，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特产，一个蛋两个蛋黄。我们现在就是加快研制两弹，一个圆的，就是后天试爆的原子弹，一个是长的，就是导弹，正在研制中。"弹"、"蛋"谐音，所以请你们吃双黄蛋。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苏方宣布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在15日深夜（北京时间是16日清晨）也发表了。于是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

从1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论赫鲁晓夫下台。我列席了这些会议。会议上大家总的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人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破产，在苏联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如此。他这次下台，究竟是国内因素大一些，还是国外因素大一些，现在还不清楚。

会议中大家谈到，从苏联国内方面来讲，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是破产了，结果使中亚、哈萨克一带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已经连续两年发生沙暴，大风卷起沙土，不见天日，白天也像黄昏一样。赫鲁晓夫大种玉米政策也破产

了。他把提倡种玉米吹得神乎其神，说玉米怎么怎么好，不问情况要全国各地普遍种玉米，结果很多地区玉米收成很低，因为那些地方不适合种玉米，如果种其他东西，比如燕麦、大麦，甚至小麦，收成还会好一些。但是他要求普遍种玉米，一刀切，下死命令，要全国各地按规定的指标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结果也失败了。还有，在农村中采取许多错误的做法导致农村供应城市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特别是大城市的供应进一步恶化，引起人民群众广泛不满。

大家还谈到，赫鲁晓夫实行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农业党的做法，实在可笑。毛主席说，工业和农业相互关联，密切不可分，搞工业和搞农业必须互相协同，怎么能一个党委管工业，一个党委管农业呢！

大家议论说，所有这些，都是来源于赫鲁晓夫的所谓加快进入共产主义。他要在 12 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为进入共产主义打下物质基础。后来他又说，15 年赶上美国以后，苏联就进入共产主义了。赫鲁晓夫这个人说话是没准的。他要加快建设速度，要改变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所以出了好些坏主意。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 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不过到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注意纠正，虽然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从 1961 年到 1962 年基本上纠过来了。到今年底，我们就可以结束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缓过气来了。

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但他们的错误没有纠正，没有调整。再加上赫鲁晓夫任人唯亲、作风霸道，什么集体领导形同虚设。他批评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实际上他也在搞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个人说了算，而且一下这样说，一下那样说，以致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无所适从，昏头转向。

大家认为，从上面这些方面看，加上赫鲁晓夫作风粗暴，独断专横，有成绩功归自己，有错误委过于人。重大问题决策草率、随心所欲、说话随意性很大，这也是导致他垮台的重要的国内原因。

会议上又议论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大家指出，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非常严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实质上是要全世界各个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都服从于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心是美苏合作。这一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做得非常恶劣，引起了亚、非、拉代表们很大的反感。特别是公开论战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揭穿了，大家更加不满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加突出。他以老子党自居，要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棒，肆意干涉别党别国内政，甚至搞颠覆活动，经济上也要别国成为附庸。

赫鲁晓夫眼中只有美国，他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中，都表现出对美国先是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后来又采取投降主义的方针。在许

多重要问题上，他一心一意要讨好美国，作无原则的迁就。这些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

大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22大”起，发动公开论战。开始时许多党跟着他跑，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我们。后来，从直接反阿尔巴尼亚、间接反中国，发展到直接反中国，苏共中央1963年7月间发表的《公开信》是一个标志。赫鲁晓夫从此就处于被动的地位，我们放手地转入反攻。毛主席说，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真正取得主动，要怎样批评他就怎样批评他。因为他先发动公开论战，这给予我们反批评的权利，给予我们进行公开论战的自由，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可以把积压了很久的问题摆出来，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这使赫鲁晓夫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

大家觉得，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以来，我们发表的九篇评论这个《公开信》的文章，写得都不错，都打中了要害。特别是7月14日发表的《九评》，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

在会上有些同志说，半年以前毛主席就讲到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这个预见现在证实了。3月间毛主席在他家里开会的时候，就谈到赫鲁晓夫可能被政变推翻。当时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急于召开国际会议就是出于一种需要。他因为对中国施加压力无效，不能把中国压服，于是就想出要采取最后一手，像过去斯大林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像他对付阿尔巴尼亚那样，召开他一手操纵的国

际会议，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大家谈到，最近苏共来信指定12月15日要开国际会议的筹备会，即使有些党不出席，这个会也要开。毛主席说，这说明他是想打最后一张牌了。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限期开会，并不说明他强大、不可一世，相反的只能说明他虚弱、没有别的办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苏联国内，对他这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同中国和其他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公开论战中所采取的错误决策、错误做法，引起了一系列恶果，当然很不满。所以他狗急跳墙，急于开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在几次会上，大家对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的前景会发生什么变化也提出种种估计。有些同志估计，苏共新领导的做法可能不得不改变一些，有些同志觉得也不一定。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从他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1957年。从1957年到现在，有7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11年了。他搞了11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

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的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有三种可能：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12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第三种可能性是属于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在会上，毛主席还讲到，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15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何，将来究竟会有什么变化。毛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这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

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大家在会上也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对毛主席的分析和提出的静观方针都表示赞成。

当然，采取静观的方针，也不是对这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毫无反应。以中共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名义联合发贺电给勃列日涅夫（他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米高扬（他从7月起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柯西金（他新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国党政领导人联名的贺电，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除对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后来定稿写了两段话。一段是："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另一段话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这段话是比较含蓄的。说"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就是说也包括对赫鲁晓夫被黜是高兴的。接着后面说："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这封贺电表示了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是近几年来没有的。

在会议过程中还决定，现在暂时不发表论战的文章，我们自己不发表，其他兄弟党跟苏共进行论战的，特别是

批判赫鲁晓夫的也不发表。所谓静观，就是包括不采取行动、按兵不动这样一种姿态，这也是对苏联一个友好的表示。因为这个时候再论战、再骂赫鲁晓夫，显然是不合时宜了。过去我们在论战中集中火力对着赫鲁晓夫，只点了他的名字。现在，他垮台了，你还骂就不得人心了。毛主席很有风趣地说，我们过去对国民党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现在对苏共领导集团也是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们在国庆节前，从9月15日起暂停发表反修的文章，到10月10日又重新恢复公开论战，发表反修的文章，从10月10日到现在知道赫鲁晓夫下台，不到一个星期。现在我们又暂停，停下来看一看再说。

在18日的会议上，大家还谈到当天收到的《真理报》10月17日的社论。大家认为，从这个社论里，还看不清苏共领导同赫鲁晓夫在哪些问题上有重大的原则的分歧。这篇社论只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好像就是不搞集体领导，所以他们要反对个人迷信。社论还讲到，赫鲁晓夫在建设中有主观主义，有放任自流，有轻率的结论，有脱离现实的匆促的决定和行动，吹嘘和夸夸其谈，藐视群众实际工作经验，个人决定等等，都是一些空话。社论的末尾还说，要坚决地、彻底地实现苏共所谓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苏共“20大”、“21大”、“22大”的决议和苏共纲领，并且要取得新的成就。这给人印象是路线不变。所以大家说毛主席提出采取静观方针是适宜的。

第二节　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10月27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又在毛主席家里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毛主席一开始便提出，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毛主席说，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纪念日，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毛主席说，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总理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

毛主席说，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

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毛主席说，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党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来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现在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会上大家讨论了毛主席的建议，认为可以做点推动的工作，但没有作出决定，再考虑考虑。

隔了一天，10月29日，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他进一步提出，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还不够。毛主席说，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

毛主席解释说，为什么要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

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周总理也说，我们跟这些兄弟党国家的大使谈，估计朝鲜、越南、罗马尼亚是会赞成的，但是阿尔巴尼亚是否赞成就难说。因为苏联已同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苏联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请不请它很难说，即使请它也可能不去。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民族自尊心很强，估计它不会去。总理说，至于苏联大使，他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表现得非常沉闷。听说他在使馆里面整天愁眉苦脸，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他自己心里也打鼓。估计我们约他见面谈，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是会向苏联国内报告的。

少奇同志、小平同志都赞成这个意见。毛主席要小平同志把这个意见告诉没有参加会议的朱老总和陈云同志，由总理告诉林彪。

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出是不是我们派人直接向金日成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告诉他，听听他有什么意见。会上当场决定由小平同志领头，

加上彭真同志，加上联络部的同志，也指定我参加，跟小平同志一起秘密访问平壤。

中央决定后，小平同志迅速行动，当天晚上就同朝鲜方面联系，第二天（10月30日）早上就飞平壤，下午就同金日成会谈，第二天（10月31日）上午又跟金日成会谈，下午就飞回北京。

我们到达平壤后，住在平壤新建起来的一个最好的宾馆里。跟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领导同志会谈的时候，小平同志先把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对苏共新领导前景的估计（就是前面所讲到的几次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看法），跟他们谈了，然后谈到我们现在要采取的行动，来推动他们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到莫斯科去主要是作一次现场观察。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作一次现场调查研究。金日成同志完全赞成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但是他说他不去，可以派别人去。后来由金一同志率领一个代表团去。

在会见过程中间，金日成同志向我们打听。他说，你们估计他们这几个人中间谁是主动的，谁是主要策划这次倒赫鲁晓夫的？金日成说，虽然中央全会是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后来他又被选为第一书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他主动也值得怀疑。因为1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他才从柏林回来。报告也不是他做的，而是苏斯洛夫做的。那么是不是苏斯洛夫策动的呢？

小平同志说，苏斯洛夫肯定是赞成的，但不会是他一

个人搞起来的。金日成说，据我们的观察，可能是波利扬斯基策动的，他是主席团的成员，也可能是科兹洛夫策动的。小平同志说，据我们在 7 月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的观察，苏斯洛夫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发言时他总是照着稿子念，遇到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是由安德罗波夫（当时是联络部长）给他递条子的。

金日成说，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我们和他有过几次接触，看起来这个人有点木头木脑的，反应很迟钝，而且谈正经事时话也不多。他现在当头，他是不是主要的策动者这也说不准。小平同志说，1960 年莫斯科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勃列日涅夫参加，他不像是一个拿主意的人。我也介绍说，1960 年少奇同志在 81 党会议后访问苏联的时候，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后来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都是勃列日涅夫（他当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陪着。当时我跟随少奇同志访问，一路上观察他对少奇同志好像对待老师那样，当然少奇同志实际上也是比他资格老得多，他对少奇同志是毕恭毕敬的样子，话也不多，表现得不像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权威的人。不过，这也难说得准。他也可能是个两面派的阴谋家，表面一套，心里另一套。

金日成还谈到苏联的国内问题。他说，苏联农业困难很大，工业也搞乱了。听我们留学生回国反映，老百姓都很不满，干部也很不满。金日成还谈到，公开论战以来，苏联搞得很被动，赫鲁晓夫很被动，所以他垮台也是

有原因的。

金日成同志同意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分析，他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外方面的原因。至于变化的可能，金日成说，你们讲的三种可能，看起来中间状态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们也是这样想的，看法差不多。他说，要苏共新领导完全不变，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呢。如果要他们变成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帮人过去是和赫鲁晓夫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一帮子的。所以前两种可能都比较小，后一种可能比较大。

在会见过程中，金日成很赞成中朝两党互通消息、交换情况、交换意见，这样做会合作得更好。他还很称赞小平同志亲自到朝鲜来，向他通报中共中央的意见，并对此表示感谢。

因为这次秘密访问的任务很简单，所以谈了两次以后，10月31日下午我们就飞回北京了。

第二天(11月1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开会。在会上，首先由小平同志向常委汇报访问平壤的情况，介绍了金日成的意见大体上跟我们一致。然后，总理讲了他这两天分别约见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的情况。

总理谈到，因为小平同志去朝鲜，所以就没有再同朝鲜大使谈。先是跟越南大使谈，然后跟罗马尼亚大使谈，他们都非常赞成我们的建议。跟阿尔巴尼亚大使谈的时候，大使表示，他估计国内很难同意，因为苏联已经宣布

跟阿尔巴尼亚断交了。他说，要苏联请我们，估计它也不一定请。即使苏联请了，我们党中央也很难就这样派人去。因为苏联同我们断交了，这笔账不算不行。估计国内不会答应去。但是他答应把我们的意见向国内汇报。

总理说，跟波兰大使谈的时候，大使比较慎重。他说他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也不了解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怎么样。但是，依他个人看，采取步骤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总是好的。估计波兰党中央会认真考虑中共中央的建议的。他答应马上向国内报告。

至于苏联大使，总理说，我是先见苏联大使的。这个人是赫鲁晓夫的亲信，我们的建议好像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想到我们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但是接下来他对我建议反应不热烈，不置可否，打官腔。他说他将向国内报告，国内有答复马上告诉中国党。总理说，在见他的时候，我还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改善，希望目前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希望今后双方都能够做出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友好的努力。但是他没有反应。总理说，跟苏联大使的谈话是在10月29日晚上，后来他在31日上午再次要求见我，说苏共中央已经答复，赞成中国方面的意见，他们将发出邀请。总理说，契尔沃年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板着脸孔，毫无表情。

小平同志和总理谈完以后，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

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毛主席说，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哪些错误。毛主席说，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从这天（11月1日）起，政治局常委一连在毛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除议论“一推二看”的方针外，主要是讨论我代表团到苏联去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在策略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在11月3日的会上，谈到了如果苏共方面提出召开国际会议这个问题怎么办。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坚持原则，反对无准备地、急急忙忙地召开这种非法的、分裂的国际会议。对于召开筹备会议，我们不主动提出要推迟这个会议，也不表示我们坚持要明年5月间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如果他们提出要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时间要另行商定。总之，保持不确定的待机态势，因为估计苏共领导短期内下不了决心。

毛主席说,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既不主动提出,也不确定日期。

毛主席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毛主席说,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他说,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11月4日又开了一次会。这是总理出发前开的最末一次会。

毛主席在会上说,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

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毛主席还谈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继续公开论战。

毛主席还强调说，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

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主席说，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吵起来的呢？是 1958 年 7 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1956 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1959 年，赫鲁晓夫又跟艾森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毛主席说，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 1960 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 1960 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

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毛主席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我记得毛主席讲这一段话时相当慷慨激昂，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

毛主席说，这次总理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是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到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4日开过会以后，周总理在11月5日早上率领代表

团离开北京，到莫斯科去了。代表团成员包括贺老总、康生和联络部的同志。

就在这一天(11 月 5 日)，毛、刘、朱、周四人联名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发了一个祝贺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贺电。贺电的前面是祝贺苏联人民 47 年来取得的成就，希望苏联人民在建设祖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间取得新的胜利，做出新的贡献。贺电的最后一段提出了实质问题。这一段话是："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的团结越巩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兴，我们的敌人就越害怕。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这段话比较强烈地表示了我们的团结的愿望。最后一句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同时，根据 4 日会议的议定，由少奇同志领头，加上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参加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招待会。这也是几年来没有过的友好姿态。

第三节　在莫斯科的观察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5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陆续地到达。

据我们代表团发来的电报说，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东欧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差不多都是党的第一把手领头。保加利亚是日夫科夫，匈牙利是卡达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乌布利希，波兰是哥穆尔卡，蒙古是泽登巴尔，这些都是第一把手。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由第二把手亨德利赫出席，它的第一把手诺沃提尼没有来，留在国内，据说是因为国内要举行大选。罗马尼亚第一把手乔治乌·德治也没有来，而由毛雷尔领头。朝鲜是金一，越南是范文同，古巴是格瓦拉。阿尔巴尼亚拒绝派出代表团。

按照通常的规矩，苏联举行庆祝活动的正式日程，一个是在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11月6日）下午举行庆祝大会，由第一书记作报告；另一个是第二天（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再一个是7日晚上举行盛大招待会。

11月6日下午的庆祝会是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的报告跟过去赫鲁晓夫比较，不算太长。我们新华社在

7日上午陆续收到了由塔斯社发的比较详细的摘要，但还不是全文。我们收到摘要以后，立即陆续翻译并打出清样，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就看到了。

我得到通知，下午3点钟在毛主席那里开会，议论此事。我到达颐年堂西会议厅后，毛主席问我，是不是收到了全文？我回答说，还没有收到全文，但详细的摘要收到了。他又问我，你看这个报告的要点是什么？你向大家说一说．有些同志看了，有些同志还没有看。

我就大体上介绍了一下勃列日涅夫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讲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第二部分是讲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其中提到：用主观主义、随心所欲的决定来代替科学的态度，是必然会产生错误的；还提到最近几年采取一些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步骤也是不对的。

第三部分题目是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讲他们的对外政策，同过去讲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是强调和平共处。但是，在这一部分里，讲到了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他先引用了1960年81党会议《声明》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协商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这一段话是1960

年我们在会议上坚持斗争才写上召开国际会议要协商一致。勃列日涅夫在引了这段话后说，“再一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只说了这么一句，既没有讲召开会议的时间，也没有提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

最后一部分是讲党的问题，讲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其中说到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间要贯彻列宁的原则和准则，要贯彻列宁的集体领导的精神。还讲到：“10月举行的中央全会（按：就是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那次中央全会），是实现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道路上的重要的里程碑。”我说，勃列日涅夫这句话含糊其词，可能是说反对赫鲁晓夫就是跟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样，也可能是说要坚持苏共“20大”的路线。

我还谈到，根据收到的比较详细的摘要看，勃列日涅夫在报告里没有提到“20大”、“21大”、“22大”路线的问题。对“20大”只点了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但是对“21大”、“22大”却采取了一种含糊的说法。他说，我们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

我介绍完了以后，毛主席说，大家可以议论议论，看看这个报告究竟反映了苏共领导什么动向。

小平同志说，我已看了详细的摘要。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刚才介绍的那么几个问题。总的印象是，他的态度

是比较含糊的。我们关心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他的错误，勃列日涅夫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仅仅根据这些，赫鲁晓夫是不应该下台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原先他们自己也参与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不敢直接承认是错误的。这可能是他们的要害。目前的苏共新领导，在赫鲁晓夫掌权时都是同他一起共事的，很多人都是他提拔起来的，要他们在路线上跟赫鲁晓夫划清界线恐怕做不到。

少奇同志比较关心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他说，勃列日涅夫引用 1960 年《声明》里的那段话，是经过我们多次斗争，最后才达成这么一个协议的。这段话是我们跟他们进行斗争的很有力的武器。过去他不提这段话，现在提了。但是他提出“再次召开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这么一个说法，这里只说必要性已经成熟，而不说条件已经成熟。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现在需要开会，条件成熟了；也可以理解为有开会的必要，条件是否成熟，怎么开，他不说。这里面有文章。但可以肯定，他是不放弃召开国际会议的，还是把一把剑悬在我们头上，对我们进行要挟。

其他同志也对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发表意见，比较多的意见还是集中在苏共新领导是不是还是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国际会议是不是还要开这两个问题上。

在讨论过程中，毛主席插了好几次话。他说，现在看到的是报告的摘要，还不是全文，我们要看到全文以

后才能够作最后判断。但是，从这个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他只讲必要性成熟，但没有讲要在 12 月 15 日召开筹备会，当然也没有讲筹备会有哪些人参加，也没有讲苏共过去提出的明年年中要开国际会议，也没有讲中苏两党会谈，这些都没有讲，含糊过去了。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的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

毛主席说，苏共领导现在处于惶惶无主，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还没有明确的、大家一致赞成的意见，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

少奇同志说，1960 年 81 党会议后，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他给我总的印象是，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毛主席说，我们过去讨论过究竟这次倒赫鲁晓夫的

核心人物是谁，现在还搞不清楚，要看代表团在莫斯科现场观察怎么样。当然，人的问题不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主席团这个集体是执行怎么样的路线。看来他们现在惶惶然，六神无主。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么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可不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今天才是第一天。要看看代表团接触、观察的结果怎样，我们再开会议论。

因为晚上少奇同志还要率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所以下午的会议的时间不太长，很快就结束了。

在莫斯科，周总理率领代表团 11 月 6 日参加了苏方举行的庆祝大会，11 月 7 日上午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检阅，11 月 7 日晚上参加了苏联党政举行的招待会。所有被邀请来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外宾，都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苏联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正像我党原来建议的那样，这是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代表团在参加庆祝大会和阅兵式的活动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在 11 月 7 日晚的招待会上却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严重事件。这就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我们贺龙元帅在跟过去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

的英雄、当时的苏联元帅崔可夫等苏联将领聚到一起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插进来对贺老总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很气愤，严肃地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

据当时在场的我们翻译同志说，周围的苏联将领，包括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这样讲很不以为然。崔可夫甚至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老总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衅，马上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当时坐在主宾席上，听了以后，马上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坚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当时勃列日涅夫他们有点吃惊，马上派人去调查。

调查的人回来以后，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总理郑重地对勃列日涅夫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说了他心里的话。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周总理讲话时声音很大，在场的许多人都围过来。

苏方一再解释马利诺夫斯基喝醉酒。周总理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快就退出招待会。

第四节　抗议攻势

11月7日夜，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

11月8日上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报。我到会时看到常委们都坐会议大厅西头的围成圆形的沙发上。

当时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都非常生气，都认为苏共新领导还是搞赫鲁晓夫那一套，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到，苏共新领导内部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崔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两人的对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决心改变赫鲁晓夫的反华方针，要不然，一个国防部长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大家也谈到，如果说这是勃列日涅夫他们指使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可能不会，因为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马上派人去了解，然后说是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说明他们可能事先并不知道，不是有意布置马利诺夫斯基这样做。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这么讲，很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代表一种

思想，就是继续反华的思想。

大家根据以上分析，同意代表团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

毛主席同意大家的意见，同意代表团的请示，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而且要声明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毛主席还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情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小平同志说，我们可以利用此事把问题摆开来讲，说明我们是为团结对敌而去莫斯科的，我们不仅自己派代表团去，而且为着表示我们的诚意，建议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共同庆祝十月革命节，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我们团结一致。而他们竟然对我们采取像对敌人那样的态度，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而且要颠覆我们的领导，这完全颠倒了敌我，破坏团结。

毛主席说，对了，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理，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有人仍然抱有这

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了敌我关系。

毛主席还提出，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筹备会议也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代表团昨天来的电报里还谈到，苏共领导 8 日下午要到我代表团住地来吃午饭，而且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和他们的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将一起来。所以毛主席要小平同志马上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并且要在苏方来吃饭之前发到代表团手里。

毛主席说完后，小平同志当场叫我同他一块到颐年堂会议厅正厅起草电报。其他常委们留在西厅议论。小平同志口授一句大意，我编写一句文字，很快就把给代表团的复电稿起草出来了。然后我用大字誊清了一遍，小平同志再过目时，改了几个字就交给毛主席。

这个电报稿写了这么几点：

第一、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

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

第二，要代表团要抓住这件挑衅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要把这个问题挂起来，要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着重攻他们颠倒敌我关系。

第三，在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不必谈召开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也不必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也不必跟他们多讲，还是坚持我们原来的立场，就是我们有权答辩，还没答复完；除非他们承认错误或者经过协商并取得协议才能停止。

毛主席看完这个电报草稿后，传给少奇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杨尚昆同志等人看了。大家看完以后，毛主席说，我看就这样子吧。然后就交给尚昆同志，用标着 AAAA 的特急电发给代表团。

据代表团后来发回的电报说，他们在 8 日上午（北京和莫斯科的时差为 5 小时）收到中央的电报。所以代表团在同勃列日涅夫他们吃午饭时，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正式提出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对这件事做出正式答复。苏方听了很慌张。勃列日涅夫在同米高扬、柯西金马上商量一会儿之后，一本正经地宣布：他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当时整个宴会气氛很紧张。我们代表团非常气愤，根据中央指示，绝口不提其他问题。苏方也许还想谈别的问题，看到这种气氛也谈不下去了。到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考虑到中央指示电

中要代表团采取攻势，我们有许多话还没有讲，在宴会上也不宜作长篇讲话，于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代表团要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举行正式会谈，并建议9日就谈。苏共方面说，他们要同许多其他兄弟党会谈，9日白天的日程已经排满。后来苏方同意中苏两党代表团在9日晚上会谈。

11月9日晚6时开始，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方参加会谈的只有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苏斯洛夫没有参加。

在会谈中，我代表团抓住马利诺夫斯基这个挑衅事件采取攻势。恩来同志指出：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竟然公开要求颠覆中国党的领导这样严重的事件，苏共领导不能以他酒后失言来解释。恩来同志根据中央来电的精神，批评苏共领导对我党派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一番好意置于不顾，反而要颠覆中国党的领导，把朋友当敌人看待，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勃列日涅夫赶忙辩解，说马利诺夫斯基完全不能代表苏共中央，还说什么马利诺夫斯基是个军人，非常粗鲁，又喝多了酒，如何如何如何。勃列日涅夫他们三个人一再重复这样的话，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十分被动。

恩来同志进而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他在国际上搞“三无世界”、大国沙文主义，对美国既犯投降主义，又犯冒险主义；在国内搞全民党、全民

国家，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等，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这时苏共领导只有招架之势，勃列日涅夫辩解软弱无力。米高扬比较圆滑，他多方进行辩解，并且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柯西金不大说话。倒是当时是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后来受到勃列日涅夫赏识和提拔的安德罗波夫比较活跃，他主要谈了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但是谈过来谈过去只讲召开会议的必要性，对什么时候开、筹备委员会怎么样组成、还要不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都没有提。

这次会谈比较特别，原来在1960年和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中苏共代表团领头的苏斯洛夫一直没有露面。这可能因为他在苏共二月全会上做了反华报告，不好意思露面。据代表团反映，在代表团在莫斯科活动期间，他碰到我们代表团成员时，即使是过去比较熟悉的，他也不理会，好像是没有看见的样子。科兹洛夫、波利扬斯基和波诺马廖夫也都没有出面。

第一次会谈的时间不长，从晚上6时开始谈，到8时左右，苏方提出因为他们已经约好要请别的代表团吃晚饭，希望到此休会，改日再谈。我方提议10日再会谈一次。后来苏方联络的人说，他们10日已安排别的日程，可以在11日再谈一次。

10日上午代表团就把9日晚第一次会谈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同时请示中央，除了前一次指示以外，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

这样，10日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从第一次会谈的总的情况看，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对中国、对开国际会议，今后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好像都还未确定。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对马利诺夫斯基事件，我们代表团一攻，他们赶快道歉。一而再，再而三，但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他们既没有跟我们就实质问题辩论，甚至连中苏两党会谈怎么样、国际会议怎么样，都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从这些情况看，现在苏共领导内部问题很多，还来不及对这些问题统一意见、做出决定。

毛主席说，苏共领导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

毛主席说，看来苏共新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要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未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毛主席说，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1956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来看，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的态度。所以说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接着，大家就议论到苏共领导这次推翻赫鲁晓夫，究竟谁是主要的策动者，一直到现在还不清楚。从现在情况看，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少奇同志说，一个党形成自己的领袖，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考验，才能在斗争中间慢慢形成自己的领袖。列宁经过长期斗争才成为苏共的领袖，斯大林也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些人的斗争中成长为领袖的。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二十年工夫，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领袖的。现在苏联还形成不了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有权威的领袖。

少奇同志还说，我们党的历史也证明，形成一个党内公认的领袖，也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包括同阶级敌人斗、同帝国主义斗、同党内机会主义斗，才能够形成。他说，毛主席是公认的领袖，不是谁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我的确充

分感到毛主席是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在领袖群中间，他是最优秀的，是代表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

毛主席插话说，如果是打仗，可能会快点出人才、出领袖，但现在是和平时期，恐怕不会很快造就一个领袖。

少奇同志说，苏共在和平时期产生不了比较英明的领袖，很可能出来的人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苏联领导集团里面究竟谁代表左派，谁代表中间派，谁代表右派。反正有左、中、右的区别，很可能是比赫鲁晓夫更坏的人出来领头。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那样一来，苏联内部还会再次分裂，甚至分裂多次，不稳定，动乱。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搞了这么些年，是不得人心的，在国内丧失了威信，在国外也不见得有威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帝国主义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又摇尾乞怜，总是那样挺不起腰来，帝国主义也看不起他。斯大林反对帝国主义很坚决，帝国主义看得起他。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经过斗争，左派占了优势，比方说莫洛托夫出来掌舵，这样可能会稳定一个时期。但是，现在人家都叫他是斯大林分子，所以莫洛托夫恐怕也出来不了，而且他年纪也大了，现在有 70 多岁了。

小平同志说，毛主席在上次会上讲到，苏共新领导是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从代表团到莫斯科之后跟他们接触的情况看，到目

前为止，他们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并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不好的表现。很可能他们并不是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是对赫鲁晓夫专横跋扈、个人说了算，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使大家无所适从，因此领导层中对这方面不满多一些，当然还有不满他把农业搞糟了。至于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对帝国主义求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恐怕现在的领导并不反对，因为他们是积极参与了这些事情的。他们很可能就是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没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3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会垮台。我们7月底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牍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

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3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账，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言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8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当时大家提出，如果苏共现在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拒绝。

少奇同志说，一方面不拒绝，一方面又不要具体承担责任。就是说，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地方谈、谈什么问题，要从长计议。因为苏方的方针还没有定，他们究竟对中国怎么样，是继续反华，还是缓和一下，还是改善关系，都没有下决心。当然，我们也不要拒绝，如果拒绝，他们就得理，会说我们连谈都不愿意谈。实际上

这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同他们举行会谈，就是两党会谈了。所以完全拒绝两党会谈不好，人家会说我们一点改善关系的诚意都没有。而且我们也要同前一个时期采取的争取缓和一下的方针保持连续性。

这次常委会时间比较长，议论快到深夜 12 点时，毛主席说现在时间已经很晚，讨论还要继续，要小平先去把会上议论归纳成几条，拟一个给代表团的电报，而且要代表团谈完了就动身回国。毛主席还说，从《参考资料》已经知道，有些兄弟党代表团跟苏共会谈后又发声明，又发公报，又发新闻。据越南同志讲，过去他们临上飞机前，苏共塞给他们一个公报稿子，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照样发表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要告诉代表团，我们要明确地表示，这次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

毛主席说完后，小平同志要我跟他一起在颐年堂正厅的长桌上起草电报。这次也是按老办法，他说，我写，个别地方我请他再斟酌一下，很快就起草好了。这个电报的要点是：

一、要代表团按照原定的方针放手反击。

二、除了攻他们的修正主义外，还要攻他们搞分裂、搞老子党、搞指挥棒、搞颠覆活动。

三、要在会谈中揭露苏联企图用表面上承诺所谓团结，来换取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和肯定 12 月会议合法性的阴谋。

四、坚决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声明我们绝不参加苏方下令在12月召开的筹备会议，这个态度，已在8月30日给苏共的信里讲了，没有更多的话要讲。

五、如果对方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可以表示同意，但是日期和地点另议。对于会谈的时间，既不要说我们过去第一次提出的10月间，也不要说第二次提出的明年5月间，只说另议，并且要苏方提出方案。

六、要质问苏方过去联美反华的路线改变不改变，愿不愿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愿不愿意真正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改变过去那种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如果对方表示愿意团结，愿意一起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口头上做了这样的表示，那我们就回答：你们这样表示，希望得到行动的证明，我们要看你们今后的行动。要把这点明确告诉他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只看他们做什么。

七、要代表团明确对苏方说，这次会谈，不搞什么联合声明，也不搞什么公报，连新闻都不要发表。

八、代表团在莫斯科不宜久留，争取11日结束会谈，随即动身回国。

跟上一次电报一样，起草完以后，小平同志把电报草稿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给大家传看。当时参加会的还有彭真同志、陈老总和刘宁一等，都传看了。

11日晚，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

行第二次会谈。

据代表团报告，在会谈中，周总理根据中央发去的指示电，放手地批评苏共领导，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

周总理立即指出，我们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和好的意愿到莫斯科来的，但是我们遇到你们的挑衅，就是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要颠覆我们党的领导。你们还是以老子党自居，还是搞分裂。你们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在上次会谈中间，你们也表示了友好、团结的愿望，说了那么一些话，但是看起来并没有真心诚意来改变你们过去的反华方针。米高扬说你们同赫鲁晓夫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要继续反华。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那是做不到的。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我们只写了九篇文章，我们还要继续答复你们的《公开信》。至于你们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也要答复。你们报刊上其他反华文章，我们也要答复。除非你们宣布过去搞错了，不算数了，不然，我们有权利答复，有权利发表我们的意见，澄清事实，澄清是非。你们过去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反华，我们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周总理这么长篇发言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们还是希望加强团结，希望增进友好，发展中苏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往，等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在1963年11月给我党中央的那封信里的话。

勃列日涅夫说完后，周总理回答说：你们上次那封信我们已经答复了。有关中苏关系的几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表示了我们的态度。现在我们还是原来的意见，我们没有新的话要讲。从那以后，你们中央开了二月会议，作出反华决议，要对我们采取“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就等着看你们的行动，是否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继续要“坚决反击”，继续要采取“集体措施”。

周总理这样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以后，苏方既没有提两党继续会谈，也没有提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只抽象地表示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为了加强团结、解决分歧。

周总理最后讲了四点意见：

（1）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在十月革命节的贺电和祝词中表达的团结愿望，我们现在仍然坚持不变。

（2）你们提出召开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事先没有经过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是非法的、分裂的会议，我们绝不参加。我们的态度已经在今年8月给苏共中央的信里面作了答复，现在没有新的话要说，只是奉劝你们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

(3) 在你们仍然奉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中苏之间的基本原则分歧没有解决，又没有达成公平协议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利回答你们对我们的攻击，公开论战不能停止。

(4) 关于我们在这儿逗留期间同你们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

这次会谈从晚上 5 时到深夜 11 时半，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11 月 12 日，苏方又要求会谈。勃列日涅夫如约到我党代表团住处，向我党代表团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但没有讲多少具体内容。勃列日涅夫谈到最后，突然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他说他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如果中国方面准备好了，可以举行中苏两国或两党的最高级会议，地点在北京或莫斯科都可以。周总理根据中央指示电，回答他们说，我们代表团将向中共中央报告你们的建议。在我们方面，已经多次表示门是开着的。

我党代表团在逗留莫斯科期间，除同苏方会谈外，还同朝鲜、罗马尼亚、波兰、古巴、民主德国、越南、英国等的代表团会谈，并且在同苏方会谈结束后还将会谈情况分别向朝、越、罗、匈等代表团通报。

第五节 商定对策

11月13日晚上，周总理率领代表团离开莫斯科，14日回到北京。代表团到达北京时，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还有少奇同志、朱老总、董必武同志、小平同志以及党政军的领导人，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到飞机场迎接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代表团在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在飞机旁边，毛主席跟周总理做了短暂交谈以后决定一起到大会堂去谈。我也跟随中央领导同志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这里说的北京厅，不是大会堂现在的北京厅，而是过去的北京厅，就是在大会堂主席台后台南边的一个会议室，当时叫北京厅，现在叫118会议室。现在大会堂开大会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休息。过去毛主席在大会堂召开会议或接见外宾都在这里。

大家到了北京厅以后，一坐下来，周总理就说，这次代表团和苏共第一次、第二次会谈的情况都给中央发了电报，主要的情况就是那样。现在谈谈代表团的观感。

毛主席问周总理：你看苏共新的领导是一个什么东西？

周总理说，看来它本身很虚弱，拿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好像有关外事方面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

见，或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反映他们内部矛盾重重。

周总理说,马利诺夫斯基和崔可夫都是元帅,崔可夫的资格比马利诺夫斯基要老得多,他跟朱可夫差不多是一级的元帅,他不同意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因此可见他们内部不一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一发生,我们就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赶忙道歉。看来他们现在首先想解决国内问题,然后才有时间、精力来考虑国际问题。

周总理说，从会谈过程中来看，他们还没有要根本改变对华方针的想法。这些人根本谈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有趣的是，昨晚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我说，他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区别的，否则为什么把他赶下去。当问他有什么区别时，他又支支吾吾，避而不谈，只说："你相信我们能把赫鲁晓夫给我们留下的沉重包袱背到底吗?"

周总理说，可以看出，他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可能是对赫鲁晓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对他的作风不满，所以就把赫鲁晓夫当做替罪羊，把过去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责任统统推到赫鲁晓夫身上。当然赫鲁晓夫个人自作主张、独断专横也是有的。但是从这次在莫斯科的试探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整个内外政策的路线并不是有实质的分歧。

毛主席说，我们在北京议论，认为苏共新领导实行

的很可能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总理马上说，主席概括的很对、很准确、很易懂。

接着，周总理又说，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议，苏共新领导似乎也没有确定硬是要在 12 月开，但是要开这个会是肯定的。勃列日涅夫的报告里就讲开会的必要性。在会谈过程中他也提到希望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加强团结。同时，他们也希望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因为在十月革命节期间，我们没有发表任何批评苏共的文章，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还是维持现在的样子，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总理还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我们会谈或接触的左派兄弟党代表团都反对苏共召开兄弟党会议，也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罗党代表团这次表现很好，我们同他们会谈了三次。他们表示：如果苏共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使其他兄弟党都参加，罗党也不参加。

大家听到这儿就议论纷纷，说这个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

毛主席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

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大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毛主席问代表团的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总理说，倒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反华报告的是苏斯洛夫，这次在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全会上作反赫鲁晓夫报告的也是苏斯洛夫。我们在莫斯科期间，一次也没有同此人接触。这究竟是因为此人反华名声太坏，不宜同我们接触，还是因为他老奸巨滑，是幕后危险人物，难以判断。

小平同志说，1960 年苏斯洛夫主持中苏两党会谈的时候，许多问题都跟科兹洛夫交头接耳，有的时候他还要安德罗波夫写条子，看起来他也不是做主的人。特别是在起草 1960 年《莫斯科声明》的时候，争论到最后跟彭真同志搞一锤子交易，达成口头协议的，也不是

苏斯洛夫，而是科兹洛夫。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时苏斯洛夫也只是照本宣科。在我们讲斯大林问题中揭露赫鲁晓夫自相矛盾时他表示抗议，也是在安德罗波夫给他递条子之后，可见也不是拿主意的人。科兹洛夫没有参加那次两党会谈。

周总理说，科兹洛夫是赫鲁晓夫亲自提拔的，原来在苏共领导集团中地位相当重要，是常务书记，有人说他是赫鲁晓夫内定的接班人，是党内第二把手，但是这次没有见到，后来才听说，他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整个活动都没有参加。就是说科兹洛夫没有直接参与扳倒赫鲁晓夫。

北京厅的会议开了近两小时。结束前，毛主席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了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了贺电。不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这不能

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毛主席最后很有风趣地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按：这是宋代词人晏殊所作《浣溪沙》中的名句。）

过了两天(11 月 16 日),金日成访问越南回国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总理先向金日成扼要地介绍了在莫斯科跟苏共领导接触的情况。下午,毛主席和金日成会谈。

本来,金日成在去越南之前,11 月 8 日路过北京的时候,也跟毛主席会谈过一次。那时大家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方面究竟是什么人策动的、苏共新领导中谁是主要人物、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苏共领导可能会怎么样。因为当时情况不明,都没有肯定的意见,只提出了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对我们今后怎么行动更没有涉及。

16 日下午会谈的时候，首先由金日成讲了他访问越南的情况。金日成说，前天从越南外地访问回到河

内，应越南方面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范文同汇报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情况。范文同说，他的汇报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没有很好整理，是初步的看法。据金日成说，范文同在汇报中大部分时间谈了苏共新领导消极的一面，比如内部非常忙乱，各说各的，好像思想没有统一，没有真正团结在一起，等等。最后范文同也谈到苏共领导表现的一些积极的方面。范文同谈到：苏共领导跟他们说，苏共首先有几件事要做：第一，要改组党，过去把党分成工业党、农业党是不行的；第二，现在就停止公开论战，不再攻击中国党；第三，表示愿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范文同说，对苏共新领导还要继续观察。

金日成同志说，在会议结束之前，胡志明主席向我提出三点意见，要我以受越南党的政治局委托的名义，转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这三点意见是：第一，公开论战要继续下去，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第二，要阻止他们召开12月的筹备会议。在这个会议之前必须举行中苏会谈，达成一致协议，否则12月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第三，现在要考虑越南方面的建议，亚洲兄弟党要就赫鲁晓夫下台和苏共新领导问题交换意见。

毛主席听了金日成谈的这些情况和越南党的三点意见之后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对苏共新领导的动向还不那么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也不清楚。西方宣传报道说，现在苏共新领导是三驾马车，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和米高扬这三驾马车。

毛主席说，公开论战可能暂停一下。他们害怕我们不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受约束，不宣布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什么时候需要公开批判他们的错误，就什么时候公开批评，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看来他们所说的“集体措施”就是要在会上做反华决议。

周总理说，现在他们骗我们参加12月的筹备会。在12日会谈过程中，他们除了大讲会议的必要性外，还表示12月会议的时间、名称、成员、性质等都可以研究，似乎表示有商量的余地。但是他们又坚持苏共是负责召集的，就是说他们还要保持老子党的地位。

毛主席说，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说连细小的问题都同赫鲁晓夫一致，既然这样，那同他们会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中苏两党会谈，苏方原来说5月就开，我们不同意，说改在10月开，他们又嫌晚。后来我们说10月也太早，推迟到明年5月开。现在看来，明年5月也太早。究竟要推迟几个月或几年，还要看一看。

毛主席说，亚洲兄弟党已公开拒绝参加苏共召集的12月筹备会议，可以到那时看他们怎样动作再说。

毛主席说，阿尔巴尼亚党是决不参加12月筹备会的。罗马尼亚党表示，他们也不参加，也不赞成我们参加。这两个党的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

少奇同志对金日成同志说，罗马尼亚党今年来过两

次。第一次是3月间，也到你们那里去了。那次的态度是要充当赫鲁晓夫的调停人。第二次是10月间，毛雷尔领头，态度比较坚决，说绝不参加赫鲁晓夫召集的分裂会议。

毛主席说，我们是强硬派，我们不怕苏共召开12月会议，最好他们开，最好他们如期在12月15日开，离现在只有一个月。看来到那时他们可能开不起来。

小平同志说，估计他们不会公开宣布不召开筹备会议，他们很可能宣布推迟召开筹备会。

少奇同志说，不管推迟也好，不推迟也好，反正他们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一个圈套，我们要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我们不同意，朝鲜也不同意，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党也不会同意，这样至少有七个党反对，其中有五个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是执政的党。

金日成说，我们对12月会议已确定方针，就是坚决反对。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也是坚决反对，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说了话不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金日成说，我们赞成中国同志的意见，对苏共新领导暂时不公开论战。这样比较好。

毛主席说，对，这个问题我们意见一致。我们现在不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苏共新领导，这样做不得人心。我

们要等苏共新领导发表像1963年7月《公开信》那样的文告，或者做出公开反对中国的决议、报告，像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那样，我们才给予公开答复。我们现在要偃旗息鼓，像打仗那样，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一段时间休整。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在争论不休。所以亚洲兄弟党要继续观察，看苏共新领导怎样变化。

少奇同志说，因为他们内部现在还在争论，方针也没有定，苏联国内和东欧各国党都会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所以我们现在暂停同苏共新领导公开论战，不写文章公开批评他们，但是我们保留批评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撤销他们的二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决议。

周总理说，我们在参加红场阅兵式的时候，碰到好几位苏联元帅。其中有索科洛夫斯基，他说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得好，可以多爆炸几个。我跟他说，我们还要搞导弹。他说应该多搞，他赞成中国搞导弹。由此可见，苏联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

最后，毛主席说，现在是不是可以肯定这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祝贺十月革命节，表示了友好和团结的愿望。

第二，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这是指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至于其他兄弟党的文章，我们考虑还是要发表，因为还有一批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第三，我们还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的表现，至少在

苏共召开12月会议之前要继续看。

第四，对12月会议，我们的方针不变，坚决反对他们召开。

金日成表示同意采取这样的态度。

这四点意见，反映了我党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于中苏关系的方针。

作者按：根据80年代末起陆续出版的前苏共中央领导人和接近苏共领导核心的人物的回忆录、访问记和专著，赫鲁晓夫被罢黜的经过如下：

大约从1964年初起，苏共中央领导层即酝酿罢黜赫鲁晓夫。这个密谋的中心人物是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前三人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是两面大旗，波利扬斯基是为他们两人出谋画策的军师，谢列平是具体部署政变的组织者，他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处最年轻的书记，曾任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他们有过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所谓“反党集团”的经验，知道宫廷政变关键是掌握内务部（克格勃），1957年扳倒莫洛托夫等就是内务部长谢罗夫起了特殊作用。因此作为倒赫这一宫廷政变的具体组织者谢列平，利用他过去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时的老关系，拉帮结派，首先把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拉进来参与密谋，并通过他联络克格勃系统的主要人物，掌握党政军（主要是莫斯科卫戍区和莫斯科军

区）的要害部门。

勃列日涅夫原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时的老部下，是赫把他提拔到中央来的，职务逐步升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1963 年 6 月兼任苏共中央书记，接替心脏病突发的科兹洛夫（据说科是赫鲁晓夫培养的接班人）的工作。有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起初不大乐意做这份冷清而费力的党务工作。因为他热衷于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或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出头露面。红地毯、仪仗队、隆重的迎送仪式、盛大的宴会、热闹的场面、授勋颁奖、热烈拥抱、报纸上经常刊出他的大幅照片，这些对他更具吸引力。据称，他逢人笑脸相迎，同各方面关系不错。赫鲁晓夫虽然选中他为培养对象，但又认为他的缺点是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容易受别人影响，有时态度模棱两可。

波德戈尔内也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时的部下，也是赫提拔他到党中央工作的。有的回忆录说，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是苏共中央的第二把手，波德戈尔内则是苏共中央的大管家，许多重大党务是他主办的。苏共“22 大”后他曾受到赫鲁晓夫多次责骂，对赫越来越不满。196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任中央书记后，波德戈尔内很快就同这位在乌克兰的老同事结成同盟，分担勃在书记处的绝大部分党务工作。他们先后拉拢波利扬斯基和谢列平两人参与密谋倒赫，这两人都有政治野心。波利扬斯基认为自己资格老，但不

受赫鲁晓夫重用。谢列平从共青团第一书记提升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自视甚高，飞扬跋扈，并认为自己是中央领导层中最年青的，最有资格当未来接班人的人选，曾拒绝赫鲁晓夫想把他下放到列宁格勒工作锻炼。

反赫鲁晓夫的密谋从1964年春起逐步实施。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计划的第一步是争取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以商量工作为借口的个别谈话摸底，到6月间估计可望争取到多数的支持。第二步计划是分别同中央委员会成员接触，方式是利用7月和8月的休假季节，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休养胜地，频繁地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各部委和各州的党政领导人"海水浴"、"野餐"、"聊天"、"拜访"，逐个逐批进行摸底（在莫斯科中央部门也同样进行摸底）。他们已了解到，这些人大多数对赫鲁晓夫把各级党委分割为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搞干部轮换制、设立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中央各部门架空）、裁减军队等重大措施，普遍不满。据说，勃列日涅夫在中委名单上每个姓名后面都画了符号，"+"表示肯定，"-"表示不肯定。据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说，到9月份他们从各休养地回到莫斯科时，已有把握可以在中央委员会中取得反赫鲁晓夫的"稳定多数"。

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从1964年初起很少在莫斯科，春天去波兰、匈牙利访问，接着又去乌克兰、列宁格勒视察，5月乘船去埃及，6月访问北欧，7月又去波兰

参加国庆大典，其后又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即农垦区）视察秋收准备工作。其间4月70大寿时，赫鲁晓夫接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全体成员的隆重祝寿，他们以非常热烈的姿态为赫歌功颂德，其中谢列平最活跃，奉承的调子最高。赫鲁晓夫对这些人的忠诚深信不疑。他在国内外到处跑了几个月后才于9月底去疗养胜地皮聪达休假。行前他的儿子小赫鲁晓夫告诉他：正在酝酿着把他拉下台的密谋。这是小赫从前主席团委员伊格纳切夫（“22大”时未被选入主席团而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也参加了政变密谋）的卫队长那里得知的。赫鲁晓夫不相信，同米高扬商量，要米高扬核查后到皮聪达会合。米高扬找来那个卫队长，询问情况。那个卫队长不但完全证实确有此事，而且谈得更详细和广泛。米高扬半信半疑，随即于10月初也去皮聪达，把核查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但赫仍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也没有为此采取任何措施，继续在皮聪达休假。

在莫斯科，10月上旬，倒赫密谋集团认为条件成熟，时机已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原定11月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动手。而且他们得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对反赫密谋已略有所闻（这是克格勃系统利用监控赫、米两人的电话和窃听设备得知的），更是迫不及待，要正在访问东德的勃列日涅夫马上回国。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家里召集主席团会议。几乎所有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都参加，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国防部长

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参加了。这些人中并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密谋。柯西金是事前一星期才知道的。马利诺夫斯基是两天前才得到通知。苏斯洛夫更是到达会场时才得到通知，他大吃一惊，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这要打内战了”。勃列日涅夫要他放心，说莫斯科军区的所有要害部门都已控制在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手中。苏明白了当前的形势，便同意倒赫政变。——这是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记述的。

勃列日涅夫主持的密谋会议商定立即行动，把赫鲁晓夫拉下台，并采取通过一个决议的形式，定于第二天即13日正式召开主席团会议，要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回莫斯科参加，借口是讨论修改新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便提交尽早召开的中央委员会讨论。为了催促赫、米回莫斯科，需要立即打电话给他们两人。这个电话本应由勃列日涅夫打，但勃不肯出面，让波德戈尔内打，波也不愿出面，要苏斯洛夫打。苏斯洛夫犹豫了一会儿，答应当场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在皮聪达，赫鲁晓夫12日晚上同米高扬在一起聊天。苏斯洛夫打来电话时，赫鲁晓夫起初不愿那么匆促召开主席团会议，不愿第二天就回莫斯科，说离11月召开中央全会还有一段时间。苏斯洛夫执意要赫和米第二天乘飞机回去，理由是主席团（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已齐集莫斯科，大家对计划草案有很大意见。赫鲁晓夫同米高扬商量后，同意两人在13日下午

（因为13日上午赫鲁晓夫还要会见法国客人）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当天夜里，米高扬同赫鲁晓夫商量此事，怀疑这同他们听到的反赫传闻有关。赫鲁晓夫向米高扬表白，不管怎样，他不会同主席团斗争。据同他父亲一起在皮聪达休假的小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说，他看到他父亲情绪低沉，表现出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样子。

10月13日下午，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乘伊尔-18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2号机场时，整个停机坪空荡荡的，既没有惯常那样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欢迎，也不见他们在莫斯科的秘书、随从和亲属，只见内务部长谢米恰斯内和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局长切卡洛夫两人走近舷梯，迅速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接上汽车，然后直奔克里姆林宫。谢米恰斯内把赫、米带进会议厅后，立即下令撤换克里姆林宫所有警卫。

勃列日涅夫主持主席团会议。到会的有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只有科兹洛夫因重病没有出席。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以及马利诺夫斯基、葛罗米柯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即对赫鲁晓夫进行激烈的指责。据米高扬事后告诉别人：指责的范围主要是涉及普遍引起不满的国内问题，如党委一分为二、成立地区经济委员会、实行干部轮换制、裁减军队等国内重大问题，也涉及国际问题。发言中对赫鲁晓夫的专横粗暴作风抨击最烈，也指责他出国访问时携带妻子和一大批其他亲属。谢列平和谢列斯特（乌克兰第一书记）跳得最

高，沃罗诺夫最粗暴，格里申等人较为克制，但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始终不发言。米高扬在会上曾提议只罢免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个提议立即被否决。

赫鲁晓夫晚上回到住处后沮丧异常。他在夜里打电话告诉米高扬，他决定请求辞职。

10月14日上午，勃列日涅夫主持主席团会议，继续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答辩性发言。据谢列斯特（乌克兰第一书记）根据当时札记写的回忆录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没有作全面的系统的答辩，他只谈到几件事。赫鲁晓夫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为主席团的成熟感到高兴。大家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不会同你们斗争。我愿意让位，由比我更年轻的人来干吧。我过去对好些人态度粗暴，请原谅我吧。赫鲁晓夫说着说着，先流泪，后来就大哭起来。但他还是接着说下去。他说，我的主要毛病是善良和轻信，又不知道自己的缺点。但你们谁也没有指出过我的缺点，都附和我，赞扬我。你们批评我把农业搞糟了，把党委分割成搞工业和搞农业两部分，成立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但都是主席团甚至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的，集体作出的决定，怎么由我一个人负责？你们说我做了第一书记还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大权揽于一身，但这是你们提议的，你们当时说这对党和国家有利。我的错误在于当时没有反对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在古巴布置导弹是冒险的，但

这不是主席团作出的决定吗？你们又说我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撤回导弹是使苏联丢脸，但这不是集体决定这样做吗？难道要打核大战不成？你们又说不应该修建“柏林墙”，但当时你们大家同我一样是极力主张这样做的。现在你们责怪我，我错在哪里？你们又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搞得这样糟不应该，说应该有政治嗅觉，又应该有政治灵活性和策略灵活性。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你们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麻烦。

赫鲁晓夫最后讲到他想对将要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什么要求时，勃列日涅夫立即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说“这办不到”，苏斯洛夫也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看到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指望了，便说：我这个最后发言，就算“绝唱”吧！

赫鲁晓夫最后写一个辞职的报告，并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上午的主席团会议便告结束。

在主席团会议进行过程中，克格勃头子谢米恰斯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说齐集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等得不耐烦了。有人提出要挽救赫鲁晓夫，有人则呼叫支持勃列日涅夫。谢米恰斯内警告勃列日涅夫，他快挺不住了，最多只能应付到晚上，要求勃列日涅夫结束主席团会议，尽快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回答说，主席团成员都讲过了，还有书记处成员和其他参加的人还未讲，每人表个态，一个人两三分钟就行。中央全会当晚6时准时召开。——这是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

中说的。

由于上述原因，勃列日涅夫在 10 月 14 日下午继续召集主席团会议。这次会议已不让赫鲁晓夫参加了。会上先由上午没有发言的人表态，然后迅速转入通过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报告和任命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决定。主持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宣布会上不提问题，只进行表决。这一切都无一人反对地通过了。

主席团向中央全会提出的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报告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本来应该由勃列日涅夫出面作报告，但他说由他出面不合适，因为全会即日才选出他代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能给人印象是他带头夺赫鲁晓夫的权。他提议波德戈尔内作报告。但波德戈尔内也推辞，说他同赫鲁晓夫共事多年，由他作报告别人会怎样看。他推荐苏斯洛夫在全会上念，说苏是党内的“大思想家”，1957 年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四人“反党集团”时，就是他在全会上作报告的。他又说本想由谢列平念也可以，他能说会道，但太嫩了。于是主席团决定由苏斯洛夫在全会上念波利扬斯基起草的反赫鲁晓夫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于 10 月 14 日晚上举行。（赫鲁晓夫本人和一些流露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没有被允许出席。）勃列日涅夫在开幕词中简单说明召开这次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原因。

他说，主席团原定在11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苏联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重大问题。但近来主席团不断收到对原来的计划草案有关问题提出的许多原则性意见，主席团在10月12日讨论了这些意见，决定请赫鲁晓夫从皮聪达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10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主席团在10月13日和14日举行会议，讨论党中央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一致认为这些错误首先应由赫鲁晓夫承担责任，并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讨论和决定。接着就由苏斯洛夫念主席团通过的报告。在苏斯洛夫报告过程中，会场内不断发出鼓掌声、谈笑声和喧哗声，许多人呼喊："说得对！""可耻！""开除党籍！""交付审判！"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念了赫鲁晓夫签字的请求辞职的声明，也念了主席团关于解除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通过。勃列日涅夫在苏斯洛夫读完报告后，即提出举手表决决议草案。结果当然是"一致通过"。随后又相继举手表决主席团提出的推荐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建议，两案当然也是"一致通过"。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关于中苏关系，从赫鲁晓夫的答辩看，似乎在主席团会议上，赫没有受到很多指责，他也没有认为他自己有什么错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念的报告中，还指责中共领导人搞"分裂活动"，指责这是"反列宁主义立场"，报告说，"今后，我们要

同他们这一立场继续斗争下去。”报告中说，“我党在国际问题上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说，“我们不应闭眼看不见赫鲁晓夫同志那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摆出一副教师架势的表现。”这是泛指，接着举例是说，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时，教训兄弟党领导人怎样种玉米。

第六节 种种看法

赫鲁晓夫下台轰动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党派、各种集团、各种报刊，都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各兄弟党的看法。

在十月革命节前，从 11 月 1 日到 4 日这四天里，中国党政领导人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米高扬发去贺电，接着又为祝贺十月革命节发去贺电，还主动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出席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除此外，没有公开评论赫鲁晓夫下台一事，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的郑重的谨慎的态度。

但是，在这四天里，我们报道了 19 个兄弟党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材料，这些材料或者是他们党中央的决议，或者是他们党中央的公报，或者是他们党中央领导人的谈话。这里有亚洲各国党的，包括日本党、印度尼西亚党的，还有蒙古人民党的，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包括波兰党、匈牙利党、保加利亚党、民主德国党、捷克斯洛

伐克党。此后还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包括法共、意共、荷共、英共和瑞典共产党。

在这些党中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鲁·艾地10月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很值得注意。他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赫鲁晓夫辞去他的三项职务,即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不管其理由是什么,这一措施是明智的。这对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件好事。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裂痕会影响新兴力量,所以这对新兴力量也是一件好事。至于赫鲁晓夫辞职的结果对今后会有哪些好处,还得注视着这个事态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10月22日的讲话很直截了当。他说,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是苏共"20大"和"22大"所确定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东欧那些过去跟随苏共领导走的党大都表示拥护苏共中央的决定。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就强调,苏共领导将继续贯彻第20次、21次和22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也有一些党还强调赫鲁晓夫的重大功绩,表示充分信任苏共中央,并且保证进一步巩固同苏共的联盟。

西欧共产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法国共产党,那是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的。另一种是意大利共产党,它的态度和法国共产党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指出把责任完全归咎

于赫鲁晓夫是不对的，应该不要忘记赫鲁晓夫的伟大贡献；另一方面又强调说，意大利共产党还是继续反对召开兄弟党的世界会议，坚持陶里亚蒂备忘录中表达的意见，对召开世界会议采取保留的态度。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在谈话中表示，他相信赫鲁晓夫下台有助于消除意见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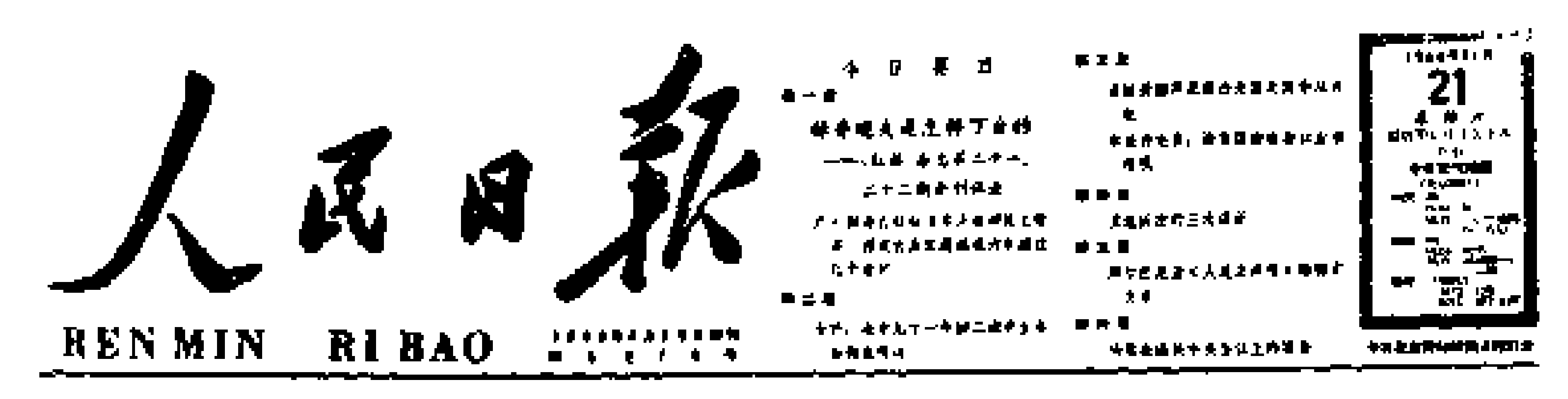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这些以外，还有好些兄弟党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和文章，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十月革命节已到，中央决定暂停两个星期。

在这期间，我们认真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们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新领导会谈之后的情况，起草了一个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

这个社论经过多次修改，11 月 18 日在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定稿。11 月 21 日用《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社论，只讲赫鲁晓夫，了结他这桩公案，对苏共新领导一句话也不谈。

这篇社论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社论在综述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种种议论之后，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预料中的事。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红旗》杂志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社论

1964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定稿的《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

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他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社论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社论指出,11 年来,赫鲁晓夫做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坏事。社论列举了赫鲁晓夫的 12 项罪状。社论说,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对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上面这段话,是针对苏共中央的公报和《真理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发表的两篇社论的。他们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所谓健康原因,所谓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等等,而完全不谈他的修正主义错误。)

社论说，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会被轧得粉身碎骨。正是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社论说，想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22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呀！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们修正主义前辈的后尘，不管人们曾经怎么样劝说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终究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社论最后说，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总希望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在发表这篇社论的同一天，就是从11月21月起，《人民日报》陆续转载了兄弟党的文件、评论、讲话，一直到翌年1月底。

在这期间转载的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秘鲁共产党、日本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法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丹麦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等一共20多个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数

是这些党在十月革命节之后，或者是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中央会谈之后发表的。

其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连续发表三次谈话。他在谈话里说，他赞赏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采取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步骤。他认为，由于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赫鲁晓夫下台显然不是由于他年迈或者患病，而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国内外政策破产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意味着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

秘鲁共产党的声明认为，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伟大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允许一个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人进行领导了。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希望，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新领导人，能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引人苏联共产党的现代修正主义，应该不留一点残余地加以清除。这是使列宁和斯大林的党重新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出，它欢迎赫鲁晓夫下台，这表明修正主义内部的危机。决议同时还指出，自赫鲁晓去下台以来，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中，修正主义分子觉得有必要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最恶劣的主张。这些事情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它使分歧重新出现，使帝国主义高兴，并且直接违背1960年81党《声明》。

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马歇发表讲话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他领导作风和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后果。马歇还讲到他在今年十月革命节前，到苏联和苏共新领导会谈的结果。他说，苏共领导告诉他们，“20大”、“22大”的精神和决议是不可改变的。而且还说，苏共中央所公布的一切文件以及不同时期致兄弟党的信件，包括在12月15日召开新的兄弟党会议筹备会的建议在内，仍然完全有效，都不改变，因为这一切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也发表了一个公报，谈到他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和苏共新领导会谈的结果。公报说，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还是领导方法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农业和党的组织中引起了消极的后果。但是公报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再一次确认，对于目前召开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时机所持的保留态度仍然有效。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在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0周年纪念大会上做的报告里，谈到了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他说，赫鲁晓夫撤职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结束了，一般地

说也不意味着现代修正主义结束了。修正主义的潮流，它的政策，它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并未随赫鲁晓夫而消除。他说，在赫鲁晓夫垮台以后，苏联党和政府的现任领导人不只一次地宣布，他们将忠实地遵循苏共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以及第22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他们同样宣布，排除赫鲁晓夫，丝毫不影响苏联共产党迄今为止所遵循的路线的实质。霍查说，很明显，他们今后将继续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可能作一些策略性的修改，以欺骗革命者和各国人民。可是，继续这种潮流，不能不激起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和原则性的公开斗争。霍查还提出，要恢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首先就要结束指挥棒、老子党的方针，等等。

在转载各兄弟党的材料的同时，我们也公布了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报告的全文和《真理报》关于赫鲁晓夫下台所发表的社论。同时我们还继续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两集主要是收集赫鲁晓夫1932年至1953年的言论。按原来预定的计划，还要继续收集出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一直到1964年10月下台的公开言论。

1965年2月26日，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在这一集里收集了赫鲁晓夫在1954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信件和文章，一共有24篇32.5万字。在2

月2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出版《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的《出版者说明》。

《出版者说明》说,赫鲁晓夫当政的11年中间,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一共有1000多万字,真是又多又长、又滥又臭。因此,这个言论集,按现在分集出版的办法,将要出30多册。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报告,到现在为止,虽然西方的报刊上根据美国国务院获得的文本全文刊载过,但是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因此全集只好暂时缺了这篇报告。

《出版者说明》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费这么多的纸张来出版赫鲁晓夫全集呢?我们说很有用处、很有必要。因为赫鲁晓夫是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以赫鲁晓夫的名字当标记的。赫鲁晓夫言论集就是一部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

《出版者说明》最后说,赫鲁晓夫被赶出世界政治舞台,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但是,赫鲁晓夫的阴魂不散。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十七章

走向分而不裂

第一节　置之不理

1964年11月26日，我党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重申要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原来赫鲁晓夫掌权的时候，他们规定1964年12月15日召开筹备委员会。这次苏共中央的来信，把召开筹备委员会的时间推迟到1965年3月1日。

在这前一天，11月25日，毛主席在颐年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常委除林彪外，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出席了。参加的还有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陈伯达等人，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12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 1965 年国民经济计划)。我当时正在带一个写作小组起草周总理准备在人代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两个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中央领导的主要注意力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

上述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二天(11 月 26 日)我们才看到苏共中央的来信。

苏共来信说,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商量的结果,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着手进行实际准备工作。这就是说,这个起草委员会,不管怎么样,不管有多少党参加,也要召开了。这是来信的第一点意见。

苏共中央来信的第二点意见,说参加会议和起草委员会的成员还是 26 个。这就是说,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不顾我们党中央过去提出的由 17 个党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建议,不同其他兄弟党商量,硬要维持赫鲁晓夫当权时擅自确定的由 26 个党参加,即使 26 个党中间有些党不去,他们也要开会。

来信的第三点意见,说这次会议的名称叫做“协商会晤”。这就是说苏共采取改头换面的办法,强行召开会议。

苏共中央这次来信,根本不是征求意见,而是下命令。在苏共中央给我们来信之前,就是 11 月 24 日之前,他们也已给其他兄弟党去信,而对有些兄弟党如印尼党等,则是 12 月 1 日才去信。后来,苏共 12 月 12 日又在

《真理报》上发表一个所谓《通知》。通知说:1965年3月1日召开兄弟党协商会晤。这次采用的是公布通知的形式,表明他们下令铁定地召开分裂会议了。

11月28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会上一致议定,我党仍然坚持过去我们对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不管他们推迟还是不推迟,不管用这个名义还是那个名义,因为这实际上都是分裂的会议。早在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提出召开这样的会议时,我党中央在8月30日的复信中已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立场。现在我们还是坚持这一立场,因此不必答复他们,也不发表声明。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时还决定,把我们对苏共中央要在1965年3月1日召开分裂会议的态度告诉各左派兄弟党。

中央常委一致认为,不管推迟两个半月召开,也不管改头换面用什么"协商会晤"的名称召开,苏共新领导决定召开分裂会议表明,他们还是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们想什么时候开就决定什么时候开,要哪些党参加就由哪些党参加,要改换什么名称就改换什么名称,这一切根本不跟我们商量。所以我们不需要对他的来信作答复。毛主席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现在我们的方针就是置之不理,看他们怎么办。

就在《真理报》12月12日发表那个开会通知的同

时，苏共新领导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九个党的代表团以古巴党的罗德里格斯为首，包括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这个代表团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他们在同我党中央联络部的同志会谈时说，公开论战对他们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都不利，会导致分裂，等等，等等。他们差不多每人都讲了这样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12月14日，毛主席会见了这个代表团。毛主席非常明确地回答他们说，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很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公开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

毛主席说，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样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

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毛主席说,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讲得通吗?

毛主席说,关于召开什么兄弟党国际会议,不管开26个党的会也好,开60个党的会也好,80个党的会也好,我们统统不参加。因为这是苏共片面决定的,没有跟我们商量。苏共新领导决定的东西,跟赫鲁晓夫不同的只是改头换面。召开那样的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我们决不参加。

毛主席还对他们说,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毛主席的这番话,断然地拒绝了他们要我党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也断然地拒绝了参加苏共召开的什么兄弟会议。

这么一来,拉丁美洲九党代表团没有完成说客的任务,郁郁寡欢回莫斯科去了。

虽然毛主席同这九党代表团谈话时拒绝停止公开论战,但我党仍然执行"偃旗息鼓、积累资本、冷静观察、后

发制人"的方针，看看苏共新领导的言行。中国的报刊，没有发表指名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

第二节　最后告诫

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之前，1965年2月间，毛主席和周总理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的机会，先后跟柯西金会谈。这是我党中央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之前，做最后的努力，劝说他们放弃召开这样的会议。

柯西金2月5日从莫斯科飞抵北京，5日和6日在北京停留两天。周总理同他会谈。他7日飞越南访问，从7日到10日，在越南访问三天，然后又回到北京，停留一天。11日毛主席同他会谈。

在柯西金访问越南期间，美国总统宣布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即美方吹嘘的所谓"地毯式"大轰炸。从当时美国报纸的反应看，美国这次对北越进行大轰炸，是有意给柯西金颜色看的。

对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中国全国各地从8日到10日先后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特别是10日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一共有300多万人参加。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

毛主席同柯西金会谈时,一开始就问柯西金在他访问越南期间美国轰炸的情况。但是,柯西金没有多说,他很快就提出,毛主席在1962年曾经跟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讲过,中苏双方最高级领导会面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柯西金问:现在是不是到时候了?

毛主席说,1962年我跟契尔沃年科曾经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只要你们发动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25年,25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

毛主席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1963年7月14日发表《公开信》那种论战,也赞成去年(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和做决议那种论战。不要搞那些不痛不痒的论战,不痛不痒没有什么味道。

毛主席说,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

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柯西金辩解说，我们也发表了你们一些文章。

毛主席说，不对。我是讲你们前年7月14日公开信和去年2月的报告和决议，我们都发表了，这是你们主要的、讲实质问题的公开论战文件。而我们答复的文章，你们一篇也没有发表。

毛主席说，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柯西金说，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地谈呢？

毛主席说，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说，你可能已经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整个马列主义分成为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主席说，如果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

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都要反,有多少就反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

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常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一万年。

毛主席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争论总是会有的,但是也会讲和的。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上,你看吧,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说一万年、九千年是讲得凶一点,"教条主义"就会说这些话,而你们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柯西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教条主义"这个词?

毛主席说,我非常欣赏这个词,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

柯西金说,这是你自己给自己戴的。

毛主席说,不对,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接着,毛主席谈到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毛主席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

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们又说要改在今年3月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这个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柯西金说，这个会不是我们要开的，而是许多党要开的。你们过去也主张开兄弟党会议。

毛主席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的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

柯西金辩解说，我们不是召开起草委员会。如果开起草委员会，就要为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制定一个纲领，那样做不行。我们召开的是协商会晤。

毛主席说，起草委员会那个名字也不要改。你们制定纲领也好，不制定也好，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柯西金问:为什么你们不参加?

毛主席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1964)7月30日的那封信里面就是那么说的,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你们11月24日给我们的要在今年3月1日开会的那封信也是这样写的。毛主席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吗?这两封信不是你们写的吗?11月24日的信,不是赫鲁晓夫干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

柯西金对此无以回答。

毛主席又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搞得那么绝,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这个问题只有你们跟阿尔巴尼亚去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开会,不解决什么会也不能开,你们要开我们就不参加。毛主席说,我建议你们取消过去对付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如果你们真是要开会的话,就取消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说这么一句话就行了。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那个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

柯西金说,毛泽东同志,那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不可能吗?

柯西金说,真是不可能。要我们取消好多东西,那你们也取消好多东西。

毛主席说,过去你们把赫鲁晓夫说得那么好,说他是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他这个这样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呢？这位赫鲁晓夫同志有什么不对的么？

柯西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最好还是问他本人。

毛主席马上说，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发出邀请，邀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你们主席团能不能答应让赫鲁晓夫到北京来？我跟赫鲁晓夫辩论，行不行？

柯西金说，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他不代表我们党了。

毛主席说，他不代表你们党吗？他过去代表你们党，做了许多好事情，这都是你们过去说的，你们"20大"这么说，"21大"这么说，"22大"也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说，你们去开会好了。你们是多数，又很有理由。你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我们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去干什么？而且我们又是"好战分子"。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这些"好战分子"怎么能够去开会，怎么能够团结？你们自己开好了。

柯西金说，我看不出你们好战，你们不是好战分子。我们一直在跟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是不是我们可以团结在一起来跟帝国主义斗争呢？

毛主席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

柯西金说,我看可以早一些,不要十年以后。

毛主席说,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柯西金说,这一点我同意,所以不应该把团结拖到1000年以后。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要1000年,大概10年、15年以后形势可能紧张起来。世界上没有什么缓和。我们天天说争取缓和国际局势,实际上国际局势天天都在紧张。如果能够争取到10年至15年的和平时间就好了。我们双方到10年、15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要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柯西金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是完全分裂了。

毛主席说,要是完全分裂,我们还能招待你吗?我们不招待美帝国主义,我也不接见英国的什么贸易大臣、什么英国代办之类,我一概不见。

柯西金最后说,我们今天的谈话全世界都会猜测。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今天见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而不

是拥护帝国主义的。这一点很好。

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谈的非常尖锐，但在提出严重警告的同时，又晓以前景并非毫无希望。整个气氛自然相当紧张，但也有张有弛。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也不是表示根本不可能改进关系。

第三节　不成样子的分裂会议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不顾各方的反对，仍在3月1日到5日召开了所谓“协商会晤”，3月10日才发表公报。

会议的公报可谓煞费苦心。公报中用的不是起草委员会的名义，而是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也没有同兄弟党国际会议挂钩。参加这个会议的并不是像1957年和1960年那样有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只有16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另外两个是巴西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党的分裂分子，再加上印度共产党的丹吉集团，一共是19个单位。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坚决拒绝参加这

个会议,其中 5 个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执政党。巴西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既谴责这次会议,又谴责苏共要他们党内的分裂分子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从发表的会议公报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既没有像原先赫鲁晓夫所要求的那样开,也没有像后来勃列日涅夫所要求的那样开,而只是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一个既非会议、又非会谈的非骡非马的"会晤"。

3 月 12 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分析了苏共召开的分裂会议,并决定要起草一篇论这个会议的文章。我们住在钓鱼台 8 号楼的写作班子,忙了三天,在 15 日写出了一个初稿。16 日小平同志再召集书记处会议讨论时,对初稿还比较满意。因为初稿大体上是根据 12 日书记处会议上大家议论的要点来写的。在 16 日的会议上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做了一些修改。

这时毛主席在武汉。我们起草的初稿以及几次修改稿,都在当天派人乘飞机送去。毛主席对起草过程都了解。

3 月 17 日,毛主席的秘书从武汉打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章的题目要改得醒目一些;整篇文章很长,应该分几节,每节加小标题,也要醒目一些。

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又作了修改,修改好以后 18 日又送毛主席审定。

在这两次修改过程中,除了题目、标题以外,比较重要的修改还有三点:

第一，对苏共新领导讲得尖锐一点，既揭穿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又区别于美帝国主义，没有说他们跟美帝国主义已完全一致。

第二，文章的基调不变，但是删去了一般人难于接受的和说得不那么准确的词句，不把问题说得太绝对。

第三，还是抓团结的旗帜。虽然他们召开分裂会议，但我们还是要强调团结。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口头上也讲团结，也讲革命，也讲反帝，但实际上做的与此相反。我们在揭穿他们的假象的同时，要高举团结的旗帜、革命的旗帜、反帝的旗帜。

毛主席收到我们修改稿以后，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要联络部请一些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和兄弟党的代表到武汉，说他要征求他们对这篇文章的意见。美国专家爱泼斯坦、柯弗兰，英国专家艾德勒和一些亚洲党的代表都到了武汉。

3 月 19 日，毛主席邀请这些客人在武昌东湖别墅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一开始，毛主席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发表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必要，要不要发表；第二，发表了有没有危险，有什么坏处；第三，这篇文章有什么地方不妥当，需要修改和补充。

毛主席跟爱泼斯坦比较熟，首先对他说，你看有没有必要发表这个东西？

爱泼斯坦说，很有必要。我们过去一直讲，如果他们要开分裂会议就怎么样怎么样，讲过多次。现在他们开

了会，我们一声不响不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有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主席说，你说的蛮有道理，但是我们发这篇文章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坏处呢？这得认真想一想。

这个时候，有些客人提出，这篇文章讲得很尖锐，旗帜很鲜明，直截了当地戳穿了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但是，恐怕有些人还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对苏共新领导还存在一些幻想。另外一些客人觉得，现在是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但是正因为有人存在幻想，所以需要把苏共新领导的假象加以揭穿。文字是尖锐了一些，可以略加修饰，但是恐怕还是比较鲜明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比较有利。

毛主席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个别地方讲得太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

美国专家柯弗兰说，中文里面讲“挂羊头卖狗肉”，直译成英文，人家不懂。

毛主席说，是呀，中国成语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

柯弗兰说，澳大利亚党的领袖希尔曾经说过他不懂这句成语。现在我们想了一个代替的成语，英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作“把马肉当作牛排卖”，意思跟“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

毛主席笑着问：西方人吃马肉吗？

柯弗兰说，战争时期是吃的，那个时候牛肉很贵，马肉比较便宜。

这时客人们都笑起来了。一位亚洲党的代表说，我们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狗肉，我们以为毛主席不会同意用“挂羊头卖狗肉”这句俗语，因为这里贬低了狗肉。

毛主席说，我过去是不吃狗肉的，上了井冈山以后才慢慢吃起来，而且觉得挺香。

有一位客人再补充说，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西方的舆论认为，召开三月会议是苏共新领导软弱的表现，不是他强大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处于弱势，我们正应该乘胜追击，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毛主席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以后要大张旗鼓地反修？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亚洲党的一些同志表示赞成这篇文章的基调，认为很有必要，而且要乘胜追击。

毛主席说，可能有一些人对一些比较尖锐的语言一时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我们讲得适当，过一个时期他们自己也会知道是正确的。现在大概还有不少人喜欢语言温和一点，但是过一个时期连他们自己也不那么温和了。前一个时期，在反修斗争过程中就有这种情况，有过一些同志劝我们多加糖少加辣椒，后来他们自己也加辣椒了，也讲得很尖锐了。

一些外国客人提出的意见中，还有一点很受毛主席重视。这就是他们觉得，这篇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

对这个意见，毛主席很称赞，他对当时陪同外国客人到武汉去的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同志说，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请北京的同志再议论一下，看看在什么地方需要强调团结的，写得更突出一点。这个意思在修改过的稿子中已经有所加强，但还不够，还可以考虑再加强一点。

赵毅敏同志回到北京以后，就在3月20日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把毛主席在武汉会见外国客人时谈的意见作了汇报。在会上，当场对文章做了一些修改。关于怎么样更强调一下团结的问题，小平同志要我们在会后在文章末尾再加强一些。

3月21日我们把文章通改一遍，特别在末尾一段谈

团结的话，更加加强了。文章修改以后，小平同志又召集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定稿。然后分送周总理、少奇同志和在武汉的毛主席。22日，毛主席回电话说，没什么意见了，可以发表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只改了个别词句。这样，文章在22日最后定稿。

3月23日，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共分四节。

第一节的小标题是："这是一个什么会议"。文章说，它是一个分裂的会议，同时也是一个七拼八凑的、支离破碎的、非常勉强的、开得不成样子的会议。文章指出，苏共新领导虽然改了一个名称，叫协商会晤，但是它的性质还是一个分裂会议。苏共新领导玩了一个花招，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的陈货。赫鲁晓夫在1964年7月30日要求各兄弟党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会议。许多兄弟党不赞成，建议他们不要开这样的会，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没召开成这个会就被苏共领导集团撤职了。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掌权，仍然不听兄弟党的劝告，还是要开会。可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是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继承者。他们只想要一个带欺骗性的花招，不在去年12月15日召开而在今年3月1日召开，不称会议而称"会晤"，来贯彻赫鲁晓夫主义，实行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苏共纲领里所

体现的总路线。

第二节的小标题是:“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一节里分析了苏共新领导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和苏共新领导对兄弟党、兄弟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然后指出,苏共新领导所谓团结、所谓共同对敌完全是假的,他干的是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还是赫鲁晓夫的老一套。

第三节的小标题是:“回答几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三月会议的公报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文章指出,公开论战是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他们对兄弟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兄弟党当然有权利来回答这些攻击。不能只许修正主义者诬蔑、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回答和批评修正主义者。

另一个问题是,三月会议公报提出反对一个党干涉另外一个党的内部事务,而且“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并说这是许多党现在闹分裂的由来。苏共新领导一贯指责这是我们干涉别的党的内政。文章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支持一切坚持革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包括政党、集团和个人,我们都支持,都赞成。我们绝不放弃这个原则。一些党之所以闹分裂,根本原因在于出现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根子在苏共领导。真正搞派别活动,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是苏共领导,他们经常对兄弟党搞颠覆活

动。如果苏共领导不改变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那会有更多的党闹分裂。我们只能支持马列主义，不能支持修正主义，这根本不是什么一个党干涉另外一个党内部事务的问题。这次苏共领导召开莫斯科三月会议，就是最严重的派别活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三月会议公报里讲要“积极地、全面地”筹备国际会议，并“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文章指出，你们召开三月会议，就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是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应该由苏共新领导来承担。过去我们说，为了召开一个团结的会议，应该消除障碍，准备工作大概需要四五年。现在看来，由于你们召开三月分裂会议，坚持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因而准备时间至少要增加一倍，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第四节的小标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在这一节里着重讲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赞成团结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这样做的。

文章指出，你们公报里说，各国共产党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更迫切的任务”上来。那么，什么是更迫切任务呢？文章说，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反对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为此，必须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文章说，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愿意再一次向苏共新领导提出诚恳的忠告，你们何必把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枷锁套在自己脖子上呢？为什么不能改弦更张呢？

文章接着说，如果你们真是要团结的话，真是要共同对敌、团结反帝的话，那么你们就要做到：

第一，公开宣布一切召开分裂会议的命令都是错误的、非法的，公开承认非法召开分裂会议是错误的。

第二，公开地、郑重地向全世界共产党人、向全世界人民承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都是错误的。

第三，公开承认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纲领是错误的。

第四，公开承认苏共领导反对中国、阿尔巴尼亚、日本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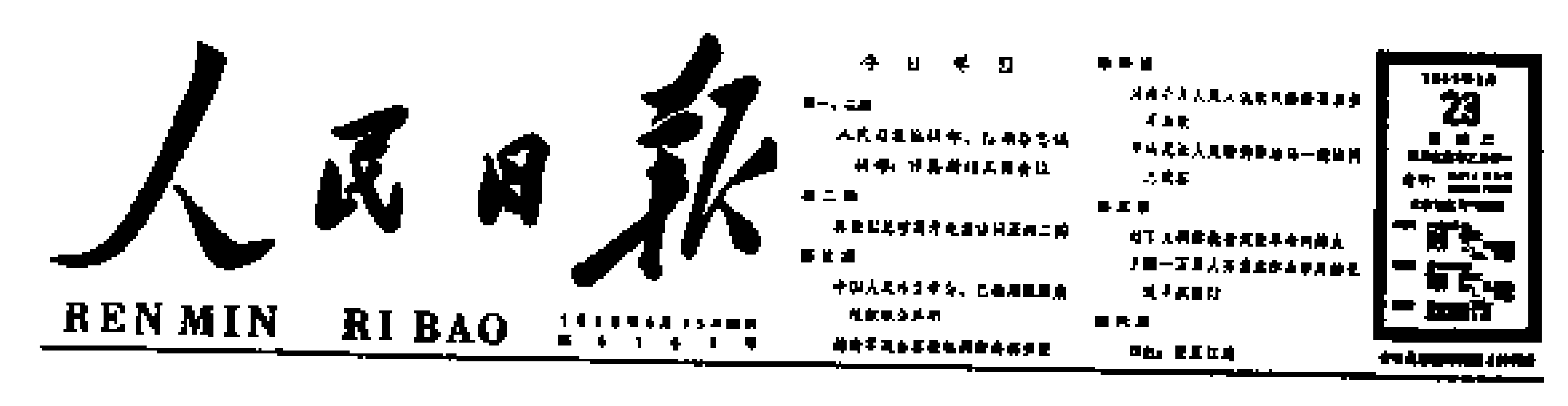
第五，公开保证今后绝不再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轨道上来。

本来，这五点主张，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我们在7月28日和8月30日答复苏共中央来信的时候，就已经把基本内容讲了，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采取五个条件的形式。这是因为那两封信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觉得，提出这五个条件不好，近乎最后通牒，还不如不作为五个条件提出，含蓄一点，留有余地。那时我们这样做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苏共新领导召开了分裂会议，这就使得我党必须明白地、毫不含糊地把五个条件提出来。

文章最后说：全世界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终将扫除一切障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世界革命事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一切妖魔鬼怪统统要被消灭干净。

从整个过程看来，苏共新领导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分界线，从这以后，中国党和苏联党的关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破裂，但只是保持一种形式上的将破未破的关系。从这以后，我们党中央决定坚持原则：公开论战不能停止，我们保留答复苏共过去攻击我们的文件、决议、文章、讲话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因赫鲁晓夫下台而终结，因为苏共领导并没有公开宣布撤销过去那些反华文件。但是，只要苏共新领导不公开指名攻击我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

们，我们也不公开指名批评他们。至于针对某一事件，我们可以不指名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后来的情况表明，中苏两党关系，不是朝着逐渐好转，而是朝着不断恶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节　不参加苏共“23 大”

1966 年 1 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 4 月间召开“23 大”，并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在武昌休息。2 月初，少奇同志召集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周总理和邓小平）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之后，曾专门讨论是否参加苏共“23 大”以及其他一些外事问题，并要彭真同志和我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时向他请示此事如何处理。当时少奇同志等尚无定见，想先听听毛主席的想法。

2 月 8 日，彭真、陆定一、康生以及我和胡绳、许立群、田家英一行，从北京直飞武汉。当天中午，我们飞抵汉口机场后乘车直接去武昌东湖毛主席住处汇报。

汇报在毛主席东湖别墅接见厅进行，这是一个有排球场那样大的宽敞大厅，正面一排落地大窗，面对东湖。除了北京来人外，王任重（他当时是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首先由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胡绳等向毛主席汇报了学术批判问题。他

们根据北京草拟的《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谈了学术讨论中的问题和准备采取的做法。毛主席在听汇报过程有好些插话。第二天（2月9日），先由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的问题，然后由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汇报关于苏共“23大”以及几个外事问题。毛主席也讲了许多意见。

毛主席说，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地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理直气壮，只是说明他们内部有困难，需要这样做。他们那么怕我们，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暂时可以置之不理，把子弹储存起来。对于他们老一套的修正主义的反华言论，我们采取评《公开信》的形式，已发表了九篇评论。对苏共其他决议、报告、讲话、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已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些新东西，才考虑答复。那时不但要答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转载。

至于苏共“23大”，毛主席说，还有一个多月他们才召开，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

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当天晚上，我通过保密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若干个外事问题的意见。第二天，我们一行经上海返北京。

到了3月5日，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一个小会，参加的除周总理、小平同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彭真、陈毅、康生以及刘宁一（他当时主持中央联络部日常工作）和我。这次小会专门讨论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问题。会上大家倾向于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大家认为，苏共上一次大会（指“22大”）时，我党派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苏共领导在大会上发起围攻阿尔巴尼亚党，并影射攻击我们党。我党代表团没有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当时有些被动，只好在致词中申明立场，坚决反对苏共这样做，并且决定周总理提前回国。现在苏共新领导正在热衷于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内部正策划着反华，说不定在大会上会搞什么名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不参加为宜。即使越南党甚至朝鲜党决定参加“23大”，我们也不参加，而且这次大会不是兄弟党国际会议，只是苏共一党的事情，我们党没有必要非去参加不可。根据这次小会讨论的结果，我同钓鱼台一些秀才起草了一份电话报告，经彭真、少奇同志阅后由中央办公厅传到武昌去请毛主席决定。

过了几天，毛主席没有回音。彭真同志可能是估计毛主席反复考虑此事，于是请少奇同志再召开一次会议复议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问题。

3月10日，少奇同志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周总理（他到邢台去视察地震）和小平同志（他在5日会议后即赴西南视察大三线）都没有参加，只有彭真、陈毅、李富春三位政治局委员和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刘宁一和我列席。彭真在会上先说了他的想法。他认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决策时经常反复考虑。上次请示已经四天，主席还没有复电。可以考虑从另一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他着重说明，对苏共“23大”，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参加。因为这不是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对我毫无约束力。我们是应邀作为客人列席的。既然是人家自己开的会，人家请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这是个礼节问题。估计越南党和朝鲜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它们距离太大。这些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去参加苏共“23大”的理由。会上大家觉得，这些理由很不充分，上次小会上都考虑过，结论是相反的，因此仍然倾向不去参加。少奇同志认为，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主席。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他说，今天到会的常委只有我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会的也是少数。

散会以后，彭真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已征得少奇同志同意，要我和姚溱就会议讨论的意见再起草一个电话报告给毛主席。我和姚溱再三考虑，都认为不宜起草。最后彭真自己起草了一个报告，并且把我和姚溱叫到他家里去商量修改。我们对他起草的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武昌毛主席住处，一直没有回音。

3月16日，我接到中央常委在杭州开会的通知后，才知道毛主席已从武昌到了杭州。3月17日，我同彭真、康生、陈伯达一起飞杭州。在飞机上，谁也不知道开会讨论什么问题。到了杭州，住进西湖边上的西泠饭店，才知道各中央局的书记都来了。

3月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召开常委会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到会。但小平同志没有来杭州，他正在西南大三线视察。头一次通知他开会时，他请假；第二次毛主席还是要他来时，他说交通不便，道路不好走，还是请假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当时已到达杭州并准备参加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书记没有参加。

会议开始，毛主席提出，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问题，二是对当前的文化革命交换意见。毛主席说，上个月在武昌的时候，曾经谈过，关于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问题，还有时间考虑。现在苏共“23大”快要召开，

我们要确定一个方针，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要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至于文化革命，在武昌时也谈过，情况变化很快，也需要交换意见。各中央局书记将参加。

毛主席在谈到苏共“23大”时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但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此事可以告诉阿尔巴尼亚，也可以告诉朝鲜和越南。对其他兄弟党是否通知，大家可以议一下。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世界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

小会上大家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解释说，

过去给毛主席的第二个电话报告是仅供主席参考的另一设想，在北京的常委并没有肯定的意见。

会议的结果，决定答复苏共：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由彭真通知中央联络部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馆。

这次杭州会议，是过去十年中我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最后一次。

这样，在苏共召开三月分裂会议后，中苏关系分而不裂：国家关系是脆弱的，党的关系处于藕断丝连的状态。

※　　※　　※

从1956年3月到1966年3月，这整整十年间，是中苏关系从热烈到冰冷的十年。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发展和两国国家关系恶化。我党尽管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最终未能阻止苏共领导把关系推向破裂。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受当时情势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一百年，最后要由历史来做结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算起，于今才一个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

历史，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于今才80年。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胜利与失败的反复，高潮与低潮的交替，经验教训极其丰富，有待共产党人从纵横宽广的层面上加以思索、分析、归纳、总结。

本书基本上是本着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为有志于研究中苏关系史者提供第一手材料。由于体弱多病，时写时辍，前后十年之久，才得定稿。

写于1987—1997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下册）
作者＝
页数＝９４０
ＳＳ号＝１００９８８０７
出版日期＝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